



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

王行娟 著





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

王行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

王行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4插页221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59-1805-2/I·1244 定价: 8.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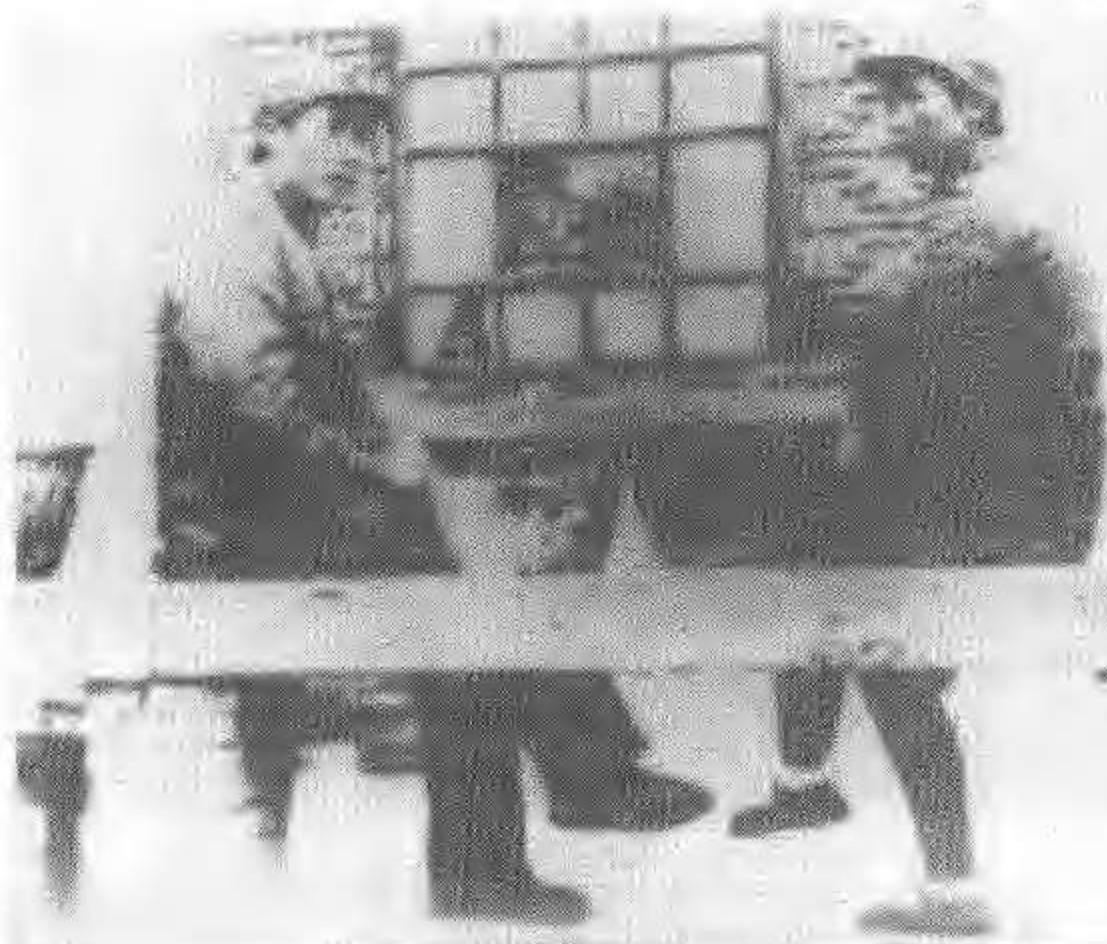


高个贺子珍与妹妹贺怡在沈阳。

贺子珍在延安。



贺子珍与毛泽东在陕北凤凰山。



贺子珍与李敏在苏联。



贺子珍(右)1937年
在西安与战友在一起。

毛泽东与李敏。



1962年毛泽东70岁生日
与李敏夫妇合影。

贺子珍在青岛海边。



贺子珍1962年与外孙孔继宁。



前 言

我由于工作的关系，有幸与贺子珍相识。承蒙她的信任，给我讲述了她的往事。她那执著的追求，善良、热情、大度的品性，以及她那坎坷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了我，使我萌生起要为贺子珍立传的想法。这个设想得到了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嫂子李立英的大力支持，给我介绍了许多有关贺子珍的材料，还提供了许多可作进一步探访的线索。贺子珍的侄女儿贺小平，外甥女儿贺海峰也给予了热情的相助。正是在他们的鼎力支持下，《贺子珍的路》一书基本上反映了贺子珍的一生。

《贺子珍的路》一书出版后，社会效果是好的。许多读者来信给予肯定，贺子珍的亲属对这本书也是满意的，贺子珍的嫂子李立英特地从福建来鸿致意。这本书至今还在重印，成为各种版本写贺子珍的蓝本，也成了一些人抄袭的对象。

对《贺子珍的路》一书，我是倾注了心血的，它的出版与产生的效应，正是我在写作时所希望达到的。但在成书之后，我又抱有很大的遗憾。

这是第一本涉及毛泽东家庭生活的书。在粉碎了“四人帮”，在八十年代初，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以后，人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在某些

1996/27

领域上仍然固守着原来的一套。比如对一个领袖的崇敬，似乎不仅由于他的丰功伟绩，他的婚姻、他的家庭生活，也应该是完美无缺的，成为世人的楷模。在江青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以后，人们能够接受和公认的毛泽东的夫人，是壮烈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杨开慧。于是一时间有关介绍她的文章，话剧、京剧，不断地出现。这种现象，当然已是很大的进步了。回想起在这之前，报刊上发表毛泽东答李淑一的一首词“蝶恋花”，对于“我失骄杨”中杨字的解释，竟然不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而成了李淑一的好朋友杨开慧。读了这个小注，不得不使人啼笑皆非，莫名其妙：既然杨开慧仅仅是李淑一的好朋友，为何毛泽东要说“我失”而不是“李（淑一）失”呢？

这个滑稽的小注的出现，可能是碍于当时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的地位，或者是江青的授意，或者是出自一种善良的意愿，认为树立毛泽东只有一个夫人的形象，会有利于人们对领袖的爱戴和尊敬。而这种观念在八十年代仍然在人们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贺子珍的路》一书，写的不是被人们所公认和接受的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而是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于是这部书稿的出版就遇到了重重的阻力和困难。阻力和困难不是来自于对史实的怀疑，而是：“已经广泛宣传了毛泽东真正的夫人是杨开慧了，怎么又出来个贺子珍？”“涉及毛泽东家庭生活的东西，以不出版为好。”对这部书稿的审查严格而且过程漫长，不断传来否定的意见，有几年不得不将它束之高阁。这部书稿最终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肯定，经中宣部批准内部发行，对我来说已经是满心欢喜很不容易了。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所能接受的程度，书稿不得不对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变的原因，毛泽东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感情生活等等，

采取回避的态度，删去一部份材料，这是我第一个感到遗憾的问题。

另外，为了展示贺子珍追求革命的一面，淡化她感情生活的一面，《贺子珍的路》的重心放在她生命的前半生，她怎样由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全书就出现了前重后轻、前细后粗的倾向，这是我第二个感到遗憾的问题。

我的第三个遗憾是，书稿的主要事实是贺子珍本人提供的。她的叙述难免带有个人主观的色彩，难免有记忆错误之处。特别是，当她的精神由于过度的重负，过度的压抑而罹患了神经症，因而她的叙述也难免反映了她的猜疑，把猜疑与事实混为一谈，把猜疑当成了真实的东西。这就使得《贺子珍的路》一书中，有一些记述与事实不尽相符。

我的衷心愿望是真实地记录下贺子珍的一生，既不美化，也不掩饰。我想把一个有血有肉的充满着革命激情和一生追求纯真爱情的贺子珍，把一个既柔弱又暴烈的贺子珍，把一个本应获得幸福却一生坎坷不幸的贺子珍，呈现在读者的面前。然而，《贺子珍的路》一书，没能比较充分地做到这一点，这是我感到遗憾的最主要之点。因此，在《贺子珍的路》刚出版不久，我就产生了要修订再版的想法，并且在第二版中作了一些订正工作。但是，这些小修小改远未能消除掉我的诸多遗憾，仍有不尽人意之感。

在随后的岁月中，我又拜访了一些曾与贺子珍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老革命家曾志、刘英、蹇先任、彭儒、水静等，听到她们对贺子珍的了解、介绍与评价，她们提供了很多有关贺子珍的珍贵资料。在毛泽东身边长期工作过的汪东兴，他的介绍更具有权威性，他的几次谈话都使我对贺子珍与毛泽东、

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担任过1948年——1951年毛泽东警卫班班长的武象庭、毛泽东的大秘书叶子龙的夫人蒋英、林伯渠的女儿林利都热情地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材料。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她的丈夫王景清，也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的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她常常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心脏衰弱，整天整夜地同我谈她的母亲贺子珍与她的父亲毛泽东的故事，这些充满了生活情趣的材料，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

我曾经用长短不等的文字，发表过“女儿心中的贺子珍”、“毛泽东的遗产”、“贺子珍精神病之谜”，作了一些介绍。这些稿件，也只是一鳞半爪地涉及到某一些方面，不能解决上面提到的遗憾。于是我决定再写一部关于贺子珍的书。

九十年代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下，人们观念更新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一些在八十年代还难以接受的事物和思想，现在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写毛泽东生活的书籍，电影、电视大量地出现，我当年写《贺子珍的路》时所遇到的一些来自社会方面的障碍，已不复存在，客观环境为我续写贺子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我可以放开笔去写了。

这部书稿的重点是贺子珍的后半生，以贺子珍的感情生活为主线，着重刻划她对毛泽东至死不渝的爱情，以及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未了情。在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直到毛泽东去世，长达二三十年的岁月中，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的沟通、书信往来，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女儿李敏进行的。因此，要写贺子珍的后半生，就不能不写到李敏，写到李敏与妈妈贺子珍、李敏与爸爸毛泽东的关系。它构成了这部书稿的特色。

这部书稿的一些内容，已经在河南省妇联主办的“妇女生

活”杂志上连载，题目为“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现在，这部书稿即将交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书名仍然定为《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它可以说是《贺子珍的路》的续集。

这部书稿是否能够达到消除遗憾，真实地全面地反映贺子珍的一生呢？我期求得到读者的公正的评价。

书稿中有不当之处，我诚挚地欢迎大家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王行娟

1992年6月28日

目 录

一、母女相逢在莫斯科	
飞往莫斯科.....	1
旅居苏联的贺子珍.....	6
二、一个临时的不象家的家	
她娇宠自己的女儿.....	15
贺子珍对岸英岸青倾注热情.....	19
谁都不提起的一个人：毛泽东.....	24
三、贺子珍的错误选择	
贺子珍的难言之隐.....	27
与毛泽东婚变的原因.....	29
又走错一步.....	37
四、战争，改变了母女的生活	
饥饿，困扰着她们.....	39
娇娇挨打.....	44
五、厄运降临	
严厉的爱.....	49
是妈妈救了娇娇.....	51
愤怒的贺子珍.....	55
娇娇成了孤儿.....	58

六、贺子珍关进疯人院之谜	
迫害并非来自王明	63
她怀疑是因为得罪了人	66
疯人院里的贺子珍	69
七、终于踏上自己的国土	
母女再次重逢了	75
她坚定地说：回祖国去！	80
在归途中	82
八、为工作、为女儿费尽心机	
艰难适应新工作	85
娇娇的教育蓝图	88
九、娇娇眼中的妈妈	
旧情难忘的妈妈	94
倾囊相赠的妈妈	97
娇娇的后悔	101
十、贺怡姨妈	
女中豪杰	106
龙萌生写信的念头	110
不让姨妈道歉	113
十一、爸爸的召唤	
她见到了爸爸	116
一个人的爸爸	120
贺怡的使命	123
十二、第二个妈妈	
娇娇不肯叫江青妈妈	127
岸青被迫搬出中南海	132
学会“外交手段”	134

十三、全新的生活	
爸爸供给制	135
四个人的爸爸	140
江青撕去伪装	145
十四、一年一度见妈妈	
都向李敏打听消息	148
一封医治心病的信	155
十五、西瓜诗的风波	
是西瓜画引出西瓜诗	158
江青承认：毛、贺感情未破裂	161
毛泽东说：我们家有三派	165
十六、父女情深	
要女儿读破万卷书	169
劝女儿打扮的毛泽东	172
同爸爸一次最严肃的谈话	176
十七、毛泽东的感情世界	
不能忘情于贺子珍	179
对江青复杂的态度	187
十八、庐山的会见	
李敏不当探春	192
一次精心的策划	198
毛、贺相会在美庐	201
十九、贺子珍的疯狂	
李敏结婚	206
再次发病的贺子珍	209
贺子珍的病症	213
二十、女儿的心意	

专机把李敏送到南昌	218
爸爸倾诉了心曲	224
二十一、寻找慰藉	
贺子珍重返故乡	229
寻找失去的儿女	236
二十二、初为人母的李敏	
搬出中南海	241
陪妈妈看社会主义	248
轮到李敏严厉教子了	250
二十三、在“文革”的狂飙中	
李敏不知该革谁的命	252
江青对准了“革命”的目标	257
“文革”中贺子珍一家	261
二十四、晚年的毛泽东	
李敏难进中南海	265
记住了李敏的年龄	270
心灵的祭奠	275
二十五、悠悠未了情	
命运再次打击了贺子珍	278
终于看到毛泽东的遗容	284
二十六、爸爸妈妈所留下的	
毛泽东的遗产	290
全家为妈妈送行	295
从妈妈那里继承的	299

一、母女相逢在莫斯科

飞往莫斯科

初生的婴儿最早认识的是谁？

是妈妈。

在世界上最钟爱女儿的是谁？

是妈妈。

这些回答都是对的。特别是在现代，在阳光普照的和平的土地上，儿童是社会的未来，祖国的花朵，他们时时刻刻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充分享受到母亲的爱。

然而，这些似乎都不适用于娇娇。

1937年，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她出生了。她的妈妈贺子珍，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生下这个女儿的。贺子珍的身体羸弱不堪。在1934年长征开始时，她是怀着身孕上路的。在长征路上匆匆产下一个女儿，未及仔细看上一眼就送了人，自己带着产后浑身的血污就上路了，根本谈不上产后的调养和休息，这已经很伤身体了。以后在敌机的一次轰炸中，贺子珍受了重伤，头上身上嵌进了十二个弹片，不仅所有的伤口在流血，连七窍都在冒血。在医生和战友们的抢救下，贺子珍是活过来了，但是大量的失血使她的身体更加衰弱。她是在这种条

件下怀上娇娇的，饥寒交迫的行军生活，使这个孩子在母胎里就先天不足。因此，当贺子珍在吴家窑一个又潮湿、又阴冷的窑洞里生下娇娇时，来祝贺的人们见到的是一个像一只小猫一样瘦小的婴儿。邓颖超抱起这个用破布裹着的小生命，不禁怜惜地说：“真是一个小娇娇。”娇娇因此得了名，大家都叫她娇娇。

由于贺子珍身体不好，没有奶，娇娇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娇娇从出生以后，在妈妈的身边一共只待了八九个月，还没有记熟妈妈的面孔，贺子珍就把她安置在保安的儿童保育院，只身去了苏联。

事实上，严格地说，娇娇在妈妈的身边，连八九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在她长大以后，听周围的阿姨说，妈妈生下她刚满月，就把她撂给了奶妈，自己上抗大学习去了。抗大过的是集体生活，只有星期六才能放假回家，贺子珍也就是一周回来看孩子一次。只是由于贺子珍身体太差，读了几个月，支持不住，有一次还晕倒在厕所里，这才辍学回了家。但是回家后的贺子珍并没有自己带娇娇，而是一心想离开延安找个医疗条件好的地方，把留在身上、头上的弹片取出来。她最先想去西安，转道上海，到上海动手术。上海沦入日本帝国主义手中，不能去了，她又想去苏联，而且不久果然成行了。这样计算起来，娇娇在妈妈的身边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

娇娇是在儿童保育院里长大的。有人说，她是在延安的消费合作社里长大的。消费合作社里住着一位年岁较大的女同志，同她朝夕与共，照顾她的生活。但是娇娇记得，她在延安时，同她一起生活的，不仅有阿姨，还有很多小朋友。每天，太阳要落山了，总有许多爸爸妈妈来把小朋友们接走，没有人接的，除了她以外，还有一个比她大一点的男孩子。这个男孩

子每次看到别人的爸爸妈妈来接其他的小朋友时，总要放声大哭，嘴里不停地喊：“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要回家！”

娇娇不知道这个男孩子为什么老哭着要找爸爸妈妈，她从来不找爸爸妈妈。在她长到四岁被送到莫斯科找妈妈之前，在她的印象里，不仅没有妈妈，连爸爸也没有。她年年月月，日日夜夜，都住在幼儿园里，同阿姨们在一起。在这里她过得很快活，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阿姨们也都爱她，她不觉得需要找爸爸、妈妈，更不会哭着找爸爸、妈妈。

娇娇从小就是个安静、内向的女孩子。她所在的儿童院，座落在延安附近的窑洞里，走出窑洞的门口，眼前就是绵延不绝的山峰，娇娇爱看这山川的景色。到了傍晚，小朋友回家了，这里静静的，娇娇一个人坐在窑洞的门口，看太阳落山，映照得满天的红霞，好看极了。有时候她会看到身披彩色羽毛的野鸡，在对面的山包里跳来跳去，更觉得好玩极了。她常常是直等到天都全黑了，才回到窑洞里去。

在战争的年代，红军内部实行战时供给制，干部子弟的生活费全部由公家包干，连身上的衣服都由公家统一制作。因此，娇娇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有组织的照料，生活也过得很好。

在贺子珍离开延安后，毛泽东是否到过儿童保育院探望过娇娇，或者把她接回家共度周末，娇娇一点都记不得了。当时她还太小，不记事。据当时在延安的一些老同志说，毛泽东是接过娇娇的。但是一来娇娇太小，他弄不了，二来公务繁忙，腾不出手来照管女儿，接娇娇的次数比较少。后来毛泽东与江青结了婚，^①家国两忙，也就更顾不上在儿童院里住着的娇娇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这个女儿，娇娇被送到莫斯科她妈妈那里，可能是毛泽东的主意，起码是得到他的同意。

1941年初，娇娇同几个比她大的哥哥姐姐一起上路了。同行的哥哥姐姐是到苏联去学习的，他们都是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他们这次行程既有风险而且漫长。为了躲过国民党的眼睛，他们被藏在苏联到延安来的飞机的机翼里。飞机到达兰州后，他们被伪装成行李一个个扛下来。在兰州换了飞机，到了新疆，然后在新疆等飞机再飞莫斯科，整整走了三个月。

自从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实现了合作，特别是中、苏、英、美结成了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联盟以后，在西安、兰州和新疆，中国共产党都设立了办事处。苏联的飞机经常走这条路线，给国民党和共产党运送军需品。这些飞机在完成运输任务返航的时候，就把我们党的一些有病的领导干部，或在长征中受伤未愈的同志、需要学习或进修的干部，以及一些领导干部和烈士的子弟，带到苏联去治病或学习。由于办事处之外就是国民党的天下，国民党不断地监视和干扰，我们党有的人员赴苏，不得不采取秘密的或伪装的手段。而且由于苏联的军用飞机并不是定期直航，要去苏联的我们党的人员，不得不在西安、兰州、新疆的办事处长期地等待。1937年贺子珍去莫斯科，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也是一走好几个月。贺子珍是被送出去学习、治病的第一批老同志，当时她是怀有身孕上路的，到达莫斯科不久就分娩了。贺子珍坐的是苏联的运输机，娇娇坐的是苏联的轰炸机。

娇娇现在还记得，她上路时的一身打扮：身上穿着飞行员的服装，外面套着一件黑色的小皮大衣，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皮帽。她说：“我当时不只有一顶皮帽子，还有一顶毛布做的帽子，毛布帽是按头的大小做的，紧紧套在头上，一直遮到眉毛上。帽子上有两条又粗又长的带子，把它结起来，就成了围巾。

事实上，她并不是穿着这身漂亮的飞行服离开延安的。在

当时的延安，还不可能为孩子置办这样奢华的服装。这是在她到达新疆以后，中共驻新疆办事处的同志为她去苏联特地购置的。到苏联去，也就是出国了，每个出国的人在新疆办事处都要换装。男的换上西服，女的穿上裙子，小孩子则置备漂亮的童装。贺子珍当年在这里换上长大衣、棉旗袍。这些出国服装并不归个人所有，而是打借条向公家借来的。等到从苏联回来，还要还给办事处，留待下一批去苏人员穿用。

同娇娇一起赴苏的，有叔叔、阿姨，还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朱德的女儿朱敏也是乘的同一架飞机赴苏。一路上，有大哥哥、大姐姐同她玩，娇娇一点不感到寂寞。在这一行中，她最小，大家都喜欢她，照顾她。娇娇记得，上飞机时，她迈不上舷梯，是苏联的飞行员把她抱上飞机的。

后来娇娇才知道，她到苏联找妈妈的消息，事先并没有通知贺子珍。飞机到达莫斯科后，没有人来接她，飞行员把娇娇送到中国留学人员的住所，直到此时，贺子珍还一无所知。当其他留学人员来对她说，你的女儿娇娇到莫斯科找你来了，她还不相信，以为同志们同她开玩笑。她是半信半疑地跑去看被称为她女儿的这个小姑娘的。她见到的是一个四岁的穿得挺神气的小姑娘，正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以后贺子珍多次向女儿重复母女俩初次重逢时的精彩对话：

“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字？”这是贺子珍带着浓重江西口音的问话。

“我叫娇娇。”娇娇的回答带着陕北的口音。

“娇娇干什么来了？”

“我找妈妈来了。”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什么礼物来了？”

“我把娇娇给带来了。”

此时，贺子珍悲喜交集，一下子把娇娇揽在了怀里，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以后，贺子珍向周围的同志讲述这个经过时，总是满面笑容，带着夸耀的口气。她为女儿的伶牙俐齿感到高兴。看来娇娇在妈妈面前的第一次亮相，反映良好。

那么，娇娇第一次见到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娇娇的直觉是：她的妈妈同延安的阿姨们不同。眼前的妈妈烫着一头卷发，穿着裙子、窄窄的高跟鞋，而延安的阿姨们都是短发、军衣、布鞋，衣服上还打着补丁。她看着这个妈妈，就象第一次看到莫斯科的楼房、马路一样新鲜，充满着神奇的色彩。在延安的时候，她听到好多阿姨说过，她的妈妈怎样漂亮。年幼的娇娇还分不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她只觉得眼前的妈妈脸色太白，几乎没有一丝血色，身体太瘦，只剩一把骨头，似乎风刮得大一点，都会把她吹倒。

妈妈是用热烈的拥抱，带着泪痕的微笑来迎接她的。娇娇清楚地感觉到，妈妈爱她，对她充满了柔情。她尝到了过去没有尝到过的母亲之爱。

小小的娇娇，怎么可能知道她的到来，给贺子珍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欢乐呢？

旅居苏联的贺子珍

贺子珍是在丧子失夫的双重悲痛中迎接她的女儿的。

贺子珍这个在1926年在江西永新的老家，参加了共青团，1927年转了党，在大革命时在江西省永新县叱咤风云的女红军

战士，虽然时年不过三十出头，却走过了坎坷的革命经历。她出身名门，祖父在万源山拥有大片的田山，她父亲捐过举人，当过安福县的县长，母亲是个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一场官司把父亲牵连进去，坐了牢。为了赎出父亲，弄得倾家荡产，使当时小小年纪的贺子珍，体会到了社会的险恶，人间的不平等。当她长成一个姑娘，她成为永新县城的一枝花，是县城里最美丽的姑娘。她本可以按照父母的愿望，找个有钱有势的少年公子，结成美满姻缘，过着荣华富贵的少奶奶生活。但正直善良的贺子珍，却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

在大革命的年月，她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永新县国民党县党部的工作，担任了妇女部的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她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县委会的委员，为推动永新县革命的进程，作了很多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永新县的许多共产党员被反水的国民党反动派投进了监狱。正在吉安县担任妇女部长的贺子珍，与陆续逃离永新县的一些共产党员一起，组织了永新暴动，发动周围的农民武装，攻陷了永新县城，救出了监狱的同志。以后，她又随着袁文才、王佐的农民革命军上了井冈山，成了那里唯一的女共产党员。

贺子珍是与袁文才、王佐的农民革命军一起，在井冈山上迎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在共同创建井冈山武装割据的战斗中，她与毛泽东结下了情谊，成为了夫妇。在以后我党革命最艰苦的10年，她风里雨里，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开辟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出生入死，历尽了千难万险。就在革命的形势出现了转机，延安成为了抗日救亡的中心，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的时候，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于是，她不顾毛泽东的一再劝阻，挽留，决

心离开延安。她离开的理由是，取出长征被炸伤时残留在身上的弹片，另外还想有个学习进修的机会，以便提高工作能力，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她向打听她的行踪的同志们一再申述的理由。

贺子珍要离开延安的第二个理由是过密的生育影响了她的健康，影响她的学习和进步，她要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调养身子，读一点书。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十年，怀孕、生育了了六次，几乎是处在不断的怀孕、生育的过程中。她自己说，我生孩子都生怕了。怀孕、生育的妇女，负担本来就很沉重了，还要风餐露宿，行军打仗，忍饥挨饿，就更加不容易了。所以，在那个时代一些事业心极强的妇女，都不肯要孩子。由于当时没有避孕的工具，这些坚强的女性在怀孕以后，都做人工流产，同时做绝育的手术，以至终身不孕。贺子珍处在这种身份，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于是她只好承受不断怀孕的痛苦。

然而，更使她痛苦的是，毛泽东并不完全理解连续生育对一个妇女所带来的负担，他就曾经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过：“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象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男人还不能理解哺育子女要耗费做妈妈的多少精力，即使按照当时的战时供给制度，公家可以出钱雇用一個保姆，母亲的担子仍然是很重的。每当毛泽东同贺子珍发生口角，贺子珍觉得，毛泽东骂她的话对她刺激最大的就是：“你政治上落后”，“你政治上不进步。”对此，贺子珍感到万分的委屈。

贺子珍不是那种软弱的、依赖性很强的人。在大革命的年代，在井冈山武装割据的时期，在与毛泽东成为夫妇之前，她曾经显示过她的组织才能。在1927年永新暴动时，她配合三县的农民武装，带领一支赤卫队，守卫永新县的南门，凭着三支

枪和赶造出来的梭标，打退敌人的进攻。那时她才17岁。她会打一点枪，更善于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她都是干得非常出色的。群众工作就是领导群众的工作，这是需要有领导者的素质与修养的。人们不难看出，如果贺子珍不是同毛泽东结婚，在革命的岁月中，她会同别的女同志一样，锻炼成为我们党一名有才干的女领导。同毛泽东结婚，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也改变了她的工作方式。她不能再做群众工作了，被留在毛泽东的身旁，当他的生活秘书，照顾他的生活。她成天面对的是乱七八糟的报纸，把毛泽东圈出的新闻、报道，剪好、贴好，分类保存好。这是在闭塞的井冈山和随后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漫长的战争年月中，毛泽东了解敌情、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不能说这个工作不重要，但是贺子珍不习惯，不喜欢，她喜欢到群众中去，干开拓性的、能发挥她的所长的工作。为此，她曾经很后悔过这桩婚姻，也同毛泽东怄过不少气。她埋怨毛泽东：“你不培养我”，“你把我关在你的笼子里。”

在1929年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下山去打击敌人，留下彭德怀、滕代远的红五军和王佐领导的32团守卫井冈山时，贺子珍曾经下决心留下来不走，与他们一起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她的动机是：她已经知道，杨开慧牺牲仅是误传，毛泽东下山后有可能与杨开慧重新汇合，他们可以恢复夫妻关系；另外，她可以告别那剪报的生活，重新开始搞她所热爱的群众工作。

贺子珍的这些想法，过去就有，但每每被毛泽东的柔情所化解。毛泽东一面晓以大义，反复说明这些剪报有多么重要，革命工作有多种；另一方面表白自己是多么需要她。贺子珍的确爱着他，只得承认这个现实，当毛泽东的后勤。这次贺子珍要留在井冈山的决心很坚决，毛泽东怎么劝说她都不肯改变初衷。还是毛泽东搬来了救兵——请了也在山上的曾志做说服教

育工作，才使贺子珍同意下山。

即使这样，在随后的岁月里，贺子珍不愿当家属、作陪衬，要求学习，独立干工作的初衷并未改变。1930年古田会议后，革命形势好一点，她怀着身孕，到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去读了一阵书，直到生孩子时才离开。在红军长征到达保安以后，当时她怀着娇娇，坚决不肯再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要求干独立的工作。毛泽东拗不过她，只得把她分配到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去工作。这个工作，虽然因为生娇娇，只干了几个月就停止了，但是在这几个月中，她工作得兢兢业业，这是所有的人都公认的。她挺着个肚子，白天印钞票，晚上检查印刷的数量和质量，白天晚上都不肯离开自己的岗位一步。银行就设在瓦窑堡，同中央机关设在一起。她忙得连家都不回，还是毛泽东隔三差五地到银行的宿舍里来看她。

贺子珍不是不愿学习进步，而是不能学习工作。她不愿意被看作是个政治上不开展的落后的人。因此，她决心要到苏联去，争取学习的机会，改变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

她到达莫斯科不久就分娩了，是个男婴，长得手长脚长，酷似他的父亲。开始东方大学派了一个老太太帮助她管孩子，洗尿布。以后王稼祥说，八部那里有托儿所，还可以学习，这样，贺子珍和同时生孩子的女同志搬到八部去，把孩子放进了托儿所，自己参加了这里的学习活动。

贺子珍按照外国人在此地居住的习惯，给孩子取了个苏联名字柳瓦。她每天到托儿所送几遍奶，晚上把孩子带回宿舍。

在生了孩子后的头几个月，贺子珍的情绪是乐观、积极的。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托回国的战友捎给毛泽东。她写信时，离开延安时的愠气的情绪已经烟消云散，她用一种平静

的、亲切的口吻写到她来到莫斯科后的经历，她说，她到医院作过检查，医生说，嵌入她身体的弹片埋得很深，同她的肉已经长到一起，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取出来了。她写到她生了一个男孩，长得很象他。她在信中还说，她想在苏联学习几年后再回国。她把这封信连同在兰州时拍的一张相片一起捎走后，就安心地读书、看孩子。

她完全没有料到一个接一个的不幸会降临到她的身上。

东方大学八部的托儿所设备是一流的。白白的小床整齐地排列着，一色的白床单、白被子，连小孩用的尿布也是白白的，给人一种洁净、卫生的感觉。托儿所里配有专职的医生、护士，他们同保育员一起照料孩子。但是在三十年代，医疗的水平比较差，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能力很低。在贺子珍的小男孩6个月的时候，一阵流感袭来，托儿所几十个孩子交叉感染，她的小男孩也传上了，而且不久转为肺炎。当时消炎的特效药盘尼西林还没有问世，孩子没有药服，只能喝盐水，不久就死了。

贺子珍哀痛欲绝。她久久地抱着那个已经变冷、僵硬的小尸体，不肯放手，不让战友们把他埋掉。当时同贺子珍一起学习的贺诚，钟赤兵等人无论怎么劝都不行，只得强行把他抱走，把他埋在校园里。

在这场流感中丧生的婴儿，不只贺子珍的一个。刘英的一个新生的婴儿也夭折了。对于孩子的离去，当母亲的哪能不悲痛。但是贺子珍悲痛的程度显然要比别人更强烈更巨大。她把小男孩的照片放在床头，日日夜夜都要看着他。她还经常来到校园，坐在长凳上，看着那个埋葬了她的小生命的小土丘，流着泪，低低地喊着他的名字。同她一屋住着的李英儒的夫人王美兰发现，贺子珍早上起床，枕头上常常有一大片泪痕。

这个打击对贺子珍来说，已经是够沉重的了，然而更加沉重的打击又接踵而来。

中国党派到苏联去学习的同志，一般是定期的，时间都不长，一年半载左右。考虑到如果花很多时间学习俄语，就上不了多少课了。因此，我们党派出去学习的干部，不一定学习俄语，由翻译把老师讲的课翻译成中文，让大家了解课程的内容。苏联的报纸这里的学员都看不懂，为了让大家了解时事新闻，决定以每周几次由翻译读报的方式，把重要的新闻念给大家听。

有一天，读报员读到了一条消息：塔斯社的记者在延安会见毛泽东，双方在窑洞里谈了很久。记者告别时已经是晚上了，毛泽东与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读这条消息时，贺子珍在场。她态度镇静，没有作出任何的反映或表示。但在她的心里，却是翻江倒海卷巨澜。啊，毛泽东已经结婚了。

在以后的日子，贺子珍周围的战友发现，她常常显得心神不定，上课时老走神，人坐在那里，却什么也没听进去。她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现在更是几乎彻夜不眠。但是在这段日子里，她还坚持上课，参加集体的活动。可能在她的内心，还存有一丝的希望，一点幻想，报上所公布的消息是误传，并不是真的。

然而不久这个消息就得到了证实。193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到苏联治病，毛泽东托他们给贺子珍带去一封信，还有一箱书。毛泽东的信很简短，一开头称她贺自珍同志，而不是过去惯用的称呼自珍。毛泽东从来都叫她贺自珍而不是子珍。自珍是贺子珍在参加革命后自己起的名字，她原来的名字是桂圆，是父母亲根据她出生在八月十五中秋之夜而起的。在革命

队伍中，同志们都称她子珍，于是她也就把自珍改为子珍，可是毛泽东仍习惯称她自珍。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有人记得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这封信实质上是毛泽东向贺子珍宣告：他们的夫妻关系从此结束了。

收到这封信后，贺子珍最后的一丝希望完全破灭了，她流泪了。她的第一根精神支柱是小男孩，已经倒塌了；现在丈夫这一根精神支柱也倒塌了，生活对她来说是一片渺茫。

从此，贺子珍陷入极度的烦恼之中。她几乎是整夜整夜地失眠。她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时，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到苏联上学后，她竭力改变这种生活习惯，遵守学校的作息制度。但是，在毛泽东已婚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彻夜难眠的她，早上再也起不了床，既吃不了早饭，也上不了第一堂课。而且，夜里睡不着的她，还无法安静地在床上躺着。一躺到床上，往事就会象过电影那样，一幕幕在她的眼前出现，弄得她更加心烦意乱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只好起来，没事找事干，洗洗衣服，整理用具，甚至跑到院子里散步，直到精疲力竭，睁不开眼睛，才上床去睡，而这时往往已经天明了。这样，贺子珍不仅第一堂课上不了，连上午的课都无法坚持了。好在这儿的学习并不是很正规的，带有干部培训的性质，有时一天就上两堂课，不要考试，也无所谓结业，学习期满学习任务就算完成了。

对贺子珍的失魂落魄，一起学习的人的议论不一样。有的人很有意见，认为贺子珍落后，只想孩子丈夫，不好好学习。更多的人则是对她充满了同情，特别是一些同病相怜的人。在延安，中国革命形势好转之后，有个别高级干部嫌原来一起革

命的妻子老了，丑了，换上投奔革命而来的年轻漂亮的女学生。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情形当然不是这样，但一个女人，即使是刚强的、献身于革命的女人，当她面临到失去家庭、失去儿子、失去丈夫的困境时，能淡然处之吗？何况贺子珍又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呢。

娇娇就是在妈妈这种复杂、痛苦的心情下，来到妈妈的身边的。

二、一个临时的不象家的家

她娇宠自己的女儿

娇娇的到来，使愁肠百结的贺子珍精神一振。她到苏联以后，几乎很少想到这个女儿，也没有料到她会来。现在女儿从天而降，这是她所剩的唯一的亲骨肉了。她那已经干涸的心田，似乎注进了一股清流。她的生活中，有了一些生气。她感到，自己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人，女儿需要她。是娇娇，使她的精神振作起来，成了她的新的精神支柱。她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女儿的身上了。

当时的苏联的党，对旅居苏联的政治侨民，是很照顾的。共产国际为东方国家的共产党员设立了东方部。东方部的部长最早是王明，他同时是共产国际的书记，负责研究东方国家革命的情况以及从东方来的革命者的照管工作。共产国际还专门开设了东方大学，培训东方的革命人员，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等课程。贺子珍就读的，就是东方大学的一个分部，在这里学习的全部是中国来的同志。1937年12月，斯大林命王明回国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工作，东方部部长的的工作就由王稼祥接任。王稼祥当时正在苏联治病，他对从国内来的同志特别照

顾。当时共产国际的书记在莫斯科的郊外都有一栋别墅，俄文叫大卡，王明也有一座大卡。在他走了以后，王稼祥把这座别墅变成中国同志周末度假的地方，贺子珍同她的战友们每逢周末就到那里去玩。王稼祥自己住在共产国际的招待所里，周末，他也常到别墅去玩，看望大家。苏联的共产党还给中国来的同志提供了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中国同志所需要的衣服，包括御寒的大衣、皮鞋都是发的。娇娇看到妈妈身上的一身洋装，还有高跟皮鞋，都是发的。生病的同志上医院，来回都有汽车接送，吃饭有专门的厨师为中国人做中餐。此外，每个月每人有60卢布的零花钱。

在女儿来到以后，贺子珍就用公家发给的零花钱打扮女儿。她给女儿买漂亮的裙子，各式各样的玩具，娇娇从来没有玩过那么多的玩具。

在延安，幼儿园的阿姨没有功夫给娇娇梳辫子，给她剪了个男孩子式的小分头，短短的。到苏联以后，妈妈把娇娇的头发留长了。而且，在阿姨们的怂恿下，妈妈还带娇娇去烫了发。那时烫发用的是电烫，把头发一绺绺梳好，加上药，缠紧，夹上铁夹子，然后通上电。夹子夹得娇娇的头皮生痛，灼热的电流烤得娇娇头皮发烧，娇娇害怕极了，生怕头皮被电烧破，长个大包出来。她大声地哭起来，不肯再烫了。可是理发师警告说：不能动，动了，头发就会全部被烧掉。娇娇只得含泪强忍着，那几十分钟就象上电刑那么可怕。结果，头发烫成一个个小圈圈，梳都梳不开，每天梳头，娇娇都疼得直叫。

可是，妈妈觉得女儿这样挺美，她带着烫了发的女儿去照相。在照相馆里，妈妈教女儿摆姿势，人往后坐着头转过来照了一张。妈妈又让娇娇撑着一把阳伞，穿着西式衣裙照了一张。娇娇的这些照片，在叔叔、阿姨们的手中转阅，大家都夸

娇娇长得可爱，贺子珍的心里乐滋滋的。

在娇娇初到莫斯科的这个时期，她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了，妈妈娇宠着她，给予她全部的爱。每天晚上临睡前，母女俩躺在床上，妈妈为女儿轻轻地唱歌。娇娇发现，原来妈妈有一副好嗓子，声音圆圆的，甜甜的。她不知道，在1927年大革命的年月，贺子珍曾经用这副嗓子唱革命歌曲，唤起民众，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妈妈会唱的歌很多，有几歌：

我家有个小娃娃，
早上起床不洗脸，不刷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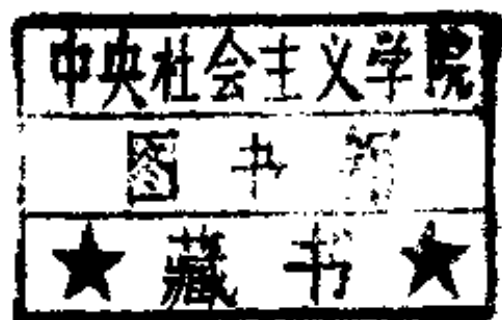
.....

娇娇听了后说，这个小娃娃不是她，她是每天都洗脸、刷牙的。

妈妈还唱过：

小鸟飞，小鸟飞，
飞到东，飞到西，

.....



娇娇的心随着妈妈的歌声也在飞，飞呀飞呀，飞累了，睡着了。

妈妈还会唱江西民歌，井冈山情歌，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歌。她每天轮换着唱，娇娇听得入了迷。在那个时候她常常盼着天快点黑，好早早上床听妈妈唱歌。娇娇后来对音乐的喜爱，也许是从听妈妈唱歌开始的。

迷人的歌声让娇娇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夜晚。她的白

天同样是愉快的。在刚到莫斯科的那段时间，她没上国际儿童院，就待在妈妈的身边。妈妈没事时就带她逛公园，逛大街，逛商店，天天见到的都是在延安没见过的新鲜事，她快活极了。

娇娇不仅是妈妈的宠儿，也是东方大学所有中国叔叔阿姨的宠儿，大家都喜欢她，争着抱她，逗她玩，给她讲故事。她是妈妈这个圈子的中心，大家喜欢的小公主。

小孩子的模仿性强，到莫斯科不久，娇娇就学会了简单的俄语，交上了外国的小朋友。在离她的住处不远的一栋楼里，住着一家西班牙裔的人家，那家人家有一个同娇娇差不多大小的小男孩。娇娇很喜欢同他玩。这个小男孩满头卷发，深深的大眼睛，长得很可爱。他有一座小木马，可以前后摇动，就象真的骑在马背上那样。娇娇胆小，不敢往上骑，怕摔下来。那个小男孩一再鼓励她，向她保证说绝不会摔跤，还一次一次骑上去示范。这样，娇娇学会了骑木马，以后天天到这个小男孩家去骑木马。她也把自己的玩具带去同小朋友一起玩。有一次，她带来了一个彩色的汽球，是妈妈给她买的。汽球下面系着一根小绳子，妈妈告诉她，玩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这根小绳子，一不小心放了手，汽球就会飞到天空去了。娇娇半信半疑。她试着松手，汽球果然飞到屋顶上去了。她和那个小男孩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汽球抓了回来。他们觉得好奇怪，汽球怎么会飞上天空的？是不是汽球里装了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小男孩出了个主意，把汽球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于是两个小家伙用木马的耳朵把汽球戳穿，啪地一声，汽球破了，成了软绵绵的碎片，再也飞不上天了。他们到底也没有弄明白，里面什么也没有的汽球，怎么会上天的。

在莫斯科，同娇娇一起玩的，除了这个小男孩以外，还有两个男孩子，这就是娇娇的同父异母兄长毛岸英和毛岸青。

贺子珍对岸英岸青倾注热情

193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害以后，她的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由党组织送到上海，进了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关于这兄弟三人的命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31年，岸龙患禁口痢病故，不久，发现出了叛徒，党组织解散了幼稚园，把岸英兄弟隐藏在一位共产党员家里，一待就是五年。1936年，经党组织的安排，张学良将军的资助，他们乘轮船去了法国，从法国再转道去苏联。由于在法国等候去苏联的签证，等了好久，他们到达苏联时，已经是1937年了。另一种说法是，兄弟仨进了幼稚园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幼稚园被打散，兄弟仨人流落街头，以捡破烂卖报纸为生，岸龙走失，不知下落。以后党组织找到岸英、岸青，设法把他们掩护起来，并送到苏联。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正确，总而言之，他们哥俩到了苏联，那时岸英已经14岁，岸青12岁了。

贺子珍住到八部时，岸英和岸青刚刚到达。他们要住进国际儿童院，在那里学习文化知识。国际儿童院是苏联的党为了抚养教育各国共产党烈士和领导干部的子弟而专门开设的学校。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照管从中国去的烈士的子弟。岸英和岸青到达时，王稼祥已经回国，东方部的工作由陈潭秋负责，陈潭秋怕在苏联的国民党特务知道他们的身份，加害于他们，特地给他们各起了一个很俗气的名字，毛岸英叫永福，毛岸青叫永寿。他们兄弟俩在进国际儿童院的手续未办妥之前就住在八部，与贺子珍住在一个院子里。

贺子珍知道他们是杨开慧的孩子，就主动跑去看他们。但是，这兄弟俩并不认识贺子珍，也不知道她的身份，只是觉得

这个阿姨对他们格外热情，和蔼可亲。

贺子珍发现，岸英比较成熟，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强，自己的用具衣物整整齐齐。岸青则比较差，衣服邋邋遢遢，象个流浪儿一样。他衣服脏了也不知道洗，脱下来往什么地方一塞，脏袜子都发出臭味。他可能在上海时受到过刺激，耳朵受过震动，听别人说话有点耳背。贺子珍很同情他们，隔几天就去一次，把他们的脏衣服找出来，拿回宿舍洗净，晾干，叠好，又给送了回去。一次两次，被这哥俩发现了，他们好生奇怪，对别人说：“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姑娘对我们那么好！”后来人们告诉了他们贺子珍的身份，他们才恍然大悟起来。这以后，在八部的中国同志把“那个姑娘”的提法传为笑话。

贺子珍主动去关怀两个孩子的生活，是出自于对杨开慧的崇敬。

在毛泽东率部上了井冈山后，她作为永新县的县委委员，经常向毛泽东介绍当地的情况，毛泽东对在井冈山上的领导层中，竟然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感到十分的惊讶，也乐意向她打听一些当地的情形，两个人逐渐地熟悉起来。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贺子珍的表现是出色的。为了攻打永新县城，她接受军委的一项特殊任务，利用她是永新人的身份，熟悉这一带的群众，带领十名战士，秘密潜回永新，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敌人兵力部署和有关的情况，并且协助那里的党组织，发动那里的农民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这是深入虎穴的一项艰巨任务，对贺子珍的能力是一次考验。临行前，毛泽东嘱咐她，要大胆机智，小心谨慎，紧紧依靠当地的群众和党组织，这样胜利就有保证了。贺子珍牢记了这些话。在工作过程中，由于叛徒的告密，贺子珍在一个老百

姓家正与队员们研究收集到的情况，地主武装突然包围了这栋房子。几个男队员硬冲了出去，这家老百姓不顾一家三口的安危，豁出了性命掩护了贺子珍，没有让敌人搜到。待敌人走远后又找了个向导，把贺子珍安全送了出去，使她和她的战友如期完成了军委交给的任务。贺子珍能够脱险，主要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紧紧地依靠了群众的结果。通过这一次战斗，她看到了毛泽东的睿智和正确，产生了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自己会进步得更快的想法。

在红军第三次攻下永新以后，毛泽东实行分兵，把红军组织成一支支工作队，深入永新的各区各乡，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训练建立工农暴动队，筹粮筹款，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贺子珍带着一支工作队来到西乡塘边村工作，不久，毛泽东也带领了一部份战士到这里来搞调查研究。贺子珍向毛泽东学了很多怎样搞调查研究的方法。在塘边村，他们遭到了外县一支地主保安队的袭击，在危急的时刻，毛泽东沉着冷静，指挥若定，化危为安，更使贺子珍佩服不已，不禁产生了依恋之情。

贺子珍感情上的这些变化，毛泽东也觉察到了。他觉得这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好姑娘，向她吐露了自己的心曲。他告诉贺子珍自己追求革命、献身革命的经过。他说，他已经三十四岁了，结过婚，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他同家人已经久不通信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否都好，是生是死。说到这里，毛泽东不禁神色黯然。

贺子珍被深深地打动了。她觉得，毛泽东为了革命、抛妻别子，孑然一身，多么不容易。他身上担子那么重，工作那么忙，自己的生活都无暇料理，有多困难。她看着毛泽东那身好久没有洗过的旧军装，在对他敬佩的目光中，又加上了怜爱之

情。两颗炽热的心就这样碰撞在一起了。

贺子珍生活在毛泽东的身边后，她用女性的细心与温情，悉心地照料毛泽东的生活，给了毛泽东很多的慰藉。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感情也是很深的，处处关怀她，开导她。但是贺子珍清醒地认识到，在她同毛泽东之间，还有一个杨开慧。她始终认定，她同毛泽东的关系只是偶然的、暂时的，是出自于对毛泽东的挚爱而无保留的献身。她认定毛泽东同杨开慧一定会重相聚首，他们才是应白头偕老的夫妻。因此，从她同毛泽东共同生活之日起，她随时准备着一旦听到杨开慧的消息，就自动地离开毛泽东，让他们夫妻团圆。

她同毛泽东双双从塘边村返回井冈山以后，一起住在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有一次，毛泽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贺子珍总是把她自己的衣物用一个旧包袱皮包好，放在另一处，从不同他的衣服混放。他指着包裹问贺子珍：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的行李。”

毛泽东打开一看，里面是贺子珍的一身换洗衣服，一双草鞋，一双布鞋，还有一把刀子。在那个极其艰苦的年月，这就是贺子珍的全部行装。

毛泽东大惑不解地问：

“你准备你的行装干嘛？”

“准备走呀，你什么时候把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你。她带着三个孩子，多不容易，我还年轻，到哪里都可以工作生活。”

毛泽东听罢，半天没有说话。他紧紧地拉着贺子珍的手，用一种深情的复杂的眼神凝视着她。

生活中的毛泽东，有时也会象年轻人那样搞点恶作剧。有

一回，他看到贺子珍又在整理她的小包袱，就用严肃的口吻说：

“我通知你一件事，杨开慧很快就要来了。”

贺子珍听罢，没有一丝犹豫，拿着她的小包袱就要离开，她对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我祝福你们夫妻生活美满幸福。”

她转身要下楼了，毛泽东一把拉着她，笑着说：

“你走什么，我这是骗你的呢，杨开慧哪里就来了。你不要老是这样，老说要走，要离开我，你应该很好地帮助我。”

毛泽东的这次试探是假，但是贺子珍不愿因为自己，影响毛泽东的家庭，却是意真情切，没有一点的私心，没有个人的考虑，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纯真的情怀！

前面讲到过的，她不愿意跟随毛泽东下井冈山，要求留下坚持地方斗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考虑到毛泽东下山后与杨开慧相遇的机会增多了，她愿意空出这个位置让他们夫妻团圆。

1930年底，当贺子珍从报纸上读到杨开慧壮烈牺牲的消息时，她流下了眼泪。毛泽东的神情也非常沉痛，不断喃喃地说：

“真可惜了，她是个女中英豪呀！”

在杨开慧牺牲之后，她同毛泽东都惦记着那三个孩子的命运，不知他们是否平安，现在在哪里。当然他们听不到任何一点关于他们的消息，只能把这种惦念埋在心底。

现在，贺子珍意外地在莫斯科与毛岸英和毛岸青相逢，她心里有多激动。看着这两个孩子安然无恙，她心里又有多高兴。她愿意代替杨开慧为他们做一点事情，也愿意代替杨开慧给他们一点母爱。正是出于这种真诚的愿望，她乐意为他们洗洗涮涮，整理床铺。

岸英和岸青很尊敬贺子珍，称她贺妈妈。他们离开八部住

进国际儿童院后，仍然同贺子珍保持往来。他们之间的往来，在娇娇到了莫斯科后，就更加密切了。

两个大哥哥都喜欢娇娇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妹妹。他们都比娇娇大很多，因而处处都让着妹妹，想着妹妹。国际儿童院发了点什么好吃的东西，他们舍不得都吃了，总要留一点，到周末时送给娇娇吃。其实，娇娇也已经进了国际儿童院，好吃的东西她也有一份了。娇娇有了两个宠爱她的大哥哥。

在这以后，每逢周末，岸英、岸青就来到贺子珍的宿舍，同贺子珍、娇娇一起共度周末。他们四个人在一起玩纸牌，讲笑话，宿舍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这是贺子珍感到最快乐的时候了。孩子们的欢乐情绪感染了她，使她暂时忘记了忧伤，抑制了她的苦恼和彷徨。她常常用自己的津贴，买一些好吃的东西，藏着，等到周末孩子们回来时拿出来给他们吃。她总是把好吃的东西平均分成三份，一个孩子一份。

谁都不提起的一个人：毛泽东

这四个人的经常聚首，给了人们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家庭。事实上，他们之间虽然有血缘、亲缘的关系，却算不上一个家。他们各自吃集体食堂，各自住集体宿舍。特别是他们从来不提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人——毛泽东，似乎在他们之中从来不曾有这个人的存在那样。

在娇娇上国际儿童院幼儿班时，贺子珍特地嘱咐她：“跟任何人都不要说你姓毛。别人问起你的爸爸是谁，你就说你没有爸爸。”

这个要求对娇娇来说是不难做到的，因为在她的记忆里，

本来就没有爸爸，她从来没有感受过爸爸的存在。

贺子珍还不让女儿提自己姓毛，让她跟着自己姓贺。娇娇都办到了。

贺子珍为什么不让女儿提父亲，不让她说她姓毛呢？她可能考虑到保密的原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是国际和国内阶级敌人注视的对象。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不仅有中国去的学生，还有亚洲其他地区去的学生。街上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员。人多嘴杂，其中难免鱼目混珠，她怕娇娇身份的暴露，会影响她的安全。

对贺子珍来说，不愿暴露与毛泽东的关系，还有更深的含意。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十年，从来没有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自居过。她待人热情，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这是所有与她接触过的人，包括喜欢她的人，不喜欢她的人所一致公认的。她从来认为自己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丈夫的地位和身份对她这个妻子来说，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她刚到苏联时，与毛泽东还保持夫妻关系，但她从未利用这个身份为自己额外要求过些什么。她来到苏联后，没有享受过任何的特权，提出过要什么样的照顾。如今，她与毛泽东的夫妻关系已不复存在了，她觉得，就更没有必要宣扬这种关系了。而且，她认为，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发展成这个样子，完全是她的错，她既不愿在孩子们面前提这些事，更不愿说一句毛泽东不好的话。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都不说。

岸英和岸青在贺子珍和娇娇的面前，也从来不提爸爸，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年纪很小就离开爸爸了，对爸爸的印象很浅。他们到苏联后，当然听叔叔阿姨们讲过他们的爸爸，不象年幼的娇娇那样一无所知。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岸英，他已

经是个小青年了，很懂事了。他早已听说爸爸婚姻的近况，也知道贺妈妈现在是孤身独处了。贺子珍虽然从未对他们讲过自己心里的愁闷，并且竭力在孩子们面前掩盖自己的真实情绪，但是细心的岸英从贺子珍深锁的眉头，忧郁的眼神中猜到了几分。他感激贺子珍对他们的照顾，也衷心希望她快活，生活使这个早熟的青年人知道怎样关心人，体察人，同情人。他在贺子珍面前总是兴高采烈，谈天说地，绝口不提爸爸，免得贺子珍伤心。

这样，在异国他乡，这长幼两辈四个人，相互依恋，相互关怀，组成了一个临时的、不象家的家。

三、贺子珍的错误选择

贺子珍的难言之隐

娇娇在莫斯科平静快乐的生活是短暂的。

1941年，德国法西斯已经撕下了与苏联和平共处的保证，正在张开血盆大嘴，伸出贪婪的铁爪，步步向苏联逼了过来。战争的阴影笼罩了莫斯科。

在这之前，按照预定的计划，中国共产党派到苏联去学习和治病的同志，在完成了学习和治疗的任务后，正一批一批地回国。

贺子珍面临到严峻的选择，是走，还是留。她一会儿决定走，一会儿又决定留，举棋不定，心乱如麻。

同她一起在苏联学习的蹇先任决定回国，并动员贺子珍同她一起走。她说：

“这是别人的国家，你在这里永远是作客，还是回去的好。”

贺子珍觉得她说得对，她在这里的确是寄人篱下。来苏联这几年，她一面感受到苏联人民的友好情谊，也受到了一些大国沙文主义者的白眼。有一次，她同蹇先任从外面回来，有事情要办就直接来到苏联人员的值班室。那天天气很冷，她身上穿着大衣。那位值班的女士正忙着什么事，没有顾得上理

她。贺子珍怕打搅了她的工作，就想耐心地等一等。她已经走得很累了，就一屁股坐到了值班室的床上。她没有想到这一下子闯了大祸，那位女士竟然大叫大吼起来：“你怎么这样不懂礼貌！你怎么可以穿着大衣随便坐到我的床上！你把我的床弄脏了！”

原来俄罗斯的生活习惯是，进门就要脱大衣，没有得到主人的允许，不能随便坐在别人的床上。贺子珍对这些规矩一无所知，她连忙站起来，陪着笑脸不断道歉：“真是对不起，是我疏忽了，请您原谅！”

可是那个女士仍不依不饶，不给台阶下，继续发脾气：“你还笑呢，你连这点规矩都不懂。”

贺子珍只好默不作声，事情也没有办，就退了出来。受了这个窝囊气，她有好几天情绪极度低沉，心里憋得难受。贺子珍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她并不是故意给别人惹麻烦，她是真的不知道。连道歉都不接受，这就太不讲理了。

蹇先任是目睹这个事件的全过程的。她当时对苏联工作人员的蛮横态度十分气愤，为贺子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鸣不平。在劝贺子珍回国时，她想起了这件往事，对贺子珍说：

“各国的风俗习惯不同，苏联有些什么风俗习惯，你并不懂得，不知什么时候触犯了人家的生活习惯，惹了麻烦，还会造成不愉快。你的俄文不好，当然比我好一点。语言不通，连报纸都看不懂，没有人读报什么都听不到，人家不了解你的心情和处境，你也不了解人家的情况。”

贺子珍觉得她说得有理，表示要回国去。蹇先任告诉她，你决心回国，要赶快去东方部说明，否则组织上就来不及作安排了。可是，过了一夜，她又变卦不想走了。

蹇先任猜到了她的心思，是因为不愿意回去看到毛泽东同

江青在一起。贺子珍承认主要是这个原因。她说：“回去干什么，回去看到了生气，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延安就那么巴掌大块地，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感情上接受不了。”

蹇先任不同意她的看法，说：“现在我们的根据地已经扩大了很多，你可以不去中央，到其他地方去。”

贺子珍仍然犹豫：“那人家会怎么看我。”

蹇先任说：“你管人家怎么看你呢，你不回去人家就对你没看法吗？你是共产党员，井冈山的儿女，是老革命了，你应该继续为中国的革命出力。”

提到井冈山，贺子珍的脸上出现了痛苦的神情，她的眼睛变得呆滞，泪水充满了眼眶。她显然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看到贺子珍如此的痛苦，蹇先任对她万分的同情。在她经历丧子失夫的艰难时刻，她同王美兰处处关怀她，以她们无私的友谊去温暖她那颗破碎的心。她不愿意触动贺子珍的痛处，惹她伤心，从来没有打听她婚变的原因。外面关于这方面的传言，纷纷扬扬，莫衷一是。现在，她即将回国了，好朋友就要分手，忍不住要解开这个谜。于是，她试探性地说：

“我从前方来到保安时，你同毛主席的关系是很好的，后来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的？”

贺子珍叹了口气，向最知心的朋友吐露了自己的心曲。

与毛泽东婚变的原因

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延安成了全国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多少青年男女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学者、友好人士，在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

延安之后，纷纷来到陕北进行采访、参观、访问。

美国女学者史沫特莱也慕名来到了延安。她不懂中文，带来了一个女翻译。她们的出现，在延安掀起了一阵旋风。这个美国妇女的学识才华，她的生活方式，都令刚刚走完长征路程，钻山沟沟的土包子们耳目一新，那位翻译是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在那个年代就披着一头长长的秀发，更是引人注目。由于她们是外来的友好人士，受到了中央首长们的隆重接待，毛泽东也多次会见她们，并长时间地与她们进行了愉快的对话。

这两位女子与长征过来的女红军真是太不一样了。她们衣着鲜丽，性格活跃。她们在哪里出现，就成哪里的轴心。她们是延安交际舞热的首创者和推动者，共产党的干部爱跳交际舞的风气，就从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舞会，亲自教毛泽东跳舞开始。那次舞会，轰动了延安，几乎所有的中央首长都去了。

然而贺子珍没有去，还有同她一起长征过来的女战士，也没有去。她太不能适应这种洋味十足的开放式社交生活了。她来自永新这个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小县城，以后又长年累月在大山包里转圈，她只适应红军内部那种除了夫妻之外的严格的、分明的男女关系，男男女女之间勾肩搭背在一起，她看不惯。从这方面说，贺子珍有点封建思想，有点狭隘意识，这个批评是对的。但这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她一时间不能适应，这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以后她也学会了跳交际舞，而且跳得相当的好，这是她到了苏联以后学会的。

她同毛泽东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是经过考验，共过患难的夫妻。他们两个人在性格上，在生活方式上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表现在生活上就会经常出现分歧，引起了纷争和争吵。

比如说，买来了一只鸡，警卫员征求意见怎样做。毛泽东

喜欢吃硬的东西，他的牙齿好，他主张炒来吃。而贺子珍则认为燉鸡喝鸡汤最有营养，难得弄到一只鸡，应该好好补补身子。两个人意见不一致，为这点小小的事情吵了起来。

贺子珍认为，她同毛泽东发生的争吵，包括一只鸡怎么吃，都是为了毛泽东的好，没有别的意思，因而吵过之后她仍然理直气壮，不肯认输。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把鸡一分为二，一半炒着吃，一半燉着吃，矛盾就解决了。

贺子珍的性格中，既有柔弱的一面，又有暴烈的一面，名门望族塑造了她诚恳热情、举止庄重，温文尔雅的一面，许多同志称她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这是她平时的行为举止。但她又是井冈山的女儿，这里出沒的绿林豪杰，以及他们所传播的侠义的劫富济贫的思想，又造就了贺子珍性格上豪放的暴烈的一面。她极富同情心，有强烈的正义感，疾恶如仇，她认准了的事情不干到底绝不罢休，十头牛都拉她不回来。正是这种性格，使她在革命失败后，没有象她的许多女同学那样，脱离了革命，嫁了人，而是跟着袁文才、王佐这些被人称作土匪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过着草莽式的生活。她的两重性格轮番地支配着她的言行，使她时而温柔，时而暴烈，漫长而残酷的战争岁月，出生入死的生活方式，进一步突出了她性格中不屈的暴烈的一面。延安时期的贺子珍，饱经了风霜，与井冈山时期的贺子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贺子珍认为，变化的不只她一个人，毛泽东也在变。毛泽东也是多种性格的复合体。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对贺子珍的爱情是深厚的，真诚的。而且后来证明是终生不渝的。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和贺子珍一起战斗过的曾志，至今还记得一件往事，那是1929年的事，在古田会议之前，毛泽东与贺子珍都住在苏加坡，两个人都生了病，贺子珍流鼻血不止，医生一检

查，是怀孕的反映。这时中央决定要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毛泽东要离开苏加坡，但是他放心不下贺子珍，临行前找到邓子恢，要他多照顾贺子珍，邓子恢当时是党的特委书记。毛泽东又找到曾志，要她照顾贺子珍。曾志一时还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以为要她为贺子珍干什么事呢，就回答说，我还有自己的工作呢。毛泽东生气地说，就是要你照顾她，关心她，她怀孕了，要生孩子了。曾志这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原来自己理解错误了。

毛泽东的性格中也有刚强、专断、说一不二的一面。他对待自己的家人，有时是家长式的命令作风，发起脾气来真有雷霆万钧之势。

贺子珍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毛泽东与他的弟弟毛泽覃的争吵，两个人不知讨论什么问题意见不一致，争执起来。毛泽东一时火起，拿起一根鞭子就要打他的弟弟。毛泽覃身子灵活，老早跑开了。他跑到毛泽东够不着的地方，然后说：“我问你，这是毛家宗祠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你为什么打我？”问得毛泽东无言以对。

毛泽东有时也用这种家长式的命令作风对待贺子珍。这是在瑞金中央苏区的事。总前委的秘书长古柏扭了脚，痛得好厉害。他的爱人曾碧漪看护着他。毛泽东非常着急，亲自过问他的医疗，请来中医给他开了几付草药。毛泽东拿着草药喊贺子珍，要她给古柏熬药去。贺子珍正在看书，她答应了一声，没有动。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叫贺子珍去烧点热水，给古柏烫脚，贺子珍仍然没有动。毛泽东发火了，说：“你不象个共产党员，没有一点阶级友爱，你再不去，我开除你的党籍！”贺子珍也生气了，说：“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共产党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她解释说：“我正在看书，这些事情负责照管

他的曾碧漪可以干，警卫员也可以干，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象这样的事情还发生过几次。他们吵过了，没事了。和好如初。

在史沫特莱和女翻译来到延安之后，他们夫妻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争吵。毛泽东是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相待。他觉得同史沫特莱和女翻译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就多了些。

这本是极正常、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似乎是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多事的人把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传到贺子珍的耳朵里，甚至有人给她提出了忠告。本来对这两个新派人物有些看不习惯的贺子珍，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以后回家，经过一个窑洞，发现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她料到毛泽东就在里面，就推开门往里走。毛泽东果然在里面，同他在一起的，还有那位女作家和女翻译。这可能就是那位女作家的住所，他们三个人谈兴正浓，神采飞扬。

贺子珍一见到这般情形，曾听到过的传言顿时涌上心头，脸色阴沉下来。

屋里本来热闹的气氛刹时消失，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这是极尴尬的局面。那位活泼的女翻译想打破沉寂，就笑着拉贺子珍坐下。贺子珍想摆脱对方的拉扯，但摆脱不开，不由得使了点劲，嘴上还说：“你少来这套！”她最后那一下子，力度大了点，不仅把女翻译的手甩开了，而且使她站立不稳，几乎摔倒。于是这位女士叫嚷了起来，连哭带闹的。

不知她叫嚷时用的是什么语种，也不记得她都说了些什么。其结果是那位女洋人出来打抱不平，并且向贺子珍动了手。

贺子珍的挨打是很冤枉的。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他看到那位女作家气势汹汹地要打贺子珍，就想过去拦阻。这位小战士没有拉架的经验。他本意想保护贺子珍，这样，他应该去拉住那两只要打人的手，他却用双手把贺子珍的双臂夹住，让贺子珍动弹不得，使她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和能力，无法抗拒对方的攻势。于是，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到贺子珍的右眼上，她的右眼顿时充血，黑了一圈。

正当她要挥出第二只拳头时，毛泽东说话了。他先对贺子珍说：“自珍，你干什么，你疯了？”然后又对那位洋人说：“你不能再打。你有什么话，你对我说。”说完，他把贺子珍带走了。

贺子珍被打的眼睛肿得象个大核桃，无法出门。每当人们问她你的眼睛怎么啦，她都不愿说出真情，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

贺子珍自己叙述的经过就是这样。从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挨打的是她，而延安当时流传的是她打了人，而且传言中被说成是她打了毛泽东。贺子珍曾经委屈地说我怎么可能打主席呢，论力气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呀。

当贺子珍重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她已经能够比较冷静、比较客观地分析这件事情了。她承认，她怀疑那个女翻译与毛泽东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是没有根据的。那个女翻译有丈夫，而且不久就同那位女作家一起离开延安，回到西安。她当时的行动是过于鲁莽了。另外，毛泽东站出来说话，他的态度是公正的。他们两个人回家以后，毛泽东并没有责备贺子珍，再也没有提这件事，应该说，他的态度是克制的，宽容的。

但是，当时挨了打的贺子珍心情不能平静，总是在生气。她无法使自己冷静下来，真正汲取这场风波的教训。她觉得自

己太委屈，为了毛泽东，她作出了很多的牺牲，结果是身体搞坏了，工作能力没有，工作职务也没有，在剪刀、浆糊、报纸中度过了十年。就在她情绪最波动的时刻，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了孕。她想奋斗、想重新开始生活的心愿，一下子落空了，她又要在怀孩子，分娩中度过一年。她越想越觉得可怕，她想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避免过密生育的念头就这样产生了。

按照贺子珍的性格、她决心要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于是她向组织上打了口头报告，又向毛泽东宣布了她的决定，并着手走的准备。

贺子珍要走，并没有提到他们夫妻间感情的裂痕，只是说留在身上的弹片使她浑身疼痛，她想把弹片取出来。她是在毛泽东不同意并且一再劝阻的情况下坚决要走的。

毛泽东为了动员她留下，曾经说了一番十分动情的话：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所说的贺子珍在贵州负伤，就是指的在长征路上贺子珍被炸弹炸伤那次。贺子珍当时伤得很重，七窍出血，差点死去。连队曾经想过把昏迷的贺子珍留在当地老百姓家，怕路上的颠簸加速她的死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不肯，说：她要留下来，准死无疑。就是用担架抬，也要把她抬着走。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腾出来给贺子珍用，自己骑马。后来贺子珍说，要不是毛泽东，她早死了。

毛泽东说完这番话后，又接着说：

“我现在的情况，同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象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在很多年以后，贺子珍每逢想起毛泽东说的这番话，就要流泪。这是性格刚强的毛泽东，在向自己的妻子袒露他的心扉，诉说他的至深至爱之情。可是，当时性格倔强，而又满腔怨气的贺子珍，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讲话的含意，用最冷漠的态度回答毛泽东，这就是“我一定要走。”

不久，她果然不顾一切地走了。

她在西安停留的那段时间，毛泽东托去西安的同志给她捎话，让她回来。毛泽东说：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毛泽东在捎话的同时，还给贺子珍捎去了一个小木箱，小木箱是他专门嘱咐警卫员做的，里面装的都是贺子珍没有带走的平时的用物。

事实上还在恼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她离开延安的时候，带走了那条记录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红毛毯，她惦记着毛泽东已有的被褥会过于单薄，于是用她的津贴，买了一条新棉被，托人捎给毛泽东。

贺子珍在西安住着不肯回延安。这时中央决定派一批身体有病的老同志去苏联学习治病。在名单中本没有贺子珍。毛泽东看看贺子珍要走的决心很大，也就同意了她要去苏联学习的要求。这样贺子珍就去了苏联。

在她离开延安的时候，她完全没有想到，她作了一个多么错误的选择。这个错误，使得她遗恨终身，造成了她坎坷悲惨的一生。在她还没有离开延安之前，江青已经来到延安，正在用她那双狡猾的眼睛，寻找要捕猎的目标。贺子珍的负气出走，正好给她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又走错一步

在贺子珍同好朋友蹇先任叙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她已经知道她在关键的一步时走错了路。她说：“这都怪我不好，我当时太任性，太不懂事了。人们说，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是一步走错终身遗恨。”

然而，贺子珍的悲剧仅仅是走错这一步吗？当她在苏联历经苦难，遭受到残酷的对待时，她才明白，不听毛泽东的忠告，坚持要去苏联，这只是她作出的第一个错误的选择。而她没有接受战友们的劝告，在学习期满后没有同他们一起回国，仍然留在苏联，是她的第二个错误的选择。第二个错误的选择，使她饱尝了比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比长征还要深重的苦难，要不是有党有毛泽东的救援，她将永远没有再见天日的时候。

当然，在贺子珍作出要留在苏联不走的时候，她并不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战友们看到她要留下的态度很坚决，也就不再动员她了，只是关心她留下以后的打算。贺子珍已经想过了，她说：我要学俄文，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我要找一份工作，自食其力。比如说，我可以当中文教师，给孩子们上语文课。

贺子珍是怀着美好的愿望留在苏联的。当她的这个愿望成为泡影，并饱尝了苦楚以后，她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她对自己的错误决定承担了全部责任，她没有埋怨过任何人，或归罪于任何外部的因素。对于这两个关键时刻的错误决定她一直怀着深深的自责，直到1984年她离开人世。

这个善良的人怎么可能知道，即使当时她下定决心要回国，她也未必能够走成。1988年6月23日，张闻天同志的夫人

刘英在介绍贺子珍的情况时，谈了这个事实：她是同贺子珍一起第一批去苏联的，当时共四个人：贺子珍、蔡树藩、钟赤兵和我。1938年11月，我接到中国来的一份电报，是洛甫（张闻天）打的，打给任弼时。那时王稼祥已经回国，他的东方部部长的职务，由任弼时担任。电报上说：蔡树藩、刘英回国，贺子珍、钟赤兵留苏学习。当时我还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不让贺子珍回去呢。我在没有接到电报之前，我还动员贺子珍回去呢。

这份以中央名义发出的电报，出自何人之手，又反映了谁的意志，这就不得而知了。如果这是历史的事实的话，那么，贺子珍以后的命运，在这封电报发出的时刻，就已经注定了，不过她自己茫然无所觉罢了。

四、战争，改变了母女的生活

饥饿，困扰着她们

正在战友们一批批地离去之际，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了。有的同志在回国途中被德军打散，在中苏边境流落了好几个月，吃了好多苦头才回到祖国。

但是他们比留下来的人幸运得多。德军的快速推进，很快就兵临莫斯科城下，他们用重兵把莫斯科包围了起来。莫斯科人几乎断炊，每天只能得到很少一点面包，很多人饿死了，一些从中国来没有走的同志，也饿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散失，东方部已不起作用了。

在德军合围莫斯科之前，莫斯科的机关、市民紧急疏散，东方大学已经停办，国际儿童院则搬到伊万诺夫市去。没有回国的贺子珍、娇娇还有她们两个哥哥岸英和岸青，都随国际儿童院来到伊万诺夫市。

在儿童院撤离之前，娇娇看到了莫斯科遭受轰炸的情形。德国的飞机象蝗虫一样一批接一批地轮番在莫斯科市的上空掷炸弹，市内的高射炮不断地对空射击，炸弹、高射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许多房屋的玻璃都震碎了。更可怕的是那尖厉的防空警报声，日夜响个不停，弄得人精神紧张，无法安宁。

有一天，娇娇亲眼看到一颗炸弹在住地的附近爆炸了，西班牙小弟弟住的楼房倒塌了。她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小朋友，妈妈告诉她，他可能被炸死了。娇娇伤心了好长时间。

伊万诺夫市离莫斯科有好几百公里远，这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严寒的世界，常年冰雪不化，雪是下了一层又一层，一年中有大半年是在天寒地冻中度过。零下四、五十度的气温，使人觉得似乎空气都冻成了硬块，沉重得象个大铅砣，连呼吸都很困难。这里的人们穿着又厚又长的皮大衣，戴着深深的大皮帽，可是一出门，寒气马上穿透皮袄，直刺筋骨，浑身透凉。在室外待的时间一长，就会手脚麻木，失去知觉。人们常说的冻掉鼻子和耳朵，绝不是无稽之谈。冬天，娇娇同孩子们在屋外玩，冻红了鼻子、耳朵、手脚，这不要紧，就怕冻得发白了。耳朵鼻子一发白，就要坏事，得赶紧用雪去搓，直到发红为止，否则这些器官就要坏死了。

苏联的党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切为了前线，支援前线。为前线服务，这是留在后方的苏联人民，包括居住在苏联的外国侨民的中心任务。原来每月60卢布的津贴已经停发，一切生活用品的供给也已经停止。贺子珍同其他留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必须自食其力，挣钱去买配给的口粮。

妇女一般的任务是打毛衣，定额是每个月打一件毛衣，每周打三双袜子。打毛线的活难不住贺子珍，她在老家永新的福音学校女部学习时，手工劳作课学过打毛活。这里发下来打毛衣、毛袜的线比较粗，应该是好打的，但因为数量多，要按时完成这些任务并不是很轻松的，娇娇常常发现，自己睡了一觉醒来，妈妈还坐在被窝里织袜子；再睡醒一觉，妈妈仍然坐着，织着。正在逐渐长大、懂事的娇娇，开始发现自己的妈妈是个疲惫不堪的妈妈。

然而最严重的困难是饥饿。在苏联，儿童历来是受到特殊照顾的。在食物极端匮乏的战争环境，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娇娇和她的两个哥哥，每天可以吃到500克白面包，有时还有一点土豆，肉是不可能有的，这已经是优待了。贺子珍呢，一天只能配给300克又粗又硬的黑面包。没有副食，没有油水，这点口粮，莫说分成两顿，就是一顿贺子珍也吃不饱。有一次，她实在饿得太厉害，拿着一天的口粮，走出商店没有几步，就三口两口吃掉了。

开始的时候，娇娇还小，这点定量可以装饱她的肚皮。可是她的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哥哥就不够了。两个小伙子经常带着饥饿的肚子，来到贺妈妈的身边找吃的。贺子珍一贯慷慨大方，体贴别人。她的战友们形容她：“只要是贺子珍的东西，谁都可以‘共’她的‘产’。”事实也是这样。在长征中，她刚生过孩子，身体极度虚弱。毛泽东好不容易分到一点火腿，舍不得吃，送给了贺子珍。贺子珍看到有一个女同志刚刚分娩，觉得她更需要，又拿出了一半送给了她。

现在，她看到两个面有饥色的孩子，于心不忍，硬是从自己可怜的定量中抠出一些来，留给他们吃。她还打起娇娇的主意来。她把娇娇的口粮从国际儿童院领出来，让娇娇同自己搭伙吃，为哥哥们再节余出一点口粮来。这时的贺子珍，她的脸上，在忧郁、疲劳的神色中，又增添了饥饿带来的青黄色。娇娇眼中的妈妈，是疲劳兼饥饿的妈妈。

为了填饱肚子，贺子珍在打毛衣之余，又开荒种菜。在战争的年月，在后方的苏联人民，都是用这种办法来补充食品供应的不足。

她拖着羸弱的身体，用锄头一点一点地刨开那象石头一样硬的土地，把它打碎，堆成两个菜畦。两个男孩在课余和假

日，常来帮忙。精明的当地人懂得充分利用开出的土地套种间种，能吃上茬接一茬的蔬菜。不谙庄稼活的贺子珍，第一年把两个菜畦全种上胡萝卜。她不懂得间苗，除草，肥也施得不足，长出来的胡萝卜，小得就象刚出生的小耗子。

然而就是这些长不大的胡萝卜，给娇娇的生活带来了多少甜蜜与欢乐。在战争的年代，白糖是极希罕的奢侈品，又甜又脆的胡萝卜就是白糖的代用品。

有一次，娇娇同几个女孩子在屋外玩，不小心掉进一个水坑里，浑身衣服湿透了，她哆嗦着回家。贺子珍赶忙用热水替她洗了身子，洗了头，换上干净衣服，让她睡到被窝里暖和。贺子珍拿了一点胡萝卜，刨成丝，挤出汁，煮开，让娇娇趁热喝下。平时，妈妈从来舍不得这样做，这是娇娇第一次喝到胡萝卜水。娇娇舍不得一口把它喝光，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让清甜的香味在嘴巴里多留一会儿。事后她对小朋友说：“我这一跤摔得值得，喝了一碗胡萝卜水。”

第二年贺子珍有经验了，在自留地上种上了苋菜、菠菜、土豆、黄豆。胃口越来越大的娇娇，每天眼巴巴地盯着这块土地，盼着小苗出土、长大，变成可口的食物。

直到现在，娇娇还清楚地记得收获黄豆后的情形。贺子珍用铁锅炒黄豆给孩子们吃，黄豆受了热，散发着香味，发出卜卜的响声，在铁锅里跳着。娇娇眼馋地站在铁锅边等着吃。突然，几粒黄豆从锅里蹦了出来，落到了地上。娇娇赶忙趴到地上，满世界地寻找那几粒黄豆。当她把找回来的小蹦豆送到嘴里时，她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

在战争的日子，不仅粮食缺乏，盐也缺乏。这种生活的必需品竟然成了奢侈品。贺子珍煮土豆，经常不放盐，就用白水煮。这种吃法，时间长了，即使肚子饿，吃着也恶心。那时娇

娇想吃盐的心情，就象现在的孩子想吃糖一样急切。贺子珍用自己种的黄豆，换来一小袋盐，舍不得吃，郑重地装到玻璃瓶里。她为了让孩子们吃没盐的土豆也觉得香甜，变着花样做给他们吃。她把土豆切成片，放在面包夹里烤，把香味烤出来。可是娇娇仍然想吃盐。有一次，她实在熬不住了，偷偷地拧开玻璃瓶盖，倒了一点盐在手心上，用手指一点点地蘸到舌头上，过过瘾。

这时的贺子珍，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她调动起她的全部智慧，就是为了吃饱肚子活下去。她打毛衣，干农活，操持家务，洗衣做饭，日复一日，都是这些单调的令人愚昧、心烦的简单劳动。她留在苏联时的计划：学好俄文，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全部落空了。

她的手也变了，变得异常粗糙，裂开一个个口子。她的脚型也变了。到苏联以后，她入乡随俗，穿上窄小的高跟鞋。穿这种鞋，长时间地站着蹲着干农活，她的脚趾严重变形，大脚趾骨节处磨出了一个老茧，象一个大包那样突出出来。穿上鞋后，脚疼得厉害。每次贺子珍下地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甩掉那双高跟鞋，抚摸疼痛的双足。

贺子珍的身子瘦得象麻杆。她本来就患有严重的贫血症，那是在长征路上负伤，失血过多造成的。如今过分的劳累和营养不足，使她的贫血症状又有所加重。她蹲在地里干活，经常眼前发黑，金星直冒，站不起来。她每天晚上躺到床上，全身象散了架子一样，再也爬不起来。可是第二天，她仍然撑着瘦弱的身子，忙前忙后，为儿女们操劳。

当时的娇娇太小了，不能理解妈妈的困难和辛劳，她同两个哥哥抢东西吃，把象金子一样珍贵的盐偷来吃。回忆起这段往事，娇娇感慨地说：“小孩子哪里懂得那么多呢？在自己肚

皮没吃饱前，只想自己的肚子。只有在自己的肚子吃饱以后，才惦记妈妈和别人。在这点上，妈妈就是伟大的，她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让儿女们吃饱。”

但是两个哥哥，特别是岸英，对于在德苏战争头几年，为了度过饥饿的难关，贺子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精神，是铭记在心的。他在国际儿童院小学毕业以后，就到莫斯科上中学，离开了伊万诺夫市。两年后岸青也到莫斯科读书了。岸英再也没有见过贺子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岸英从娇娇处得到了贺子珍的地址，特地写了一封信，感谢贺妈妈在最困难的时期，给予他们弟兄俩无微不至的照顾。

一个人承受精神的压力能有多大？似乎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尺度，统一的标准，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当贺子珍为在苏联所生的男孩的夭折痛苦不已的时候，她曾经问过蹇先任：当你第一个孩子死去时，你是否天天想念他？你心里也很难过是吗？蹇先任回答说，我的孩子死了以后，我没有时间想念他。那时战争环境很残酷，我得把全部精力用在干革命上。在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忘掉了孩子。另外，如果一个女同志婆婆妈妈，整天想着孩子，要被人瞧不起，不给分配工作的。孩子的死去，对我是一种解放，我就不用为孩子分心了。看得出，蹇先任这位非常值得尊敬的革命老前辈，心理承受能力是比较强的。事实上，她不仅象贺子珍那样，经历过丧子之痛，随后也有失夫之祸，但是她坚强地挺过来了。

娇娇挨打

有人说，过度的疲劳会使人烦躁。忙碌未能让贺子珍忘掉不愉快的过去，相反却加重了心理的负担。她把痛苦一层又一

层地埋藏在心底，越积越厚，越压越重，到了她难以承受的地步了。她的肝火越来越盛，常常无名火起。她对娇娇的态度也由娇宠变得严厉起来。

有一天，她竟然动手打了娇娇。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在这个风雪肆虐的小城市，可供孩子们玩乐的东西太少了。户外，除了冰，就是雪。雪成了孩子们最心爱的玩物。头一天，这里下了一场两尺多深的大雪，第二天却放晴了。娇娇同一帮和她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在雪地里玩。这群孩子中，大部分是女孩，有一两个男孩。他们开始堆雪人，滚雪球，接着玩起印雪印的游戏来。印雪印，就是孩子们在没有人踩踏过的雪地上，张开双手，张开双腿，平卧在雪上，在高的积雪上印下自己的身子，然后由别的孩子拉着他的手直直地把他提起来。印雪印的要求是，印子要清晰，周边没有损坏。孩子们商量进行比赛，每人印一排，看谁印得漂亮、整齐。这个游戏新鲜、好玩，娇娇玩得高兴极了。回到家里，她兴冲冲地向妈妈讲述这一切，她以为妈妈会感兴趣，没想到妈妈登时变了脸，板着面孔说：

“以后不许你同这些孩子玩，更不许玩雪印。一个女孩子同男孩子混在一起，躺在雪地上玩，成何体统？你不觉得害臊？”

娇娇当然不同意妈妈的意见了，她申辩说：

“一起玩的多是女孩子，只有一两个男孩子。”

“一两个男孩子也不行，他们就不会使坏？”贺子珍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们就像我那么大，能使出什么坏来？我们哪儿都没去，就在门前玩。我们玩的时候，邻居有个阿姨也在那里，她在晾床单。”娇娇记得，因为天气太冷，床单刚搭到绳子上，

立刻冻成大冰块。她想用邻家阿姨的在场，证明是妈妈多心，自己正确。

不料娇娇的这番话，更激怒了贺子珍，她第一次动手打了娇娇。

娇娇头一回挨打，自然委屈极了。她拉开嗓门大哭起来。她哭，是因为疼，也是抗议。这一来更惹怒了贺子珍，她打得更狠了。娇娇的哭声惊动了四邻，许多人前来劝解，贺子珍仍余怒未消。

贺子珍为什么动手打娇娇呢？她觉得，这是为了女儿好。她发现，过去由于自己心情不好，对女儿过于溺爱了，只是把她作为消愁解闷的玩意儿，光是打扮她，娇惯她，没有想到教育她，没有尽到做母亲应有的责任。她痛心地感到，女儿长大了，也变野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就要毁了女儿的一生了。饱经沧桑的她，当然知道社会的复杂，人心的叵测，欺侮凌辱幼女的事件，真是太多太多了。万一这种现象降临到女儿的身上，她怎么对得起女儿，对得起千里迢迢把女儿送来的毛泽东呢？她越往深里想，越恨自己糊涂，对女儿管晚了。她的拳头落在女儿的身上，痛在自己的心上。娇娇哭完已经没事人一样了，她却不由得哭了起来。

从此，贺子珍对娇娇很少有笑容。她同娇娇说话，面孔都是板着的，口气都是命令式的，没有商量的余地。

贺子珍下了道死命令，不许娇娇同孩子们往来，特别是大一点的男孩子。

从国际儿童院放学以后，就被关在家里的娇娇，有多寂寞呀。她常常趴在窗口上，望着窗外欢蹦乱跳的小朋友们，眼眶里含着泪水。她多么想飞出去同小朋友一起玩呀。对于妈妈的责备，娇娇一直思想不通。妈妈给她讲过一个小女孩受欺侮的

事，她听过多遍了。她觉得这种事可能是有的，可是同娇娇没关系。娇娇的身边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娇娇还觉得，同自己一起玩的，多数是女孩子，那两个小男孩，同自己一般大，哪里有那么多心眼呢？妈妈见得多了，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对娇娇来说，就是没有道理，因为这不符合事实。可是，妈妈不肯听娇娇的解释，也不相信娇娇的话，娇娇只能心里委屈。

娇娇挨打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娇娇觉得妈妈变得不爱她了，自己无论怎样做，都不讨妈妈的喜欢。

比如说，春天来了，娇娇从国际儿童院回家，一路上，见到野花开了，红的白的黄的，好看极了。哪个女孩子不爱花呢，她一路走，一路摘，捧了一大把鲜花回家。她正在找空瓶子把花插上，妈妈从外面回来，贺子珍一看，脸色又阴沉下来了：

“哪儿弄来的花呀？”

“这是我从野地里摘的。”

“野的也不能玩，快扔出去。”

娇娇迟疑着不想动手，妈妈一把抢过来，一抬手，扔到窗外去了。爱花有什么错？玩花有什么不对？娇娇难过极了，眼泪要流出来了，妈妈一看，生气了，打了娇娇。

还有，为了一只小猫，娇娇不知受了多少气，挨了多少打。

自从贺子珍下了命令不让娇娇同小朋友一起玩以后，娇娇孤单极了。她已经有了一批要好的苏联小朋友，她们特别同情娇娇的处境，集体讨论了好多次，用什么办法安慰娇娇。最后她们决定给娇娇送去一只小猫。这是一只波斯种的小猫，浑身长着雪白的毛，短短的鼻子，圆圆的眼睛，可爱极了。苏联人是不喜欢黑猫的，认为黑猫不吉利。

娇娇得到了这头小猫，喜欢极了，抱在怀里带回家。

妈妈见了，又皱起了眉头：

“玩猫干什么？把心思都用到猫上了？不读书，不写字了？再说，人都吃不饱，用什么喂猫呀！”

娇娇当然不答应了。她保证说，养猫不会影响她的学习。她还说，这么小的猫吃不了多少东西。她没敢说，宁愿自己少吃一口，匀出一点给小猫吃。因为她很清楚，妈妈是不会让她饿肚子的。而且，她也做不到挨饿不喊饿。

妈妈不理睬娇娇，拾起小猫，开了门，扔了出去。娇娇没敢作声。过了一会儿，她开门出去，发现小猫没有走开，蹲伏在自己的家门口，娇娇又把它抱了回来。为此，娇娇又挨了打。可是，挨了打的娇娇，仍然紧紧地抱着小猫，舍不得放。等妈妈睡下了，她把小猫抱到自己的被窝里，同小猫睡在一起。第二天早上起床，贺子珍叠被子，发现了小猫，又打了娇娇。

娇娇虽然为小猫吃了苦头，但小猫总算得到妈妈的承认，留了下来。小猫成了娇娇最好的伴侣。娇娇以后爱小动物，爱养鸡，养猫，养兔，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不过，这只小猫也给她惹来了麻烦，猫身上的虱子传染给她，娇娇也长了虱子，让妈妈忙活了好一阵。

妈妈不让娇娇同小朋友玩的禁令，一直到来年开春印不成雪印了，才算终止。

五、厄运降临

严厉的爱

在这个时期，娇娇对妈妈的看法是很矛盾的。她有时候觉得妈妈心太狠，太厉害；有时候又觉得妈妈的严厉并不是没道理的。很多时候，妈妈的要求是对的，的确是想让她学好。

娇娇忘不了这件事：

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洋娃娃，这是她从莫斯科带来的玩具。洋娃娃很大，有一尺多长，睡下会闭眼睛，拍她会哭。这是娇娇最心爱的玩具。

那正是德苏战争热火朝天进行的时候，远离前线的伊万诺夫市，也是一派备战的景象。学校开设军事课，比娇娇大一点的孩子都要参加军训，其中有一个项目是练习跳伞，孩子们排着队走上跳伞塔，背着空降伞跳下来。娇娇和她的小伙伴们对跳伞入了迷，他们常常跑去观看大哥哥、大姐姐们是怎样威风凛凛地从跳伞塔里跃出，干净利落地打开伞的保险，飘忽飘忽地落下来。他们真想也能跳一跳，试一试。可是这种机会不可能落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只能瞪大两只羡慕的狼睛，远远地看着。

不知哪个小朋友突然出了个主意：我们没有机会跳伞，就

让娇娇的洋娃娃跳一次伞吧。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娇娇也同意了。他们在洋娃娃的身上绑上一条大手绢，跑到二楼的窗口旁，把洋娃娃往下扔。只听啪地一声，洋娃娃垂直地跌落地面，摔得粉身碎骨。原来这个洋娃娃是用泥做的。

看着洋娃娃成了一堆烂泥片，娇娇伤心地哭起来。她把这些烂泥片拣了起来，抱回家去。她以为又要挨妈妈的打了。妈妈问清了事情的经过后，并没有责备娇娇，也没有说一句小朋友们的不是，只说了一句：摔坏了就算了，事情就过去了。

第二天，这些孩子们又到一起玩了。这次他们是在一个小姑娘的家里玩。这个小姑娘有一只小红皮球。娇娇在离开她们家的时候，把小红皮球揣在怀里带回家了。她心里是这样想的：哼，你们出的主意，让我的洋娃娃跳伞，把我的洋娃娃摔坏了，我没有玩具玩了，这只皮球得归我。

可是没有想到，她前脚刚到家，这个小姑娘的奶奶，后脚就跟来了。老奶奶告诉贺子珍，娇娇把她家的小皮球拿走了。贺子珍让娇娇把皮球还给老奶奶，娇娇只得把皮球交了出来。等老奶奶一走，贺子珍就训斥起女儿来：

“别人家的东西你怎么能随便拿？你实在喜欢，想玩，可以向人家借，要征求人家意见，得到人家的同意，玩了以后要还。怎么能够自己喜欢，想拿就拿呢？即使别人摔坏了你的洋娃娃，你这样做也是不对的，对别人一定要宽容。”

这次，贺子珍没有打娇娇，而是罚她每天傍晚去国际儿童院把自己的那份晚饭打回来。伊万诺夫市的清晨来得早，晚上黑的快。下午5点钟，天就黑了。而国际儿童院开晚饭的时间是6点钟。国际儿童院离她们的住处要走半个小时的路程。中间要过一道沟，还要穿过一片小森林。这时的娇娇才只七岁，一个人摸黑走那么长的路，她还没有走过。她多么的害怕，但是娇娇

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能硬着头皮每天去走这条黑路。谁叫自己做错了事，做错了事就得接受妈妈的惩罚。有时候，娇娇打完饭回来，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每次娇娇挨妈妈打以后，她的脑子就在转一个问题：妈妈为什么对自己那么狠？她是不是不爱娇娇了？她是不是娇娇的后妈？因为她听别人说过，做后妈的都是心狠手辣，打骂小孩的。

但是以后发生的一些事，逐渐改变了娇娇的看法。有好几次，她发现，妈妈对她并不是只有严厉、苛刻的一面，妈妈是爱她的，而且是非常的爱。妈妈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是一种寓于严厉中的爱。当然，贺子珍与女儿相处，并不是只有训斥与打骂，有时候仍表现出挚爱与热情。

娇娇对妈妈的这个认识是正确的。贺子珍的心，就象一颗被重重苦难折磨得失去了弹力的橡皮球，它已经被一层硬硬的外壳包裹住了。但是，在她内心的深处，仍然流动着滚热的血液，在硬壳的表面，也仍然存留着还没有完全老化的部份。爱的泉流就从这里突破，滚滚流淌。

在贺子珍的心里，女儿是她的安慰，是她的精神支柱，她是为了女儿才这样苦熬人生的。常常有这样的事情，白天她见到娇娇，没有多少笑容；到了深夜，她反复难眠，打开电灯，深情地、久久地注视着熟睡的女儿，仔细地察看她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寻找熟悉的影子。她有时抚摸着女儿浓密的头发，眼泪一滴滴地落下来。

是妈妈救了娇娇

以后有一段时间，娇娇重新回到国际儿童院去住宿，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漫漫长夜，孤灯独照，贺子珍感到份外的冷

清。她突然强烈地想念起女儿来，恨不得马上见到她，拥抱她，但是她克制住了。

有一天，她听别人说，娇娇在院里生病了，可能是感冒。院里有一条规定，不是节假日，不许家人探望。听说娇娇生病了，贺子珍再也忍不住了。她的小儿子就是因为患了感冒，转为肺炎死去的。她为此后悔了好多年，责备自己忙于学习，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现在她唯一的女儿也生病了，她多么害怕发生在儿子身上的这一幕，会在娇娇身上重演。她越想越害怕，似乎娇娇马上就要不行了。

这时，天色已经晚了，可能已经是半夜了。她再也忍耐不住，披衣起床，穿过森林，来到国际儿童院。她径直来到娇娇的寝室，走到娇娇的床前，把正熟睡的娇娇连被子一起抱起，就往外走。她要把娇娇带回家去，自己照顾她。

声音惊动了值班的保育员。保育员一看，贺子珍要把娇娇带走，违反院里的规定，当然不答应了。贺子珍抱着娇娇，也绝不让步，两个人在走廊里争吵起来。最后，贺子珍拗不过保育员，只得自己回家。

不知是否因为晚上这一番折腾，娇娇的病情加重了起来。在被窝里的娇娇，只穿着薄薄的睡衣，光着脚。贺子珍抱着她站在走廊时，虽然用披子把娇娇裹紧，走廊里也有暖气，但那里毕竟不如室内暖和。第二天，娇娇烧得更高，住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的娇娇，病情日重一日。可能是转为肺炎，也可能并发了脑炎，事后娇娇和贺子珍都说不清楚。后来，娇娇不能进食了，牙关紧咬，脸色铁青，还抽起风来，医生抢救、输液，都不见好转。

医院有规定，急诊儿童住院抢救时，家长不能探视。这真把贺子珍急疯了。她觉得，是自己害了女儿，要不是那天半夜把

女儿抱出来，让她再次着凉，她的病情可能不会加重。医生不让探视，她就千方百计躲过医务人员的眼睛，进入医院，在女儿病房的玻璃窗外往里窥视。当她看到女儿昏迷不醒，吊着输液的瓶子时，心都碎了。

她终于获准去探视女儿了。她以为这是因为娇娇的病情有了转机，兴匆匆地去了。不料，医生告诉她，娇娇已无法救治了，她已经挪出了儿童病房，推到太平间的副室，这里都是临危的病人，只等一断气，就推到太平间去。

贺子珍一听，手脚都凉了。她一下子扑到医生的身旁，拉着医生的手，苦苦地哀求说，请他一定要设法救救娇娇。无奈医生耸耸肩，摆摆手，摇摇头，表示一切已无能为力了。

贺子珍明白了，哀求不会有什么结果。她疾步来到病危室，去看娇娇。她看到的是双目紧闭，奄奄一息的娇娇。此时，⁸⁸她不再哭泣，突然升起了无比的勇气和决心：我要自己救活她，我一定能够救活她。娇娇是不会死的。

她转身又来到医生的身旁，对医生说：

“你不能把她送到太平间去，她还没有死，我要救活她，我马上就回来。”

说罢，她一阵风似地走出医院，回了家，拿出几件值钱的衣服卖掉，买回一小包白糖和一瓶牛奶，然后回到医院。她来到太平间的外室，坐在娇娇的床头，喂她吃这瓶带糖的牛奶。在那饥荒的岁月，这就是最珍贵的营养品了。可是娇娇人事不醒，牙关紧咬，一滴水都喂不进去。贺子珍细心地把小匙一点一点插进娇娇的嘴里，慢慢往上抬，把娇娇的牙齿撬开，终于将这瓶牛奶喂进娇娇的嘴里。

为了让娇娇天天能吃到牛奶，贺子珍到处奔跑，想尽了办法。牛奶是毫无办法弄到了，但羊奶还有希望。在贺子珍家的

附近，住着一个苏联老太太，她有一座小花园，园里养了一只小母羊，可以出售一些多余的羊奶。贺子珍把自己种的土豆，全部装进口袋里，送到老太太那里，换得每日一小瓶羊奶的供应。贺子珍就是靠每日一小瓶羊奶，救娇娇的命。在这个时刻，羊奶比琼浆甘露要贵重千百倍。

娇娇虽然能吃一点东西了，但仍然经常处在昏睡的状态中，眼睛睁不开。在她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之中，眼前老是出现一个死人的面孔，和他躺着的那副棺材。娇娇怎么也想不起这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的一个死人。她拼命地想呀，回忆呀，终于记起来了。这是有一年，在伊万诺夫市的郊区见过的情形。那里住着一家人家，丈夫参加红军打仗去了，妻子留在家里。后来这个战士受伤复员回来了，可是妻子变了心，另有了情人。有一天晚上，喝醉了的丈夫掉到一个井里淹死了。他是被人推到井里的，还是自己掉进去的？乡亲们议论纷纷。娇娇和小朋友们去看热闹时，就见到这种情形，一个死了的男人被放进棺材里，棺材盖开着，那口井就在死人的边上。这是娇娇第一次见到死人，她害怕极了，回来以后几天吃不下饭，眼前老出现死人的模样。可是，这些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为什么现在，这个死人和他的棺材又出现在娇娇的眼前呢？是不是娇娇也要死了呢？娇娇可不想死呀！她拼命想说：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妈妈也不要我死。可是她说不出话来。她挣扎着想喊妈妈，让妈妈来救她，突然她听到有人在喊她，叫着娇娇的名字。她仔细地听，听出来了，是妈妈的声音，是妈妈在喊我呢……娇娇从昏迷中睁开了眼，她发现，这并不是幻觉，妈妈的确在叫她。妈妈正坐在她的床头，紧紧地抱住她，泪流满面，一叠连声地喊着她：“娇娇，你醒醒呀，妈妈在叫你呢，你听见了没有？”

娇娇看到，眼前的妈妈又慈祥、又温柔，她为娇娇生病多么着急呀，妈妈多么爱我呀。一股暖流通过了她的全身，她感到好幸福，轻轻地喊了声：“妈妈！”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娇娇终于苏醒过来了。

贺子珍欣喜若狂，她一阵风地走进医生的办公室，报告了这个喜讯。她要求医生让娇娇重新回到儿童病房去，离开那间冰冷的太平间外室。

医生跟随着贺子珍去看娇娇，发现娇娇的病情果然出现了转机，这真是天大的奇迹，就同意了这个要求。

不想死的娇娇，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她一天天好起来。她的手脚原来是蹇曲、僵硬的，伸都伸不直，现在舒展开来了。她的脸上灰暗的死色也逐渐褪去。

这时，贺子珍又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娇娇接回家去，由自己亲自护理。这一次，医生没有阻拦，痛快地答应了贺子珍的要求。于是，贺子珍雇了一辆马拉的雪橇，把娇娇里三层、外三层地裹住，带回家了。

愤怒的贺子珍

在贺子珍接娇娇回家的时候，她只想到娇娇回家后的好处，可以日夜照顾娇娇。她完全没有想到会面临那么多的困难。

回家以后的娇娇，康复得很慢。她的手和脚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夜晚，都是凉冰冰的。即使人整天捂在被窝里，仍然冷得把身子缩成一团。屋子里水杯的水，放上一会儿，水面上结一层冰。贺子珍心疼了。

房子里是装有暖气的。但艰难时势，燃料缺乏，暖气形同虚设，室温常在零度以下。在这样寒冷的屋里，没有病的人都

受不住，何况是重病初愈的孩子呢。

怎样能够把屋子弄得暖和些呢？贺子珍简直束手无策。她没有煤，没有劈柴，没法在屋里生火。战争时期燃料是军用物资，定量配给，不是随便可以买到的。贺子珍在生活上是个淡泊惯了的人，到苏联以后，一向朴素、自制，从来没有伸手要过什么东西。现在，她看到娇娇冷得那么难受，只得跑到国际儿童院去，要求给一点煤和柴。她的要求被绝决了，原因是没有多余的煤和柴。贺子珍耐心地解释说，这是特殊的情况，女儿病了，希望照顾一下，特殊处理，多少给一点。对方回答的口气仍然很硬，就是不行。贺子珍生气了，但是她忍住了，没有再说什么，回家了。

天气太冷了，贺子珍无法给娇娇洗澡、洗头，连衣服的洗换都有困难。娇娇的头上、身上都长了虱子。贺子珍看看这样下去实在不行，又想了一个办法：用电炉。那时候，电炉还是很昂贵的东西，贺子珍为了买它，几乎倾其所有。但是，这只电炉几乎没有给娇娇带来多少温暖。伊万诺夫市白天停电，无法使用，到了晚上，刚把插头插上，电灯一闪，灭了，保险丝烧断了。于是就有人来查哪家用电炉了。

贺子珍并没有绝望。她又想出了一个新招，去买一个瓦数大的灯泡插上。她以为，电炉不能用，大灯泡还能不让用？灯泡的热量虽然低，但总能多少带来一点温暖。贺子珍没有料到，这也不行。国际儿童院的一个人走进屋来，伸手就要摘那个大灯泡。贺子珍忍无可忍了，她抢前一步，摘下了大灯泡，狠狠地往地下一摔。尖锐，响亮的灯泡爆炸声把这个人吓了一跳，她嚷了起来：“你疯了！”

这是贺子珍第一次听到国际儿童院的人用疯字来形容她。

正在贺子珍为女儿的寒冷愁肠百结的时候，新的麻烦又来

了。

这一天，国际儿童院的负责人找她谈话说，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到集体中生活；你也应该马上去干活，你的毛线活好久没交了。贺子珍一听急了，连忙解释说，娇娇的病还没有完全好，现在还不能回到儿童院去。她要照顾娇娇，有些活还没法去做。这个人听了贺子珍的话后，轻蔑地说：“你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国际儿童院的这位负责人是否真的说了如此带侮辱性的话，或者是贺子珍的误解，现在已经很难查对了。贺子珍的俄文水平比较差，这是实情。在苏联生活这几年，并没有上过一天俄语课。她不过只能听懂一些生活用语，会讲一些最简单的日常用语。有时为了使对方理解自己的意思，她不得不借助手势，来弥补语言表达的不足。

当时贺子珍认定了这个人说了诬蔑她的话，她认为不仅从语言上，从这个人的眼神和表情中也看得出来。她的血登时涌到了头上，苍白的脸一下变得通红。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这些日子来所经受的委屈，所积累的不满，一下子迸发出来了。她的声音颤抖着，同这个负责人吵了起来。她言辞激烈，数落这个负责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没有一点同情心。她反驳说，她从来不偷懒，没少干事情。她的口粮都是自己用劳动挣来的，没有白吃饭。这时，她向国际儿童院的负责人，伸出她那双粗糙皴裂的手。

贺子珍的俄文水平不高，也不知道这一番话她用语言表述清楚了没有，那位国际儿童院的负责人准确理解了没有。她的反映是：暴跳如雷。

这个负责人对贺子珍竟敢在她的面前表示异议，无法接受。她用俄语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堆的话，越说火气越大。她到

底都说了些什么，贺子珍没有完全听懂，但最后两句话听懂了：“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进了疯人院。”

贺子珍更生气了，她一发不可收拾，吵得更凶了。她逼视着这个苏联女人，要她回答：“我怎么疯了？你有什么权力，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事情过去了，贺子珍生了几天闷气，也就把它丢下了。她完全没有料到这场争吵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

娇娇成了孤儿

事过不久，有一天，她同女儿娇娇正在屋里待着。有人敲门，同时屋外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叫门声。叫门的是一个中国的女人，她也是从国内来的，由于个人的生活问题同贺子珍一样，不愿意回国去，她也随同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夫市来，平时跟贺子珍常有来往。

贺子珍听到是熟人的叫门声，她毫不犹豫地起身去开门。当她把门一拉开，马上被门外站着一群穿白大挂的苏联人惊住了。那个叫门的女子一闪身，不见了。这些穿白大挂的人都是彪形大汉。他们见到贺子珍，一言不发，捉住她的胳膊就要往外拖。

贺子珍下意识地挣扎着，往屋里逃，嘴里一面说：

“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

“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其中的一个说明了来意。

贺子珍气坏了，她不是疯子，为什么要让她进精神病院。她疯狂地反抗着。她不能离开生病还没有全好的女儿。她想走到女儿的身边，把女儿抱在怀里，不让任何人把她同女儿分开，但她走不过去，大汉们拽着她往外拖。她一把抓住了床把。

想借助床的力量，留在屋里。但是，瘦弱的贺子珍怎么敌得过几条大汉。她的手被粗暴地掰开，硬是把她拖出了房门，塞进了汽车，开走了。

在这场妈妈与精神病院工作人员惊心动魄的搏斗中，娇娇吓坏了。她先是吓得大哭起来，喊着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想扑到妈妈的身上。但是，她被人一把推开了。她看到人们要把妈妈架走，害怕极了，她怕也把她送进疯人院，关了起来，趁着混乱没有人理会她的机会，爬上了窗口，跳到了屋外。她家住在楼的底层。然后，她越过了沟，躲进了小森林里，藏了起来。她听到妈妈撕心裂肺的绝望的喊叫声，听到了汽车马达的发动声，接着，一切沉寂了下来，妈妈被带走了。

妈妈凄厉的叫喊声，撕裂着女儿的五脏六腑。这声音，使人毛骨耸然，心头颤抖。在40多年后的今天，娇娇回忆起来，仍然感到惊心动魄，惨绝人寰。当时，在妈妈被抓走以后，幼小的娇娇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她哭妈妈不见了，自己无依无靠了，不知将来怎样生活了。可怜的娇娇只有用哭声表达她内心的痛苦与徬徨。

人们在贺子珍被抓走以后，循着哭声，找到了娇娇，把她送进了国际儿童院。从此娇娇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一种无父无母的孤儿式的生活。

国际儿童院接收的儿童，分为两部份。一部份是伊万诺夫市市民和这里职工的子弟，他们有父母照顾，可以不住宿，晚上可回家。这部份儿童可以留头发，伙食比较差。娇娇原来就在这个分部学习，她留了两条小辫子。这次重入儿童院，她被送进另一个分部。这个分部的儿童都是孤儿，有很多是苏联红军烈士的子弟，他们的父母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这个分部又分为三个班，五年级以上的上大班，一至四年级上中班，学龄

前的上小班，娇娇进的是中班。

中班的儿童中，除了她以外，还有几个中国孩子。无论是在大班、中班还是小班，也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进了这个分部，一律剃成光头。娇娇入院的第一件事是，小辫子被剪掉了，剃成了大光头。当时，娇娇伤心地哭了。她暗暗下决心，将来有朝一日离开这里，一定要重新留起辫子。

国际儿童院的工作人员，把娇娇长满虱子的衣服都扒了下来，让她彻底洗了个澡，换上了儿童院的衣服。娇娇的打扮与过去完全不同了。

国际儿童院这个分部还有一个规定，住在这里的儿童只能与同一个班的儿童往来，不许同另一个班的儿童接触。这样，娇娇虽然知道大班里有几个中国姐姐，却见不到她们。

初到这个分部的娇娇，生活不习惯，没有熟悉的朋友，她感到好冷清，好孤独。妈妈被强行带走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她的心灵，对妈妈的牵挂与惦念，又使得她悲伤和难过。她在入儿童院的初期常常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不同任何人接近。

这个班有的苏联孩子，在开始的时候，爱捉弄这个中国小姑娘。他们嘲笑她的鼻子扁，皮肤黄，眼睛黑。从妈妈那里秉承到的中国人的骨气和傲气，使她在受到欺侮时，绝不示弱，她不怕自己人单影只，奋起反抗。她反唇相讥，说他们的鼻子象个胡萝卜，皮肤象个白面包。说完，她高兴地抬起她的光光的小脑袋，直视着围着她起哄的小朋友们，一动不动地站着。娇娇的不屈服的表现，没有招来更多的嘲弄，相反，她赢得了小朋友们的敬重。他们喜欢起这个大胆、有个性的中国小姑娘，向她伸出了友谊的手。

然而，娇娇仍然感到寂寞，她非常想念在精神病院里的妈妈。她不知道妈妈现在怎样了，妈妈何时来接她回家。她很想

到医院里去看望妈妈，她向班里的老师提出了请求，但是老师拒绝了，说：“绝对不行，你的妈妈不能见人。”娇娇常常站在学校的铁门边，盼望妈妈的身影在这里出现，可是她得到的只是失望。

这个分部的生活条件，比娇娇原来所在的分部要好多了。这可能是因为，苏联的政府对这些烈士的遗孤给予特殊的照顾，给予他们比较丰富的物质待遇。另外，也可能随着苏联战争形势中的逆转，物质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总之，娇娇在这里吃得比过去好。她在谈起这一段的生活时，曾经笑着说：

“在那两年，我是受到了‘贵宾’的待遇。”

在这里，不时可以吃到过去吃不到的美食。比如，有时早上可以喝到一杯茶，加上一块方糖；有时午餐可以吃到一段肉肠，或一杯很稠的牛奶；有时，在正餐之外，每人还发一块带果酱馅的糖块。

肚子吃饱了的娇娇，更加想念她的妈妈。她不知道妈妈是否还象过去那样挨饿，在精神病院里，妈妈吃的是什么伙食。每次，院里发方糖，发果酱馅糖，娇娇都舍不得吃，她把这些糖块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藏在枕头下，她要留给妈妈吃。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大班的几个中国姐姐突然来访。她们过去就认识娇娇，常常在一起玩。她们的父母都不在苏联，也被送进这个分部来。她们很惦记着娇娇，一直想来看娇娇，没有得到准许。在她们的一再要求下，她们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

娇娇看到故人，自然是十分的高兴。她听到这几个姐姐想去看望妈妈，更是欣喜若狂。她笑着对姐姐们说：“你们等着，替我带点东西给妈妈。”

说完，她急匆匆地跑回宿舍，掀开枕头，要拿那包糖块。

但是枕头下什么也没有。她傻眼了，急忙把枕头、被子、褥子翻了个遍，也不见那袋糖的影子。这可能是给哪个馋嘴的小孩给偷吃了。娇娇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了。她只顾着伤心落泪，忘了院子里的几个姐姐还在等着她呢。那几个女孩子左等右等不见娇娇出来，就进屋去找她。

她们见到了哭得泪人似的娇娇，一问原因，也替她难过。她们安慰了娇娇几句，也就离开了。她们以后也没有获准去看贺子珍。

从此，再也没有人来探望娇娇，也再没有人同她提起过妈妈。她年复一年在这里生活，学习。她读的是俄文，讲的是俄语，她已经不会说中国话了，成了个黑眼睛、黄皮肤的俄国小姑娘。

六、贺子珍关进疯人院之谜

迫害并非来自王明

贺子珍为什么会被关进疯人院，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贺子珍自己的看法是，把她关进精神病院，是对她的迫害。她怀疑迫害来自两个方面。她第一个怀疑的是王明。这个认识在我著的《贺子珍的路》一书的初版中写得很清楚。这是完全根据贺子珍本人的叙述整理而成的。

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正当贺子珍潜心学习的时候，她哪里想得到，就在她的身边，有一双阴险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她，一双罪恶的黑手，正在向她伸过来。这个人就是王明。王明这时担任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和东方部的部长，常驻莫斯科。因为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不合，他把毛泽东看作死对头。在遵义会上，执行王明路线的人受到批判，毛泽东重新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上，这一切，都使得他恨得咬牙切齿。他同贺子珍之间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这使他感到无法忍受。他要把这一腔怨恨发泄在这个无辜的人身上。从贺子珍在莫斯科出现，王明就这样想，就这样做了。

在书出版以后，我查对了这一段的历史，发现在贺子珍去

苏联期间，王明并不在苏联。于是按照贺子珍的思路，在这本书再版时，将王明改成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从以后了解到的情况看，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同贺子珍一起第一批赴苏的刘英介绍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被批准去苏联学习、治病的四个人从西安到达兰州，住在中共驻兰州的办事处，当时办事处的主任是谢觉哉。他们在那里等苏联的飞机去乌鲁木齐，等了一个多月。正在等候飞机的时候，王明回国了，那时是1937年12月。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书记，又是东方部的部长，管东方地区的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他在苏联的地位很高，很得到斯大林的信任。他这次回来，是奉斯大林之命，回国指挥抗日工作，同时转达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他是坐苏联的飞机来到兰州的，同机到达的有陈云和康生。由于除办事处外，兰州市是国民党的天下，为了不暴露王明的身份，影响他的安全，王明到兰州后并没有露面。陈云来到办事处，从这里打电报到延安，要求延安的机场增加标志，保证飞机准确降落。另外，王明知道他们一行四人要去苏联，请陈云代表他致以慰问，还送来100美元，作为他们伙食费的补助。王明飞抵延安时，毛主席还到飞机场去迎接，说，喜从天降，后来王明自命不凡，把他那套理论吹得很厉害，对毛主席不尊重，才有了对王明路线的批判。

刘英的话证实了贺子珍被关进精神病院时，王明的确不在莫斯科；他也不可能有什么代理人，把手长长地伸到远离莫斯科的伊万诺夫市，去对一个已经在政治舞台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女人实施他的报复。

那么，贺子珍为什么会如此肯定地一口咬定是王明对她的迫害呢？纵观她以后的言行，就不难看出，害怕王明对她以及

对毛泽东的迫害，这是她一贯的思想。1959年她在庐山与毛泽东会晤时，她就曾当面提醒毛泽东，要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她在少有的几封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提到请毛泽东注意王明这样的人有没有在他的身边。当她自己神思恍惚的时候，不敢随便下筷吃饭，不敢随便喝水，也是因为害怕王明在里面放了毒药。王明几乎成了贺子珍所认为的对立力量的代名词。

王明在贺子珍的心目中如此可怕，这是从三十年代初期，王明路线对毛泽东以至他们全家所带来的灾难所形成的。王明一伙凭借共产国际的支持，迫使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提出了一条比李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会议将王明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会后王明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为口号，派其宗派集团的人，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各个根据地夺取领导权。1931年11月，在赣南根据地党的代表大会，实际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眼看着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他们的口号越来越左，到处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毛泽东忧心忡忡。从那时起，他的身体就不好了。但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对毛泽东的迫害并没有到此为止。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又把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销了。情绪不好的毛泽东，病得很厉害，连大小便都下不了床，把贺子珍都要急坏了。

王明路线对毛泽东的迫害，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以反罗明路线为名，对一批赞成和执行毛泽东的路线的同志，扣上反党、反革命的罪名。其中打击最重的是邓（小平）、毛（泽覃）、谢（邦俊）、古（柏）。他们被诬蔑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对他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残酷斗争。这场斗争，不仅牵连了毛泽覃，毛泽东的另一个弟弟毛泽民也受到了批判。

贺子珍和他们一家也受到影响。原来贺子珍还能管管总前

委的机要文件，总前委撤销，他们找个借口，不让她和古柏的夫人曾碧漪再管机要文件了，只让她们给苏维埃政府当收发。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带领游击队在井冈山一带坚持斗争。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第九师。以后他担任红二十四师的代理师长。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他被说成是邓、毛、谢、古的支持者，被免去了领导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不让他继续带兵，留校当个普通教员，以后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是毛泽覃的爱人。在反罗明路线时，她被撤销了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当时她已怀有身孕，在她怀孕和分娩后，对她进行日以继夜的批判斗争，逼她揭发毛泽覃，使她产后得了一身病，孩子也没有活下来。要不是董必武的力保，她的党籍都保不住了。

连贺子珍年迈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们在子女的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投身革命。在1927年永新事变后，他们同贺怡先后逃到吉安的清源山，住在一个庙里当斋工，掩护女儿继续革命。以后，他们随贺怡到了东固，在区委做勤杂工，抄抄写写。可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嫌他们的成份不好，不让他们在区委工作，老俩口只得去教书，养活自己。

了解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贺子珍为什么那么害怕王明了。她同她的家庭真是饱受其害，以至谈虎色变，几十年后仍然心有余悸。

她怀疑是因为得罪了人

贺子珍还认为，对她的迫害的第二个方面，是来自国际儿

童院的某些领导人，这就是她在同国际儿童院的领导人吵架时所说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她曾经谈到过，在德苏战争之前，苏联的党、斯大林对来自他国的共产党员是很照顾的，但是具体的某一些苏联人，他们的思想达不到国际主义的高度，对于培养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重要性，不能理解，觉得把钱花在他们身上不值得。这种思想情绪在德苏战争之前有一点流露，但还不明显，在德苏战争之后，就让你常常感觉到了，似乎这些外国人赖在他们的国家，白吃他们的粮食似的。贺子珍觉得，在苏联期间，来自这方面的精神压力对她是很大的，她时刻都能感觉到自己是外来人，局外人。

另外，她认为，在苏联，无论上上下下，长官的意志都表现得很强烈，谁当了领导，谁就说了算。谁敢违抗，各种各样的帽子都可能扣上。把一个不听话的人，加上精神病人的罪名，把他关到精神病院里，这是常见的事。贺子珍说，在她进了疯人院后，就发现有一个被当作是精神病人的人，她的精神、言行、举止，一切都很正常。问她，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这里来，我的领导认为我需受到这里来，就把我送到这里来了。贺子珍自己认为，她的遭遇同这个苏联女人差不多。

贺子珍的分析，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很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个时期的国际儿童院，负责人中分成了两派，争权夺利，彼此斗争得很激烈。她们都标榜自己所管辖的工作部门，工作是最出色的，秩序是最优良的，攻击另一派工作中的缺点，并且以此大作文章，达到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目的。这样，他们都要在自己工作的职权内，树立起绝对的权威，不允许有人说三道四，加以违抗。贺子珍正触犯了他们的忌讳，不听话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但是，这里也有解释不通的疑点。在斯大林的时期，的确出现过以精神病为名把某些不满意、不喜欢的人进行迫害，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但这通常用于政治斗争，对付敌对的政治力量。贺子珍是个最最普通的外国侨民，不过为了活命苦苦地挣扎。即使她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也上不到政治这条纲上去。为了一场争吵，为了出一口气，竟然出此下策，未免太小题大作了。更何况，一个国际儿童院的负责人，不过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导，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随便决定什么人有什么神经病，而且指挥医院来抓人呢？

当时在伊万诺夫市，以及后来流传到莫斯科所有中国同志的耳朵里，最普遍、最权威的说法是，贺子珍精神不正常，而不正常的主要表现是她打娇娇。据说在苏联，儿童是受到重点保护的，是不许殴打的。这种说法也是值得怀疑的。

贺子珍的确打过娇娇，而且不只一次。她打娇娇，有的打得有道理，有的没有道理。这是连娇娇自己都承认的。当然，从现代的教育观点来看，有道理也不能打，应该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苏联可能在四十年代就达到了这种家教的水平，但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却是信奉武力，“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不听话，打一顿，这是常有的事情。贺子珍是生长在旧社会的人，传统观念的影响肯定是很深的，她觉得应该严格要求女儿，除了用语言，有时还诉诸于武力，这在我们的国土上，不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情吗？

再说，贺子珍打娇娇，并没有达到伤害她的程度，不是很严重的，何至于因为打女儿而被当作精神病人关起来呢？

还有，如果不是国际儿童院的主谋，那么，是由谁提出，经过什么人批准，把贺子珍送到精神病院的？难道确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要不要住院治疗，可以不通过医疗部门的检

查、确诊，凭着什么人的个人意愿，就可以施行吗？这能说不是对人身自由的肆意亵渎吗？

总而言之，贺子珍就这样被稀里糊涂地关进了精神病院。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出来仗义执言，为她鸣冤叫屈；在事情发生以后，也没有人提醒她、协助她要求澄清事实，以正视听。贺子珍是带着神经病的帽子进的疯人院，在出院以后，也仍然被很多人看作是精神不正常的人。

贺子珍的厄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疯人院里的贺子珍

贺子珍进了精神病院后，特别是在初期，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与折磨，至今鲜为人知。贺子珍什么时候提起这段往事，都是热泪盈眶，痛苦万分。她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

她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了，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不得不日夜戴上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以贺子珍那暴烈、倔强的性格，她绝不会驯服地接受精神病院人的对待。她承认，她的确激烈地反抗过，抗议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来。她曾经拒绝医院的任何治疗，要求马上把她放回家去。她说，我家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然而，不管她说一千道一万，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均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他们强迫她服用大剂量的镇静剂，强制给她注射针剂。服用了这些药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即使醒过来以后，脑子仍然是一片浑

沌，沉重得象头上压了个大磨盘。她饭也不想吃，话也不想说，人也不想动，连女儿也懒得去想。

当她觉得药性慢慢消失，活力又回到她的身上的时候，连续的服药、注射又使她重新陷入了神智不清的昏睡状态中。

就这样，在昏睡、清醒不断的往复中，她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个日夜，她不知道进了这个同样有着铁门、铁窗的牢笼，经过了多少岁月，流失了多少时光。

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对她说：我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没有脑子的废人了？这个声音不断地重复出现，而且越来越清晰，响亮。她不寒而栗起来：我是不是真的成了没有思想的大傻子了？我不能任由他们摆布，把自己变成那样一种人。她觉得，自己没有病，被人诬陷说有病，硬拉到这种地方来，已经够不幸了。如果让他们按精神病来治疗，大剂量地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时间长了，把脑子真的治坏了，不是更倒霉吗？

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想出对策来，她逐渐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存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贺子珍拿定主意后，安静了下来。她再也不提要出院、要回家的话，而是老老实实在地接受医生安排的各种治疗，以取得医生的信任。过了一段时间，她对医生说，我天天睡眠很好，也不觉得心烦意乱，是不是光吃药就行了，不要打针了。医生看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针药停掉了。

其实，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病人每天

几次服药都是护士送。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吐出来的药她不敢随便扔，藏在身上，等上厕所时悄悄地用水冲走。

再过一段时间，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医生为此不断开出处方让她去烤电，做物理治疗，贺子珍三天两头要到理疗室去理疗，她被允许走出病房，活动的天地扩大了。她看到的東西也多了。她发现，自己是被关在“文疯子”的病室里，这样的病室还有好几个。里面住着的人，有的是真有病，有的也象她那样，被诬陷成为疯子，强行关了进来。还有的是“武疯子”，动手动脚的，他们有的被用绳子捆在床上，不断嗷嗷地大叫，可怕极了。贺子珍多么想早一日离开这个地狱般的鬼地方啊！

贺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医生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贺子珍的胳膊、腿上来，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贺子珍被关进精神病院后，能够周密地分析自己的处境，有步骤地采取相应的对策，这说明，她的神智是清楚的，她被当作精神病人来对待是不公正的。

她在精神病院里住着，有足够的时间来反省自己的过去。她再也不用为了谁，因什么事而奔忙了。自从娇娇来到她的身边后，她就感到肩上压着一副沉重的担子，终日忙忙碌碌地围着女儿转，为吃，为穿，为她的思想操碎了心。确切地说，她内心的忙碌要比她行动上的忙碌更厉害得多。现在，她无所事事，整天都可以躺着或坐着，默默地思量自己所走过的路，以及今后还要走的路。

对于自己到苏联来，贺子珍早就后悔了，而且不知后悔了多少次了。现在，她深深地感到这样做的错误。她过去十分迷信苏联，以为只有到了列宁的故乡，在那里才能学好马列主义。其实，马列主义学得好不好，环境、条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她在苏联虽然有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思想不集中，心绪烦乱，不是没有学好吗？

她还后悔对于异国医学的迷信。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能取出，身体就能康复，也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毛泽东当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提高的，我们要请国外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为大家治病。你不用到苏联去，不久以后在延安也能把弹片取出来。她听不进这些话，急着要走。结果，她在苏联也没能把弹片取出。

贺子珍更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当他们夫妻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毛泽东表示出了和解的和向前看的姿态。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她到了新疆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恳请当时在兰州办事处工作的陈正人和彭儒夫妇，劝贺子珍回来。陈正人和彭儒在井冈山时就与贺子珍相熟，相处比较好。毛泽东几乎是动员了所有他认为有可能劝说贺子珍回心转意的人做她的工作。可是，当时的贺子珍太任性了，不知道珍惜夫妻间的感情，结果，让江青钻了空子。

贺子珍更加后悔的是，在学习结束以后，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回国。她不愿意回国，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觉得毛泽东再婚了，回国后目睹这种情形，会很尴尬，很难堪。其实，革命的根据地不断扩大，并非只有一个延安。自己回去后，完全可以到前线去，到敌后去工作，实现自己多年所梦想的做群众工作。一个人的婚姻生活，只是生活的一个部份，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为什么不能把全部的感情寄托在事业上呢？

贺子珍在医院里，反过来复过去地检讨自己的过去。她觉得，自己被人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通造成的。如果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因此，今天走到这一步，主要是自己的错，不该有长期旅居苏联的念头和打算。这样一想，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国去。个人感情生活的不如意，重见到毛泽东后的别扭，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了，重要的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回到党的集体中去。那里有她的事业，有关心爱护她的组织和同志们。

当贺子珍下了决心要回国后，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采取了好多措施。她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安静本份，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最后，这些医务工作者终于承认，贺子珍神智清楚，不象是精神病，或者是精神病已经治好。他们不再强迫她吃药，给了她更多的活动的自由。

接着，她争取得到医务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她让他们知道，她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她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旅居苏联的。这时，治疗她的医生暗示：“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不过，他们告诉她：精神病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医生的话，使贺子珍异常兴奋。她出院回国有希望了。可是，她到哪里去找担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自从她进了疯人院，就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人来看过她，她无法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中国同志留在苏联，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她还发愁的是，她身无分文，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她没有自己的衣服，入院后，^⑤她身上穿的衣服被收走了，她总不能穿着精神病人的衣服出院呀。

她向一位态度比较温和的女护士，要了一张邮票，一张信

纸和一个信封。这封信写给谁？发到哪里呢？贺子珍好费思量。她根本不知道医院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更不知道她所熟悉的人中谁还留在苏联。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骗她开门，让精神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她想，别人都走了，这个人可能还会留在苏联。她并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何处，是否还在伊万诺夫市。她决定收信人就写这个女人的名字，地址呢，写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东方部，被大家称作柳克斯的那栋别墅。她觉得，把信投到那里比较保险，那里中国侨民出入的比较多，如果碰到有人认识这位女同志，并知道她的住址，就有可能转交到她的手中。另外，共产国际东方部如果还在活动，这样一封寄自精神病院的来信，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要是找不到那位妇女，他们又敢于把信拆开，就会看到她的呼唤，把她接了出去。

贺子珍在这封信中，没有流露出任何的个人恩怨和不满的情绪。她并不责备这个女人在把她关进精神病院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以后的岁月中，她每次提起这位妇女，都是抱着一种宽容的谅解的态度，说：“她有她的难处，上面有人命令她这样做，她也是寄人篱下，能不服从吗？”她是用一种平静的口吻写这封信的。她在信中写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你到医院来一次，接我出院。她还在信中提醒那位女同志，来的时候请别忘了给她带几件衣服来。

信发出以后，她觉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她每天都是在盼望中度过时光的。虽然她每天的盼望都落了空，并没有人接她，探望她，但她并不灰心。她充满着信心，总有一天，她的信会落到关心她的人手里，一定会有人来接她出去的。

贺子珍的信念是正确的，她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她，他们很快就要解救她来了。

七、终于踏上自己的国土

母女再次重逢了

1946年夏天，贺子珍终于盼来了接她出院的人，这个人就是王稼祥同他的夫人朱仲丽。

王稼祥是在夫人的陪同下，到莫斯科治病的。他们到达以后，就打听贺子珍的下落，寻找她的踪影。

王稼祥夫妇为什么关注这个早已失去任何光环的、不幸的人？是出自阶级的感情，同志的情谊，还是看到了贺子珍的信，听到了她的呼唤？贺子珍没有向他们提出过自己的疑问，她宁愿相信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她在医院里发出的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向王稼祥提起了贺子珍的遭遇，因而激发起要寻找贺子珍的念头。

王稼祥的确是知道贺子珍留在苏联的。在贺子珍刚到苏联的时候，王稼祥正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负责照管从中国来苏学习和治病的同志。他对同志体贴，关怀、周到。看到一些同志住在郊外，进城看病不方便，冬天下雪时，汽车都不好开，就设法让他们在城里东方大学的一个宿舍住下。贺子珍同刘英分娩以后，为了照顾她们的生活，王稼祥给她们找了一个苏联老太太帮她们照顾孩子，以后又让她们住到八部，因为那

里有食堂、有托儿所，还可以在那里上课。他是在1938年5月回国的。回国以后，他的身体仍然不好，因而在抗战胜利以后，在1946年的夏季又来到莫斯科。

王稼祥同贺子珍在中央苏区时就相熟，在长征时对贺子珍有进一步的了解，一向敬重贺子珍的为人，对贺子珍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他在到达苏联以后，见到了德苏战争后中国的幸存者，了解在德苏战争中留苏的中国同志的遭遇与下落，严酷的战争，无情的饥荒，夺去了一些来不及撤退的中国同志的生命，还使一些人下落不明。人们在介绍时，不时提到贺子珍和娇娇，这引起了王稼祥的关注，他决定打听贺子珍的下落。

王稼祥到莫斯科后，苏联根据他的地位和身份，为他派了专门的联络员，了解他的需要，帮助他解决一些问题，这位联络员叫尼古耐夫。王稼祥对尼古耐夫说，我们有一个中国同志叫贺子珍，还有她的女儿毛娇娇，现在还在伊万诺夫市，请帮助打听关于她的消息，我希望见到她。

尼古耐夫答应帮助调查。几天后，他回复王稼祥说：

“是有一个叫贺子珍的人，现在住在精神病院。她神经不好，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的女儿在国际儿童院上小学。”

“她的病很严重吗？”王稼祥问。

“是脏躁型的，生活不能自理。”

“请转告上级，我想把她接到莫斯科来见一面。”

尼古耐夫答应转达。一周后，他回复说：“贺子珍不便来莫斯科。”

王稼祥表示：“那我们到伊万诺夫市去看她。”

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对话的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此时插话说：

“我们一定要见她一面，最好连小孩子一起见，一起送到

莫斯科来。我是医生，我要亲自检查她的病情。”

尼古耐夫走了，十天以后回来仍然说不行。

王稼祥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见贺子珍一面。他说：

“如病情严重见过面后仍然送她回疯人病院。如果不严重，准备请示国内，把她送回国去。现在，我们东北的好几个大城市已经解放，有了好的医疗条件，我们可以继续给予治疗。”

不久，尼古耐夫回复说：上级已经同意派人护送贺子珍和她的女儿来莫斯科，住的地方也已准备好了，不日即可见面。

王稼祥夫妇满心欢喜地等待贺子珍的到来。

在朱仲丽所著的《江青野史》中，她是这样描绘他们夫妇与贺子珍母女的第一次会面的：

“几天以后，贺子珍到。她35岁（当时贺子珍已经37岁了），从皮肤颜色上看出，她饱经风霜。从圆圆的眼睛看出，她忧郁不安。从她略宽的嘴角看出她坦率直爽。她牵着一个十岁的女孩站在门口说：‘王同志，您好’尼古耐夫跟在后面。

“贺子珍头戴一顶法国式圆形无边帽，上身穿一件黑灰色薄呢子西装式短衣，下身是黑色裙子，半高跟圆头皮鞋。她看上去神智清醒，颜面有表情，眼神略迟钝，反应稍为缓慢。

“‘我好！’贺子珍回答我们的问候。她面带笑容，眉尖微蹙，让女孩叫阿姨。

“‘我睡得好，也吃得好。’她表情淡漠，说话迟钝。

“‘你觉得哪里不舒服？’

“‘我有些心烦。’

“‘你们在这儿玩半天吧。’王稼祥说。

“尼古耐夫说：‘到5点钟，我派车接她们回旅馆。’

“‘我现在口齿不顺，好几年没讲中国话了。小孩子同我讲

话，一半俄语，一半国语。我只在生活方面讲几句简单的俄语。’

“她的口齿和脑筋，在三个钟头内转向灵活。

“晚饭前，尼古耐夫来接她。王稼祥对贺子珍说：‘请你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一有机会，带你回国，’

“贺子珍从谈话中得悉国内一片大好形势，思念祖国之情不可言喻，高兴得直点头。

“尼古耐夫在旁见此情形说：‘我如实反映上级。你们可以提出应有要求，愿到哪里去玩吗？我想你永远不会再入精神病院了。’”

贺子珍自己的叙说，与朱仲丽的介绍是一致的。那天，她正躺在病床上，一个护士突然走进病房，把她领了出去。护士把她带进一间更衣室，指着桌上的衣服，让她换上。她一看，原来是自己来时所穿的衣服。旁边还有一只小箱子，里面放的是她过去的洗换衣服，还有那床她从延安带出来的红毛毯。护士说：有人要接你到莫斯科去一趟，穿好衣服就走吧，汽车在外面等你。

这样，贺子珍在进入疯人院两年多以后，终于走出了医院的大门。一位苏联同志陪她上了汽车，来到一家旅馆，这里已为她定好了房间。她就在这个房间里见到了两年多没见面的女儿娇娇。

娇娇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她那时已是国际儿童院三年级的学生了，那天，她正在上课，老师让她去见院领导。院领导对她说：你妈妈要见你，现在就带你去见妈妈。娇娇瞪大了眼睛，惊奇得说不出一句话。小小的年纪就经历了那么多生活的波折，娇娇的性格变了，她变得内向，沉默寡言。院领导见娇娇不说话，又重复了一遍，并指着身边的一个男子说，他将带你去见妈妈。院长又问了一

句：“你愿意吗？”娇娇轻轻地点了点头，仍然没有热烈的表示。她觉得这个好消息虽然是盼望已久，但来得太突然，没有心理准备。这件事是真是假还说不定，要见了妈妈才能肯定。不管她表面上没有表现出兴奋、热烈的情绪，她内心是很高兴的，她终于可以飞出这个鸟笼了。

她很快被带到一家旅馆，领到一个中年妇女的面前。娇娇一眼就认出，这真是她的妈妈，妈妈在屋里也戴着帽，帽沿外没有一丝头发，原来妈妈也同自己一样，剃成秃子了。娇娇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一刻也不迟疑地扑向妈妈，嘴里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

贺子珍也异常激动，双泪直流，紧紧地抱住哭得全身颤抖的娇娇，喃喃地说：“娇娇，我的好孩子，妈妈多想你呀，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

当她们的情绪平伏下来以后，都久久地凝视着对方。贺子珍看到，两年多不见，娇娇长大了。人长高了，面庞更酷似她的爸爸，端正秀气，神态中有一点大孩子的模样了。

娇娇觉得，妈妈也有了变化。妈妈虽然仍很纤细，瘦弱，苍白，但已经没有了饥饿的痕迹，脸上青黄的菜色不见了。她的眼神仍然饱含忧郁和哀伤，但已经没有了倦容。娇娇原来还怕妈妈饿肚子，现在不用担心了。

第二天，母女俩一起动身去莫斯科。

苏方原来决定，只让贺子珍母女同王稼祥见一次面，时间是半天，然后再把她送回精神病院。后来看到贺子珍的表现十分正常，就同意她留下来，多住些时候。

在莫斯科居住的中国的同志，听到贺子珍来到莫斯科，纷纷前去探望她。这些同志中，有在德苏战争时期就留居莫斯科，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也可以说是劫后余生的。他们同贺子

珍重新聚首，都感慨万千，叹息世事沧桑，变化莫测。那些到苏联来学习的干部子弟，听到贺子珍同娇娇来了，更是万分高兴。他们差不多天天都要跑去看望她们，陪她们说话，陪她们上街去玩。他们热情地劝慰贺子珍：“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不要老想它了，多想点高兴的事不是更好吗？”

正在莫斯科上中学的毛岸青听到贺子珍和娇娇来到莫斯科，兴高采烈。他多么喜欢同娇娇妹妹一起玩呀。那几天，他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同贺妈妈、娇娇在一起。

朋友之情，阶级之爱，给了贺子珍鼓舞和力量。她的情绪变得开朗起来，笑声也多起来了。刚到莫斯科时，她还有说话口齿不顺的现象，不过三四天，她的语言变得流畅，思维也变得敏捷多了，那呆滞的眼神，迟缓的动作，几乎看不到了。

经过几天对贺子珍的观察，苏方同意了这个结论：贺子珍的神智正常。这样，完全排除了她重回精神病院的可能性了。

她坚定地说：回祖国去！

贺子珍有了自由地选择生活的权力了。王稼祥问她：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回祖国去！”贺子珍没有一点犹豫，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这是她在精神病院时就已经深思熟虑的决定了。

“很好。”王稼祥对她的决定十分满意。他说：“一切经过组织手续来办。这事关系到毛泽东的家庭问题，必须请示毛泽东。”

于是，他立即起草了一份电文，把贺子珍目前的情况以及她要求回国的意见，详细作了汇报。电报直接打给毛泽东，上面写了“请毛主席批示”的字样。

不久，毛泽东的复电来了，只有四个字：“完全同意。”

王稼祥收到回电后，立刻通知了贺子珍，贺子珍兴奋极了。说：谢谢毛主席给了我回国的机会。她同王稼祥商量后决定，不仅她同娇娇一起随同王稼祥回国，而且把岸青也带着走。岸青耳朵有点背，生活自理能力差，将他一个人留在苏联，是不大放心的。

岸青知道能同贺妈妈、娇娇一起回国，也是非常高兴。他的哥哥毛岸英在这之前已经回国了，他一个人在莫斯科生活，感到很孤寂。现在，他又有了家的温暖。

王稼祥还需要在莫斯科停留一个时期，以治疗他的疾病，于是贺子珍同娇娇也在莫斯科住了下来。在王稼祥夫妇的建议下，贺子珍同娇娇离开了旅馆，搬来同他们一起居住，生活上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他们夫妻经常带着贺子珍、娇娇和岸青三人一起游玩，大戏院、歌剧院、公园是他们常常涉猎的地方。当医生的朱仲丽说：“这是帮助贺子珍变换脑筋的健身疗法。”

贺子珍愿意同王稼祥夫妇住到一起，也有她的想法，这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听他们讲述中国革命的情况。她离开中国已经九年了，革命的形势一日千里地发展，同她原来印象中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渴望多了解国内的情况，多听他们的介绍，同他们住在一起，就有了更方便的条件。

在等待回国的日子，最高兴的要数岸青和娇娇了。岸青已经不上学，他每天都要来陪妹妹玩。兄妹俩都喜欢音乐，两个人打开收音机静静地听着。有时，岸青领着娇娇去公园看哈哈镜。把一个人照得怪模怪样的哈哈镜，常常逗得娇娇哈哈大笑，她总是看不够。

这一段时间是贺子珍身心一定程度得以恢复的时期。她精神愉快，吃饭也香了。她体重增加了，面颊也显得丰腴起来。

一些老战友在哈尔滨看到她，都说她没有怎么变样，事实上完全得力于在莫斯科这多半年时间的休息与调养。

在归途中

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一起踏上了归国之途。

从莫斯科到我国的哈尔滨，要穿越苏联的大部份国土，路途是遥远的。正点行驶都要八天八夜。他们一行由于有病人，停停走走，竟走了一个多月。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位中国同志。一位是被炮弹打伤了眼睛的男同志，到苏联去医治，治疗没有效果，又回国了。他双目失明，行动很不方便，生活也难自理。另一位是女同志，是位烈属，她的丈夫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到苏联去医治，未愈，在苏联去世了，她是只身回国的。

贺子珍同那位女同志一起，跑前跑后，照顾那位失明的同志，她们给他端茶端水，洗衣送饭，还扶他上厕所。人们从她那细心周到的服务中，似乎又看到了长征时期那个对同志满腔热情，只要自己有一口吃的，就要分出一半给别人的贺子珍。

从踏上火车这一刻，贺子珍的心已经飞回了祖国，在筹划今后的生活。

事实上，从她离开精神病院，来到莫斯科后，她对未来生活的设想就已经开始了。在莫斯科等待回国的半年多时间里，她除了同王稼祥夫妇交谈以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同国内来的同志交谈，了解国内的情况。

她一遍一遍地问自己，回国以后我能做些什么，将在什么地方工作和生活。但是，她每次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她离开祖国九年，对生她养她的这块土地已经变得很陌生了。她有时想到哥哥贺敏学工作的地方去，兄妹间可以有个依靠；有时

又想找她的妹妹贺怡，与她生活，工作在一起。至于她的哥哥和妹妹生死如何，现在何方，她一点都不知道。红军长征的时候，贺敏学被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从此兄妹失去联系。贺怡在红军长征时，同她的丈夫毛泽覃一起留在江西，姐妹再也没有见过面。贺子珍有时又想到前线去，或者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总之，离毛泽东远远的，一个人，默默地，尽自己的心意，为党做一点工作，补偿九年光阴的虚度。

在一个多月的行程中，贺子珍并没有让时间白过。她抓紧这个机会向那位失明者和女同志了解他们出国前国内的战局与政局。无论他们介绍些什么，她都听得津津有味。她象海绵一般吸取一切她能听到、了解到的国内的情况，为回国后工作做准备。

她在火车上就开始为娇娇的未来操心了。娇娇四岁出国，在苏联整整待了六年，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更不用说写中国字了。回国以后，她将怎样适应新的生活呢？贺子珍请同行的这两位同志教娇娇讲中文，她们都很乐意当娇娇的老师，一路走一路教，桌子、椅子、茶杯、碗筷的读法，就是娇娇每日的功课。

经历过与家人离散又重相聚首的娇娇，卸下了孤苦伶仃的心理重压，变得活泼多了。但是她比起同龄的少女，仍然显得成熟，甚至有点孤僻。她与妈妈虽然有过生离死别的劫难，母女的感情更靠近了。但是在娇娇的心目中，妈妈依然严厉，可敬多于可亲。自己做了什么不如妈妈意的事情，一个巴掌随时可能落到她的头上。就拿学汉语来说吧，娇娇是很愿意学的，她学得也很认真。可是一个“厕所”与“茅房”的异同，把她搅得头昏脑胀，她怎么也弄不明白什么时候应该用“厕所”，什么时候应该用“茅房”。她学得兴趣索然，自然就不愿再去

学了。这惹得妈妈不高兴，她自己也免不了挨剋。

娇娇虽然比一般女孩子显得老成，但她毕竟是个只有十岁的孩子。这是一个需要爱抚的撒娇的年龄。她不可能在妈妈的怀里得到满足，却在与二哥岸青的交往中得到快乐。岸青对外界的事物反映比较缓慢，对妹妹却是极好的，一副当哥哥的模样。在火车上，兄妹俩一直待在一起。他们用俄语对话，讲故事，说笑话，非常融洽，这使娇娇的旅途十分愉快。

火车越靠近祖国的边陲，贺子珍的情绪越亢奋，流露出急不可待的神态，她时不时地站在车窗旁边，极目往前眺望，想早一点看到祖国的面貌，站台上迎接她的亲人。

娇娇却不一样，她对于早一点晚一点到达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有妈妈和哥哥同她在一起，这就很满足了。她对于祖国毫无印象，说不上爱，也说不上不爱。

列车终于开进车站。贺子珍在车上一眼看到站台上已经站着来接他们的同志，不禁一阵激动，眼圈都红了。娇娇的反映则是惊讶和害怕。原来她一眼瞅见站台上一些穿着灰布衣服的人们，都戴着有檐的帽子。在她的印象中，戴有帽檐帽子的都是日本人，是侵略中国的坏蛋，苏联士兵的帽子都是无檐的。她不由得惊恐地叫喊起来：“日本兵”！迅速躲在妈妈的身后。贺子珍慌忙堵住娇娇的嘴，低声斥责她：“别瞎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是叔叔阿姨接你来了。”

他们终于踏上自己的国土。

八、为工作、为女儿费尽心机

艰难适应新工作

在回国之前，贺子珍设想了自己今后的生活，要到前线去，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回到祖国以后，贺子珍、娇娇和岸青三个人哪儿也没去，而是逗留在哈尔滨，一待就是一年。这是组织上安排的。贺子珍是个组织观念极强的人，从来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党叫在哪里干就在哪里干，她没有提过意见。

他们一行人走下列车时，李富春等人代表东北局在车站迎接他们。李富春亲切地同每位归来的同志握手。他一面同贺子珍握手，一面问道：

“一路上身体可好？”

“很好，谢谢。”贺子珍高兴地回答说。

“路上辛苦了，好好休息吧！”

“不用休息，我不累。我请求组织上尽快安排我的工作，干什么都行。”

“你的住处已经安排了，你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可以提出来，我们去办。”李富春似乎有意岔开话题，只谈生活。

“不，我个人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早日工作。”贺子珍重复了她的请求。

但是，东北局的同志发现，贺子珍最需要解决的不是工作，而是生活必需用品。她们母女到达哈尔滨时已经是秋天了，金黄色的树叶落了一地。她们带回来的只有一只小小的衣箱，不仅没有过冬的衣裳，连日常换洗的衣服也缺少。娇娇脚上穿的一双鞋，已经露出了脚趾。

贺子珍在德苏战争爆发前，由于每个月有津贴费，母女俩添置了一些衣服。到了伊万诺夫市，为了填饱肚子，陆续将一些不穿的衣服变卖了，换了吃的。到娇娇病重时，贺子珍将值钱的衣服都卖了，也不管等穿不等穿了。她从精神病院出来，国际儿童院倒是把她的东西都发还给她了，不过她本来就所剩无几。至于娇娇，在国际儿童院住着，由院里按时发给四季服装。要是离开，只能穿走身上的一套。

东北局的同志为贺子珍做了一套深色的列宁装，前面两排扣子，斜开身，给娇娇买了一双皮鞋，做了一条带背带的裙子。以后又陆续给她们添置了冬装。组织上还给她们安排了宽敞的住房。

一些在哈尔滨的战友，纷纷来看望贺子珍。贺子珍与战友们叙离情别恨时难免伤心落泪，但是她的情绪是乐观的，平稳的。人们都说，贺子珍虽然受了那么多的苦，却没有怎样变样。她穿上了组织上为她做的、当时最时髦的列宁装，束上了腰带，身段依然苗条。她戴上了列宁帽，把重新长出的漆黑的头发塞在帽子里，显得干净利落，神采奕奕。她的皮肤还是那样白皙细腻。她的眉毛仍然又弯又浓，微微蹙起，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饱含着热情，她的举止还象过去那样大方庄重，但是贺子珍自己说她苍老多了，心灵上布满了创伤。

在她的一再请求下，组织上给她安排了工作。她先是在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的职务，后来又到了哈尔

滨市总工会工作。

贺子珍是满腔热情地迎接这些工作的。她不挑不拣，不计较职位高低。然而，一段时间下来，她发现自己无法适应这些工作。作为一个党的干部，不仅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前，起表率的作用，还要会做组织鼓动工作，给干部、工会会员们讲课，宣传党的政策，讲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还要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这些宣传教育工作，在解放不久的新解放区，尤其显得重要，因此，每个党的干部都要担负讲课的任务。

东北局的宣传部门为了便于干部们讲课，编写了宣传大纲，规定了每一课的范围和主要内容。但是，大纲仅仅是大纲，需要每个讲课人临场发挥，充实很多的实际情况，才能讲得有血有肉。

想当年，贺子珍是做群众工作的佼佼者。八十年代初，访问过1927年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老革命家何长工的人，都会听到他对贺子珍演讲口才的衷心赞扬。他一直清楚地记得，1929年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第一次打开江西永新县开祝捷大会时的情形。在这次会上，贺子珍代表江西永新县的妇女和青年讲话。她穿一身藏青色农村妇女便装，腰上扎了一根皮带，别着一支短枪，站在黑鸦鸦的一片人海面前，不慌不忙地讲话。她没有讲稿，却讲得头头是道，鼓动性强，赢得阵阵掌声。

然而今日的贺子珍，对走上讲台心里发怵。她除了大纲上的话，就没有什么可讲了，没有办法为大纲充实更多的内容，因为她对国内的情况太不熟悉了。离开精神病院后，她虽然在这些方面作了努力，但毕竟是有限的，零碎的。特别使她感到困难的是，无法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哈尔滨是新解放区，群众的文化层次比较高，思想基础却比较差，他们常常提出一些

敏感性强，政策性强的问题，要求贺子珍回答。比如：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搬走我们的机器，等等。贺子珍连这些情况都不了解，自然无法给以满意的答复。

贺子珍是用顽强的毅力来克服困难的。她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用来备课，查阅各种报纸，从中摘下可以利用的例子，然后把她写到讲稿上去。她已经是久不拿笔写字的人了，文化水平原来并不高，要写出自己的讲稿，对她来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她要求自己这样做了。

对于一时解答不了的问题，她老老实实在地表示她回答不了，但是她可以向上级反映，请示以后再回答。她讲的课可能不尽人意，但是对她来说，她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一个九年没有参与国内政治生活，在异国他乡，终日为生活奔波，心灵上满是创伤并受尽精神折磨的人，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够多够好的了。

娇娇的教育蓝图

在贺子珍为自己的工作伤尽脑筋的同时，又在为女儿的未来操心。

“一定要让娇娇多读书，受最好的教育。”这是贺子珍的心愿，她多次同知心的战友们讲述过。她自己只读了小学，因为参加革命，中途辍学了。她痛感自己文化太低，适应不了工作，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也千方百计抓住机会去上学，但终因时间过短，学学停停，没有多大成效。她不能让女儿象自己那样，留下终身的遗憾。她要让女儿利用现在的好条件，饱读诗书，成为新中国有用的建设者。

贺子珍为娇娇构想了一个庞大的、包罗了好多方面的学习计划。这个学习计划的第一项是让娇娇尽快学会讲汉语，学会

写汉字。

在妈妈被关进疯人院之后，娇娇就几乎没有机会说中文了。她在国际儿童院读的是俄文，讲的也是俄文，几年下来，她已经不会讲中国话了。她还能听懂一些日用的汉语会话，如吃饭，上学这些名词，可是，一句都讲不出来。要让她读和写汉字，就更加不行了。这对母女在伊万诺夫市再次重逢后，她们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用中文来对话，而是用一种混杂的语言来交谈。娇娇能听懂一点妈妈说的中国话，但她只能用俄语同妈妈说话。贺子珍呢，她没有受过正规的俄语训练，说得不正规，也不流利，特别是她的思维方式仍然是中国式的，她是按照中文的意思，把它翻译成俄语，因而是中国式的俄语，有时是让俄国人听不明白的俄语。对这样的俄语，娇娇也往往是听不懂的。就是这种中国式的俄语，贺子珍说着说着，碰到一个什么词说不下去了，就要用中文来帮忙。她与娇娇的对话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俄语夹着汉语，或者是说几句俄语再加上一句汉语。这种对话方式，贺子珍觉得好憋扭。她认识到只有让娇娇学会讲汉语，她们的对话才能结束这种尴尬的局面。

娇娇到了哈尔滨后，按照她在苏联学习的程度，插班进入小学三年级，实际上她的中文语文能力，连幼儿园的小朋友还不如。为了让娇娇赶快提高中文，贺子珍在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给娇娇请了中文教员，在上课之余专门给娇娇补习中文。从哈尔滨到以后移居沈阳，娇娇的中文教师换了三个，中文教育始终未断过。刘少奇的前夫人王前，曾经教过娇娇中文。

娇娇学习中文，是从学讲汉语开始的。教员们引导娇娇用汉语讲话，用汉语回答老师的提问，逼着娇娇用汉语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为了让娇娇有更多的用汉语说话的机会，贺子珍又鼓励娇娇结交更多不懂俄语的小朋友。在哈尔滨时，娇娇在周

末放假并不是每次都回家看妈妈，而是轮流在李富春、王美兰等妈妈的老朋友家住宿，同他们家的其他人员和小孩子，用汉语对话。贺子珍的这一招还真灵验，娇娇的语言能力有了比较大的突破。

但是写和读就困难多了。在回国之前，娇娇从未接触过方块字，可以说连个“一”字怎么写都不知道，而三年级的语文书已经是长篇课文了。老师们对娇娇不得不从“一二三四五”、“人口刀手尺”最简单的汉字教起。

可是贺子珍盼女成才心切，过不了几天，又给娇娇提出了新要求：记日记。她说，这是锻炼中文文字能力最好的方法。这对娇娇来说，真是太为难她了。她听、讲、写中文的三种能力中，写的能力最差。她连中文字都认不得几个，怎么写得出日记呢？因此，无论妈妈怎样催逼，她始终没能拿起笔来。妈妈对娇娇的这个愿望，一直到娇娇到了爸爸的身边才得以实现。

贺子珍对娇娇的一个要求是：学好中文，不忘俄文。为了不让娇娇在学中文时忘了俄文，她又为娇娇挑选俄文教员，可是没找到合适的。在哈尔滨，有不少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逃亡到中国的俄国贵族和他们的后裔，请这些人教娇娇是很容易的。但贺子珍不放心，怕给娇娇灌输了不好的思想影响。她让岸青同娇娇一起温习俄文，同意他们只用俄语交谈。平时，机关放映俄文原版电影，贺子珍总让娇娇去看。买东西，她爱带娇娇到俄国人开设的秋林公司，让娇娇用俄语同售货员对话。贺子珍细心到这种程度，在沈阳时，听说苏联的学者尤金正在沈阳访问，就带着娇娇去拜访他，让娇娇结识这位学者，有更多用俄语对话的机会。尤金后来被任命为苏联驻中国的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

有一天，贺子珍对娇娇说：“现在的女孩子同我们当年不同了，除了学文化还应有多方面的修养，你愿意学弹钢琴吗？”娇娇喜欢音乐，以为练琴是很好玩的事，不知其中甘苦，马上表示乐意。贺子珍用自己的津贴为娇娇请了一位钢琴教师。

贺子珍还让娇娇学画画，特地给她买了图画簿和彩笔。娇娇画的画不是临摹静物，很多是根据自己的想象随意画出来的，很有儿童的情趣，贺子珍看后觉得怪有意思的。

有一天，贺子珍对娇娇说，你画一张你自己的画给我看。不一会儿，娇娇就画完了。画面上是两个男孩子，中间是一个梳小辫子的小姑娘，两个男孩子画得又矮又小，女孩子却画得又高又大，三个人手拉手地往前走。毛岸青一看就知道画的他们兄妹三个人，便抗议道：“我们仨人你最小，你怎么把我和大哥画得那么小，你自己画得那么大呢？”娇娇得意地说：“就该这样画，在这张画里，你们就是比我小。”平时对娇娇很少露笑容的贺子珍，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贺子珍也关心岸青的学习。回国以后，岸青同娇娇一起生活在她的身边，她对岸青象自己的儿子，甚至比对娇娇更耐心。娇娇时不时要挨妈妈的打和骂，但贺子珍从来没有碰过岸青一个小指头。每次同岸青说话，她都是轻声细语，充满母爱的温情。她为岸青找了一所好学校，又怕岸青学中文后把俄文丢了，又督促他经常温习俄文。搬到沈阳居住以后，她特地为岸青请了俄文教员，为他晚上增设俄文课。贺子珍还让娇娇陪他一起上课。岸青白天上课，晚上学俄文，负担过重，身体累坏了，得了神经衰弱症，这才将俄文课取消了。

贺子珍为开发女儿的智力，不遗余力，她对娇娇的品德塑造，抓得更紧。

娇娇在苏联生活了六七年，生活方式已全部苏化了。比如

说，在苏联，不论春夏秋冬都穿裙子。回国以后，组织上看她换洗衣服不够，给她做了一身衣服，下面是条裤子。娇娇没有穿惯长裤子，穿着别扭极了，怎么穿怎么不舒服。组织上知道了，另外给她做了一条裙子。为这事，贺子珍好一顿生气，数落了娇娇好一阵。

再比如说，娇娇在苏联居住期间，虽说在德苏战争时挨了饿，吃了些苦头，但以后进了国际儿童院二分部，生活还是不错的。她吃惯了黄油、果酱、面包。回国以后，这些都没有了，变成了馒头、粗粮、杂粮。开始的时候，娇娇不习惯，每次吃饭都没情绪，有时还哭着鼻子要黄油、面包。这时，贺子珍的气就上来了，不断责备娇娇：“我们回国没做什么事，却给组织添了好多麻烦，你还好意思伸手要这要那。你吃不下就别吃，饿肚子去。”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娇娇差点挨打。

贺子珍的好朋友陈正人和彭儒夫妇，要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他们的两个孩子只能交给学校来照管，做妈妈的彭儒有点舍割不下。有过同子女生离死别惨痛经历的贺子珍，很能体会彭儒此时的心情，就说：“你放心走吧，孩子们交给我，我每个礼拜把他们接到家里来，给他们做好吃的。”

彭儒走后，贺子珍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每个周末把他们接到家里来，给他们洗头、洗澡、洗衣服。

娇娇读书的学校，同彭儒的儿子——小名叫小胖子的是一个学校。贺子珍叮嘱娇娇，星期六回家时一定要同小胖子一起回来。

有一次周末，娇娇一个人回来了。贺子珍没见到小胖子，登时沉下脸来，问：

“小胖子呢？你怎么不同他一起回来？”

“我没有找到他。”娇娇见妈妈生气，心里打起鼓来，怯生生地回答说。

“没有找到他你就回来了？他要出了事怎么办？”贺子珍生气了。“你给我回去，不找到他你就别回来。”

学校离家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要一个不满十一岁的女孩子，来回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去寻找她的伙伴，这个要求是不是太过份了？娇娇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泪却象断了线的珍珠，一颗一颗地落下来，她在无声地哭泣着。

正在贺子珍家作客的王美兰不忍心了，劝贺子珍说：

“娇娇还是个孩子呢，叫她到哪里去找小胖子，这个淘气包还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玩了，我看还是让警卫员赶着马车去找吧。”

贺子珍同意了，但她对娇娇的批评还在继续：

“我不知教了你多少次，要关心别人，关心别人要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才是做人应有的品德。我答应过要照顾小胖子，他要出了点事，我怎么向他们的爸爸妈妈交待？”

这场风波，直到小胖子安然回家，才算了结。

九、娇娇眼中的妈妈

旧情难忘的妈妈

贺子珍在忙着工作，忙着安排娇娇的学习的同时，又急切地多方打听她的哥哥贺敏学和妹妹贺怡的下落。

他们兄妹三人几乎是同时参加革命的，在大革命时期，在永新县，都做不少工作，被人们称为“永新三贺”。他们兄妹之间，既有手足之情，又有革命之意，感情很深。

贺子珍是在随同红一方面军在1934年撤离江西瑞金时同哥哥、妹妹分别的。那时，贺敏学担任红二十二师代师长，跟随项英、陈毅留守赣南，坚持游击战。妹妹贺怡当时任云都县委组织部长，有孕在身。她的丈夫毛泽覃被留在赣南，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这样，贺怡也跟着留了下来。在分别时，贺子珍把爱子小毛和跟随他们兄妹参加革命的老父老母，托付给贺怡。如今，他们均在何方，是否都健在老小平安，贺子珍万分惦念，希望听到他们的音讯，同他们联系上。

东北局的同志虽然无法给她提供任何消息，但都热心帮忙。一封封电报打到了各个野战军的组织部门，打探贺敏学、贺怡的下落。贺子珍自己也给正在华东前线的昔日老战友肖劲

光和肖华打了电报，请他们帮忙寻找贺敏学。这些同志都是热心人，怀里攥着电报到处找贺敏学，也果真把他找到了。当时国民党正重点进攻胶东，贺敏学作为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的师长，军务在身，不能去看贺子珍，他就派自己的妻子李立英——一位新四军的女干部带着五岁的女儿小平代表他前去探望。

李立英在哈尔滨停留了一个多月，这是贺子珍心情最激动的时刻。见到了嫂子就如同见到了哥哥，她有多少话要对自己的亲人诉说啊！在那些日子，贺子珍与这位年轻秀气的嫂子形影不离，连晚上都睡在一张大床上。她们常常是彻夜不眠，从深夜谈到黎明。李立英发现，贺子珍仍然保持着她与毛泽东一起生活时的习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贺子珍在嫂子的叙说中，了解到贺敏学和家人的情况。贺敏学在赣南游击战争中非常艰苦。有次部队被打散，他为了寻找部队，当过长工，打过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七次负伤，至今在他的腰上和腿上，还留着子弹。

贺子珍听了，既为哥哥的刚毅英勇感到高兴，又为哥哥的健康担忧。她第一次萌生了要与毛泽东联系的念头。她对李立英说：“我们马上起草一份电报，报告贺敏学的健康状况，请求中央批准让他到东北进行手术治疗。这份电报就打给毛主席。”

她俩很快起草了电报，一起送到罗荣桓家，请秘书代为拍发。三四天后，回电来了，电文上写：现正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敏学离开，待以后有机会再说。签名是毛泽东。这是贺子珍在回国以后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音讯往来。

李立英告诉贺子珍，红军大部队撤离瑞金以后，赣南的革命形势马上恶化，毛泽覃牺牲了，由他负责寄放的小毛下落不

明。贺怡带着父母，在一片白色恐怖笼罩下，在于都县白禾区隐蔽起来，坚持斗争。直到国共实现合作，贺怡才到赣州与项英接上头，以后到油山的新城办事处工作，贺的父母留在赣州办事处。1937年底贺子珍的父亲因病去世，组织上把贺母送到武汉办事处，以后又转送延安。这时贺子珍已经离开延安去了苏联。是毛泽东照顾了老人的生活，并在她去世后为她办理了后事，还在她的坟前立了一块碑。

听到这里，贺子珍流泪了。妹妹贺怡坚强的革命意志强烈地震撼了她。贺怡也有失夫之痛，而且拖儿携老，仍然坚持革命，表现出多么坚定的革命信念。她和哥哥贺敏学对祖国的解放事业是有贡献的，对人民是有功的。相比之下，她感到很惭愧，自己这些年真是白过了。

小毛的失踪，使她很难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他是唯一的在她和毛泽东身边长大的孩子。他的出生，曾经给他们夫妻带来了多少欢乐。现在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可能再无重逢的机会了。想到这里，贺子珍不禁抽泣起来。

她想到了她的父母，追随着儿女，投身革命，结果客死他乡，两个老人死后还不能合葬一起，更是觉得悲痛难忍。她对李立英说：如果我不去苏联，在延安照顾妈妈，妈妈不会感到孤独，也不会因痼疾丧生，我没有尽到女儿应尽的责任。

当她听到是毛泽东替她尽孝，为老人养老送终，她的眼泪象拧开了的水龙头，不住地往下流。她感念毛泽东的不忘旧情，也越发觉得自己对不起毛泽东。不是自己的任性，多次拒绝毛泽东的劝说，不肯回头，她们之间的关系绝不会弄到这一步。

她哭着打开了从苏联带回来的小提箱，取出一床红色的毛毯，一面抚摸着一面对李立英说：

这床毛毯是我和毛主席的纪念物，它陪伴我们一起生活了好多年。这上面有一个大洞，是主席在长征路上烤火时烧坏的，到了陕北，我请老乡用土羊毛织补好了。我同主席生气走了，可我把这条毯子带走了。我也是忘不了过去的深情呀！”

此时，贺子珍已不是伤心落泪，而是嚎啕大哭了。李立英也陪着流了不少泪。

倾囊相赠的妈妈

当然，亲人们的难得相见，毕竟欢乐多于哀愁。在李立英母女来到哈尔滨以后，贺子珍的情绪很好，她张罗着带她们去看看北国城市的风貌，认识在哈尔滨的她的老战友们。她对待这个初次见面的嫂子，就象久别重逢一般，熟悉中透着亲热。

舅妈李立英带着表妹贺小平来访，不仅妈妈高兴，娇娇也好高兴。十岁的女孩子有多少悄悄话想和自己的同龄人说啊。这些话，没有多少秘密，可都是女孩子之间才有的话题，既不可能跟妈妈说，也无法对岸青哥哥说。

可是过了不多久，娇娇感到好委屈，好难过。因为妈妈对表妹小平比对她这个亲生女儿还要好，而且不只好一倍，而是好很多倍。

妈妈对娇娇一直很严，即使有过在苏联那段母女分离的悲痛经历，在重逢以后，妈妈对娇娇的态度并没有因此改变。妈妈严格要求娇娇，这是为了娇娇好，妈妈的用心，娇娇能理解。如果妈妈对娇娇同对其他的孩子都一视同仁，娇娇绝不会有意见。可是妈妈对别人家的孩子，又温柔，又体贴，唯独对娇娇横竖都看不顺眼。这种现象在小平来到哈尔滨后，表现更突出了。

舅妈她们刚到哈尔滨时，天气比较严寒，两个人都穿得厚厚的。到了换季的时候，她们身上的行头就显得臃肿了。从来在物质上慷慨大度的贺子珍，在亲人面前更是舍得倾其所有。拿娇娇的话说，妈妈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东西都拿出来送给她们。

贺子珍看到小平天暖了还穿着棉衣，就想给她打件毛衣。没有毛线，她甚至想将那条红毛毯拆成线，给小平打毛衣。是李立英极力制止，她才作罢。后来，她要把娇娇从苏联带回来的、最心爱的、也是最好的一条红毛线裙子，还有娇娇从苏联带回来的一顶很洋气，立式帽檐的帽子，都送给小平，娇娇心疼地哭了，这是她最好的裙子和帽子呀，而且她还能穿戴呢。

可是妈妈却说：

“小平是妹妹，她小。天暖了，她没有换季的衣服怎么行。我们应该关心她。”

“她也有妈妈呀，她的妈妈不会给她做吗？”娇娇一面说，一面流泪。

“她的妈妈在前线打仗，没有功夫给她做。人家有困难，我们要帮助。”

娇娇难过地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这对一个十岁的女孩来说，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全送给别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娇娇在妈妈的教育下，终于这样做了。

事实上，不仅小平没有换季的衣服，娇娇也没有。后来，还是组织上为她做了一套深色的衫裙，上身是苏式列宁装，下身是大折子裙，娇娇才把棉衣脱下来。

李立英母女要回前线去了，贺子珍依依难舍，她一再挽留她们多住些时候，眼看留不住了，在她们临行前，贺子珍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金戒指，送给李立英，说：

“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我是空着手从苏联回来的，这是

我回国以后李富春送给我的一只金戒指，现在我转送给你。你在前方打仗，条件艰苦，需要的时候，把她卖掉，应付环境。”

听着贺子珍这番话，李立英的眼睛湿润了，她被贺子珍真挚的情谊深深地感动了。她完全知道这只戒指的分量，这几乎是贺子珍的全部财产了。她对自己的亲人真是倾其所有了。

李立英在动身前来看望这位小姑子的路上，听到许多关于贺子珍的传说。既有过去的，也有当前的。无非是说她性格暴烈，脾气急躁，而且患有精神病，住过疯人院，至今神智不正常。好心的人还附带嘱咐李立英几句：要小心谨慎，不要提及她与毛泽东的往事，免得精神病发作，不可收拾。因此，李立英奉丈夫之命去见贺子珍时，是心存疑虑的。但是，见面以后的印象，完全改变了她的先入之见，她看到的是一个温柔、热情、大度的女人，在她的身上时时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优良品质。她能够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值钱东西，毫不犹豫地赠给他人，典型地表现出她那宽阔的胸怀。

另外，在相处一个多月的日子里，李立英没有发现贺子珍神智有什么地方不正常，她重感情，非常怀念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那段岁月，主动向李立英讲述了那段生活的许多细节。说到有趣之处，不觉开怀大笑。说到两个人不幸的分手，不觉流下泪来。这是情之所至，伤心人怕说伤心事，谁都可能这样的，怎能说神经有什么不正常。于是，她在到达后不久，就消除了戒心，与这位小姑子真诚相处。而个人能够彻夜地倾心交谈，如果其中一个人戴着面具，设了防线，能够做到吗？

对于贺子珍的这个厚赠，她觉得这份礼太重，无论如何不肯收。她说：

“你也需要有一点值钱的东西防身，你自己留着。”

一个一定要送，一个坚决不肯收，她们你一来我一往地不知道经过多少个回合，站在一旁的娇娇全部看在眼里了。她看到妈妈，为了让舅妈收下这只戒指，表现出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她简直是费尽了口舌，举出充足理由来说服李立英。她说，在战争环境里，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如与队伍走散，个人陷入困境，身上有一点值钱的东西，一点金子，几块银元，说不定能派上用场，转危为安。她还说，自己现在后方，不大可能遇到这种情形了。而嫂子正在战争的第一线，比她更需要这些东西。

李立英拗不过她，只好收下了。那时，贺子珍高兴得如同拣了一个大元宝。她忙着为她们整理行装去了。

原来李立英并不是真心要收下，她随即找到同贺子珍相好的王美兰，把戒指交给她，委托她在她离开哈尔滨之后，把戒指还给贺子珍。王美兰答应了。

李立英母女离开的那天，贺子珍带着娇娇到火车站去送行，王美兰也去了。贺子珍眼睛都哭红了。火车要开动了，这时，王美兰用右手高高地举着那枚戒指，当着李立英的面，把戒指放到贺子珍的手里。贺子珍正眼泪婆娑地最后与亲人告别，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懵了，但她马上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拿着戒指，跟着火车跑起来，想追上火车，再将戒指交给李立英。火车越开越快，贺子珍是无望追上了。

这个过程，娇娇全部目睹了。她看到妈妈拿着戒指，望着远去的列车，一副伤心失望的样子，她的心感到沉甸甸的。她觉得她进一步认识了妈妈。

她看到，妈妈并不仅仅苛求于娇娇，她自己也是这样立身处世的。贺子珍在生活上的要求很低，粗茶淡饭，一身布衣，但求温饱，心满意足。对于别人，则是多方体贴，尽量满足。

她对于亲属是这样，对于一般的同志也是这样。在实行战时供给制的时候，贺子珍每月的津贴不多，可是只要同志们有需要，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有了薪水以后，可以由她支配的钱多了，她仍然没有把它看作私有之物。同乡中，同学中，晚辈中有什么需求，她会把整个月的工资全部掏出来。

谈起这些往事，娇娇说：“过去我觉得妈妈对我过于严厉、苛求，缺少柔情，心里对妈妈敬畏多于情爱。我现在认识到，妈妈所讲的道理是对的，她的用心是好的，在很多时候她对我的要求也是对的。当然，妈妈有时候的责难没有道理，甚至不近人情。”对这些，娇娇是采取谅解的态度。她深深感到，妈妈受的痛苦与磨难太多，她为了保护女儿，不得不多存一点戒心，多长一点心眼，以致使女儿泯灭了儿童的天真，失掉了一些童年的欢乐，这个代价当然是高的。

娇娇承认，由于儿童时期妈妈管教过严，她的性格也由原来的活泼开朗变为沉默寡言，甚至拘谨胆怯。妈妈的严厉，深深地烙印在她的心上，直到成了年，戒了家，也当了妈妈，她都不敢在妈妈面前苟言谈笑，生怕说错了话，惹妈妈生气。她喜欢在人多的场合下同妈妈相处，因为妈妈爱热闹，待人热情，此时的妈妈最慈爱、最宽容，最好相处，娇娇同众多的人们在一起，觉得轻松自然得多。

娇娇的后悔

妈妈的严厉，使娇娇的童年失去了一些欢乐的色彩，这当然是有遗憾的。可是娇娇觉得，她欠妈妈的更多。不仅是因为妈妈抚养了她，把她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而且由于她的不懂事，未经考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竟然决定了妈妈以后的人

生道路，使妈妈孤苦寂寞地度过了她的一生。为此，娇娇终生都感到悔恨。

为什么娇娇一句话，会决定妈妈的生活道路呢？

贺子珍在回国以后，人生的道路怎么走，这个问题，她在苏联等待回国的时期，已经千百次地思考过了。甚至可以说，在她住进疯人院，筹划怎样离开，回国干什么时，就考虑过多遍了。在她回国后，与战友们谈起今后的打算，她多次表示过：过去与毛泽东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今后是各走各的路。

她在哈尔滨生活了一年，她以宁静的心境，服从组织的安排，留在那里工作，这都是她为开创自己的新生活所作的努力。

现在，一些当年同贺子珍在哈尔滨一起讨论过她今后生活的老战友，仍然无限感慨：如果贺子珍按照她原定的方针那样去生活，她的一生，不至于那样不幸。她可能获得新的爱情，新的婚姻，因而也获得新的幸福。

在哈尔滨的老战友们曾多次劝告贺子珍，另外物色一个生活的伴侣，而且有的人还热心地张罗过。

前面讲过了，刚回国时的贺子珍，风姿绰约，美丽不减当年。甚至可以说，此时的贺子珍，比在长征路上，比在陕北时期，更焕发出女性的魅力。那时候，她常为怀孕、生育所累，患有严重的贫血症，再加上战争、行军，经常饥寒交迫，极度疲劳，身体极差，常常会突然晕倒。一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弱的人，顶多是一种病态美。而今日的贺子珍焕发出的是一种健康的，成熟的女性美，她那饱经沧桑的经历凝结在她眸子里的忧郁，更使她别具风韵，楚楚动人。

早在苏联留学时期，她丧子失夫，陷于极度悲痛、极度孤独的时候，就有过不少异性，向她伸出过求爱的手，可都被贺子珍婉转拒绝了。

回国后，战友们为了排解她的寂寞，常常拉她去参加周末的舞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周末举办交谊舞会的风气，在备战繁忙的哈尔滨，也不例外。娇娇有时跟妈妈到舞厅去玩，她看到，请妈妈跳舞的叔叔很多，许多人都夸妈妈舞步轻盈，舞姿优美。贺子珍是在苏联学会跳舞的。那时她为了从极度的烦恼中解脱出来，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形象，特地上理发店烫了头发，还向会跳舞的战友们学习跳舞。由于她是从苏联去的女同志中，第一个烫发的人，她受到了一些持共产党员应是不加雕饰，朴实无华观念的人的非议。

贺子珍对于跳舞是有兴趣但并不着迷。在哈尔滨每参加一次舞会回来，她的脸庞红红的，充满了欢乐，眼睛里原来弥漫的忧郁神色，似乎消失了。

有一次舞罢归来，屋里只有贺子珍与娇娇，贺子珍把娇娇叫到跟前，说：

“娇娇，我同你商量个事，我给你找个新爸爸好吗？”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新爸爸！”在妈妈面前一向温顺听话的娇娇，此时象发了疯似的，大哭大叫起来。

娇娇离开延安时才四岁，对爸爸毫无印象。她在苏联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到妈妈讲过爸爸，从她懂事以后，第一次知道爸爸的情况，是哥哥岸青告诉她的。

那时，妈妈已经进了精神病院，她进了国际儿童院二分部。这里的孩子都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娇娇觉得自己本来就没有爸爸，现在连妈妈也没有了，同这里的同学一个样。

在国际儿童院的礼堂里，挂着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巨幅画像。其中有苏联的领袖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加里宁，中国的领袖有毛泽东、朱德。儿童院的老师们常对学生们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讲述各国领袖的革命业绩。老师们也讲过中

国领袖毛泽东的英雄业绩。娇娇听了，对毛泽东很崇敬，可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中国伟人同自己有什么关系。

有一天，已经去莫斯科上中学的岸青特地回到伊万诺夫市，去国际儿童院探望妹妹。他给妹妹带来一捆长长的手杖糖，把妹妹高兴得合不拢嘴。兄妹俩坐在空无一人的礼堂里聊天，突然，岸青指着高高挂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的照片问娇娇：

“你知道他是谁吗？”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他是我们的爸爸。”

“你瞎说，我没有爸爸。”

“我没瞎说，他的确是我们的爸爸。是他把我们送到苏联来学习的，大哥已经回到爸爸身边了。”

看到岸青说得那么肯定，娇娇有点相信了。可是这个爸爸太遥远，太高大，娇娇想不出她同自己有什么联系。

回国以后，娇娇长大一些了。她从妈妈同阿姨们，同舅妈的谈话中，知道了妈妈和爸爸的关系，以及妈妈同爸爸关系破裂的事实，对爸爸知道得多一些。

时至今日，娇娇都说不清楚，在听到妈妈要为她找一个新爸爸时，她为什么会大哭大叫。她当时对妈妈的话的反映，几乎是直觉的，下意识的，脑子都没有来得及想一想，就脱口而出了。

当时，贺子珍看到娇娇这种态度，失声痛哭起来。她伏在桌上哭了很久很久。打这以后，她再也没有提过结婚的事，任由朋友们介绍、劝说，她的态度都是拒绝、摇头。

回忆起这段往事，娇娇神色黯然，仍然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她说，我当时为什么会反对妈妈改嫁呢？是因为我已有了一个当伟人的爸爸吗？不想再要一个不如自己爸爸的爸爸吗？

我那时幼稚单纯，没有那么复杂的思想，也不会那么世故。我那种近乎本能似的反抗，只有一个主导思想，那就是，妈妈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愿意有人分走妈妈的爱；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一个妈妈对我管教就够严了，再来一个爸爸，我更受不了了。

娇娇哪里想得到，这些孩子气的想法，随口而出的几句话，竟然改变了妈妈的初衷，让妈妈孤寂地度过多半生。随着娇娇长大成人，越来越深入理解妈妈的内心，她的这种负罪感也日益强烈。娇娇说，既然爸爸和妈妈不可能团圆了，应鼓励妈妈重新结婚。这样，她的情绪不会那么压抑，也能够实现她的愿望，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她觉得对不起妈妈。

但是，当娇娇来到爸爸的身边以后，她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她的爸爸和妈妈，虽然因种种原因分手了，但他们始终彼此深深地相爱着，藕断丝连。妈妈为什么要征求一个小孩子的意见呢？而且竟然按照女儿的意见去办呢？这是否可以说，她当时内心充满着矛盾。面对着众多的追求者，还有挚友的劝说，领导的关怀，她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同毛泽东破镜重圆，希望渺茫。自己还年轻，应该重新安排日后的生活。但是她对毛泽东旧情难忘，终生难忘。她举棋不定，不知应何去何从。她把决定自己后半生的重大举动，去问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而且竟然按小孩子的意见去做，就好象一个拿不定主意的人去占卦问卜，让冥冥上苍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娇娇的一哭，增加了她拒绝改变现有生活的砝码，终于使她在两难的矛盾中作出抉择。

在贺子珍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刻，她一定清楚她今后的生活将是多么的凄清，多么寂寞。她与男女情爱从此无缘。她伏在桌上哀哀地哭泣，是否也有感于此，控制不住悲从中来呢？

十、贺怡姨妈

女中豪杰

1948年，贺子珍同娇娇，岸青，随着东北三省的解放，由哈尔滨迁至沈阳。在沈阳，贺子珍与阔别十几年的妹妹贺怡重逢了。

贺怡是到东北来疗养的。

贺怡比贺子珍小两岁，她是同姐姐同年参加革命的。她们在福音堂小学女部同班上学，贺怡是姐姐的影子。她崇拜、敬仰姐姐的革命信念和革命行动，对贺子珍的任何革命行为，她都是亦步亦趋，紧紧跟上。贺子珍在学校搞宣传，办壁报，贺怡总是她最得力的助手。

大革命时期，贺子珍任永新县县党部的妇女部长，贺怡任副部长。贺子珍下乡发动群众，到哪里都带着贺怡。贺子珍还在学校读书时，为了表示与封建传统观念决裂，在永新县第一个剪去了她那又粗又黑的长辫子，遭到许多人的讥笑与议论。是贺怡第一个响应姐姐的号召，也剪掉自己的辫子，分担了姐姐的压力。姐姐贺子珍兼任了县党部青年部副部长职务后，一时不知道应带领青年人干些什么，曾掀起过打菩萨的活动。贺怡是执行姐姐决议最坚决的一个人，她领导的那个小组，泥菩萨打

得最多。

贺怡同贺子珍虽是同胞姐妹，性格却各异、长相也不一样。贺怡性格泼辣，豪爽，说话与办事都是快节奏的，走起路来似一阵风，而贺子珍则是温柔、沉静，慢斯条理。贺怡个子矮小，皮肤比较黑，长个圆圆的脸。贺子珍则是身材修长，皮肤白皙，有着东方人最喜爱的瓜子脸，加上她的五官端正，使她的外表更胜妹妹一筹。

在大革命失败，永新县的反动地主武装突然偷袭永新，把正在开会的一批共产党员，积极分子抓了起来，缴了工人和农民赤卫队的武装，在全城开展大搜捕活动，地主武装还包围了贺家，寻找贺怡和贺敏学。这时贺怡正在家里，听到动静，赶忙躲到邻居家的柴房里，敌人没有找到。第二天，她在亲戚的帮助下，把脸涂黑，打扮成小长工，顶着一大捆柴火混出了城门，逃到吉安县一个亲戚的家里。

她进了吉安第四女子中学读书。那时吉安的局势还比较平静，没有出现右派政变的事件。贺怡在学校里组织了秘密的地下革命组织。几个月功夫就把吉安几个学校一批进步学生团结起来，开展了很有声势的学生运动。这些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学生的一次聚会中，一批军警包围了学校，捉拿贺怡。在进步师生的掩护下，贺怡又一次逃出虎口。朋友们把白布绑在她的身上，把她从城墙上坠出城外。

这时贺怡的父母在永新看看形势不对，怕右派会找他们的麻烦，带着小儿子贺敏仁逃了出来。他们有一个亲戚在吉安县的清源山当和尚，三个人就投奔这个亲戚去了。贺怡离开吉安县城后，也来到了清源山。父母当了斋工，从此常年吃素，直到去世。贺怡以出家作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她参加了东固、吉安一带的游击活动，曾经从夹墙里揪出反动地主，活捉

叛徒罗焕南，在这一带声名显赫，很受人民的尊敬。

这次姐妹重逢，两个人都万分激动，热泪盈眶。她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泪眼对着泪眼，悲喜交集。

贺子珍发现，多年不见，贺怡变样了。她的声音虽然还那么洪亮，说话的节奏还那么快，但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她的体魄原来很健壮，如今变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原来黑里透红的面孔，如今变得灰暗枯黄。贺怡告诉姐姐，她现在的体重只有八十多斤。

贺子珍虽然从嫂子李立英处知道毛泽覃牺牲，小毛下落不明，贺怡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大概情况，但再听贺怡详细道来，仍觉惊心动魄，感叹不已。

原来在红军主力西撤以后，国民党派了樊崧甫、李延年两个纵队的兵力，从东、北两路向中央苏区包围过来，企图把红军压缩在狭小的地带，聚而歼之。执行左倾路线的项英，无视敌我悬殊的事实，提出了“保卫苏区”、“恢复苏区”、“创建新的师、新的军团”的错误口号，并同敌人硬打硬拼，使部队的力量遭到很大损失，中央根据地都丢了。队伍在突围中有重大伤亡，毛泽覃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

怀着孕的贺怡，强忍着悲痛，来到江西省于都县白禾区，在一个共产党员的亲戚的掩护下，住进了一个小庙里，靠母亲帮人家洗衣服、干粗活维持一家生活，掩护贺怡继续开展地下工作。贺怡帮助那里的党组织恢复了党的活动，还开了一家酒店，作为与上级接头的联络站。

贺怡对姐姐说：

“小毛找不到了，我也感到很难过。开始泽覃把小毛放在他奶妈的家里，后来他看到形势越来越险恶，怕奶妈的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觉，就赶快把他转移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

方。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小毛的去处告诉我，就牺牲了。我觉得很对不起你，没有把你的托付办好。不过你放心，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小毛找到，让他回到你的身边。”

贺子珍双泪长流，紧紧地握住妹妹的手。她哽咽地说：

“这怎么能怪你呢，这是谁都无能为力的事情，小毛以后再想办法找吧。”

接着贺怡告诉姐姐她身体变得这样虚弱的原因。

她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国共合作，项英和陈毅代表赣南游击队同国民党谈判的消息，马上从于都来到赣州市共产党代表的住地中华大旅社，同项英接上头。她在赣州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随项英到油山革命根据地了。她走得那么急，都顾不上回去同父母和孩子告别一声。

以后，她往来于南昌、吉安、广州等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担任粤赣根据地的民运部长。

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盯上了这位女共产党员。有一次，她刚到广州，一队国民党宪兵包围了她的住所。贺怡正带着一份党的文件，文件写在一张草纸上。要将文件烧毁和转移都来不及了，她赶忙把草纸放进嘴里，咀嚼着要把它吃进肚子里。这时国民党的宪兵破门而入了。他们一看就知道贺怡在干什么，二话不说就撬她的嘴，逼她张开口，把文件吐出来。贺怡不从，使劲地把最后的一点文件吃了进去。宪兵气坏了，扒下贺怡的鞋，使劲地打她的嘴。贺怡的门牙被打落了，血从嘴里流出来，衣襟一片鲜红。可是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气疯了的敌人把她投进了监狱，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几乎把一切刑具都用遍了。贺怡被折腾得奄奄一息，但她坚贞不屈。她准备死了，吞下了一只金戒指。这时，我们的党营救贺怡成功，周恩来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顾祝同达成协议，用国民

党的一个俘虏把贺怡换回来。贺怡经香港辗转到了延安，组织上决定马上给她进行取金戒指的手术。

贺怡告诉姐姐，手术在延安和平医院进行。医院规定，做手术必须有病人家属签字。而贺怡在延安没有亲人。毛泽东知道了，说：“为了贺怡同志能够多工作几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从贺怡胃里取出的金戒指，布满了麻坑，这是被胃酸腐蚀的缘故。她的胃出现大面积的溃疡，不得不将2/3的胃切除掉。

贺怡还说，毛泽东为了让贺怡在手术前养好身体，特地把自己的马夫派去照料她。马夫为贺怡养了几只鸡，有一次抓鸡时不小心竟摔成重伤。手术以后，毛泽东经常到医院去探视她。

听到这里，贺子珍的眼泪不住地往外涌。

贺怡在出院以后，即要求分配工作，她在西北和东北都工作过一个时期。党中央高度评价贺怡的工作，她被推选为出席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候补代表。

对于贺怡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度的革命热忱，贺子珍边听边赞叹，不断说：我真是太惭愧了。你是个女中豪杰。

贺怡又谈到她们的母亲在延安去世前受到毛泽东周到照顾的详细情形。她说，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把她安葬了，并立了碑。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母亲的坟挖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自己拿出十块银元，请老乡重新将她掩埋了，又立了一块碑。

贺子珍听到这里，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她萌生写信的念头

以后几天贺子珍心潮澎湃，夜不安寝。她感念毛泽东对她及对她一家人所给予的恩惠，这些恩惠，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她感念毛泽东代她照顾了她的妹妹贺怡。贺怡能够活着走出国民党的监狱，是党营救的结果。贺怡手术的前后，更得到毛泽东细致的照料。为了妹妹，她要感谢他。

她感念毛泽东对她母亲所作的一切。这一切本应是作儿女的本份，现在，毛泽东代替她去做了。她听到父母相继去世的消息后，曾经同嫂子李立英和妹妹贺怡慨叹过：她们的父母亲为了跟随他们闹革命，倾家荡产，颠沛流离，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他们把所有子女都交给了革命，除了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以外，他们的小女儿贺先圆在1927年永新暴动送情报时，被敌人杀害；他们的小儿子贺敏仁在长征时，误遭红军杀害。他们自己在革命队伍中，做最平凡最琐碎的事情，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在他们身后，可能没有人会记得起他们，但他们得到过毛泽东的关怀；特别是她们的母亲，是在毛泽东的料理下离开人世的，他们死而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为此，贺子珍感谢毛泽东。

她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敬之心，更加强烈了。她能够离开那可怕的疯人院，回到祖国，重新走进革命的队伍，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不也是毛泽东的给予吗？

贺子珍是个知恩必报的人。她给予别人的，从来慷慨大度，不求回报；但对别人的滴水之恩，总想涌泉以报。她知道，毛泽东对她们一家的给予，即使粉身碎骨，也是无以回报的。此时，她萌生起一个念头：不能报答毛泽东于万一，但向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总是应该的，必不可少的。她想给毛泽东写一封信。

贺子珍回国一年多，一直坚持她的既定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已另有所娶，她同毛泽东原来的夫妻关系已经终结。过去的，永远过去了。今后的生活是各走各的路。因此，她回国

后，除了因哥哥贺敏学的治病问题，给毛泽东打过一个电报外，从来没有想过要同毛泽东建立联系。但是，如今，她要给毛泽东写信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真是日思夜想，欲罢不能。

贺子珍把这个心事向贺怡透露，征求她的意见。向来快人快语的贺怡马上表示：这有什么好为难的，这是好事嘛，应该这样做。这一席话，坚定了贺子珍的决心。

贺子珍又考虑，怎样做更妥当些。

她把娇娇叫来，对她说：“你已经回国一年多了，还没有给爸爸写过信，你应该给爸爸写封信才是。”

已经12岁的娇娇比过去懂事多了。她对爸爸有了一点认识。回国以后，她虽然从未见到过爸爸，但在生活中，几乎无时无刻不感到爸爸的存在。报纸上，广播里，课本中，处处有毛泽东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又是同革命、同胜利、同权威联系在一起的。娇娇象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对这个名字怀有崇敬与仰慕。

现在，妈妈让她给爸爸写信，她欣然同意了。可是，她不会写中文，就用俄文写了一封信。她还不习惯称一个陌生人为爸爸，她象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她的信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生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未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娇娇

贺子珍也摊开了信纸，写了一封信。她第一次象普通人一样，称呼毛泽东为主席。她在信中写道：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大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她接着写道：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很苦，什么都要自己做，劈柴、烧饭、洗衣服、带孩子，种地，织袜子，什么都要干，比长征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最后，她写道：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贺子珍把娇娇的信和自己的信，装在一个信封里，写上地址，发出去了。

不让姨妈道歉

贺怡到沈阳后，一直同娇娇生活在一起。那时，贺子珍天天上班，住在另一个招待所。贺怡照顾娇娇的生活，每天教娇娇学习中文。闲来无事，她给娇娇讲自己的过去，她的经历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娇娇听来惊心动魄，比书上的故事还要好听。

娇娇觉得，她的这位姨妈与妈妈不同，完全没有妈妈那种柔弱的神态。她与娇娇所见过的革命队伍里的阿姨们也不同。她的身体十分羸弱，一阵大风都能把她吹倒。她的胃大部分切除以后，每天只能吃流质，而且每次只能吃一点，一天要吃很多餐。可是，她的性格与她的外表截然不同。她嗓门大，脾气急，长期残酷的战争养成了她粗犷的性格。娇娇觉得她语言很不卫生，张口就骂人，枪毙人是她的口头禅。有一次，她让一个义子喝牛奶，这个小子不爱喝，贺怡就吼了起来：“你要不

喝，老子枪毙你！”娇娇感到好笑，还有为不喝牛奶挨枪毙的事。

娇娇对这位姨妈打心眼里佩服和尊敬。她曾经评价她这位姨妈：她就象一颗革命的种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生长、开花、结果。娇娇曾不止一次听到爸爸在背后夸奖她，说她“坚强”，“是个好同志”。娇娇很愿意同这个姨妈待在一起。

贺怡呢，也很爱娇娇。当然，她是用她自己的方式去爱。她对娇娇的态度也是很厉害的，在嘴巴上不知枪毙了娇娇多少次。但她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从来不碰娇娇一个小指头。娇娇明白，这个姨妈只是嘴巴厉害，她的心却是很细很柔的。

贺怡姨妈把娇娇的衣食住行都安排得很周到，比妈妈还周到，让娇娇集中精力去读书。这时，娇娇重新留的头发可以梳辫子了，她不让娇娇自己梳，每天都要亲自给娇娇梳头。她的梳子在娇娇的头发上轻轻地滑动，柔柔的，舒服极了。

有一次，贺怡又给娇娇梳头。娇娇对着镜子对姨妈说：

“姨妈，您看我前额的头发是不是太少了？”

“这是你小时候给江青打的。”贺怡对江青占了姐姐的位置不满意，信口开河，以发泄自己的情绪。其实，娇娇在延安时，贺怡并不在那里，不可能知道江青对娇娇的态度。

“我不信，要是打了落了疤，那里的头发就长不出来了。”娇娇提出反驳。

“不信拉倒。”说罢，贺怡把这事丢开了。

可是，女孩子的心细，娇娇把这个疑问记在心里了。

以后她同二哥岸青来到毛泽东的身旁，在父女俩的一次闲谈中，她忽然想起这件事，就问爸爸，“我没有得罪江青，她为什么要打我？”

“谁给你说的？”

“贺怡姨妈。”

“她说的不对，江青不可能对你那么坏。”毛泽东说得很肯定，他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了。

不几天，贺怡来到香山，向毛泽东说了好一阵子的话，娇娇没听到他们说些什么。吃过午饭以后，毛泽东对娇娇说：

“你的姨要同你和你二哥一起谈谈，她要向你赔礼道歉。”说罢，毛泽东走了。

娇娇一听，就明白爸爸说的是什么了。她感到很对不起姨妈，不该把姨妈的话告诉爸爸，让姨妈挨批评。

贺怡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一个亭子里，她正要开口说话，娇娇突然飞步走出亭子，跑出很远很远。她不让姨妈向她道歉，也不要听姨妈的道歉。她站在远处，望着姨妈，姨妈招手，唤她回来，她不肯回来。她看到，姨妈同二哥谈了好半天，也不知说些什么。贺怡看到娇娇不会回来了，就走了。

娇娇没有想到，她同姨妈的这次会见，竟是最后一次会面。姨妈为了找回她的哥哥小毛，急匆匆，想赶在走马上任吉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之前，把事情办完，连夜赶路，不料在赣州泰河桥边，汽车失事，牺牲了。为此，娇娇伤心难过了好多天。她永远不会忘记她的好姨妈。

十一、爸爸的召唤

她见到了爸爸

贺子珍把给毛泽东的信发出以后，没有收到回信，却收到了一份给娇娇的电报。电报上写道：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娇娇后来才知道，她的那封俄文信可把爸爸难住了。他打开信一看，通篇歪歪扭扭，一个字也不认得。他从贺子珍的信中知道，这是他多年未见的女儿娇娇写的，一阵喜悦涌上心头。他连忙找翻译把它译成汉文，这才知道娇娇信中的意思。

他被娇娇天真的问话逗乐了，陡然升起对这个女儿的怀念之情。娇娇是在四岁时送到苏联找妈妈的，转眼过去八年了，该长成个大姑娘了。细心的贺子珍在发出这封信的时候，没有忘记夹上娇娇的两张照片。这是贺子珍产生了要给毛泽东写信的念头时，特意让娇娇到照相馆去照的。此时，毛泽东目不转睛地凝神注视着娇娇的相片。这个一身洋装的小姑娘，扎着两个小短辫子，抿着嘴在微笑。那神态，有些羞赧，有些沉静，有些天真，还似乎有点倔强。想着她在信中直率地提问题：“你是不是我的真爸爸”，毛泽东不由得笑出声来，似乎照片中的女儿也给他提出这个问题呢。

这两张照片，毛泽东一直放在手边。工作累了，他就拿出来细细地观看。他觉得，娇娇跟小毛一样，长得象他。高高的天堂，大大的眼睛，直直的鼻子，略显得宽大的嘴巴。当然喽，年轻的女孩子自有一番天然的风韵，那是爸爸所不可能具备的，因此他断定，女儿肯定比他漂亮得多。

毛泽东同时收到娇娇与贺子珍的信，他没有回信，而是给娇娇打了个电报，电报中没有提贺子珍的信的事。他这样做，是出自什么考虑，没有人能够代替他作出回答。贺子珍呢，虽然没有收到毛泽东给她的回信，但是她的心意，她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肯定表达到了。更何况，娇娇还收到爸爸打来的电报呢，她已经感到很满足，很欢喜了。音讯断绝多年的父女俩，又联系上了，这就是天大的好事。那些日子，贺子珍情绪特别好，笑声也多了，对娇娇也不那么求全责备了。

转眼进入了1949年。革命的形势一日千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北平，党中央的机关已从河北的西柏坡迁到了北平的郊区香山，毛泽东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

这时，毛泽东的身边除了毛岸英没有自己的家人。江青因病去苏联治疗，把她同毛泽东生的女儿李讷也带走了。毛泽东突然萌生了要把娇娇接到身边来的愿望。他想念这个女儿，希望能见到这个女儿，亲亲她，爱抚她。他觉得对这个女儿他父亲的责任尽得太少了。

他让警卫员马上带着他的这个意见，到沈阳去，征求贺子珍的意见，同不同意让娇娇到他的身旁来。

警卫员到达沈阳，准确地向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然后，他又到学校去征求娇娇的意见。

听到毛泽东召唤女儿到他的身旁，贺子珍没有一丝的犹豫，一口答应了。此时她想的只是应该让他们父女团圆，让娇

娇到爸爸的身边享受到父亲的爱。她觉得，有毛泽东的指点，娇娇在学业上，思想上一定会进步得更快。她几乎同时就决定，让岸青同娇娇一起走，让他们一起来到爸爸的身边。

娇娇听说爸爸想念她，要她到爸爸的身边，高兴极了。她雀跃着，象唱歌一样来回念着这一句话：我要到北平见爸爸了！我要到北平见爸爸了！

突然，她象想起什么似的，飞也似地走到妈妈的跟前，着急地问：“妈妈，你也同我们一起去北平见爸爸吗？”

贺子珍苦笑了一下说：

“不，妈妈不去，就你们兄妹俩去。”

正在一旁的贺怡这时接过话茬来，说：

“你妈妈现在不去，但是你妈妈过些日子一定会去的。”

她转过头来对贺子珍说：

“我同孩子们一起走，我要见主席，我要为你争得你应该得到的。”

贺子珍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她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她没有反对，说明她心中曾经有过一丝的希望；她必有支持，是因为理智告诉她，这件事不大可能成功，这是极渺茫的空想。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回天已无力了。

娇娇天真地以为妈妈很快就会去北平，高高兴兴地同二哥一起准备行装。

在打发两个孩子上路的过程中，贺子珍是忙碌的，愉快的。她同两个孩子一样，沉浸在即将与亲人相逢的兴奋与欢乐中。她打听到苏联的尤金博士即日要去北平，出任苏联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就找到尤金，要求两个孩子与他同行。尤金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他们一行四人踏上了去北平的路途。

他们旅行的路线是，从沈阳坐火车去大连，从大连坐船到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到北平。

尤金与贺怡在北平城里安顿好住处，立即带两个孩子去见他们的父亲。汽车一直把他们送上香山的双清别墅。

这是一群古色古香的宫廷建筑，环境清幽，草木森森。然而此时娇娇无心欣赏这些，马上就要见到自己的、却不认识的爸爸，使她心情紧张，心在卜卜地狂跳。

警卫员把他们一行人领进了屋。娇娇看到一个身材高大，与她在画像中所见的一模一样的中年人，正站在屋的中央，满脸笑容地等候着他们的到来。

尤金先开口：“主席先生，我们完成了任务，把您的公子和千金送来了。”

急性子的贺怡推着两个孩子，一迭连声地说：“他就是你们的爸爸，快叫爸爸呀，快叫呀！”

娇娇抬起头，仰视这位陌生的，可以说没有见过面的爸爸。她四岁离开延安时，年龄太小，对爸爸没有印象。她在画中见到的爸爸，目光威严，不苟言笑，于是在她的想象中，爸爸可能是个很严肃、很严厉的人。她曾经害怕过，到爸爸这里以后，会不会象在妈妈身边那样，挨打受骂呢？

如今，爸爸就在眼前，娇娇的担心消失了。她看到的是目光慈祥、和蔼可亲的爸爸。他穿着一身宽大的灰布中山装，脚蹬一双平底黑布鞋，平平常常，普普通通，没有一点领袖的架子。娇娇看到，爸爸也正很有兴味地在观察她呢。

娇娇给爸爸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娇娇没有听爸爸讲过。但是，她从爸爸那充满喜悦的凝视中感觉到，爸爸对她满意的，爸爸爱她，欢迎她的到来。

毛泽东看到，娇娇的确象相片中的那个样，酷似自己。女

孩子乍见生人时的娇羞与好奇，使这张脸显得格外纯真、甜美，可爱。

那时正是5月，天气还微有寒意。娇娇穿着深色的薄呢裙子，梳着两条刚刚到肩的短辫子，脚上穿着一双大皮鞋。一直在农村生活，看惯了土色、灰色、黄色的毛泽东，觉得眼前的这个女儿不光是稚气十足，而且是洋味十足。在战争的年月，革命队伍里的孩子也象他们的父母一样，穿着土色、灰色、黄色的衣服，有的就是用大人的旧军衣、旧制服改制成的，不可能讲究什么色彩，什么式样。娇娇的服装在这些孩子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毛泽东想起娇娇的俄文信，不由得笑了起来，充满爱意地说：

“我的小外国人，爸爸欢迎你。”

以后，毛泽东经常用“小外国人”、“洋宝贝”来称呼娇娇。毛泽东也用同样的热情欢迎岸青的到来。

一对儿女来到自己的身旁，毛泽东的情绪欢乐愉快。毛泽东周围的警卫员很快就把这个消息在西山传开了。有的中央领导同志闻讯后来到双清别墅看娇娇。毛泽东还约请一些中央领导人到家里来，把他的“洋宝贝”介绍给大家。人们都喜爱这个聪明俊秀的小姑娘，拉着她的手，抚摸着她的头，问长问短。娇娇似懂非懂，有的答不上来，一着急，一串俄语脱口而出，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都说：这真是个小外国人。

一个人的爸爸

娇娇从5月来到毛泽东身边，到9月随同毛泽东搬进中南海，这一段时间，是她同爸爸接触最多，也是得到父爱最多的时间。江青还在苏联治病未归，李讷也没有回来。岸青虽与娇

娇一块来到爸爸身边，一来男孩子一般都是粗线条，对于感情、爱抚不大在意，二来他脑子受过伤害，性情木讷。大哥岸英呢，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早过了在父亲面前撒娇的年龄。在这个时期，娇娇觉得爸爸是她一个人的爸爸。

娇娇每天都能见到爸爸，每天晚饭都能同爸爸一起吃。毛泽东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仍尽量抽出时间同孩子们在一起。有时吃过晚饭，或者休息日，毛泽东一边一个，拉着孩子的手逛香山。他一边走，一边同孩子们聊天，告诉他们好多有趣的事。此时毛泽东的声音是轻柔的，充满了爱意。

娇娇已经爱上爸爸了，她好喜欢同爸爸一起散步，听爸爸讲古论今。有一次，毛泽东带着两个孩子走出好远，遇见一个梳着一条长辫子的老人。孩子们好奇地问毛泽东，男人为什么还留辫子。毛泽东转身问老人，你为什么留辫子，老人笑着不回答。毛泽东对他说，现在不怕了，不留辫子不会杀头了。他对两个孩子解释说，在满清时代，老百姓剪辫子是要杀头的。岸青你没有辫子，说明你要革命，不怕杀头。娇娇梳了两条辫子，说明怕杀头。两个孩子听了，都笑得笑起来。

白天，爸爸忙完公务后要睡觉，不能陪他们，娇娇同岸青两个人就在香山满世界跑着玩。他们对什么都好奇，都想知道。有一次，他们见到西山上的蛆虫，长着长长的尾巴，与东北见到的不同，娇娇就跑去问爸爸，这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知道你的姨妈贺懿（贺怡的名字原用懿，后因难写，改用怡字）的懿字是怎么来的吗，懿就是一，古时候人们看见一条蛆虫横在那里，就按照蛆虫的样子写下了，一字就是从蛆虫变出来的。你们相信不相信？

娇娇听得傻了眼，瞪着一双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毛泽东看着她这副模样，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娇娇觉得，爸爸不仅平易近人，而且幽默风趣，这是爸爸的性格中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在娇娇来到身边以后，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娇娇在哈尔滨、沈阳学习的情形，贺子珍对娇娇的学习作了哪些安排。当他听到贺子珍对娇娇的教育方针是：学好中文，不忘俄文时，很是赞赏，他对娇娇说：

“你妈妈希望你学好中文是很对的。学中文的一个办法是背唐诗宋词，以后你每天都要学着背一点。”

毛泽东象个普通家庭的父亲那样，亲自教女儿学诗。他挑选一些意思容易明白而又朗朗上口的诗教给娇娇，几天教一首，每天要她背给他听，检查她学得巩固不巩固。后来娇娇说我的中文程度太差，对这些诗词理解不了，当时背下来了，过后就全忘了，辜负了爸爸的教育。

习惯了寒冷天气的娇娇，到了北平，觉得已经进入夏季了。虽然5月的北平，人们还得穿毛衣，穿绒裤。伊万诺夫市夏天的时间很短，太阳光是宝贵的，得充分利用。在那里，学生们冬天没有寒假，暑假却长达3个月。夏季到来的时候，孩子们都要进行日光浴，穿着短裤，小背心，光着脚，晒太阳。

娇娇来到香山后，象在苏联时那样，穿着小背心，灯笼短裤，光着脚，在屋子外面晒太阳。毛泽东见到女儿这身打扮，关切地说：现在天还太凉，不能穿那么少，要着凉的，北平的风硬着呢。毛泽东还说，这里不兴光裤丫子，地不平，会把你的脚扎伤，快把鞋穿起来。

娇娇感激地看着爸爸，顺从地把衣服和鞋都穿上了。

娇娇是个懂事的孩子，她知道爸爸很爱她，她可以在爸爸的面前撒娇，爸爸不会生她的气。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她愿意做一个温顺、听话、不惹爸爸生气的好女孩子，让爸爸更爱

她。刚到爸爸身边时，她因为不懂得爸爸的规矩，爸爸办公的时候是不能随便打扰的，有时候想起要同爸爸说个什么话，或是有哪个字念不出来，她轻轻地推开爸爸办公室的门，伸进一个小脑袋，张望着。毛泽东发现了，放下笔，笑着让她进来，抱着她回答她所提出的问题。娇娇满足了，甜甜地笑了。

娇娇在妈妈的熏陶下，养成了礼貌待人的习惯。无论谁，为她做了什么事，或者回答了她所提出的问题，她都要说一声谢谢。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来是喜欢这个小姑娘，有事没事愿意逗她玩，为她做一点事，二来是娇娇初来乍到，有些事情还摸不着门，得经常提醒、指点她，于是娇娇就不断地说谢谢了。有时候，小半天的功夫，她一连说了十几声谢谢，把毛泽东逗笑了，说：你都可以姓谢了，谢字不离口呐。娇娇也乐了。有一天，双清别墅来了一位女同志，找毛泽东有事，这位女同志姓谢，毛泽东叫她小谢。娇娇正好在旁边，毛泽东用幽默的眼神望着娇娇，对她说：“这回可是真的小谢来了。”娇娇知道爸爸又在调笑她爱说谢谢了，抿着嘴笑了。

贺怡的使命

在爸爸的身边十分快乐的娇娇，仍然惦记着妈妈，她不知道妈妈是否能到北平来，何时到北平来，同她一起生活。她已经感觉到，这是不太可能的事了，因为爸爸常常向她提起李讷妹妹和江青妈妈，还说她们不久就要从苏联回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典礼。江青要回来，妈妈肯定就来不了了。

她很关注贺怡姨妈同爸爸谈判的结果，但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大人之间的事情，她不便去问，也不敢去打听。她同爸爸相处得虽然很好，但毕竟只有很短的时间。

那么，贺怡主动挑起的要让姐姐贺子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的努力，结果怎样呢？

贺怡在送娇娇、岸青到毛泽东香山的住处后，返回了北平，她住在北京饭店。

以后她多次上香山，会见毛泽东，他们之间都谈了些什么？可以想象，她肯定谈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关系问题，这是她在沈阳时就定下的去北平的目的。

我在《贺子珍的路》一书中，根据贺子珍，她的哥哥贺敏学、嫂子李立英的叙说，写了如下一段话：

他见到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两个人谈到了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说：

“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毛泽东没有说，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具体怎么办，但贺怡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要恢复同贺子珍的关系，承认历史上造成的这个事实。

这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

贺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到哈尔滨（应为沈阳）去接姐姐，她们乘坐的火车，到了山海关，上来两个同志，自称是组织部派来的。他们说：

“你们不能进石家庄（应是北京），只能南下，到你们哥哥（贺敏学当时在上海）那里去，这是组织的决定。”

贺子珍一听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让进石家庄（应是北京），这是指她，而不是贺怡。有人从中阻挠她与毛泽东的重逢，她沉默着，没有说话。贺怡

为姐姐力争。但这个决定是不可更改的。那两个人板着面孔，毫无商量的余地，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她们只得转车来到上海，住到哥哥贺敏学的家中。

这一段文字介绍了两个重要情节：一是毛泽东同意与贺子珍恢复关系，按传统的办法承认历史的现实；二是有人从中阻挠，致使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事实是否是这样的呢？从深入的访问中发现，第一个情节可能有误，第二个情节还有待进一步的查实。

从1948年到1951年担任过毛泽东警卫班班长的武象廷，在1988年12月16日的谈话中说到：

“1949年贺怡到香山来见毛泽东，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我因倒茶续水，进进出出，断断续续地听到他们之间的一些谈话。贺怡说，她要去把小毛找回来，毛泽东不同意，说，农民辛辛苦苦地养活了他十几年，把他找回来，对不起农民。贺怡坚持要去找，两个人谈崩了。毛泽东动用了军纪，喊着口令，立正。贺怡只得立正，这才停止了争吵。”

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在井冈山时期就与毛泽东、贺子珍相熟。1988年5月16日，她在介绍贺子珍的情况时谈了这样一段话：

“有一次，毛主席同我讲起贺怡。毛对贺怡很好，夸她坚强，宁死不屈。毛主席还说过，贺怡想让我同贺子珍恢复关系，贺怡真不懂事，我怎么能与她再恢复关系呢，一个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这两段话透露出，贺怡的愿望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响应，毛泽东不仅不同意与贺子珍恢复关系，连找回小毛都不同意。按老传统去办，只是贺怡的一厢情愿。

贺怡的性格是，决定要去办的事情一定要办到，不达目的誓不休。毛泽东的反对并不能改变她的主意。在这之后，她曾经返回沈阳，见到贺子珍。这时，贺子珍思念女儿成疾，逼着贺怡要把娇娇接回来。贺怡没办法，又回到北京。她请求再见毛泽东，但毛泽东不肯约见。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位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曾介绍过这样一个情节：

“1949年毛泽东住进中南海以后，贺怡带着两包东北土产，送给毛泽东，并要求见面。毛泽东不肯见。于是贺怡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是经过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的。毛泽东没有作复，收下了礼物，同时送了东西，还了礼。”

贺怡回江西去接小毛，是在毛泽东拒绝会见她之后的事。她显然对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复婚，并不死心，希望通过小毛的重新出现，勾起毛泽东的怜子之情以及夫妻之情，回心转意。于是这才有了她急匆匆地赶回江西，寻找小毛下落的行动。她想去吉安县上圩之前，把小毛找到，可是她并不知道小毛在哪里。结果，她把古柏和曾碧漪的儿子错当成小毛接了出来。她为了抢时间，连夜赶路，造成了车毁人亡的惨祸。她自己在这场车祸中丧生，那个错被当成小毛的曾碧漪的儿子也因伤重死去。这不能不是一场人间的悲剧。

十二、第二个妈妈

娇娇不肯叫江青妈妈

娇娇独享爸爸的爱，这段时间太短暂了，9月份，江青带着李讷回国，娇娇一个人的爸爸就变成了妹妹两个人的爸爸了。

然而矛盾的爆发点首先并不在姐妹之间，而是娇娇同第二个妈妈的关系。

在见到江青之前，娇娇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夸赞她的妈妈贺子珍，说她长得漂亮，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过去，娇娇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在见到江青之后，她发现，自己的妈妈同江青相比，竟是十足的土包子，丑八怪。在“四人帮”倒台之后，有的人因为憎恨江青，说她长得并不漂亮，是三四流的演员，却要争抢演主角。娇娇觉得，不管她是几流的演员，她的品质有多少恶劣之处，但你不得不承认，她的相貌出众，才华出众，风度出众。她长得很美，五官轮廓分明，皮肤细腻白净。娇娇觉得，她最漂亮的是她的下巴，从下唇到下巴，中间有一个较长过渡的小沟，然后下巴往外翘起。江青肯定知道自己最动人之处在什么地方，她常常仰着头，把她的下巴高高地翘起，让人们看清楚那好看的线条。

江青爱读书，也读了不少书。她写得一手好字，她的草书有怀素之风。她临摹毛泽东的书法，酣畅流利，几乎可以乱真。以至有人怀疑社会流传的毛泽东的书法中，有一些是出自江青的手。毛泽东曾夸奖过她的字写得好，让李讷学毛笔字，就用江青写的字帖，江青懂英语，她能看外文原版书，口语也能对付。当然，作为第一夫人这个身份，她会见外宾时，都用翻译，并不用英语与外宾对话。

江青平时说话的声音是轻轻的，娇娇的，只有发脾气时是个例外。她很讲究自己的风度，总想表现出她不同凡响的身份。她在上海滩待过，见过大世面，因此，不论在什么场合，她都能应付自如，落落大方。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高贵，富于魅力。她的面部表情异常丰富，能准确地反映出她的喜怒哀乐。娇娇觉得，江青可能是演惯戏，她的表情和举止都带有表演的味道，它可能很优美，却不自然，不真诚，起码娇娇是这样感觉的。

比如说，江青同娇娇的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娇娇在想象当中，江青一定不会欢迎她的到来，见到娇娇会是冷冷的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事实并不是这样。江青刚到家，一见到娇娇，就主动上前搂抱她，亲吻她，满脸堆着笑意，那股亲热劲，比对亲生女儿还要亲。以后，她常常在人前夸娇娇好，娇娇多么爱她，同她情如亲生母女。还说，娇娇宁愿同她一起生活，也不愿意回到贺子珍的身边去。

江青很会投其所好，极尽笼络之能事。她知道娇娇穿惯了裙子，就把自己不穿的裙子拿出来送给娇娇，让她的姐姐帮娇娇改来穿。她知道毛泽东喜欢这个女儿，她就在毛泽东的面前做表面文章。有时候，娇娇情绪不佳，毛泽东发现了，过来亲亲她，抚慰她；江青总是亦步亦趋，在娇娇的脸蛋上多加上两个吻。

江青还常常夸娇娇在哪些方面有天才，在哪些方面可以造就。娇娇随便画的一幅画，她看到了，表情十足地夸这幅画怎么怎么好，似乎发现了什么绘画天才，还特意带着娇娇去拜访康生的妻子曹轶欧，请她鉴定娇娇的艺术才能，还说要着意加以培养，送她去业余美术学校。江青看到娇娇的腿又瘦又长，又夸赞她四肢灵活，弹跳力强，将来在体育上会出成果，说要送她去体育学校。

对于这第二个妈妈，娇娇的心情非常复杂。平心而论，娇娇觉得江青对她不能说坏，江青没有骂过她，更没有打过她。在这一点上，贺子珍更象后母，江青倒象个亲妈。但是，江青的言谈举止总让娇娇有一种虚假的感觉，她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娇娇觉得不摸底。她已经十二岁了，风风雨雨也经历过一些了，她对这第二个妈妈，不能不存着一份戒心。她常常反问自己：江青会真的爱我吗？她会把我看作亲生女儿吗？贺怡姨妈说过江青的不是，对娇娇不能不产生影响，因此，在江青回来后有半年多的时间，娇娇不肯叫江青妈妈。

这可急坏了毛泽东，他一次又一次地做娇娇的工作，他说：

“你不肯叫她妈妈，她很难过的。”

“她不会对你不好的。”

到后来，毛泽东几乎是恳求了：

“你叫她一声妈妈，对你不会有什么损害嘛。”

娇娇的态度被爸爸软化了，她答应叫江青妈妈了。

娇娇的这个转变并不是因为经过半年的“考察”，认识到江青的确真心爱她，所以叫她妈妈，而是为了爸爸。她已经看出江青在家庭中的霸王地位了。惹她不高兴，爸爸就要受闲气，而娇娇爱爸爸，不愿意为了她让爸爸不好受。另外，她虽

然是毛泽东的长女，但却是这个家庭的新成员，她要同所有的人相处得好，就要同江青也相处好，否则家庭就没有和睦、和谐了。娇娇是个懂事的孩子，她愿意叫一声妈妈，换来家庭的和平。

事实上，就在娇娇决心开口叫江青妈妈时，她已经看清了江青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的本性了。

就说那次江青带她到曹轶欧家评画吧，曹轶欧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对娇娇的画吹捧了一番，说她的画风好，构图好，要是学画，准有出息。曹轶欧还建议江青给娇娇找个美术老师，进行正规训练。娇娇听了真有点飘飘然，对自己有了点信心，还真想过在绘画上下一番功夫。可是回家以后，总也不见江青有什么行动，送娇娇去业余美校的事再也没有提起过，娇娇的满腔学画热情冷却下来。

还有，娇娇在东北时，在贺子珍的安排下，曾练过一段钢琴。到北京以后，开始家里没有钢琴，无法练，以后苏联送了一架钢琴，娇娇可以练琴了。但是继续学习没有老师，也没有新的琴谱。自称对艺术造诣很深的江青，对于娇娇的练琴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漠然态度，她从来没有坐下来听娇娇弹过琴，说过一句鼓励的话，这使娇娇练琴的情绪越来越低落。

倒是舅舅贺敏学和舅妈李立英知道娇娇喜欢音乐，给她送来许多音乐唱片，供她欣赏，以后娇娇只听唱片，不练琴了。

娇娇在同江青的接触中，常常不自觉地拿她同自己的妈妈贺子珍相比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谁叫她有两个妈妈呢。

娇娇觉得，江青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时时处处要以她这个人为中心，她最喜欢的还是她自己。她不仅对待娇娇是装模作样，对待毛泽东，以至对待她自己的女儿李讷，都不是真情实意。她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怎样过得舒适，怎

样得到快乐，怎样保护自己的身体，怎样维持她的地位。

她名为毛泽东的秘书，实际上既不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也不做什么工作。她把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包括该添置什么衣物的事情全推给警卫员去办，她只顾打扮她自己，她闲得发慌，一会儿养兔，一会儿养猴，一会儿养鸡，却很少过问孩子们的功课。她用打扑克来消磨时间，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陪着她打牌玩，却又输不起。她输了牌就要骂人，发脾气。

她的饮食起居，完全按照她自己制定的方针行事。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工作到天明，这才睡觉，上午、中午都是睡觉的时间，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床。当年贺子珍在毛泽东身边，为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生活习惯，随着毛泽东晚睡晚起。而江青的作息时间则是我行我素，从来不管毛泽东是怎样安排，这样他们夫妻一个睡觉一个起床，各干各的。

江青的生活不仅有规律，而且不论在什么时候，她的饮食都很讲究，“食不厌精，烩不厌细”拿来形容她，都不为过。她鄙夷毛泽东是农民作风，只会吃红烧肉，她是一点肥肉都不吃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在挨饿，毛泽东心里难过，好长时间自动不肯吃肉，与人民同甘共苦，可是江青不仅一如既往，挑挑拣拣，要吃好的，而且吃肉还要过油。

江青喜欢耍脾气，摆威风。在家里，不论她有理无理，都要对她绝对服从，她最讨厌人家顶嘴，反驳她，但是对用沉默来对抗她的人，她也不满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没有不讨厌她的。

娇娇觉得，她的妈妈贺子珍与江青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妈妈是个忘我的无私的人，她心里装的是别人，很少想到要照顾自己。妈妈身体那么不好，才从精神病院里出来，却急着要

去工作。江青则不同，她自私，只关心自己，她有工作却不做，养尊处优，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娇娇把妈妈同江青作了比较，更觉得自己的妈妈好。即使贺子珍打过她，骂过她，没有江青长得漂亮，没有江青的气派，可那是真心爱她的好妈妈，是江青无法比拟的。

娇娇不喜欢这第二个妈妈。可是，为了维持家庭的和睦，她对江青是采取和平相处的态度。她在家庭中，一切言行小心谨慎，尽量少惹麻烦。特别是，她觉得自己中文不好，语言表达能力差，可能会由于词不达意造成误会，带来纠纷，她在家里总是尽量少开口，少说话。对于江青的刁难，她更是不开口，不表态，有意见放在肚子里不说。

可就是这样，江青也不满意。她是个极端聪明的人，还能不从娇娇的神色中看到她的内心。于是她对娇娇的评价，就从“文静”、“听话”转而为“倔脾气”、“娇娇二气”。

岸青被迫搬出中南海

江青对娇娇不满意，由于娇娇采取避免冲突的态度，她不敢作得太过份了。但是对于岸青，她就很不客气了。

毛岸青来到北京后，被分配到中宣部当俄文翻译。他性格内向，行动迟缓，生活自理能力差。他不会来事，不会讨好江青，这些都遭来江青的厌恶，她对于岸青从来不给好脸色，爱理不理的。她有时候还小题大作，故意嚷嚷岸青衣冠不整，床铺不叠。岸青在这个家里感到好压抑，心情不舒畅。毛泽东很忙，不可能太多地照顾他。他心里有话，只能同娇娇说。娇娇常常安慰他，帮助他。

有一次，岸青对娇娇说：“同江妈妈比，我觉得贺妈妈

好，我好想念贺妈妈。”他说时，神色黯然，一副无限怀念的神态，他的话引得娇娇心里酸酸的，因为，她也好想念她的妈妈呀。

江青曾经多次表示，岸青有精神病，不能住在中南海，要他搬出去，毛泽东感念父子之情，没有同意，可是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毛泽东不得不让步了。

有一天，岸青突然找到娇娇，拉着她的手，说：“我们一块跳中南海去。”娇娇吓坏了，忙往后抽她的手，可是被岸青捏得紧紧的，抽不出来。幸亏警卫员过来了，发现了这个情形，赶忙拦住，这才没有造成事故。

江青当然要借这件事大作文章了。毛泽东考虑到娇娇的安全，同意让岸青搬出去，在岸青离开的时候，毛泽东的心情很沉重，他对娇娇说：

“我爱岸青，也很同情他。他很小就同岸英沦落上海街头，受尽了苦难，几次被警察打过，对他刺激很大。他搬出去了，我很难照顾他，以后你要代替我多多地照顾岸青了。”

娇娇听话地点了点头。从她来到爸爸的身边，一直看到的是微笑的、和蔼的爸爸，今天他看到了一个忧伤的爸爸。爸爸为二哥的身体状况很难过，还托娇娇照顾哥哥，可见爸爸对她的器重。娇娇认识到，她不能光做一个得到爸爸的爱的女孩子，而且要关心爸爸，支持爸爸，爱护爸爸。

娇娇还价岸青说，“岸青有时表现得比较糊涂，主要是精神压抑得太厉害的结果，其实他常常是头脑很清楚的。我见到过他同几个苏联专家谈话，思路很清晰。”

以后，娇娇为没能完成爸爸的嘱咐照顾岸青哥哥感到惭愧。岸青离开中南海后，去苏联治了一段病，后来回到大连工作，在那里结了婚，他在大连有一段时间病得很厉害，毛泽东让娇

娇代表他去大连探望了哥哥一次，以后兄妹间来往也很少了。

学会“外交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青装腔作势喜欢娇娇的表面文章懒得做了，对娇娇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对于江青的无理取闹，娇娇仍然采取这样的对策：从来不到爸爸面前告状，有多大的委屈只放在心里。摸透江青为人的毛泽东，怎能不了解娇娇在家庭中的困难处境。有一次，他与娇娇闲聊天，忽然，话锋一转，没头没脑地对娇娇说：

“你得学聪明一点，有时候来点外交手段才行，懂吗？”

娇娇一笑，她听懂了。

以后，她除了继续施用她的不予理睬的战术以外，还不时用点“外交手段”来对付江青。

在五十年代，江青一直说她身体不好，什么工作也不做，跑到各处风景胜地去疗养。她每年冬天都要到广州住几个月，等到北京春暖花开再回来。有一年她从广州回来，那天正好娇娇没上学，就去飞机场接她。

飞机已经到达了，娇娇站在机场上等候多时，不见江青下来。她一打听，原来江青说走不了，得用担架抬，正准备担架呢。娇娇想，她在广州游山玩水都可以，怎么就走不下飞机。于是，她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上飞机去接她，还亲热地问她都玩了哪些地方。江青一看娇娇来了，而且点出了她在那里游山玩水，不好意思再摆威风。她装模作样地让护士给她吃了止痛药，自己走下飞机。下了汽车，她也是自己走进家门的。

娇娇觉得，这一次，她取得了“外交手段”的胜利。

十三、全新的生活

爸爸供给制

9月初，一个新的学年开始，娇娇要去上学了。

那年娇娇已经12岁。她虽然在国际儿童院已读到四年级，回国后在哈尔滨、沈阳也读过一阵书，但她的中文程度太差，这次入学，只能从二年级读起。她的妹妹李讷比她小三岁，上三年级。姐俩都进了育英小学。育英小学只有四个年级，她上到四年级后就转到八一小学读书，中学是在北师大附中上的。

娇娇是住校，周末才能回家。毛泽东细心地为她准备了书包，文具和被褥。开学前夕，毛泽东对她说：

“娇娇，你要上学去了，爸爸给你起个读书用的大名吧！”

“我有名字呢，我叫毛娇娇。”

毛泽东笑了，说：

“那是你妈妈在你出生时给你起的小名，上学了，要有个学名。”

毛泽东略一沉思，说：

“你就叫李敏。这敏字出自《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你妹妹叫李讷，也是取自这句话。”

“那我为什么不姓毛，变成姓李呢？”

毛泽东抚摸着女儿的头发，温情地说：

“1947年国民党调集20万大军进攻延安，在转战陕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中，我用的名字是李德胜，我们果然得胜了。在我用过的名字中，我最喜欢这个名字，你也跟着姓李吧。”

从此，娇娇有了自己正式的学名：李敏。

李敏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家，过着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家里，共有五个人：毛泽东、江青、李敏、李讷和江青的姐姐。以后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在江西读完小学，来北京读中学，周末也回这个家。李敏和李讷合住在一间屋里，各人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

这里的生活是由管理员统一安排的。比如，一日三餐，吃什么饭，有几个菜，都有一定的计划，每人每月伙食费45元。如果在计划外要吃点什么，就比较麻烦，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和手续，才能办到。

对这种饮食方式，李敏开始很不习惯。她下午放学回家，感到肚子饿，离开饭时间还有几个钟头，她想添补点什么吃的却没有。要到厨房找点吃的，手续很多，李敏不想给别人找麻烦，只得忍了，饿着肚子等到够钟点才能吃上饭。时间长了，也就不觉得饿，而且形成条件反射，即便有了点心之类的小吃，也不想吃了。逢年过节，她们家总会收到糖果、点心之类的礼物，她同李讷都会分到一份。李敏吃不下，一吃就恶心呕吐，她只得把这些吃的送给警卫员。

在苏联形成的生活习惯，李敏爱吃咖啡。分给她的咖啡，她是很想喝的。可是那时没有速溶这一说，所有的咖啡都要用火煮，这又要麻烦厨房的师傅们，李敏只好也不喝。她舍不得送人，几年下来，屋里攒了一大堆走了味的咖啡。

添置衣服，也有一定的规矩。一般是两年添置一件，把裁缝师傅请来给每人量身制作。李敏爱出汗，内衣内裤洗得勤，不够替换，就得自己用零用钱去添补。日用品也是按人定量供应，比如一人一月发一条肥皂。如果衣服自己不洗，拿出去洗，洗衣费要自己付。

李敏每月拿15元零用钱，学习用的文具本册，都从这里开销。她倒是不买零嘴吃的，可是有时买了书和日用品，没到月底钱就花光了，这时就要挨爸爸的批评。

一个月45元伙食费，李敏上学时交到学校里，周末回家，学校退的伙食费，要如数交给管理员入帐。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对家庭的经济收支管得很细。每个月，他都要查一次家庭帐，看看有没有超支，有没有使用不合理的地方。如果发现问题，就要提出批评和意见。这时，江青坐在一旁不说话。事实上，毛泽东检查的是他的那份工资的收支情况，江青的工资不在此列，她的工资从来是她个人“专款专用”，不作家用开支的。

毛泽东的生活作风是极其俭朴的。他的膳食很简单，而且绝不标新立异。李敏记得，有一年冬天，管理员为了改变天天“大白菜当家”的状况，买了一点温室栽种的黄瓜来调剂伙食，这叫尝鲜。毛泽东看见冬天的饭桌上摆了黄瓜，就问：

“这个时候还有黄瓜卖？”

“这是温室里的黄瓜。”

“多少钱一斤？”

管理员报了个价。

毛泽东不高兴了，他说：“拿这个钱在夏天可以买上一大筐黄瓜呢，有什么必要在冬天花那么多钱吃那么点东西？下次不要买了。”

毛泽东不满意，那顿饭大家都吃得没有兴味，连鲜嫩的黄瓜也引不起大家的食欲了。

还有一次，毛泽东发了火。那正是玉米刚刚长成的时候，管理员买了一点嫩玉米，炊事员把嫩籽剥下来炒给毛泽东吃。毛泽东一见这道菜，脸顿时拉了下来，他质问是谁出的主意把那样嫩的玉米做菜吃。他说：

“你们知道这些玉米长老了，能打多少粮食吗？现在国家粮食很紧张，能这样糟塌粮食吗？谁买的谁吃，反正我不吃。”

以后管理员摸准了毛泽东的脾气，只给他买大路菜吃，每碗菜里放一点辣椒，他就觉得很好了。五十年代，毛泽东的一个护士曾经对毛泽东的膳食进行过营养分析和测试，多次发现毛泽东吸入的热量和蛋白质，达不到标准，建议他吃得好一点。但毛泽东俭朴惯了，这些建议听不进去。

毛泽东的衣着也很随便。一件睡袍已洗得发白，破了，他让警卫员打上补丁继续穿。他的袜子几乎没有不打补丁的。他给家里人定下了规矩，每两年添一件新衣服，可是他自己，常常两年都不添一件新的衣服，而且下了死命令，不经他的同意，不得给他添制新衣服。

毛泽东如此勤俭持家，一是他一生都俭朴过来的，即使作为领袖，也不改其本色；二是在建国初期，毛泽东还没有稿费可以让他补贴家用，而亲朋故旧常常来家探访，他们来回的车费，毛泽东馈赠礼物的费用，都要从工资中开支。毛泽东还常常要给老家来的人做套衣服，花费不少，他不得不精打细算。

每个周末，是全家人相聚的时候。李敏、李讷都从学校回家了。五十年代初，岸英还没有赴朝作战，岸青还没有搬出中南海，毛泽东的四个子女都回家了。李敏和李讷都是星期日下午就要返校，每周只回家过一个周末。毛泽东很珍惜与儿女们

相聚的时间，他总是尽量腾出时间来，同大家一起吃一顿晚饭，一面吃，一面谈，享受天伦之乐。这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家庭生活最融洽、最愉快的时期。

在这个晚上，毛泽东同子女们说说笑笑，显得很悠闲，很自在。李敏同两个哥哥岸英和岸青的共同语言最多了。他们在苏联期间就建立起亲密的手足之情，如今重逢在北京，关系就更密切了。他们都懂俄语，每周见了面，三个人就用俄语对话，兄妹间说得特别热闹。有一次，毛泽东看他们谈得那么高兴，就过来问他们都说些什么。李敏告诉爸爸，他们在争论是西餐好吃还是中餐好吃。

毛泽东笑着用英语回答说：“中餐好吃。中餐的特点是软、热、丰、香，而西餐是冷、硬、单、调。”

这回可轮到李敏听不懂爸爸说什么了，因为她不懂英文。她这是第一次听爸爸讲英语，很惊奇。毛岸英告诉李敏，他们的爸爸早就在学英语了。他1946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就听说爸爸在学英语了。爸爸工作那么忙，却坚持学习英语，真不简单。李敏听了以后，对爸爸的敬佩又深了一层。

毛泽东看到李敏的目光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敬仰，他就对李敏说：“其实我的英语水平比你的俄文水平差，我年纪大了，学起来比不上你们年轻来得快，学好了一门外语用处大着呢。”

李敏点点头。她想起了妈妈的教导，学好中文，不忘俄文，觉得自己除了要把中文学好以外，真的不能把俄文丢掉了。

在周末的晚上，毛泽东有时也检查李敏和李讷的功课，查看她们的作业，给她们讲解课文。

四个人的爸爸

在小学四年级之前，李敏同李讷同在一个学校读书，虽然不在同一个班上课，却是每个周末一起回家，星期天一起返校，回到家里以后，又同住在一间屋子里，两个人的年岁又相差不大，应该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的。但是，在不同环境生长的这对同父异母姐妹，开始却很难适应对方。

在李敏没到北京之前，毛泽东是李讷一个人的爸爸。李讷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长大，女孩子善解人意，天真烂漫，特别是她从母亲江青处学得唱歌、唱京剧的本事，在转战陕北，戎马倥偬的岁月，她的一首歌曲，一段京剧，曾经给过毛泽东多么大的安慰和快乐。她得到毛泽东的宠爱，这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常常亲切地称她讷娃。

毛泽东曾经结过三次婚，他曾经拥有过众多的子女。杨开慧为他生过三个男孩，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为革命事业奔波，将杨开慧与孩子们送回湖南老家，从此就没有见过三个孩子的面，直到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学成回国，父子才得重逢。杨开慧所生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在毛泽东的身边长大。贺子珍先后生过六个孩子，其中的五个不是生一个丢一个，就是早夭。只有小毛在毛泽东的身边长到两岁，非常得到毛泽东的疼爱。但长征前寄养到老百姓家不知下落。李敏出生以后，在母亲去了苏联的四年时光里，她虽然与父亲同在延安的蓝天下，但她并没有同毛泽东住在一起，而是住在保育院里，父女俩难得见面。只有李讷是一直生长在毛泽东的身边，得到父亲的厚爱。

因此，李讷一直认为，爸爸是她一个人的，她应该拥有爸爸全部的爱。可是她从苏联回国以后，发现多了一个姐姐，而且

爸爸对这个姐姐，也充满了慈爱，于是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有一点不满意，有一点委屈，也有一点嫉妒。她是妈妈的独生女儿，太习惯于说“我的”这样的词句了：“我的玩具”、“我的书本”、“我的画册”、“我的家”，还有“我的爸爸”，她不愿意让姐姐去碰属于她的东西。

而李敏呢，也有自己的想法。在苏联的时候，她与两个哥哥岸英，岸青相处，她是小妹妹，两个哥哥都比她大十岁，八岁，倍受两个哥哥的关怀和爱护。她可以在两个哥哥面前撒娇，耍脾气，搞点小小的恶作剧。她这样做，不仅不会受到责备，相反，还使全家增添欢乐的气氛。可是在李讷这个小妹妹面前，她是个大姐姐了。按照中国家庭传统的习惯，大的孩子都应该让着点小的，因此，她要学会宽容，象两个哥哥对待她那样，对待这个初识的小妹妹。

可是李敏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她也只有12岁，还需要别人的关怀和忍让。另外，李敏觉得，自己长那么大，现在才来到爸爸的身旁，她得到的父爱太少了，她现在应该得到多一些，才能得到补偿。

姐妹俩想不到一起，在生活中自然会出现一些纷争。她们之间的纷争，有的是由于观念不同而产生的。

比如说，李敏是在集体生活中长大的，尤其是到了贺子珍的身边后，她的集体观念更强了。贺子珍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形成了很强的集体观念，开口闭口就是“公家的”，屋子里一切东西都是公家的，连自己也是公家的人。因而在李敏的观念中，只有公家的，没有个人的。她身上穿的，手上用的，嘴里吃的，都是公家给的。当她与妹妹住在一间屋子以后，她拿起一本书，妹妹说：“这是我的”；当她抚摸一个洋娃娃，妹妹又说：“这是我的。”李敏感到好奇怪，怎么会都是你的呢？

那么，什么是大家的，公家的呢？

姐妹俩的纷争，也有相互间的不理解造成的。有一次，李敏同李讷一起在园子里玩，李讷一不小心，掉进一个水潭里。李敏慌忙把李讷从水潭里拉了出来，泥水溅了她一身，衣服也脏了。可小李讷不说姐姐救了她，反而哭着回家告姐姐的状，弄得李敏好委屈。

李敏不管同李讷闹了什么矛盾，她坚持一条，不到爸爸那里告状。即使自己有理，正确，也不告状。她对待江青也是同样的态度。她这样做是为了体谅爸爸，爸爸工作太忙，不愿意他为这些小事费神、分心。

看来，毛泽东对于小李讷的告状，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他从不因此质问李敏，责备李敏。他并不想分清是非曲直，也不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和稀泥。他为了安抚李讷，总是说一些模棱两可、一般爸爸说的话：

“你们姐妹俩要相互帮助，相亲相爱。”

“作姐姐的要多照顾妹妹。”

毛泽东爱说的一句话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你们要相亲相爱。”

在弥合姐妹俩的分歧中，毛泽东是个高级泥瓦匠。

等到这姐俩都长大成人了，回想起初见面时“争”爸爸的情形，都觉得好滑稽，好可笑。

可是在当时，李敏认为，“争”爸爸的不只她们姐妹俩，还有两个人。

在岸青因江青作梗，不得已搬出中南海后，毛泽东身边的子女就剩下李敏和李讷了。不久，毛泽民的遗孤毛远新到北京上中学，周末他也住进伯父家。毛泽民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后，毛泽东对弟弟的这个遗孤很怜惜，把他从他的母亲朱旦华

的手里要过来，加以抚养。毛远新一一直在江西读书，后来上北京上中学，星期天就到伯父家来。毛泽东对他象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甚至还要好。毛泽东想到毛远新无父无母，身上的零钱不多。星期六、星期天他回到自己家，学校退的伙食费不要他交出来，让他留着自己用。毛泽东说：“这个钱我出得起。”毛远新在毛泽东的家，自由出入，俨然是这个家的一个成员。

毛岸英在建国后，只在毛泽东身边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随着他去抗美援朝，牺牲在前线，很快在毛泽东子女的行列中消失了。

如此算来，毛泽东身边的子女只有三个人，怎么会是四个人的爸爸呢？李敏笑着解释说，这是因为江青老想挤进来，以毛泽东子女的身份出现，这样，毛泽东就有了第四个“女儿”。

江青在孩子们的面前提到毛泽东，都是称爸爸，或者叫老爸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这些孩子说来，毛泽东的确是爸爸。可笑的是她当着孩子们的面同毛泽东谈话，也一声接一声地叫爸爸。比如说：“爸爸年纪大了，身体要当心”，“爸爸今天还能回来同我们一起吃晚饭吗？”

更有意思的是，江青在同“爸爸”说话的时候，总爱带上个老字。有时是在爸爸之前加上一个老字，有时是“爸爸老了”，不能怎么怎么了，把个老字放在后面。特别可笑的是，江青在给毛泽东加上老字的时候，却不断地突出她的小。她不让李讷叫她妈妈，而是叫她“小妈”，意思是年纪很小的妈妈。毛远新来到北京以后，她也不让他叫她妈妈，跟着李讷叫小妈。她不让孩子们叫她妈妈，是怕同毛泽东的老划上等号，把她也叫老了。

在家里，唯一不叫她小妈的是李敏。毛泽东动员李敏叫江青作妈妈，提的是妈妈，不是小妈。以后江青也没有特别要求李敏改口叫她小妈，于是李敏就这么样叫下来了。李敏并不主

动改口称江青为小妈，也有她的想法，她觉得小妈的叫法太别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地主老财家的小老婆。江青所以要儿女们把她叫小妈，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年轻，故意把毛泽东往老的行列中推。其实建国初期，毛泽东才五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不仅举止矫健，而且思维敏捷，哪里有一点老态呢。

在这个家里，还曾经有一个人没有叫江青小妈的，这就是毛岸英。江青大概也不敢强迫毛泽东的长子叫她小妈。

在这个家里，江青总想称王称霸，树立她的权威。她对于年轻的毛远新极尽拉拢之能事，常用一些小恩小惠来取得毛远新的好感。江青的这种惯用伎俩在李敏身上没有发挥作用，但是在毛远新的身上似乎是起了作用的。他在北京读完中学以后，考进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时起来造反，毛泽东说过，不要让毛远新做大官，在空军当个处长就可以了。可是已经结合进辽宁省革委会的陈希濂，一级一级地给他升官。他的父亲毛泽民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有一年曾经组团到新疆去纪念他。陈希濂是团长，毛远新是副团长，毛远新由此出名。以后他当了毛泽东的联络员，江青拉拢利用他，他就倒向了江青，为江青效力。他们的关系是从毛远新在北京上中学时开始的。

江青在家里虽然咋咋呼呼，颐指气使，但在中南海的毛泽东的家，总的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志在运转的，几个子女的学习和生活，都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所以，李敏虽然只身走进这个陌生的家，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但是她谨慎而不害怕，孤身而不孤单，因为毛泽东是她的最大的保护伞。作为毛泽东的长女，她在这个家里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是江青所无法改变的。江青虽然不情愿、不喜欢毛泽东前妻的这个女儿出现在她

的家庭中，但她不得不承认和接受这个现实。当然，按照江青的为人和性格，她是不会甘心情愿接受这个现实的，她要顽强地表演，不久，她就撕下了她极爱李敏的伪装了。

江青撕去伪装

江青在人前炫耀和标榜的她与李敏情同亲生母女的谎话，不久就拆穿了。这个心眼狭窄的女人竟然容不得李敏在家吃几顿饭。

李敏来到北京上学就是住校，一周才回家一次。上了中学以后，她是两周才回一次家。按照五十年代学校的规定，周末学生回家都退当日的晚餐和星期日的伙食费。学校退回来的伙食费，李敏遵照爸爸的意见，交给管理员了。因此，严格地说，李敏周末回家吃饭，并没有额外增加家庭的负担，她还是吃的爸爸支付给她的45元伙食费中的一部份。

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很重视家庭的生活，到周末孩子们回家了，他要尽量摆脱工作，同孩子们一起吃顿晚饭，但是这种局面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就被繁忙的公务挤掉了。毛泽东来不了，江青有自己的伙食习惯和要求，周末的团圆饭也就取消了，李敏放学回到家里，常常是在伙房的锅台上随便吃一点就算了。第二天清早，她经常不吃早饭，早饭同中饭合并成一顿饭，她的饭量并不大。

李敏周末回家吃的饭菜，也很一般。偶尔炊事员为她专门做一点她爱吃的小菜，多数情况是吃的给毛泽东做饭时剩下的“边脚余料”，如切得不规整的萝卜丁、土豆丁，挑出来的比较老的菜叶等。

然而，小心眼的江青连李敏回家吃这样的伙食都容不下。

她开口对李敏说：“你爸爸一向主张对子女严格要求，不要搞特殊化。李讷小时候就吃大食堂，你是不是以后回家也到大食堂去吃饭？”

“好的，以后我回家就上大食堂去吃饭。”李敏知道江青嫌她回家吃饭，但她不想点破，就答应了下来。她想，爸爸的确是这样要求子女的，自己去大食堂吃饭，也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过了一会儿，江青又跑来对她说“你不要上大食堂去吃饭了。”

“为什么？”李敏觉得很奇怪。

“我动员李讷上大食堂去吃饭，李讷不肯，又哭又闹。那就算了，你也不要去了。”江青回答说。

“李讷去不去同我没有关系，我既然已经决定去了，我就要去大食堂吃饭。”李敏不紧不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江青听了一脸的不高兴，她怕李敏去了大食堂，而李讷没有去，有人会说她偏心眼，不一碗水端平；还怕毛泽东知道了，会责备她对李敏另眼看待，娇惯李讷。因此，她不得不转弯，让李敏不去大食堂，这样，就把她对李敏使坏，对李讷宠爱的事掩饰过去了。无奈李敏不卖她的帐，不肯拐弯，这使她很生气。她板着脸说：“你就是个倔脾气，叫你不 去 你 偏 要去。看你的嘴噘得多高，都可以拴上三条毛驴。”

李敏不答话，用沉默来对抗。

江青看看说服不了李敏，只得又回过头来动员李讷。李讷也不卖她的帐，说什么也不肯上大食堂去，而且继续哭闹。她的哭声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走了过来，问清了原因，也生气了，他说：

“上大食堂去吃饭有什么好哭的，李敏去了，你也要去。不仅你们姐妹俩去，远新也去，家里的其他人统统都上大食堂

去，以后都不要在家里吃饭。”

毛泽东一锤定音。这样一来，不仅李敏、李讷、毛远新到大食堂去，连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儿子，全都被撵到大食堂去了。这个结果，是江青所始料不及的。她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反倒怪罪李敏不肯在家吃饭，闹得大家都不能在家吃饭。她对李敏的厌恶从此表面化了，对李敏这也看不顺眼，那也有意见。她常常莫名其妙地给李敏扣上好多帽子：“什么“资产阶级大小姐的生活作风”“什么讲吃讲喝”呀，满天飞舞。

对这些，李敏既没有反驳，表示异议，也没往心里去。她很明白，这些帽子都太大，戴不到她的头上。到大食堂去吃饭，对她来说，是极普通极易做到的事情。因为她从小就是吃食堂长大的，从没有尝过小灶的待遇。在苏联的时候，她还忍过饥，挨过饿，能有大食堂吃就很不错了。

事实上江青这一招是弄巧成拙，不光是彻底剥下了她爱李敏的伪装，而且也让她那个仗着妹妹的势力，在家里作威作福、养尊处优的姐姐尝到了普通饮食的滋味。这位老太太到大食堂吃了一顿饭，就受不了了，一定要李敏陪她去小卖部买点心吃，以补充肚子里的油水不足。李敏看了，忍不住笑了起来。

以后，李敏见到爸爸，批评他说：“你这是昏官断案，把有关没关的人全都打了板子，太不公平了。”毛泽东乐呵呵地笑了。

十四、一年一度见妈妈

都向李敏打听消息

李敏离开贺子珍到毛泽东身边以后，贺子珍还在沈阳住了一个时期。

在毛泽东提出要李敏到他的身边读书，征求贺子珍的意见时，贺子珍几乎是没有过一丝一毫的犹豫，马上就同意了。在为李敏和岸青收拾行装的时候，她也是高高兴兴的。她热切地希望这两个孩子早日与他们的父亲团圆。直到这个时候，她都没有想过自己。待到孩子真的高去了，只剩下空落落的房子，孑然一身的她，孤独与寂寞的情绪就向她袭来。

她一天比一天强烈地思念女儿，这使得原来就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她，更是彻夜难眠。她经常是靠在床上，睁着失神的双眼，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天明。每天早上起床，床头的烟缸里满是烟头。

她产生了要把女儿接回来的念头。这时，贺怡把李敏和岸青送到北京后，又返回沈阳。贺子珍逼她马上去北京，面见毛泽东，申明她要把李敏接回来的意见。

贺怡看到因思念女儿被折磨得憔悴不堪的姐姐，感到阵阵心疼。她完全理解贺子珍此时的心情，孤身独居的姐姐，如今

只剩下李敏这一个亲人了。但是，贺怡不能同意姐姐的做法。她认为，李敏留在她爸爸的身边，对于她所策划的毛泽东与姐姐的复婚会有好处。

然而，她终究架不住姐姐涕泪涟涟的哀求，答应她再去一次北京，贺怡匆匆地走了。

贺怡第二次去北京，可能见到过毛泽东，也可能根本没见到毛泽东，只送进去了一封信。这封信都写了些什么，是否转达了姐姐贺子珍要娇娇回去的意见，或者还说了些什么，现在很难以考证了。现实的情况是，李敏并没有随姨妈贺怡回到她妈妈的身边。人们只能够猜测，贺怡即使转达了，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因而李敏没有走。

就在贺怡离开沈阳以后，贺子珍又产生了要给毛泽东写信的念头。她想亲自告诉毛泽东，她多么希望女儿重新回到她的身边，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

贺子珍在信中写道：主席，娇娇和岸青到你那里去了，我一个人感到很寂寞。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们教育好的，这不用我说，我的工作很好，身体好一点。请你多注意身体。

贺子珍在这封信里，竟然只字没有提要李敏回到自己身边的意见，这是否贺子珍在执笔时临时改变了主意？

毛泽东仍然没有回信。但贺子珍很快收到李敏的来信。这封信，李敏是用中文写的。她在信中说：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您想念我吗？我也想念您。爸爸问您好，希望您保重身体。

此后，李敏给妈妈的信很勤，差不多十天半个月就写一封。李敏的中文比较差，她有好多话要对妈妈说，却象茶壶里倒饺子，一句也写不出来，她的信来来回回就是这么几句话，没有什么新内容，只能是一封报平安的家书。可是贺子珍收到

李敏的信，总是特别的高兴，颠过来倒过去的，不知道要看上多少遍。接到李敏的来信后，她的一颗悬挂着的心，似乎又落到原来的地方，她从此再也没有提过要李敏回来的话。

随着大江南北的解放，原来在东北工作的政工干部，纷纷南下，开辟新区的工作。贺子珍被这股革命的新浪潮所吸引，也想南下工作。此时，贺子珍在井冈山时就相识的老战友谭震林，盛情邀请她到浙江去工作，她答应了，于是乘火车南下，直奔杭州。

她在杭州的职务是杭州市妇联副主任。她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直到她妹妹在赣州附近翻车身亡。噩耗传来，贺子珍悲痛欲绝，肝胆俱裂。她知道，贺怡不顧安危连夜赶路，为的是想赶在上任之前，找到在江西失落的小毛，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当她知道贺怡的两个孩子在这次事故中受了伤，其中的一个伤势还很重时，马上请假赶往上海她哥哥贺敏学的家中，悉心照料两个受伤的孩子。

贺子珍万万没有想到，杭州市妇联的工作，竟是她革命队伍中最后的一个工作岗位。从此她就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大闲人。当贺怡的两个孩子伤愈以后，贺子珍就没有什么事做了，她不大愿意再回到杭州去，希望留在上海工作，但是上海市委只负责给她发工资，却不肯安排她任何的工作。直到许多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贺子珍才醒悟到，原来当时上海市委的负责人，就是江青的心腹与亲信，江青正是通过这个亲信和心腹，控制着贺子珍，以防止政治不良影响为名，不许她出来工作。表面上她是自由的，实际上她是受到禁锢的。

1959年，贺子珍在南昌与井冈山时期的好朋友曾志相见时，她曾经万分后悔地表示：如果她当年不是去了杭州，而是到广东与曾志一起工作，她不会得病，也不会长期没有工作做。

的确是这样的。一个忙于工作，生活充实的人，他无暇去胡思乱想，而且工作上的成就可以填补情感上的空虚，生活得更意义。而一个闲得发慌的人，只能在往事的回忆中讨生活。他的脑子就会越想越乱，罹患各种的病症。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的确只有关键的几步。贺子珍是否在又一个关键时刻，又走错了一步，使她的后半生笼罩了更浓重的凄凉的色彩！这当然只是后人的感叹，而她自己，却是按照自己认为的正确方向，或者是身不由己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自从李敏来到毛泽东的身边，每到寒假，毛泽东都要打发李敏去看望她的妈妈贺子珍，让她们母女相聚。而每年暑假，他则把李敏留在身边，陪伴自己。

毛泽东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每次李敏起程去上海，他都要亲自为李敏打点行李，嘱咐警卫员购买北京的土特产品让李敏带去。水果，燕窝、蜜饯、茯苓饼，还有“六必居”的酱菜，大包小包，直到李敏嚷嚷拿不动为止。细心的毛泽东每次都让李敏带足回来的路费，以及在上海期间的伙食费和零花钱。有时，毛泽东还捎去专门为贺子珍购买的东西，如为她治病的药品、外国朋友赠送的名烟等。

母女的重逢充满了喜悦。贺子珍是盼了一年才盼到女儿的回来，看着长高长大的女儿，真是百看不厌，高兴得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李敏呢，也有满腹的话要对妈妈说。现在，她已经能够比较自如地用汉语，表述自己的思想了。

不过，刚下火车的李敏，什么都还来不及说，她要先把爸爸带来的物品，一件件打开，让妈妈过目。李敏得意地以北京人的身份，给妈妈介绍为什么这是北京的特产，都特在哪里。李敏要妈妈每样都尝一尝。

这一切，对于从来没有进过北京城的贺子珍来说，自然都是十分新鲜有趣的。她发现，过去寡言少语的女儿，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后，变得话多起来，性格也活泼多了。

李敏到上海以后，按照爸爸的安排，住进了东湖宾馆一个专为毛泽东准备的套间里。她早上起床，吃过早饭，带着寒假要做的功课，到妈妈那里去。到中午要吃饭了，回宾馆去吃，下午再到妈妈那里去，晚上再回来吃饭睡觉。

贺子珍虽然想留女儿在身边住，母女俩好多些相聚的时间，但是她没有开口。一来因为毛泽东安排得很周到，她不想改变它；二来她住的地方太窄小了。她在上海，住在天平路一栋两层的小楼房里，哥哥和妹妹的子女，都住在这里，一共四间房间，贺子珍只住一间，李敏要住进来就更挤了。

每天，贺子珍最高兴的时刻就是听女儿讲她到爸爸身边后的生活。贺子珍从女儿的叙说中知道，毛泽东真是个好爸爸，他为李敏学好中文费了很多心思。李敏是住校，周末才回家。毛泽东再忙，也要抽时间同家人吃一顿晚饭。晚饭后，毛泽东还要检查李敏的功课，了解她在学校生活的状况。为了让李敏练好毛笔字，毛泽东亲自为李敏用红笔写描红字帖，让李敏照着描。字帖从“一二三四五”，写到“大小人手足”，还有“李敏学写字”，由浅入深。可能李敏的字帖是毛泽东的手书，这个秘密被有的人发现了，李敏的字帖经常不翼而飞。几次下来毛泽东就不再写了，李敏练大字用的就是街上买的描红本和字帖了。

听了女儿的介绍，又看到李敏的汉语与语文有了进步，贺子珍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她想写一封给毛泽东表示感谢的信，就与哥哥贺敏学与嫂子李立英商量，用三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由李立英执笔的。信中说，娇娇回国

时，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现在不但会说了，而且会用中文写信了，这都是毛主席教育的结果，我们感谢主席对娇娇的大力栽培。

毛泽东很快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贺子珍看懂了这封信的意思，她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要顾全大局，接受现实。

寒假在妈妈的身旁，李敏是快活的，但是也有一件令人烦恼的事，这就是整个寒假一直有个警卫员叔叔跟在她的身旁。他陪她坐上火车来到上海，到达目的地后，他对李敏是跟前跟后，一步都不肯离开。

李敏对于这点很不习惯。自从她知道自己是毛泽东的女儿后，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就是出远门多了个“尾巴”。她特别不喜欢有“尾巴”。她已经是个大孩子了，用不着有专人来照顾。要说这是为了她的安全吧，她觉得，没有“尾巴”更安全，谁都不会注意到她这个衣着普通的小姑娘。而现在，一个手持盒子枪、一身戎装的叔叔在身旁，反而惹人注目，人家倒要奇怪地多看两眼，研究研究这是个什么人物的千金小姐，要跟个警卫员，反而会出事。

李敏企图说服这位警卫员叔叔，不要管她了，路她都认得，自己来回就是了，各人尽可以自由行动。无奈奉毛泽东之命保卫李敏的警卫员，说什么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职责，依然不离李敏的左右。

小姑娘搞起小动作来了。她走在路上，一会儿急，一会儿慢。净往人多的地方挤。想用人群挡住警卫员叔叔的视线，然后溜之大吉。“目标”从跟前消失以后，警卫员可吓坏了，他在这儿来回地转圈，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却不见李敏的踪影。没法可想，他只得试探着到贺子珍家去看看，是否李敏已

经到达了。他推开门一看，李敏正在客厅里写作业呢。李敏看见他，抿嘴一笑，既是胜利后的得意，又是道歉的表示。从此，他们之间达成了协议，警卫员叔叔执行任务，保护李敏的安全是必要的，但是不必跟得太紧，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可以了。这场“冲突”圆满解决了。

寒假的假期是短暂的，过完春节，李敏就得回北京了。

李敏回京的行装，一点也不比她来的时候少。贺子珍也是大包小包地买，把南方的土特产往北京带。她有时给毛泽东捎去南方的时鲜蔬菜，都是旧日毛泽东爱吃的，在北方不易买到。有一次，她给毛泽东捎去一只银质的、做得很精致的耳挖子。毛泽东是油耳朵，经常要清除耳垢，这个习惯，贺子珍记住了。

每次李敏探亲回京，贺子珍都要给李敏一份礼物，如纯毛毛线、毛质衣料，总要同样买一份送给李讷。她甚至每次都给江青捎去一份礼物。她这样做，是因为她衷心希望这个家庭和睦幸福，她自己甘愿处在局外人的地位。她虽然旧情难舍，为着这不可再得的爱情，孤身独处，献出了一切，包括自己宝贵的年华，但是她用理智克制感情。就曾宽容地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不在了，总不能让他当和尚呀！”

毛泽东也爱打听李敏在上海见到贺子珍的情形。他问李敏：

“你妈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我妈现在可胖了，腰这么粗，象个大水桶。”李敏故意逗爸爸。

毛泽东摇摇头，惆怅地说：

“她不可能发胖，她过去身体就比较瘦弱，现在又有病，情绪也不好，怎么可能胖呢。”

李敏惊异了，爸爸没见到妈妈，怎么可能知道那么清楚。她只得告诉爸爸，妈妈的确很瘦很瘦。

毛泽东又问起贺子珍的生活起居。李敏告诉他，妈妈同表姐妹们住在一起，只有一间屋子，很挤。毛泽东说：

“你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去找汪东兴叔叔，我办不了的事情，他能办到。”

李敏于是去找汪东兴，将妈妈住房困难的情况告诉他。不久，汪东兴果然帮助解决了。原来在湖南路有一栋陈毅的寓所，他当时任上海市市长。以后陈毅奉调中央，房子空出来了，汪东兴通过市委让贺子珍搬进去住了。

一封医治心病的信

然而平静的生活没过几年，贺子珍的生活陡然掀起波澜。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正在家中休息，她的嫂子李立英也在上海。收音机里播放毛泽东在一次重要讲话的录音，贺子珍听得发呆了。这声音对她来说，是多么熟悉，虽然已经有十多年没听见了。

“毛主席的声音真洪亮。”李立英赞叹地说。

“是呀，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贺子珍回答得很正常。

可能是这个讲话太重要了，广播电台播放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是听了一遍又一遍，她忘了吃饭，也忘了睡觉。

第二天早上，李立英起床，发现贺子珍还坐在那里，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凝神在听什么。

她见到李立英进来，便问：“收音机怎么不响了，不播毛主席的讲话了？”

李立英走过去一看，原来收音机一夜未关，已经烧坏了。再一看，贺子珍神情恍惚，痴痴迷迷。李立英将贺子珍扶起，见她的月经从裤子里渗出，竟顺着腿流出来了。

贺子珍病了，她茶饭不思，不眠不睡，处在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重新听到那过于熟悉的声音，对她的刺激太大了。她的神经无法承受起这个事实：那曾经在耳边听惯的声音，却不可能再见面，亲耳听到他说话了。熟悉的声音勾起了她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那段岁月的回忆，而这样的岁月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怀念、悔恨、痛苦，这种种复杂的心情搅和在一起，使她那已经愈合的心灵的创伤，又重新裂开，流出殷红殷红的血。

家人们慌了手脚，立即为她求医诊治。可是她不肯吃药，拒绝治疗。无计可想，李立英只好给李敏写信，告诉她妈妈病重的消息。

李敏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爸。毛泽东听到贺子珍生病的经过，情绪十分沉重，他流下了眼泪。这是李敏第一次见到爸爸流泪。在岸青搬离中南海时，她看到过爸爸难过的样子，这一次，爸爸不仅是难过，而且是流泪了，可见是动了真感情的。爸爸对妈妈的眷念之情，李敏是清楚地看到了。她陪着爸爸一起流了泪。

当时李敏正在上学，不能中断学业去照顾妈妈。毛泽东左思右想，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给贺子珍写一封信。他知道，贺子珍的病是因心事太重而起，他相信心病还需心药医的话。这是他给贺子珍的第二封信。他听说贺子珍不肯看病，不肯吃药，就在信中劝说她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他在信中说，苏医生是个好同志，杨医生也是好的，要听医生的话。他听说贺子珍抽烟抽得很厉害，就在信上说，不要抽那么多的烟，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信中，他还要求贺敏学代为照顾贺子

珍。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解铃还是系铃人。贺子珍的病是由于思念毛泽东而起的，毛泽东的信给予了她心灵上的慰藉，她的心病也就有可能治愈了。当亲人们告诉她，毛主席给她来信了，要她好好吃药，好好看病，她的神智竟然逐渐清醒起来。她能够自己读信了，她肯吃药，也肯看病了，而且把烟也戒了。

待到放寒假李敏到上海见到妈妈时，贺子珍虽然身体更羸弱了，但精神已基本如常了。

李敏临行时，毛泽东除了让她带去专门为贺子珍购买的药物外，还特地嘱咐李敏，代他向贺子珍问好。他说：

“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多照顾，带她去治病。但不要说，她是因为什么生病的。”

毛泽东既要托上海的组织照顾贺子珍，又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贺子珍的病与自己有关，是否有难言之隐呢。

在中国这个封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人们对领袖的尊敬是达到神化的境地。作为领袖的人，不仅在治国之才上是功勋卓越的，他的思想素质，生活方式似乎也应该是全国人民的楷模。领袖的婚姻，应该是稳定的，如一的，甚至是模范的。如果出现了以前的妻子因为对这个已成为领袖的人物竟有未了之情，并因此而精神出了毛病，就会有损领袖的形象。毛泽东看来是感受到这种社会的压力的。在建国以后，他对江青纵有一百个不满，也不敢走离婚这一步；他对贺子珍即使念念不忘，也不敢把这个真情大白于天下。如此看来，成为领袖人物者，他们的婚姻如果发现是不幸的，要想改正，比起一般的老百姓来，更是难乎其难了。

十五、西瓜诗的风波

是西瓜画引出西瓜诗

自从李敏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的联系，通过李敏这个媒介，密切起来了。李敏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为毛泽东与贺子珍相互传递口信，这是名正言顺的。李敏不断地给妈妈写信，向妈妈汇报学习成绩，信中常常会谈到爸爸，这样，贺子珍又了解到毛泽东的一些情况。对于李敏的来信，贺子珍是每信必复，信中除了勉励李敏好好学习以外，还会谈到自己的近况。这些信的内容，通过李敏的介绍，又会传到毛泽东的耳中。李敏在爸爸与妈妈之间，起到了桥梁与沟通的作用。

另外，有一些事情，比如毛泽东希望上海市委的组织部门多照顾贺子珍的身体，包括为贺子珍安排住房，毛泽东想为贺子珍去办而又不便出面的，他都通过李敏，为贺子珍办到了。

对于这种现象，心眼狭窄的江青是看在眼里，恼在心上。她不满意，但说不出口，也禁止不了。因为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的联系是正当的，没有超过朋友之谊。而且，李敏作为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沟通一些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信息，是人之常情，无法阻止。为此，江青虽然十分恼恨，却不敢发作，只

得埋在心底。这种恼恨，日积月累，越积越深，总有爆发的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事情的导火线是一幅西瓜画和一首西瓜诗。

李敏喜欢画画，虽然江青听了曹轶欧对李敏的画的评判后，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没有送李敏到业余美校去学习，但李敏仍然喜欢画画。在一个新的学年开始时，老师允许学生不再用蜡笔而是改用水彩来作画。水彩的色泽比蜡笔鲜明多了，李敏好兴奋，老师表示画的题材由自己选定，李敏很快就决定用强烈的对比色来体现水彩颜色鲜明的特色。她选定西瓜作为画的题材。她在画纸的右边，画了一个圆圆的大西瓜，青翠的瓜皮，深绿的瓜纹，绿得鲜嫩；在画纸的左边，她画了一块切成三角形的西瓜，鲜红的瓜瓤，点缀着几粒黑色的瓜籽，饱含着比蜜还甜的瓜汁，让人看了垂涎欲滴。老师给这幅打了五分。李敏高兴极了。她写了一封信给妈妈，讲了自己最近学习的成绩，考试的成绩，最后，把这幅画也夹到信里了。

贺子珍收到这张画后，竟然情绪激动，联想翩翩。她不把它看作是小孩子的随手之作，而是她自己处境的写照。那圆圆的大西瓜，好比毛泽东现在的家庭，团圆美满，旁边那块切成三角形的西瓜，形单影只，好比她自己。贺子珍西对着这幅画，发了多少呆，流了多少泪，因为无人亲睹这一切，难以作准确的介绍。人们只知道贺子珍提笔写了一首诗，并且把它寄到北京。

贺子珍有一定的古文根底。在她还没有到永新县的福音堂学校女部读书之前，曾经同她的妹妹贺怡一起，隔着大门，从门缝里随着请来教贺敏学读书的老先生，读了几年古书。她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以后，毛泽东喜爱古典诗词的爱好也感染了她。在井冈山寒冷冬天的漫漫长夜，毛泽东工作累了，就同

她一起谈论诗词，讲解名篇佳作。有时候，毛泽东还教她诗词格律和写诗的要领。在艰苦的战争年月，贺子珍偶有所得，也常常写上几句。1937年她在延安抗大读书，有一次，她同蹇先任一起上厕所，突然掏出纸笔，站在厕所里就匆匆写起来。蹇先任奇怪地问她干什么，她回答说写诗。刚想了一句，怕忘了，赶快写出来。蹇先任当时还笑话她不嫌臭，在茅房里写诗。可惜贺子珍写的诗都没有留下来。

这次看到李敏的西瓜画，可能又触动了她写诗的灵感，于是她写了一首吟西瓜的诗。这首诗是新诗还是旧诗，她寄给了谁？是寄给了李敏还是毛泽东？李敏至今没闹清楚。因为从始至终，她没见过这首诗。她知道妈妈写了这样一首诗，是从江青的撒泼中了解到的。

那天，江青一改平时那种娇娇滴滴，轻声慢语的神态，怒气冲冲地闯进李敏的住房，尖声地责问李敏：“你用西瓜画拉什么线？搞什么名堂？”

李敏一时如坠烟雾，莫名其妙。

江青继续吼叫：

“你的妈拿你画的一幅西瓜画，写了一首西瓜诗，用这首来讽刺我，骂我。我岂能咽下这口气，我已经将这件事报告了中央，让组织来处理这件事，要组织处分你的妈妈。”

说了这些，江青还不解恨，又恶狠狠地说：“还要处分你的舅舅和舅妈，他们尽在里头出谋划策，出馊主意。”

李敏这才听明白是她的那张画惹了事。她极力分辩说：

“画是我的作业，是我自己寄给妈妈的。我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任何人给我出主意。”她接着说：“我妈要是写了诗，诗是写给我的，你有什么权利拆看我的信，偷看写给我的诗？”

江青无言以对，恨恨地说：

“这事完不了，一定要处分你妈。你以后不要来往穿线，上窜下跳。”

她一转身走了。

李敏毕竟是个孩子，听了江青的话，着实担了一阵子心，不知道江青大闹中南海，在中办那里搅到什么程度。在这之前，爸爸从来没有在她的面前谈过他与江青的关系，他们也从来没有在李敏面前争吵过。李敏是凭着一种直觉感到爸爸与江青间微妙的、不融洽的关系。

但是，在江青吵闹一通之后，李敏没看到什么动静。中南海依然风平浪静，毛泽东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照样对李敏和蔼可亲，照样工作、吃饭，睡觉。他见到李敏，绝口不提这件事。李敏自己定的一个原则，这就是不管受到什么委屈，绝不在爸爸面前告状。这次江青无理取闹，她感到好气愤，真想爸爸面前发泄一通，但几次话到口边，又忍住了。她还是不想打搅爸爸，增添他的烦恼。

等她探亲时见到贺子珍，忍不住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妈妈是否写了一首诗，诗都写了些什么，是否寄给她的。她还担心地问妈妈，有没有因为这首诗受到组织的处分。可是妈妈缄口不言，什么问话都不回答。不过自此以后，不管李敏给妈妈写多少信，贺子珍再也没有复过信。

江青承认：毛、贺感情未破裂

江青是个心眼狭窄、尖酸刻薄的女人，她容不下一个处于无权无势、孤苦无依的女人。只要有会，她就要诋毁她，发泄她心头的不满。

1988年7月2日，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利曾谈过江青对她说过的话。她说：

“有一次，我听到江青议论贺子珍。她极力贬低贺子珍，说了贺子珍很多的不是。她说，贺子珍从来没有工作过，以前在井冈山，也就是剪剪报纸；到了延安，也不工作。她还说，贺子珍现在在上海单独住一栋房子，得到很多照顾，影响很不好。她同她的哥哥在一起，也不工作。很不好。但是江青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虽然与贺子珍分手了，可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并未破裂。”

江青不仅同林利讲过贺子珍的坏话，而且同很多人讲过：贺子珍是一个完全不理解毛泽东政治生活的人。言下之意，她比贺子珍高出很多，她才真正是毛泽东政治上的伴侣。

当李敏长大成人之后，她对江青对她妈妈的评语，是不能同意的。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的妻子，组织上给予她们的政治任务就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让毛泽东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工作中。无论是贺子珍还是江青，她们与毛泽东结成伴侣以后，她们的身份都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贺子珍是很不愿意放下她热爱和熟悉的群众工作，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的。但是一来她爱毛泽东，愿意为她作出牺牲，二来这是组织交给的任务，她只有服从。应该说，在毛泽东身边的十年，贺子珍是个称职的生活秘书，她周到地照顾了毛泽东的衣食住行，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让他生活得好一些。在左倾路线的折磨下，毛泽东曾经几次病重，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是贺子珍与警卫员悉心照顾，才转危为安。贺子珍并没有满足于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这个工作，她剪报纸，负责保管前委的机要文件，尽量为党多做一些事情。

而江青这个生活秘书又做了些什么工作呢？她根本不管毛

泽东的生活，把这个任务全推给警卫员去管。曾志曾经讲过一件事：1957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开过以后，毛泽东组织了反右的辩论大会，辩论林希苓的观点。毛泽东让曾志参加辩论会，回来向他汇报。曾志向他汇报时发现，这时已经是6月份了，毛泽东仍然穿着毛裤，而且毛裤的边已经破了。曾志奇怪地问：

“你怎么还穿毛裤？”

毛泽东无奈地回答说：“没有那个关心我。”

在1955年、1956年，毛泽东两次到广州，都要求曾志替他做点衣服。他说：“你看我身上衣服没有了，你替我想个办法吧。”

这时毛泽东的身材已经变宽，他本来就比较高大，又大又宽的衣服外面买不到，只能特制。曾志找到针织厂，为他特地织了两套衣服和一些便裤，这才为毛泽东解决了困难。而这些工作，本应该是江青的事，她却撒手不管。即使她是同毛泽东一起南行，她也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她是个失职的生活秘书。

后来，她被列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排在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之后，她的任务是每天看两本大参考。她不用剪报，干这些琐碎的事，但她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工作，总觉得自己是大才小用。她借口身体不好，游手好闲，跑遍名山大川的疗养胜地，小病大养。

解放以后，贺子珍没有工作，不是她不想干，而是不让她去干。她曾经多次到上海市委的组织部，要求分配工作，但是她从来看不到市委的负责人，接待她的总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一次，贺子珍把窗户纸给点破了：

“你们是怕影响不好吗？毛主席在北京做他的主席，我在上海做我的工作，这能影响他些什么呢？”

但是她得到的仍然是不置可否的回答。

贺子珍心里明白，她实际上是处在被控制、被软禁的地位。几十年不让她做工作这是江青搞的鬼。她在上海有她的心腹，她差不多每年都要往上海跑，贺子珍的情况她一清二楚。她是不会轻易放过贺子珍的。

至于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不工作，躺在功劳簿上享福，这完全是江青造的谣。贺敏学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淞沪等重大战役。在建国后，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开始他在上海担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以后又到大西北支援三线建设，后来分配到福建，担任副省长的职务。

至于贺子珍后来在上海的住房比较宽敞，这并不是她伸手要的，是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安排的。一个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战士，住房宽敞一些，又有什么可指责呢？江青到处为自己盖豪华的别墅，挥霍国家大量的钱财，贺子珍同她相比，不是有天渊之别吗？

至于说，贺子珍是个不懂得毛泽东政治生活的人，李敏更是不能同意。在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排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贺子珍没有演出“姬别霸王”，始终相信他，追随他，照顾他。贺子珍正是懂得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重要，她从来不干扰毛泽东的工作，从不刮“枕边风”，说三道四，以个人的好恶议论干部的短长，这是所有与贺子珍接触过的干部都公认的。贺子珍也没有利用过她的特殊身份，作威作福，谋取个人私利，给毛泽东添过麻烦。相反，她总是作为革命队伍中普通的一员，体察民情，了解干部的困难和工作中的问题，及时向毛泽东反映情况，这些都有助于毛泽东制定正确的政策。

而江青则是野心勃勃的。毛泽东说过：江青嫌他这棵大树

遮了她的荫，让她发挥不出来。她利用了文化大革命林彪的力量，一步一步走上了最高的权力机构，成为了“四人帮”之首，把国家和人民推向了深渊。当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以后，人们更看到贺子珍品德的高洁，更加怀念她，赞颂她。大家认为，贺子珍在政治上比江青好得多，对毛泽东的理解也深得多。人们还叹息地说，当年如果贺子珍不走，毛泽东与贺子珍没有发生婚变，江青爬不上这个位置，文化大革命会不是这个样子，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老干部遭到迫害了。

毛泽东说，我们家有三派

在西瓜诗的风波发生以后，江青对李敏的不满表面化了。如果说，过去只有表面热，那么现在连这点表层都不存在了。她夸奖李敏的话越来越少，批评的话越来越多。她抓不到李敏别的东西，所有的责难都围绕一个“倔”字。

周末是毛泽东全家团聚的日子，吃晚饭的时间定在晚七点。有一次，时间到了六点三刻，全家人都到了，唯独毛远新还没来。毛远新在一〇一中学读书，学校靠近颐和园，要倒几次公共汽车才能回家。年幼的李讷喊肚子饿了，吵吵着要吃饭。李敏说，远新哥哥还没有回来呢。李讷不管，一定要提前吃饭。江青心疼女儿，坐到桌子边了。毛泽东也顺从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三个人开始用餐。唯独李敏不肯吃，她说：哥哥还没有回来呢。毛泽东看了李敏一眼，没有说话，在慢慢地吃饭。江青不满意了，挑起她那弯弯的眉毛，撇着嘴说：“瞧你那个劲，脾气就那么拧。”她一边吃一边不断地唠叨。李敏还是不肯吃。到了七点正，毛远新气喘吁吁地赶回来了。他是因为倒车不顺，回来晚了。直到这时，李敏才肯坐到桌旁来。

在毛泽东的家里，除了毛泽东、江青、李敏、李讷、毛远新外，还有一个家庭成员，这就是江青的姐姐。她仗着妹妹的气势，常常拨弄是非，搅得家庭不得安宁。她爱在江青的面前打李敏的小报告，而这些话又通过江青的嘴，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回国以后，李敏根据爸爸和妈妈的意见，努力学习中文，而且一本一本地阅读中外名著。有时候，她也爱看小人书，特别是绘画水平比较高的小人书。这本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到了江青姐姐的嘴里，就变成了，李敏不爱读书，尽看小人书了。毛泽东对一般的闲言碎语是不大理会的，他知道江青的禀性。但是李敏尽看小人书的话他听进去了，他爱李敏，希望她的中文水平快快提高，如果不读书，老看小人书，是会影响汉语的阅读能力的呀。于是毛泽东见到李敏后，就关切地问道：

“娇娇，你是老看小人书吗？”

“没有呀，我只是偶尔看一点。”李敏说的是实话，她待到，这准是有一次江青的姐姐看到她的书桌上放了一些小人书，去汇报了。

“这就好。看一点不要紧，换换脑筋是可以的，主要还得多读书。”毛泽东的口气很温和，没有一点责备之意。他可能已经发现自己对听来的闲话轻信了。

在东北的时候，贺子珍看到李敏的中文水平太低，曾建议李敏写日记，锻炼文字能力。李敏因认不得几个中文字，没有办到。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听到贺子珍的这个建议，觉得很好，就买了两个黑色硬皮笔记本，一本送李敏，一本送李讷，让姐儿俩记日记。毛泽东用毛笔在笔记本的首页上亲自写上“李敏的日记”、“李讷的日记”的字样，鼓励她们把每日的重要事情、重要心得写上。

李敏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中文字认得了不少，她也想通过记日记，学习写作文，把自己的思想用文字表述出来，因而对写日记，积极性很高。她觉得爸爸送的日记本不够漂亮，特地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一本带有插图的精美日记本，兴冲冲地开始写起来。

李敏的日记，就放在卧室自己的书桌里，并没有上锁。她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觉得有上锁的必要。但她毕竟是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女，心中朦朦胧胧地觉得有一种异样的感情，这些可能在日记中有所流露了。

有一天，她发现，在江青的姐姐进过她的屋以后，她的日记本不见了。过了多半天，又悄悄地放回来了。不久，江青讲话常常话外有音，什么人倒不大，心倒不小啦，什么字还认不了几个，还谈恋爱了。

李敏一听，就知道江青说的是她了。江青肯定看了她的日记了，而且肯定认为日记中有问题了。清清白白、坦坦荡荡的李敏，觉得受到了污辱，她白皙的面孔因恼怒而变得通红，她真想跟江青大吵一架，以洩心头之恨。但是她用极大的自制力抑制了自己的情绪，一言不发，转身回到房里，把那本心爱的日记本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里。李敏觉得好伤心，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自从江青大闹西瓜诗后，妈妈不再来信了。李敏写的都是得不到回音的信，思想感情得不到交流，写信的情绪也低落了。还有，她怕她的信再惹事，给江青抓住把柄，整她的爸爸妈妈。以后她写信，都是用最干巴、最直接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力求准确，不流露感情，现在，连日记也不再写了，练笔的机会更少，她的笔写起来更涩了。至今，她还懊丧地说：

“妈妈要我不忘俄文，学好中文，我并没有按妈妈的要求去做，却是按照江青的要求去做了。我要是读了妈妈写给我的诗，说不定来了情绪，也会学写诗呢。”

可能，李敏谈恋爱之类的话已经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了。有一次，毛泽东问李敏：“怎么不写日记了？”

李敏默不作声。从来不在爸爸面前告状的她，仍然不说别人一句坏话。

毛泽东没有再追问，只是感叹地说：

“我们家有三派，有左中右，我同你是一派呢。”

李敏感激地望着爸爸，她知道，爸爸是理解她的，她得到了安慰，也释然了。

毛泽东说他们家有三派，有左中右，这句话，不仅李敏听到过，他还同身边的人，包括中办的负责人也说过。

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未破裂，江青倒是说对了。因此，她尽管心里恼恨，但又不得不面对他们之间的未了情谊。

十六、父女情深

要女儿读破万卷书

毛泽东的工作很忙，父女俩的作息时间又不一致，加上李敏住校，两个人难得见面。父女俩接触时间最多的是在暑假，李敏可以不上学，整天在家，有时还能跟随爸爸到北戴河、与爸爸一起游泳散步。

但是，毛泽东再忙，总是亲自过问李敏的功课，关心她的成长。

一般的女孩都喜欢文科，李敏却喜欢理科，她的中文水平一直很差，她最怕上语文课，特别是语文测验和写作文。语文测验的成绩常常不好，有时是因为没把测验题看懂，有时是题目倒是看懂了，却不知怎样准确地把答案写出来。作文更令她头痛，她脑子里想得好好的，写出来却成了另一回事。李敏自认自己的感情是比较丰富的，但无法用手中的笔直抒胸臆。她喜欢数学，那是因为数学的公式明明白白，直截了当。但李敏做应用题就不行了，应用题是用文字来表述的。李敏对文字的理解往往错误，演算和答案也就跟着错了。在考试时，应用题都是大题，一道题错了，一、二十分就丢了，于是李敏常常是考试不及格的数学爱好者，这使她非常苦恼。

毛泽东重点帮助李敏提高中文水平。到了暑假，毛泽东常常请来两位老师，语文老师帮助李敏补习语文，数学老师则帮助李敏补习数学。

毛泽东领着李敏走进他的书房，指着屋里的一架架书说：

“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你要突破语文这一关，得下个决心，一架书一架书地去读，读完一架读另一架，你会有进步的。”

毛泽东随手拿了一本书递给李敏，这是一本《西游记》，为了提高李敏阅读的兴趣，他还讲了几段故事给她听。毛泽东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是用一种赞美的口吻描述孙悟空造玉皇大帝反的经过的。

毛泽东还指导李敏读《红楼梦》。李敏惊异地发现，爸爸的记忆力竟然那么好，《红楼梦》中的好多段落，他都背得出来。林黛玉所写的诗，他全部能背下来。原来毛泽东看《红楼梦》不下五遍。

毛泽东还希望李敏学点古文。他说，这对于提高文字的逻辑力和表达力有好处。可是李敏觉得，这对她来说就更难了。

在爸爸的支持下，李敏开始有计划地阅读世界名著。她先读的是巴尔扎克的作品，把“人间喜剧”几乎读了一遍。她打算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读下去。李敏的读书计划是在课余进行的，她必须先完成学校的作业，才能够读课外的书。因此，她的读书计划只有在假期中才能进展得快一些。

毛泽东是个极爱读书的人，他也希望自己的女儿爱书。他给李敏设计的读书计划，不仅有文学的，还有政治和历史方面的。毛泽东曾鼓励李敏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都读一遍，提高马列水平。他还希望李敏读点中国的历史书籍，如《史记》、《汉书》等。汪东兴听说了毛泽东为李敏开

的这张书单，为了鼓励李敏学习，特地送了她一套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史记》和《汉书》等书籍。这些书，李敏至今还保存着。

李敏把课余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了。周末回家，她还要把从学校图书馆借的书带回家阅读，星期天再带回学校。毛泽东有时步入李敏的房间，看到桌上放着书，总要走过去翻翻看看。碰上一两本他感兴趣的，就拿去看了。

毛泽东读书有个习惯，就是边读边写，喜欢在书上作眉批，写下自己的观感和评语。有一次，他读李敏借来的书，兴之所至，提笔竟在书上批了一段文字。李敏把书拿回来一看，急了，公家的图书是不许涂写的，爸爸在书上写了字，违反了规定，书怎么能还呢，说不定老师要让赔书呢。借书日期到了，李敏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还书。好在同时还的书比较多，老师检查不仔细，“蒙混”过了关。至于毛泽东批的是哪本书，写了哪一段话，李敏已经记不得了。

毛泽东只要有时间，喜欢检查孩子们的作业。他重点看的是李敏的作文本。毛泽东看出其中哪些句字有语病，逐个给李敏指出来，而且告诉她，怎样写更好。

李敏喜欢体育课，有的运动项目成绩还不差。为此，江青曾夸张地说李敏有运动天才，说要送她到业余体校去受训。当然，这是江青从来不打算兑现的一句空话。

有一次，李敏在上体育课时崴了脚，造成右腿骨折，肿得老粗。李敏正在养伤，又感到全身发软，没有力气。抽血一化验，是得了急性肝炎。她被送了传染病院，住了两个月医院。

李敏在医院里，好多叔叔阿姨还有同学来探望她。陈毅当时因病也住在这个医院里，李敏成了他的病友，他常常来到李敏的床前，给她讲故事，读诗给她听，同她一起玩。

在这个时候，李敏最想念的是爸爸。她想，每个周末从学校归来，毛泽东都是万分欣喜地欢迎她。到星期天下午要返校了，父女俩都觉得依依难舍。有一回，李敏心里不高兴，返校时掉了眼泪。毛泽东温情地弯下身子，抱着李敏，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轻轻地说：“你是好孩子，爸爸爱你。”李敏听话地把眼泪擦干，高高兴兴地走了。

生病中的李敏，多么希望见到爸爸。她知道，爸爸太忙，不可能来看她。毛泽东的确没有来过，但他惦记着女儿。他不时让警卫员给她捎来吃的、玩的、看的，还让警卫员了解李敏病情进展的状况，回去给他汇报。有一次，毛泽东捎来了专为李敏写的一首诗，诗是毛泽东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这是毛泽东给李敏写的唯一的一首诗。李敏读着，似乎又看到父亲亲切的笑容，感受到父亲对她深深的爱。这首诗，至今珍藏在李敏的手里，舍不得拿出来给别人看。

等到李敏终于病愈回到家。毛泽东紧紧地把她揽在怀里，欣喜地说：“你终于回来了，爸爸欢迎你。”

此时，李敏感到，她是最幸福的人了。

劝女儿打扮的毛泽东

在家里，李敏最爱爸爸，但是她能同毛泽东一起相处的时间太少了，特别是父女俩单独相处的时间更少。毛泽东越来越忙，经常周末阖家的一顿团圆饭都无法参加。李敏在星期六晚上见不到爸爸，只能盼望星期天能见到爸爸，同爸爸一起待一会儿。有时候，毛泽东连星期天都抽不出空同孩子们待一会儿，李敏只好带着失望返校，盼望下一个周末的到来了。

有一个假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李敏的卧室，说：“走

呀，我们一块出去走走。”李敏真是喜出望外，象小燕子一般飞到了爸爸的身旁。

这正是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时期，北京的郊区要兴建几座大型水库：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官厅水库。毛泽东决定到十三陵水库去视察，他知道李敏正在家，就带上女儿一起去。

能够同爸爸单独出游，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李敏兴奋极了。平时沉默寡言的她，此时话多了起来，脸上一直漾着幸福的微笑。

毛泽东一边含笑地聆听女儿喋喋不休地诉说学校中的新鲜事，一边打量着女儿。他发现，女儿长高了，长大了，从小姑娘变成了大姑娘。她已经洗尽了“洋宝贝”的洋味，衣着打扮是地道的中国女学生的模样，上下一身深蓝的干部制服。

毛泽东怜惜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说：

“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要打扮打扮自己，穿得漂亮一点，要不将来找不到对象了。”

毛泽东说完，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

李敏一听，急了，跟爸爸嚷嚷起来：“你这个爸爸，说话不象个爸爸的样子！”

毛泽东没有生气，又指着李敏的两条辫子说：

“在辫子上系上两个漂亮的蝴蝶结，人就会漂亮多了。当然，也不能打扮得太过份，别人会把你看作怪物呢。”

说完，毛泽东又是一阵开怀大笑，李敏也被爸爸逗笑了。

汽车疾驰在平整的公路上。一座由石龟背着石碑从车窗外闪过，被毛泽东看到了，他连忙招呼汽车司机停车。他同李敏下了车，围着石碑转了好几个圈，又仔细地看了碑文，他回过头来问李敏：

“小外国人，你知道王八为什么会背石碑吗？”

李敏摇摇头，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石龟和石碑。

“这里有个故事呢。”毛泽东兴致极高地对李敏说，“有一支歌子唱的就是这个故事，歌子的名字就叫‘王八卖烧酒’。”

于是，毛泽东合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曲调，轻声地唱起来：

“王八呀王八我问你，
你呀为什么驮石碑？
因为我呀卖烧酒，
烧酒里面掺了凉的水。”

唱完以后，毛泽东同李敏一起笑了起来。李敏是第一次听到爸爸唱歌。

毛泽东接着说：

“娇娇，你这个被你妈掺了凉水的烧酒，将来会不会有人要呢？嫁不嫁得出去呢？将来会不会让你妈驮你一辈子呢？”

李敏这才明白了，原来爸爸在取笑她呢，爸爸把乌龟比作妈妈，龟字同妈妈原来的名字桂圆的桂字是同音，而酒字呢同娇娇的娇字读音近似。爸爸是拿乌龟驮石碑比作妈妈驮娇娇呢。父女俩相互对视，开心地大笑起来。

汽车重新上路。毛泽东告诉李敏石龟背石碑的故事。他说，石龟背着高大的石碑，人们通常叫它王八驮石碑。其实，驮石碑的既非王八，也不是乌龟，它的真正名字叫赑屃（音bixi）。在神话里传说龙王有九个儿子，其中力气最大，性格好背重物的一个就是赑屃，它的身体似龟，头部似龙。古代的人为死者立碑，喜欢把石碑立在赑屃的背上，企求依靠它的神力，使石碑经久不倒，千秋永存。在明十三陵见到的石碑，是功德碑，就是由龙首龟身的赑屃驮着的。毛泽东还说，有的石碑上面盖

着亭子，叫做碑亭。有的石碑有几十吨重。

李敏听得津津有味。她对爸爸的博学多才从来是十分崇敬的，她常常觉得自己同爸爸之间相差太远，两者的距离连十万八千里都不止。她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无法达到爸爸的高度，这种想法，一方面使她对爸爸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感情，觉得自己的爸爸了不起，另一方面又很自卑，认为自己太差劲，不象爸爸的女儿。

事实上，毛泽东对自己子女的要求，既是很严的，也是很宽的。1989年1月19日，李讷同她的丈夫王景清在谈话中说到：

“主席对子女的要求很严，对我们一个是生活上要求很严，不许我们有一点特殊，二是政治上要求很严，要求我们政治上要开展，要进步。至于将来成了什么龙，什么凤，这点没有要求，只要我们为人民做一点工作，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这就可以了。”

李讷还讲到她的爸爸生活上对她要求很严的故事。她说：

“困难时期，我在学校读书，别人每月有30多元生活费，主席只给我20多元，连杂费都包括在内。我不够用，也不给增加。困难时期，学校有阵子把树叶切碎了放到锅里熬粥，每人还只有一碗，大家都把碗换大，象个脸盆一样，我也买了个大的蓝海碗，想多喝一点。那时，我每月只有27斤粮食，人都浮肿了。主席说，浮肿有什么关系，我们在井冈山连27斤粮食都没有吃呢。听了主席的话，我觉得也是，回到学校，要求减粮食，把27斤降到25斤。可是老师和同学都不同意，说，你降了，我们怎么办？老师说，你正长身体的时候，不能少吃，我只好作罢。以后增加了半斤，变成了27.5斤。我当时就是这样按照主席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可主席觉得这样还不够，周末回到家里，还不许我同他一起吃饭，要我去机关的大食堂去吃，

不许我有一点特殊。

“我结婚比较晚，三十好几才结婚。由于没有结婚，一直住在中南海。我大学毕业有了工资，主席就停止了我的供给，我就靠46.5元过日子，我住在中南海，可主席不让我在家里吃饭，要我到机关大食堂去吃。他说，你现在生活太优越了，以后怎么生活呢，怎么过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呢。”

毛泽东对子女的爱，的确是一种严格的爱，他对李敏的爱是深沉的，也是有政治原则的。在国家的困难时期，李敏已经搬出中南海，她不可能享受到任何的特殊待遇，她象千千万万的普通干部那样挨饿，靠机关发的一点黄豆米补充营养，治疗浮肿，她从来没有想过到爸爸那里补充一点油水，解一解馋。

同爸爸一次最严肃的谈话

李敏在爸爸的身边长大，爸爸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一生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她。她小小年纪就开始有了政治的要求。

这是五十年代青年的特点。李敏已经上中学，她象那个年代的青年那样，热衷于阅读理想、人生观一类的政治书籍，开始思考有关人生的课题。她不断问自己：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我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在她所读过的书籍中，她最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喜欢他说过的几句话：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年华的虚度而悲哀，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可以无愧地说，我整个的生命已经贡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

李敏对自己说，我也要把我的青春，我的生命贡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

五十年代的青年，崇拜英雄，敬仰英雄，学习英雄。李敏也不例外。她相信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在共产党员身上集中了人类最美好的品德和理想。她崇敬在她周围的共产党员，特别是父辈的老共产党员。她觉得，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时代的英雄，是她学习的榜样。要做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人，成了她的人生目标与追求。于是，她产生了入党的要求。

然而，她怀着很深的自卑感。她看到她所在的班上，申请入党的同学个个都是品学兼优，功课名列前茅。而她的学习成绩比较差，她自己觉得还达不到共产党员的标准。她想入党，又怕水平不够，内心矛盾着，斗争着，十分苦恼。她写了入党申请书，却不敢递上去；她想找班上的党员谈一谈，又不敢开口，最后她决定回家找爸爸，让爸爸帮助她。

于是李敏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最严肃的谈话。

她星期六回到家，找到爸爸，鼓足勇气地说：“爸爸，我要同您谈话。”

毛泽东同李敏在一起，相处一向随便、自然，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严肃的场面，今天看到李敏这种神态，他有点意外，随即放下手中的笔，抬头看看站在书桌旁的李敏，轻轻地说，

“你想谈什么？”

“我想入党。”

“你为什么要入党？”毛泽东对李敏的入党要求没有表态，却反问了一句。

李敏以为，爸爸听到她想入党的要求，一定会满心欢喜，热烈支持，没想到爸爸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她感到失望，还有点不满意，而且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才能表达清楚她申

请入党的要求。她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满脸的不高兴，一本正经的表情消失了，噘起了小嘴说：

“您这个爸爸不象个爸爸，人家的爸爸都是鼓励儿女争取入党，您到好，没说一句鼓励的话，反倒问起我为什么要入党起来了。”

看着女儿生气的样子，毛泽东不由得笑起来，他和颜悦色地对李敏说：

“问问你为什么要入党有什么不对呢？我这不正是在帮助你吗？你的哥哥毛远新要入党，来跟我谈，我也是这样问他的。一个人加入共产党，首先要明确为什么入党，端正入党动机。”

李敏这才明白，原来爸爸已经不是用爸爸的身份在同她谈话，而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同要求入党的年轻人进行谈话。以后她上了大学，真要参加到党的组织的行列了，在入党前夕，党委的同志同她谈话，第一句也是这样提问：你为什么要入党？在随后申请入党的过程中，李敏也不断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入党？

接着，毛泽东告诉她，做一个共产党员要具备哪些条件，共产党员有什么义务和责任。他还回答了李敏提出的问题：功课不好的人能不能入党。

李敏从爸爸的谈话中，明白了这个道理，看一个人够不够入党的条件，要看他的学习和工作的表现，更要看他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她认真思考了爸爸的话，并对照反省了自己。她觉得，她虽然想入党，但还不具备入党的条件，自己还太幼稚，在一些方面不能起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于是，她把入党申请书放进抽屉里，把这个愿望埋在心底，用行动创造入党条件。直到上了大学，她觉得自己成熟一些了，才重新写了入党申请书，参加到党的光荣的行列来。

十七、毛泽东的感情世界

不能忘情于贺子珍

自从江青大闹西瓜诗之后，毛泽东虽然从来没有在李敏面前提起过这件事，评论过这件事，就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般。但是，李敏却敏感地发现，在他们父女单独相处的时候，爸爸更加频繁地提到她的妈妈贺子珍，而且这已经成为父女见面时最重要的话题了。

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论贺子珍的身体，她的疾病和她的孤独。说到难过处，两个人都长吁短叹，李敏发现，爸爸的心情比自己还沉重，他对妈妈的怀念比自己更深切。

每当传来贺子珍的病情有所反复的消息，父女俩见面的话题更是绝大部分都涉及贺子珍了。想到妈妈那样受苦，李敏有几次想责备爸爸几句，不该同妈妈分手，不该同江青结婚。但她终于没有出口，每次都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爸爸的后悔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事了，老一代人生活动荡不定，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又有谁能给予公正的评判呢？后一代人又怎么能够理解得了呢？

毛泽东与李敏单独相处时，常常同她谈贺子珍的过去，告诉李敏她的妈妈年纪很小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他讲过贺子

珍小名桂圆的由来，说他喜欢这个名字，过去给贺子珍写信，常常呼她的小名称她桂妹。在去十三陵水库的途中，毛泽东用乌龟的龟字，隐喻贺子珍的桂字，同李敏开了个玩笑妈妈驮娇娇以后，他们父女俩就常常用桂字来代表妈妈了。他们思念贺子珍到这种程度，连带着与贺子珍小名同音的事物，他们都爱，以此寄托他们对贺子珍的想念。

有一次，一位外国朋友送给毛泽东一盆黄玫瑰。黄玫瑰是玫瑰中最名贵的品种，毛泽东非常喜欢。但他没有把黄玫瑰留在自己身边，而是送到李敏的屋里。他们俩没有说一句话，但都心领神会，倍加钟爱这盆美丽的玫瑰。玫瑰的瑰字与贺子珍原来的名字桂圆的桂字是同音。看着这株玫瑰，父女俩就想起了远在南方的妈妈，似乎与贺子珍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

李敏爱花，她在房门口种了很多花，其中有玫瑰花，有白玫瑰，也有红玫瑰。她用玫瑰花来寄托对妈妈的思念。当李敏上学去时，总要先请警卫员叔叔替她浇水。下午两三点钟，毛泽东起床，在院子里走动，总要在李敏的花坛门前站一会儿，看看玫瑰花生长的情况，有时还亲自为这些花浇水。

有一次，毛泽东把李敏叫到跟前，递给她一包东西，说这是专门买来送给她的。李敏拿回房间打开一看，原来是两个细瓷五寸碟子，开始，李敏思索了好久，不明白爸爸为什么送她两个碟子，而且没有杯子配套。她拿着两个盘子左看右看，突然醒悟了，盘子的边上画的全是红玫瑰，爸爸正是因为这碟子画有玫瑰，才特意送给她的。李敏的心头不禁一阵发热，从心底发出呼喊：妈妈，您知道爸爸和我多么想念您吗？

毛泽东除了在李敏寒假探亲时，给贺子珍捎去各种食用东西外，有时候他认为有必要，也会直接派身边的工作人员给贺子珍送东西。这些东西中，有吃的，有用的，有时是钱。他知

道贺子珍烧坏了一台收音机，就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给她。有一次，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贺子珍送去一千元钱。贺子珍用这些钱买了许多日用品，送给井冈山时期掩护过她的乡亲。毛泽东劝贺子珍戒烟，贺子珍戒了。可是有一回，外宾送给他一条外国名牌香烟，他打开了一包，抽了一半，突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那九包未开封的烟，连同那抽过的半包，一起包好，派人送给贺子珍。贺子珍收到烟后，原来已经戒了烟，又抽起来了。

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旧情难舍，这是连江青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他不仅在李敏的面前，流露出他的感情，而且在他的老战友的面前，也毫不隐晦地表现出来。

毛泽东对贺子珍缕缕割不断的柔情，就在他们分了手，毛泽东与江青成为夫妇不久，就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1988年5月19日，李六如的夫人王美兰曾经讲过这段话：

“我是1939年去苏联治病的，曾经同贺子珍在一个宿舍里住了一年多。

“我未去苏联之前，在毛主席的秘书处工作，管报纸和文件。毛主席常常到我那里去看看。贺子珍是1937年走的，毛主席几次派人请贺子珍回来，贺子珍不肯回来。那年的春节，毛主席过得很孤单，除夕那天，是他同李六如和我三个人一起度过的，他的情绪并不好。

“以后江青以向毛主席请教的名义，不断去找毛主席，他们的关系就发展了。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关系还未完全公开和确定。有一次，有一个国民党的代表来到延安，毛主席请他吃饭，让李六如和我作陪，还有江青也参加了。毛主席对客人介绍说，这是江青同志。他并没有点出是他的爱人。客人走了以后，我们四个人走出窑洞散步。毛主席同李六如走在前

边，他们一边走一边商量着什么事，我同江青并排走在后面。江青沉默着，我觉得很难受，就随便找句话来说，你是哪里人？结果她回答说，我是中国人，明显地表现出她的傲慢和不友好。这个人的狂妄自大，瞧不起我们这些土包子，从一开始就暴露得很清楚。我觉得她很讨厌，从此不爱理她了。

“我到苏联以后，贺子珍的儿子已经死了，她已经知道毛主席与江青的关系了，她很伤心，经常早上起床时，眼泪将被子湿了一片，我很同情她，经常劝慰她。我还曾经天真地劝她赶快回去，趁毛主席与江青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确定，把江青撵走，贺子珍摇摇头。她已经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回国时，她不打算走，决定留在苏联。她说，你见到主席，请代我向 he 好吧。我答应了。

“我回到延安，就去见毛主席。我同毛主席讲了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形，告诉他那个小儿子七个月就夭折了。毛主席那天的情绪本来很好，听了以后，马上变得很低沉，长长地叹了口气，半天不说一句话。

“这时江青在旁边，不断地打岔。听到我讲贺子珍，满脸的不高兴，一撇嘴，一扭腰，进里屋去了。李讷在屋里玩，她刚刚学会走路。

“毛主席平时对我很客气，很尊重的。这次，他沉默了一会后，竟自己起身进卧房去了，把我一个人撂在那里。我理解毛主席的心情，不怪他，他心里太难过，又不愿在别人面前过于流露，就走开了。后来，警卫员告诉我，每晚毛主席都要办公到第二天清早，唯独那天早早就睡了。

“毛主席是个重感情的人，他虽然再婚了，但仍然惦念着贺子珍，这是很明白的事。”

曾志同志在1988年5月16日的介绍，进一步揭示了毛泽东

在对贺子珍与对江青的关系中存在矛盾与复杂的态度。她说：

“毛主席多次同我讲过他对贺子珍的想念。这些话在我1939年到达延安的时候，在他同江青结婚后不久就讲过了。他爱说，我们是十年夫妻了；是有感情的。他还曾经细细地同我描述了他同贺子珍夫妻生活的一些细节。他讲过，他同贺子珍两个人到茅坪河抓鱼时的情形。那时什么捉鱼的工具都没有，两个人光着脚，站到了河的中央，看到有鱼游过来了，就用手去抓。有时候还真逮着了一条两条笨鱼，两个人高兴得笑起来。

“毛主席还同我讲过，他同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想一起出去散步，但又怕大家议论，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是他们采取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策略’，这就是行走到有老乡或战士居住的地方，两个人就拉开距离，一前一后地走；来到偏僻的地方，两个人就肩并肩地走。

“每次，毛主席都是怀着很有兴味的心情回忆这些往事的。看得出来，毛主席是留恋他同贺子珍的这段生活的。

“毛主席对贺子珍以至后来对江青，都很照顾。他比贺子珍年长十几岁，对贺子珍象大哥哥对小妹妹，贺子珍有一些任性，但只是在毛主席的面前是这样，对待同志，贺子珍是非常热情、关心和得体的，从来没有耍过威风，摆过什么架子。

“毛主席比江青大得更多，他对江青不仅是照顾，有时是迁就了。毛泽东把自己的警卫员给她，让老警卫员去照顾她。可是江青对人太厉害，对护士、工作人员、警卫员都不好，不把他们当人。警卫员小李不知怎么惹她不高兴，她竟然伸手打了人家一记耳光，还罚站，不许动。医生开收音机听音乐，声音大一点，她就歇斯底里地叫嚷：“你想把我弄死呀。”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怕她，看在毛主席的份上，迁就她。江青在

广州居住时，我不得不老做调解工作，劝慰大家忍耐一点。

“1953年，江青同毛主席一起来到广州，她的派头比毛主席大得多。在五十年代，还没有毛主席专门的别墅。省委有三套房子留给中央的首长使用，毛主席就住在其中的一套。毛主席只占用其中的一间房子，吃、睡、开会全在那里，屋子的正房及其他房间，江青全占了，是毛主席让给她的。后来觉得在那里住着不方便，搬了个地方，好房子仍然是江青住的。毛泽东迁让她，可能是怕她吵吵闹闹，影响不好。他们走的时候，毛主席是坐火车走的，江青却要标新立异，坐飞机走。她是我行我素惯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在五十年代，江青差不多每年都要到广东来住几个月，她每次来，大家都觉得特别受罪。我为了尽地主之谊，不能不去看她，每次都是小心翼翼，怕她不高兴。她1955年从苏联治病回来，更加神经质，不能听到一点声音，听到什么声音就会全身出汗，头皮发麻，精神紧张。我开门走进她的屋里，门不能发出一点声音，走路不能有一点声音，连衣服碰衣服，两条裤腿磨擦都不能发出声音，说话更得轻轻的，不能把她吓着了。她有时候留我吃饭，这就更糟，调羹、筷子、碗碟不能有碰撞声，吃饭嚼嚼，也不能出声，因此嘴不能张开，只能够象征性地吃一点，回家再吃。陪她吃饭的护士、工作人员，从来就没有吃饱过，回头都得重新吃。

“她吃饭也很难伺候。菜咸一点、淡一点，油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吃鱼一定要吃什么鱼，其他的鱼不吃，鱼还要按照她规定的方法去做。她吃鸡，要用四只鸡炖成一碗汤，就这么讲究。

“她的威风摆到这种程度：她晚上睡觉，她住处附近有条河，河上一律不让船走动，说船上发出的声音吵了她，在她住

处的附近，有两家工厂，不时传出敲敲打打的声音，这也不行，硬逼着把两个工厂迁走。她甚至提出，她睡觉的时候，鸟都不能叫，让工作人员站在院子里替她赶鸟。她霸道成这个样子。

“她这个人还贪婪、自私。她到广东后，做西服，买三千多元一架的进口照相机，都不付钱，是警卫局替她付了钱。毛主席来广州，有时查问这些事，一个警卫局的副局长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很生气，批评了江青，用自己的稿费还了债。江青不高兴了，从此就不来广州了。

“对于江青的这些毛病，毛主席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他很生气，常常批评江青，不愿意同她一起生活，但很多时候是无可奈何。”

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吵架的事，曾志是这样看的。她说：

“毛泽东与贺子珍吵架的事，这是有的。有一阵子我们家同他们家住得很近，只隔一个天井。他们两个人在灯下看书，你说我一句，我动你一下，也会打起来，但是第二天就好了，没有相互不理睬、不讲话的事。

“要说毛主席与贺子珍有不一致之处，那么，毛泽东与江青的不一致就更大更严重。江青动不动就吵架，发脾气，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

江青曾经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她与毛泽东是政治夫妻，她说：“主席与我年龄相差那么大，要不是政治原因，怎么可能成为夫妻呢。”言下之意，她同毛泽东做夫妻，完全是因为看中了他党内的政治地位，并不是因为有爱情。她想以此贬低毛泽东，却暴露了她为了达到往上爬，当毛主席夫人的目的，不惜出卖自己的丑恶嘴脸。她在建国以后作威作福，这并不是条

作环境变化了，人才变坏的，而是从她接近毛泽东时起，这就是她向往追求的目的，这个目的果然实现了。

曾经跟随过毛泽东长征的郭化若同志，是亲眼目睹过毛泽东与贺子珍、毛泽东与江青吵架的一个人。他曾经把他们的吵架作过比较，他说：

“毛泽东同贺子珍在延安时，的确吵过架，延安就那么巴掌大块地方，谁家吵架还能瞒得了谁？他们有时吵得还很凶。有一次，毛泽东开会回来，要吃饭了，一眼望到桌上的一碗辣椒不见了。他一面洗脸，一面问贺子珍，辣椒哪里去了。贺子珍回答说，倒掉了。毛泽东登时火起，把脸盆带水向贺子珍摔过去，贺子珍赶快跑掉了，到晚上才回来。当时在延安，生活还是很清苦的，能吃到辣椒，就很不错了。毛泽东爱吃辣椒，舍不得吃掉，一天只吃一点，几天下来，辣椒已经变味了，贺子珍怕他吃坏肚子，倒掉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却吵起架来了。其实贺子珍的回答虽然简单了一点，没把为什么倒掉的原因说清楚，但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毛泽东好，怕把他的身体搞坏了。

“而江青则不同，她跟毛泽东吵，是要达到控制利用毛泽东的目的。江青在上海滩有一段不光彩、不清楚的历史，她怕审查过不了关，要毛泽东出面为她说话，毛泽东不干，她就哭哭啼啼，大吵大闹，弄得鸡犬不宁。”

在毛泽东与贺子珍发生婚变，特别是与江青结婚以后，人们对这三者之间关系有过种种议论和猜测。同情贺子珍的人认为是江青“插足”造成的；不喜贺子珍的人则说是贺子珍狭隘落后，毛泽东不要她了。当然也有人对毛泽东有非议的。

当事人对此事是怎样认为的呢？

贺子珍从1937年离开延安，到1984年去世，她从来没有说

过一句毛泽东不是的话，她总是责备自己：“是我不好，我当时太不懂事了，我太任性了。”她承认毛泽东多次动员她回来。

毛泽东对曾志说过一番肺腑之言，表述自己的心迹。他说：

“贺子珍是在我们吵架之后走的。我派特务员（当时警卫员称特务员）去截她，劝她回来，她说什么也不肯回来。特务员不肯放她走，她就在一条手巾上写了与我诀别的话，让特务员带回来。她的这封诀别信，现在还保留在我的文件箱里呢。”

事情比较清楚了，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看中了江青抛弃贺子珍，而是贺子珍执意要离开毛泽东。江青走进毛泽东的生活，是以后的事情。

对江青复杂的态度

对于贺子珍与江青，毛泽东也曾经作过比较，并且对人谈过他的看法。

毛泽东几十年来念念不忘贺子珍，可以说是旧情难舍，这是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的。生长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毛泽东，他的思想感情，生活方式，都带着韶山冲浓重的乡土气息与烙印，他虽然走南闯北，饱读诗书，开创了新中国的天地，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成为了亿万人民仰慕的伟大导师与领袖，但他终究是个农民的儿子。来自乡土的贺子珍，虽然文化比较低，幼稚单纯，与他的丰功伟绩无法相比，但她的执着与善良，她的气质与性格，与毛泽东却是有相通的与一致的地方。特别是贺子珍对他的真挚的、始终如一的爱情，更是他所需要的和追求的。毛泽东既然也是普通的人，他需要去爱和被人爱。贺子珍满足了他的这个要求。而这些，他在江青那里是得不到的。

江青年轻美丽，能歌善舞，还带着上海电影明星的头衔，出现在延安这个小小的城镇上，引起轰动的效应，是很自然的。她的确有才华、有魅力，这些都容易使人眩目。毛泽东是非常爱才的，他在与江青的交往中，肯定会发现一些在他与贺子珍的交往中所没有的新的乐趣，这又会使他感到兴奋。在他还没有透过江青的外表看清她性格与品质上严重缺陷时，就同她迈入了婚姻的殿堂，使他虽然后悔却无力改变这一切。他曾对卫士长李银桥表白过他当时同江青结婚是草率了。这草率的一步使他尝尽了婚姻的苦果。在他同贺子珍在庐山会晤之后，他曾经对女儿坦露过他的婚姻的痛苦。他对李敏说过：“江青不爱我，她嫌我老了，是个土包子。”江青的高傲与冷漠，更使得毛泽东怀念平凡、纯真的贺子珍。即使贺子珍不复美丽，百病缠身，甚至精神异常，但那灼热的情爱，仍然使他难以忘怀。

然而，他同贺子珍之间毕竟存在文化水平上的差异，精神境界的差异，他们之间又会存在一定的隔阂与不理解。毛泽东是个大才不拘小节的人，他可以对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命运落泪，但他不一定理解自己的妻子默默无闻的奉献与牺牲，体会到一个女人十年生六个孩子从精神到肉体的痛苦。他用不生育的或者少生育的延安有才干的女干部的标准来要求贺子珍，又会觉得她终日围着孩子、炕头转，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目光短浅，毛泽东同贺子珍一吵架，就说她“你政治上落后”“你思想不进步”，这些都深深地刺伤了贺子珍的自尊心。贺子珍堵着一口气要上抗大学习，要去苏联学习，这不能不是一个原因。

毛泽东可能就是这样认为的，贺子珍好，是因为她是他生活上的伴侣，满足了他情感的需求，仅仅如此而已。因而他曾经直言不讳地对曾志说：“贺子珍对我政治上没有帮助，江青在政治上对我有帮助。”这句话从一个侧面——也就是政治这

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先后两个妻子的看法。

毛泽东对贺子珍的念念不忘，可能更多地是感情上的眷念。他本来就有较浓厚的怀旧情绪，他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都有念旧之情，舍不得他们离开，对于曾经做了十年夫妻、相濡以沫的贺子珍不能忘怀，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只把贺子珍作为生活的伴侣，并不认为贺子珍对他政治上有帮助。这个看法，不仅导致了他对贺子珍认识上的偏颇，而且影响他对江青的认识。

毛泽东对江青是有认识的。1990年10月30日，汪东兴同志在谈话中讲到：

“主席说过，江青没有什么本事，只会讲吃讲穿。她就象一杯水，还不是一杯清水，而是黄河的浑水，半杯子浑水，幌来幌去。

“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就骂过江青是政治流氓。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江青放出来，不是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用军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的形式把江青抬高。她要进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都不是毛主席的意见，是有人抬轿子，林彪是一个，但一个人是抬不起来的；还有另外的人，康生是文革小组的顾问，陈伯达是组长，把她抬出来的渠道是畅通的。毛主席原来一直压着不让她出头，文化革命中把她抬为第一副组长，主席手一松，就不可收拾了。”

然而，毛泽东的手为什么会一松呢？是不是同他认为江青是有能力的人，对他政治上有帮助有关呢？从文化革命中毛泽东给江青的几封信中看出，毛泽东把江青看作是可以进行政治交流的人，写信给她谈对林彪的看法，江青以此作为她攫取更高权力的政治资本。同时毛泽东对江青的作风、野心又是深恶痛绝的，用最严厉的语言批评她，反对她组阁，指出她搞

“四人帮”，甚至连面都不想见她，这又表现出毛泽东对她的极其反感。江青召见美国女记者维克特，要维克特为她树碑立传。当毛泽东听到美国要出版这本写江青的《红都女皇》时，非常生气。这件事情对他打击很大，他一下子不能走路，唾涎直流，加重了病情。文化革命的后期，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也越来越多，相反，对她的好话越说越少，这是否同毛泽东对江青政治上的看法越来越准确有关系呢？

毛泽东的最后一名护士小孟在回忆录中，写了一段毛泽东谈江青的话。他说：

“有人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言过其实，说过了头嘛。不要说一句顶一万句，就算一句顶一句，有时也办不到呐。我说要把有的人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硬是撵不动，分不开嘛！”

他说有的人是指江青。江青几次要求见毛泽东，他都是表现出反感，摇摇头，不放江青进那个大铁门。

他还曾经说过：“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和江青离婚的消息会怎么样？”他又自问自答：“离摇，我到哪里去起诉哟！离婚总要办个手续吧，到那时，不知道是法官听我的，还是我听法官的。那可能要大大热闹一番。总有一天一了百了，统统解决。”

这段文字，清楚地表现出毛泽东直到晚年，重病在身，仍然萦绕着思考着他与江青的婚姻问题，他对这个婚姻越来越不能忍受了。他曾经想过要将江青撵出政治局，与她分道扬镳，而碍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无法办到，这使他万分痛苦，只能企求在自己去世后，做到一了百了，这是多么孤寂、哀伤的心灵的倾诉啊！

事实上毛泽东并不是到晚年，在江青在文革中作了充分的

表演后才产生离婚的念头。在建国以后，他就说过了：我要同江青离婚，全国人民会怎么看呢？何况，江青无大过，怎能这样做呢？他只能默默地忍受这桩婚姻带来的痛苦。

毛泽东是为了政治，为了社会影响才维持同江青的夫妻关系的。这是他作为领袖人物的为难之处，也使他的感情生活涂上了悲剧色彩。

与贺子珍和江青都有很多接触，而且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曾经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认为贺子珍在政治上对毛主席是有帮助的。作为一个领袖的夫人，党对她的要求就是照顾好领袖的生活，遵守纪律，全力支持领袖的工作，不干扰他的工作。在这方面，贺子珍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她从来不以个人的好恶在毛泽东面前对老干部说三道四，刮枕边风。因此，她从苏联回国后，虽然她什么身份都没有，大家仍然很尊敬她，称她贺大姐。

“江青则不同了。她这个人不仅生活作风霸道，自私狠毒，不好好照顾毛主席的生活，而且常常干扰主席的工作。有一个时期，毛主席让江青同田家英一起担任秘书工作，但是江青处处不合作，闹矛盾。没办法，毛主席只好说你别的事不要管了，每天就看两本大参考算了，上午一本，下午一本。可是江青连这个工作也不好好做。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毛主席的干扰就更大了，这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事。”

毛泽东为他最后一次婚姻的失败而苦恼，他可能没有想到，这次婚姻的错误不仅给他个人的生活带来了不幸，而且给中国的人民带来了苦难。要不是我们成熟的党及时粉碎江青的反革命阴谋，由毛泽东领导和开创的中国的革命事业就要出现逆转的形势，这肯定不是毛泽东之所愿。

十八、庐山的会见

李敏不当探春

李敏一天一天在长大。

她刚上学时读二年级，李讷上三年级。后来李敏跳了两班，上四年级，这样比李讷高了一班。她在八一小学毕业后，到北师大附中读书。

在八一小学上学时，她认识了孔令华。孔令华比她高两班，是学生会主席，是学校的知名人物。李敏在学校里也很活跃，爱跳舞，还常常登台表演。孔令华长得高大英俊，是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从洲原来是杨虎城将军部下的炮兵旅长，在西安事变中作过贡献。

李敏同孔令华可以说是青梅竹马，相识的时间比较长，在共同的学习环境中，由相识到相爱。

在李敏上高中时，她向爸爸公开了这个秘密。毛泽东听了很欢喜，他说：“我一向主张儿女的婚事由自己作主，大人不要干涉。你觉得小孔好，我没有意见。”

五十年代还没有提倡晚婚，女孩子一般到20岁左右就结婚了。这对恋人也想早结连理。他们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他没有说什么，仍然表示由他们自己作主。李敏又征求妈妈的意见，

贺子珍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她对李敏说：

“你同小孔相爱，打算结婚，我赞成，但是我希望你们的婚期能拖后一年，等到你高中毕业后再结婚。我是这样考虑的，结婚以前多读一点书，对你今后有好处。结婚以后，生儿育女，杂事很多，你想再读书就难了。”

李敏觉得妈妈的话有道理，于是把婚事往后推了一年，决定1959年再谈婚事。

转眼1959年就到了，李敏即将高中毕业，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时的李敏，已经是个漂亮的太姑娘了。她用一种热烈的、充满憧憬的情绪迎接未来。

自从李敏把有男朋友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以后，他似乎一下子发现女儿长大了。从1949年李敏来到他的身边，一晃十年过去了。今日的李敏，已经不是那个害羞、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望着他的小姑娘了。对于爱女的长大，他既感到高兴，又有些怅惘，这意味着女儿在不久的将来，要离他而去。

毛泽东一向鼓励儿女要自立，不要仰靠父辈过日子。他曾经给他们讲过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东观汉记·梁鸿》，梁鸿是东汉人，年纪很小就失去父母，家境贫寒。有一次他的邻居做完饭，招呼梁鸿趁着热锅热灶接着做饭，可是梁鸿拒绝了，他说，我是不因人热的，于是他自己点起火来做饭。毛泽东用这个故事勉励子女要靠自己的努力生活。

但是，在李敏高中即将毕业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想法，这就是把李敏留在自己身边。他爱这个女儿，非常希望常常见到她，并由她来照顾自己的生活。毛泽东的身边虽有个江青，可是她从来不关心，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她只关心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炫耀她的美丽。她在文化革命中用军装、军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副十足革命者的派头。事实上在这之

前，她经常穿上落地的丝绸长裙，把自己装扮成贵妇人。

毛泽东的身边的确有众多的卫士、警卫员，照料他的生活。但是卫士们只能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他们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可能主动去张罗、安排。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一生俭朴，穿衣服从来不讲究。他总是抱着能省就省，能穿就穿的态度。他给家里人定下了两年添置一套新衣的规矩，可他常常舍不得做。他的衣服特别是内衣，常常是补丁摞补丁，袜子也是补得一层又一层，这都是警卫员按照他的意愿，往上补的。但这些衣服终究有一天会达到无法再使用的程度，这样，他就感到无衣可穿了。他到广州求曾志给他做两身衣服，反映了他得自己操心自己的衣着，这对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来说，还要为这些生活琐事分心，真是太难为他了。李敏细心、沉稳，他觉得由她来照顾自己的生活，是再好不过了。

李敏上中学后，是两周才回一次家。有一次她从学校回来，毛泽东对她说：

“你高中要毕业了，毕业以后你来帮我管家吧！”

“您想让我当探春呀，”李敏调皮地说。她看过《红楼梦》，对探春代管家务，兴利除弊的故事有深刻的印象。“可惜我当不了探春，我没有探春的管家才能，您不怕我把家管砸了？”

“能力嘛，锻炼锻炼就提高了。”毛泽东还企图说服李敏。

“我的中文水平太差，常常词不达意，我真怕管不好。”李敏说的是心里话。当然，还有一个理由她没有说出来，这就是与江青的关系更不好相处，两个人的联系会更多，矛盾也会加剧。

毛泽东有些失望，但他没有再动员李敏。他问：

“那你高中毕业后打算怎么办？”

“我想上大学，想继续读书。”

毛泽东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以后毛泽东没有重提此事，他一向是尊重儿女的选择的。

几十年后，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李敏感到怅然若失。要是她真当了爸爸的管家，她可能长长远远地陪伴在爸爸的身旁，晚年的爸爸就不至于那么孤苦和寂寞了。

父女俩接着讨论起李敏的婚事。他们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日子还很难定下来。一是婚礼要在李敏毕业以后举行，毕业前不考虑；二是毛泽东明确表示，他一定要参加李敏的婚礼，婚礼的时间还得看他工作的安排。李敏很感动，说：

“爸爸，婚礼什么时候进行，就由您来决定和安排好了。”

这时的毛泽东正为大跃进以后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在操心。李敏七月中举行了毕业典礼，而毛泽东在六月底就上了庐山，中央决定在那里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在离开北京前，就叮嘱李敏，婚礼要等他回来后再举行。李敏答应了。可是毛泽东还不放心，到了庐山后又来了两次电话，说一定要等他回来主持婚礼。毛泽东对李敏的婚礼的重视，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毛泽东这次上庐山，作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这就是会见贺子珍。关于1959年夏天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这次会见，报刊上介绍得很多。在《贺子珍的路》一书中，我曾经作过简要的介绍，我的介绍完全是根据贺子珍的口述。但是这件事是怎样策划起来的，贺子珍本人并不清楚。直至以后访问了一些当事人，线头才逐渐清晰起来。当然，即使是当事人，由于每个人的处境不同，记忆也有差异，仍然有在细节上对不上号之处，

但大体上说，来龙去脉是搞清楚了。

事情最早的起因要追溯到陶铸的夫人曾志那里。她也要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她从广州来到南昌，正准备上山，听江西省委的同志说，贺子珍正在南昌，就去看望她。

曾志与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她是1928年4月跟随朱德率领的湖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以后她们常常在一起行军打仗，结下很深的友谊。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两个人在哈尔滨见过面，谈起往事，都万分感慨。以后贺子珍定居上海，曾志出差上海，也曾去看过她，可惜没有见到。在这以后，曾志听到了许多关于贺子珍得了神经病的传言，有的还说得很玄乎。她对这些流言半信半疑，决定亲眼看一看贺子珍。

她在南昌见到的是神智完全正常的贺子珍。时值盛夏，南昌酷热，贺子珍短衣短裤一身家居的打扮，干净利落。她的住所窗明几净，收拾得整整齐齐。她发现，贺子珍与在哈尔滨时相比，明显地见老，头发已经花白，人瘦得厉害。

贺子珍在上海没有工作可干，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在国家一日千里地发展的时代里，她成了个大闲人。她在上海住一段，到调到福州工作的贺敏学家里住一段，有时到江西南昌住一段。

江西是她的老家，江西省委的领导杨尚奎等人 都很敬重她，照顾她。有的省级领导象郭俊秀还是永新人，与她是同乡，更有一种亲切感。江西省委欢迎她到南昌来居住，特地给她安排了一个幽雅的住处，给她配备了护士和炊事员，生活上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省委的领导还时时去探望她。

享受到副部级干部待遇的贺子珍，生活依然简朴，一身普通干部的打扮。有一次，她在永新老家福音堂学校女部读书时的一位同学，打听到她在南昌，特地来访。这位女同学惊讶地

发现，贺子珍这个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而且衣着打扮竟然同她这个从大山包里出来的乡下人差不多。她不禁把她的第一印象告诉贺子珍。贺子珍莞尔一笑，说：“我本来就是普通老百姓，现在还是个普通老百姓，我有什么架子好端的。衣着嘛，同大家差不多就行了，何必惹人注意呢。”

这个细节，反映贺子珍在建国后，仍然保持勤俭、随和的作风，并没有利用过去的身份，以及今日老战友对她的照顾，去要求得到更多。她就是穿着一身江西人喜爱的白布做的短衫短裤，会见老战友曾志的。

见到故人来访，贺子珍惊喜万分。她一眼就认出了老朋友，热烈地握住曾志的手，久久不放。

她们坐在一起，又回忆起井冈山的那段生活。贺子珍还记得，1929年1月她们随红四军下山到外线打击敌人的情形。曾志本来是留守井冈山的，在朱德的夫人伍若兰和贺子珍的要求下，毛泽东临时通知曾志随队出发，她连工作都来不及交待就走了。原来红四军成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后又改为农工运动委员会，下面分了很多组，其中一个组是妇女组，红四军的女同志都参加这个组，一起行军吃饭。大家要求曾志当妇女组的组长，于是毛泽东就把曾志找来了。那时候，贺子珍天天与曾志在一起，晚上还与曾志在一个被窝里睡觉。

曾志发现，贺子珍叙述往事，记忆准确清晰。

贺子珍留曾志吃饭。过去曾志听说，贺子珍有多疑症，吃饭吃菜，总要等别人动过筷子才敢吃，生怕其中下了毒。但曾志与贺子珍一起用餐，完全看不到她疑神疑鬼的样子。

贺子珍谈起她经常失眠，曾志即向她介绍自己服用的效果比较好的安眠药，并把随身带的安眠药留下一些给贺子珍。她

走时天色已晚了，贺子珍把曾志给的药服下了，说：希望今天睡个好觉，并高高兴兴送曾志出门。

一次精心的策划

曾志到了庐山后，见到毛泽东，讲起了贺子珍在南昌的情形，她说：“我看她很好嘛，哪有什么神经病，过去的事情讲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听后动了感情，说：“哎呀，我们到底是十年夫妻了，还是很想她。你同汪东兴讲一讲，在江青没有来之前，我想见一见她。”

汪东兴原来是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当时在江西省下放锻炼，担任江西省副省长兼农业厅厅长。曾志找到了汪东兴，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以后就没有过问这件事。

汪东兴在延安干部团时就认识贺子珍，对她很尊敬，称她贺大姐。以后他在毛泽东的身边，看透了江青的面目，很讨厌她的为人。他是在毛泽东的身边，敢于同江青对抗的一个人，江青同他拍桌子，他也同她拍桌子。江青多次要整他，都没有整倒，是因为毛泽东了解他，毛泽东是他的后台。毛泽东问过汪东兴：“你敢同江青对抗吗？”汪东兴说：“有你的支持，我就敢。”毛泽东说：“我支持你。”事实上，毛泽东同江青的斗争，很多时候是通过汪东兴来进行的。毛泽东曾经对汪东兴说过：“你能治住她，我还治不了她，她要夺我的权。”

汪东兴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怕泄露秘密，不敢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找到了方志纯和朱旦华，让她把贺子珍从南昌接上庐山。朱旦华是原来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夫人，毛泽民在新疆遇难后，她与方志纯结婚，方志纯是当时江西省的省委书记，朱旦华是省妇联主任。汪东兴的记忆中，没有当时的江西省委

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参与这件事。但在水静的介绍中，是她同朱旦华一起去南昌接贺子珍的。贺子珍的回忆中，也提到水静去接她的事实。

水静是这样介绍的：

“八月上旬的一个上午，尚奎同志突然对我说：‘毛主席想见见贺子珍同志，要你同朱旦华今天下午回南昌，把贺大姐接上庐山。’全国解放后，贺大姐一直住在上海。后来她提出到南昌住一段，当时江西省委的几个负责人都是她的老战友，欢迎她到南昌来居住。尚奎同志常去看望她，她也常来我们家。

“尚奎告诉我，你们上山后，直接去隧洞口左边的第二栋房子，我已安排好了。主席特意交待，这事要绝对保密。”

“我与朱旦华当晚回到南昌，把事情告诉贺大姐，她显得很激动，忙不迭地问我何时动身。第二天中午，我们回到庐山，按照尚奎的交待，车子开到那栋房子前，早已有人等候在门口。”

贺子珍上山的时间，一种说法是在1959年的7月8日，而水静提供的时间是8月上旬，相差一个月。贺子珍是乘坐杨尚奎的专车上山的，汽车到达庐山贺子珍的住处，一种说法是第二天的中午，另一种说法是在晚上，是摸黑上山的。前者是水静的回忆，后者是贺子珍的回忆。

对于为什么把她接上山，贺子珍的回忆与水静的回忆也不一致。贺子珍说，她对于上山是为了见毛泽东，事前一无所知，她以为只是接她上庐山住几天，散散心。庐山是她多次来过的地方，很喜欢，因此两位夫人请她上山去玩，她高高兴兴就来了。

水静的介绍中则说，她在南昌见到贺子珍后，当时是没说为何上山，但到了庐山后，是让她知道要见主席的，她表现得

很兴奋。

贺子珍的回忆是：汽车驶到一幢依坡而筑的别墅门前，门牌是28号。车灯一亮，她见到汽车的前面站着汪东兴，但他没有同她打招呼，也没有陪她进屋，就消失在黑夜中。汪东兴证实，他因怕车子出故障，不能准时到达，就在接待贺子珍的别墅前等候车子的到来。他看到车子到了，放心了，就离开了。

贺子珍居住的别墅，是在庐山一个很僻静的地方，行人很少。她进屋后，朱旦华就走了，是水静陪着她。

水静介绍说：

“贺大姐住下后，我立即向主席汇报。当时主席住在庐山的美庐。美庐原来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庐山居住的别墅，用宋美龄的名字命名为美庐，现在改称180号。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楼下是会客室、副室，楼上是个大套间，外面是书房，里面是卧室。毛泽东的卫士就在楼梯口的小屋子里值勤。

“我们刚到达庐山，警卫就告诉我，主席通知我马上去见他，我立刻就去了。主席坐在书房的沙发上，听我汇报接贺子珍上山的经过。他听完以后问：贺子珍身体怎么样。我回答说，还可以。主席说，你同尚奎同志商量一下，是否这几天就由你陪着她。他又嘱咐说，你一定陪着她，不要让她跑到外面来，不要离开屋子一步。我答应了。

“主席又说，你好好照顾她，我很快安排见她，时间可能是明天晚上，我会通知你的。主席接着说，江青正在北戴河，不知道这件事，我已经派人用专机给她送文件去了。我身边的人我也会安排的，把他们支开。

“主席嘱咐完，看我要走了，突然又冒了一句：‘希望她能一拍即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主席没有解释，我也不便多问。从主席见到贺子珍后沉重的情绪看，是否他的希望落了

空，没有做到一拍即合？”

第二天，水静接到通知：当晚9时乘杨尚奎的专车，带贺子珍去见毛泽东。通知还说到，已经打好招呼，一路不会有人截车。

当水静与贺子珍准时乘车来到180号时，平时盘查很紧的门卫，竟没有一个人上前拦阻、询问，院子里静悄悄，汽车直接开到别墅的门前。这道门没有人守卫，门是虚掩着的。

与180号紧挨着的181号别墅，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办公、住宿的地方，此时灯火通明，窗户洞开，里面工作人员说话的声音清晰可闻。但是没有一个人探出头来看一眼这悄然而至的黑色轿车，更没有知道从车内走出来的是谁？

推门进去，只有封幼松卫士一个人在客厅里等着。他显然已经知道他今天晚上的职责，把来访的两位女士领上二楼。他让水静在他的楼梯旁的值班室里坐着。然后他推开套间的门，让贺子珍走进去，他自己并没有走进去，而是随手带上了门，退到值班室，与水静一起坐着等候。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会见，经过周密精心的安排，在他们分别二十多年后，终于实现了。

毛、贺相会在美庐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会见是在两个当事人中进行的，参与会见安排的人都没有在场，水静也只在值班室等候。因此，这次会见的情形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从以后掌握的材料来看，贺子珍与毛泽东对这次的会见，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贺子珍是兴奋，毛泽东则是心情沉重。

在《贺子珍的路》一书中，根据贺子珍本人的叙述，会见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她被领到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他们就隔着一个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水静说，在毛泽东的书房，没有藤椅，只有沙发）。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象打开了闸门的水坝，汹涌澎湃，再也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他问道：“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细看了看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毛泽东说：“忙呀，比过去更忙了。”

接着，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一都说了。毛泽东听了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凄然。他是不是也在为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而后悔呢？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毛泽东谈起了他这些年的情况。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

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一句关于她的话都没有。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

“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

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毛泽东又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贺子珍回答说。

毛泽东还告诉她，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他们举行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他们没有握手，也没有告别，只点点头，就各自回房间去了。

水静的回忆是这样的：她同封卫士在值班室等候了一个多小时，铃声响了，是毛泽东在召唤。封卫士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一会儿，他搀扶着贺子珍走了出来，她看到贺子珍两眼通红，还带着泪痕。封卫士让贺子珍在值班室坐下，通知水静说：“主席请你进去。”

水静推开了毛泽东书房的门，只见他身穿白色的长睡袍，很宽大，腰间结了一根带子。他站在那里，吸着烟，面部表情有些愁苦。

他见水静走来，对她说：

“贺子珍的脑子已经不行了，所答非所问。”他还说：“她拿走我三瓶安眠药，这种药很厉害，千万不能让她多吃，最好把药拿回来。”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你要好好照顾她，明天送她回南昌。”

毛泽东在两天中，已经是第二次嘱咐水静要好好照顾贺子珍了。

水静点头答道：“我向主席保证，一定把药拿回来，一定把贺大姐安全送回南昌。”

毛泽东听了，点头说，好的，水静就退了出来。她与贺子珍乘原车回到原来的住所。

水静是在第三天傍晚时分，与贺子珍一起下山的。

贺子珍与毛泽东会见之后，情绪特别好。她成天都处在亢奋的状态中，话也比平时多了。在离开庐山之前的一天一夜里，她不断地向水静讲述她过去的事情。

在毛泽东见过贺子珍后，曾同汪东兴谈过这次会见的情形。他说：

“我们两个人谈得不好，贺子珍不讲话，只是哭。我怎么劝她都不讲话，不讲话怎么能谈下去呢。没办法，我只好说，那你休息吧。我还问过她有什么困难没有，她也不讲话。”

曾志也听到过毛泽东对这次会见后的印象。曾志问毛泽东：“她是不是没有什么毛病？”毛泽东摇摇头，心情十分沉重地说：

“她的思想不是很健全。她看见我的桌子上放着药，她将药瓶一抢，说，这药有毒，不要吃药，不要吃药。另外还谈了王明，要我当心王明会害我。”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贺子珍骤然见到毛泽东，缺乏思想准备，不停地哭，以至未能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表达自己相思之情，以及别后的离情，是比较可信的。另外，也并不是说，他们之间完全没有对话，贺子珍自己叙述中谈到了王明，

毛泽东也说，贺子珍谈到了王明。他们围绕着安眠药问题也有过一番对话，当然，毛泽东认为贺子珍把安眠药说成会有毒，是神经不正常的表现。而贺子珍对水静说，这种厉害的安眠药吃多了没好处，她对水静承认，是她把安眠药拿走，不让毛泽东再吃的。

不论是悲是喜，这对分飞的劳燕在阔别二十多年之后，总算有了一次短暂的相见的机会了。

十九、贺子珍的疯狂

李敏结婚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是1959年8月16日结束的，毛泽东回到北京已是8月下旬了。他一回到北京，就考虑李敏的婚期。他衡量来衡量去，觉得他只有在8月28日这天能抽出时间来，就对李敏说：“你们就在8月28日结婚吧。”

李敏和孔令华结婚的日期，李敏记得是8月28日。李敏的公公孔从洲在回忆录里写他们的婚期是8月29日。这里，按照当事人的记忆，把李敏大喜的日子写为8月28日。

这对青年恋人虽然早就打算结婚了，但因为婚期一直定不下来，有一些准备工作就不曾做。等到毛泽东回来，没想到他把婚期定得那么近，总共没有几天的时间，他们又觉得太仓促了。可是毛泽东说：“我没有其他时间了，就这个日子吧！”

李敏与孔令华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还没有工作。李敏刚高中毕业，孔令华正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大学，手头都没有钱，没有力量为结婚置办什么东西。李敏平时积攒了一些零用钱，一共有45元。她拿这笔钱为她的新郎买了一件新村衣，一条毛料的西裤，一双皮鞋，钱就花光了，连上衣都买不起。好在当时天气很热，不穿上衣可以说是气候的关系，打个马虎眼就过

去了。

李敏的新娘服是一件布料的连衣裙，她戏称这不是新娘服，而是女儿服。因为这并不是为婚礼而特别制作的，它是按照“爸爸供给制”，每两年应添置的一件衣服。它原是一段布料，让李敏和李讷每人做一件衣服。等李讷把衣服做完以后，李敏发现剩下的布料只够连衣裙的身长，连袖子和领子都裁不出来了，于是她拿它做了一件无袖、无领的连衣裙，而且由于将就布料，裙子的领口开得比较低，也比较大，人一低头就能看见里面的衬裙。这两个年轻人觉得，在这个庄严的婚礼上，新娘穿这么低领的婚礼服似乎不大合适，可是他们又无钱添置另外的衣服，还是孔令华有主意，他上街花了三角钱买了一枚胸针，让李敏别在三角领的尖尖上。这样胸针点缀了美丽的新娘，也把衣服的缺点遮掩了。穷学生在这枚廉价的胸针上，倾注了他对新娘的爱。

出席李敏婚礼人员的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他写出一个，听听李敏和孔令华的意见，他们同意了，就保留；如果不同意，就勾掉。名单确定后，他们又写了请柬，发了出去。

那天参加婚礼的人员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外，还请了蔡畅、邓颖超、王季范、曹轶欧等，还有一些年轻人如王海蓉等也出席了。

江青、李讷和江青的姐姐没有出席李敏的婚礼，她们此时不在北京，正在庐山避暑。江青一行是从北戴河去庐山的。江青知道李敏要结婚，事先送了一段纯毛料子作为贺礼。

婚礼这一天，毛泽东拿出四百元在丰泽园颐年堂摆了三桌酒席宴请来宾。在婚宴上，他笑容满面，兴致极高，不断给大家劝酒，自己也喝了好几盅。

毛泽东在婚礼上第一次见到亲家孔从洲。孔令华的父亲孔

从洲当时在沈阳工作，担任高级炮兵学校的校长。他正出差北京，恰好参加儿子的婚礼。一大早，毛泽东就派车把亲家接进中南海，同他一起主持婚礼，而且拉着他的手逐个地把他介绍给其他的客人，说：“这是李敏的公公。”

李敏的公公孔从洲是一位传奇人物。他18岁从军一直跟随杨虎城将军，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的少将，以后率部起义，成为共产党的中将。孔令华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孔从洲事先虽然知道儿子要结婚，但并不知道具体日期，仓促地来出席这次婚礼，没有来得及给刚见面的儿媳妇准备见面礼物。他见到李敏，把身上带的70元送给她，表达自己的祝贺。

在婚礼上，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新娘了。李敏此时已把她心爱的长辫子剪掉，烫了一头蓬松的秀发。她同孔令华都戴上了大红花，孔令华送她的胸针，连同红花一起别在胸前。她那件无袖的连衣裙，勾勒出她苗条的身段。胸前的红花映衬得她那青春的面庞，粉扑扑，红艳艳，象化了妆一样。事实上五十年代的女孩子是不化妆的，她们既没有化妆盒，也不知道怎样化妆。

从婚礼开始，她就处于快乐的眩晕之中。大家给予她和她的新郎那么多美好的祝愿，灌满了她的心田，她憧憬着美好的，新的生活的开始。

李敏结婚的时候21岁了。她的人生观已基本完成。她从12岁来到父亲的身边，经历了十个春秋，父亲的言行、作风已深深地印入她的脑海之中，成为她待人处事的准则。因此，当爸爸拉着她和孔令华的手，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已经成家了，长大了，可以自立了。我祝福你们相处好，学习好和工作好”时，李敏频频地点头，用一种敬爱的目光望着她的爸爸，她在心里暗下决心：我一定照爸爸的话去做，不辜负爸爸的期望。

再次发病的贺子珍

正当李敏沉醉在蜜月新婚的欢乐之际，从江西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贺子珍病重，不吃不喝，已拒绝进食多日了。

这是贺子珍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尽了办法，也无法劝说贺子珍看病吃药、喝水吃饭后，只得给李敏写信，向她报告她母亲的情况。

贺子珍从庐山回到南昌以后，开始几天，仍然处在兴奋，激动的状态中。她的神智十分清醒，对这次会见的回忆，占据了她的身心，她的眼前不断地出现她与毛泽东会见的情形，一幕又一幕，象过电影一样，清楚地再现每一个细节。她陶醉在回忆的欢乐中。

她对自己在毛泽东面前的表现，也不满意，为什么不停地哭呢，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多说话呢？这也难怪她，事情来得太突然，她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当她突然发现毛泽东就站在她的面前时，她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是在做梦。这是几十年来自己魂牵梦萦的人，以为永无再见之日的人，一下子出现在眼前，她那已经变得相当脆弱的神经，怎么能承受得起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巨大的欢乐呢？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除了哭泣，除了用哭泣来倾泄她内心几十年积聚下来的痛苦与思念以外，再也无法做别的什么了。悲极而恸，喜极而恸，都是人之常情，此时的贺子珍，她的恸哭，也说不清是悲还是喜，抑或是两者都兼而有之了。

她在会见毛泽东之后，已经想好了，同他再见面时，一定要仔仔细细看看他，看看分别二十年后，他变老了多少。同相片里的他，是否一模一样。她还计划好，要同毛泽东谈谈她想

工作的要求，毛泽东不是问过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吗？当时自己一个劲地哭，有什么要求都想不起来了。

她忽然回想起，同毛泽东分手时，毛泽东说过的话：“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为什么第二次见面却没有实现，就把自己送下山了呢？是谁搞的鬼，阻挠他们的第二次会见呢？为什么匆匆忙忙地把她送下山呢？

这些问号一经在她脑海中产生，竟象着了魔似地，死死地缠着她，再也甩不开，抹不去。她绞尽脑汁左思右想，作梗的会是什么人。她想到可能是江青和江青的心腹做的手脚。

她回想起她下山时的情形是这样的：第二天早上，她正在屋里等待着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见，忽然进来了一个不认识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而且不由分说，半请半强迫地把她送下山去。

她认为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的。直至几十年后，毛泽东已经仙逝，江青已得到她应有的下场，她谈起这段往事，仍然认为是江青做的手脚，她怀疑是陈伯达报的信，江青突然决定上庐山，这才出现了匆匆把她送下山去的决定。

她怀疑的根据是，在批林（彪）批陈（伯达）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1959年你在庐山时，没有任务，你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干什么去了？贺子珍听传达时，联想到山下有个通讯连，陈伯达是否跑下山去，将毛泽东与她的会见，向江青报告了。

然而水静介绍她送贺子珍下山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她说的经过是：第二天傍晚，她按照毛泽东头天晚上的指示，把贺子珍送下山去。她并没有对贺子珍说明到哪里去，只是扶她上了车，汽车就开动了。可能贺子珍会以为是再次去见毛泽东，实际上汽车是沿着下山的路迂迴，一直开到南昌。与贺子

珍只见一面，本来就是毛泽东所作的安排。

不管贺子珍的猜测是否正确，但有一个事实却是真的，这就是江青的确很快就飞上了庐山。她从北戴河打来长途，说她要到庐山来，而且与贺子珍的走只差前后脚。

江青到达庐山后，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到处招摇，大摆架子。她在众位老同志的面前，摆出一副对毛泽东极为关心、极为亲密的样子，但是，当她与毛泽东独处时，吵闹之声却时时传到屋外。有人怀疑江青的放肆是由于发现了毛贺相会的秘密。其实，喜怒无常是她的一贯表现。她从来就是心血来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她从北戴河突然想去庐山，恐怕也是平时我行我素惯了的一个表现，不一定是了解到什么秘密。如果在庐山，她果真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按照她的性格，她不大闹庐山，羞辱毛泽东，而且逐个清查参与这次安排的人，她是绝不会罢休的。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可以说，毛贺会见的保密工作，是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的。

因此，贺子珍由于没有再次见到毛泽东，胡思乱想，多方猜疑，是没有根据的。可是，她已经不能自拔了，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思想了。有人从中作梗破坏她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面的想法，占据了她的全部的思维，无论她喃喃自语还是在心中思量，反反复复就是那句话：“为什么要让我下山，主席说好同我再见面的……”

她神智昏迷，表情呆滞，头不梳，脸不洗，饭不吃，水不喝，觉不睡，就象一个只有一口气的木头人。

她听不进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劝说，更拒绝看医生服药。几天下来，她已经虚弱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摇摇晃晃，步子都迈不开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到省委去

问个清楚，是什么人违反主席的意思，强行把我送下山来。她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竟霍然地站了起来，推开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任何人搀扶，也不要人带路，竟独自向省委的所在地走去。她来到省委的大门口，对守卫在门口的武警说，她要见省委的书记杨尚奎、方志纯，还要见他们的夫人水静和朱旦华。

守卫在省委大门的年轻战士，见到这个蓬头垢面，神情惶惶的女人，都把她看作是疯子，自然不会给她通报。贺子珍在门口逗留了一阵，被随后赶来的工作人员带回家去了。

以后，工作人员日夜不敢离开她，怕她再次跑到省委去。但是，执意要找江西省委问个清楚的贺子珍，仍然找到了独自遛出去的机会。有一次，南昌下着倾盆大雨，贺子珍没带任何挡雨的工具就到省委去，她从头到脚淋得湿透，头发上，衣服上，裤子上都滴着雨水。她竟象浑然不觉地呆呆地站立在雨中。

贺子珍真的病了，而且比五十年代初那次生病，要严重得多。在贺子珍身边工作的人，看到她病成这副模样，都忍不住伤心落泪。

对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庐山相会，当时是绝对保密的，鲜为人知。直到八十年代，乾坤扭转，“女皇”已成为阶下囚以后，事情的真相才逐步揭露出来。很多人认为，这次会见，非常具有戏剧性，激动人心，充满了罗曼谛克的情调。从这一个多小时的相会来看，它可能是动人心弦的，但绝不是诗情画意的，而是痛苦的悲鸣，流不尽的眼泪，诉不尽的愁肠。相爱的人不能相爱，没有爱情的人却要生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很残酷的现实。更何况，对随后的贺子珍来说，带给她的是更大的不幸呢。

1954年突然听到收音机里广播毛泽东的声音，她受到很大

的刺激，大病了一场。那一场病，使她衰老了很多，不复再有哈尔滨时期的勃勃英姿。经过四五年的调整，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心理平衡，又被这一个多小时的会见所打碎了。这次会见，比光听到声音，更强烈地刺激她的神经，这种强烈的程度，已经到了她的神经无法再承受的地步了。在会见毛泽东以后，她的情绪无论是亢奋还是处在抑郁的状态，她只能想一件事，这就是渴望再见毛泽东，她已经无法作出理智的判断，这种愿望有没有实现的可能了。她已经失去了常态，神魂颠倒，异于正常人了。这种精神异常的症状，在1959年与毛泽东会晤大发作一次之后，在她随后的岁月里，又反反复复地发作，几乎伴随她一生。这种病症，使她本来就很不幸的生活，加倍地不幸。这个后果，是当时所有热心张罗、筹划这次会见，关心、爱护她的战友们，还包括这次会见的总导演者毛泽东，都是始料不及的。如果人们能够预卜未来，知道这次会见对贺子珍凶多吉少，相信就会打消这次会见的念头，以免这个不幸的人再遭劫难。然而，世界上没有未卜先知者，于是造成了这种局面，好心的人竟然在她伤痕累累的心灵上，又狠狠地戳上一刀。

贺子珍的病症

很多人都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疑问：贺子珍是不是有精神病？她疯了吗？如果她真的疯了，是从何时开始的？有什么表现？

贺子珍疯了的传言，从她回国以后，就一直跟随着她。在解放以后，贺子珍虽然从未抛头露面，被封闭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但是在大陆，很多人都知道她，关心她。而且一提起贺子珍，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首先想到的都是她的精神是否正常的

问题。她在苏联曾经住过两年疯人院，回国后又两次精神失常，这都是人们提出疑问的依据。这些都是事实。

然而还有一个事实是，在贺子珍回国以后，在哈尔滨、沈阳和杭州，她都一如正常人那样工作过。她的工作虽然谈不上出色，但都尽职尽责。她回国后与许多老战友重逢，她的言谈举止并无怪异之处。包括在庐山与毛泽东会晤以前，毛泽东曾经询问过曾志、汪东兴和水静：贺子珍的身体怎样，精神是否正常，他得到的回答都是：身体还好，精神正常。汪东兴说得更具体，贺子珍还看电影、跳舞呢。

贺子珍也知道人们对她的议论，她曾经这样表白说：“有人说我癫，把我当作精神病人。我自己明白，我一点都不癫，脑子清楚得很。谁个是什么样子，我心里明明白白。”

对有的问题的看法，她的确目光锐利。她回国后，听到有关江青的议论，曾经对她身边的外甥女儿，侄女儿说过：“我个人的遭遇微不足道，我担心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流血牺牲打下的天下，有一天要被她这样的人葬送了。”这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在她与毛泽东会晤二十多年以后，她介绍这次会见的情形时，谈到她曾提醒毛泽东，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说明她有一定的警惕性。

但贺子珍除了两次精神失常以外，也的确在日常的表现中有异于常人之处。有一次，炊事员熬了一锅猪油，她硬说里面有毒，逼着倒掉了。汪东兴在南昌担任副省长时，两次请贺子珍到他的家吃饭，第一次她吃得很高兴，第二次她说什么也不肯吃，说菜里有毒，弄得主人啼笑皆非。

应该说，贺子珍的精神是处在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的状态。

一位有着丰富的精神病临床经验的精神病学专家，在纵观

了贺子珍从去苏联以后的全部经历后表示，贺子珍是患有忧郁型神经症。‘她的病根可能是从在苏联她的儿子夭折，毛泽东另娶后就开始了。当时的症状主要是精神压抑，情绪低沉。当她被当作精神病人送进精神病院以后，她的神经系统进一步受到挫伤，她的精神更压抑，更低沉，而且对周围的人产生了不信任感。她是属于情感型的神经症，从此又加上了多疑症。她的病因是由于在情感方面受到过于强烈的刺激，心理承受不起而致病的。这种病人往往爱回忆过去，在往昔的温馨中讨生活。但是，过多地沉浸在旧日感情的漩涡中，又会使她陷入神智失常的状态中。

他还认为，这种病人的病症并不是随时显现的。当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外部世界，集中在个人感情以外的事物时，她会一如正常人那样去思维和工作。因此，对这类病人最有效的治疗办法，就是进行疏泄疗法和注意点转移疗法，让她把心中的郁闷都倾泄出来，淡化个人的情感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或其他方面上来。

这个分析可能是有道理的。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人的意识中有一个情结。这是被压抑的欲望在无意识中的固结，是一种心理的损伤，左右着人的思想与行为。在贺子珍的意识中，也有一个情结，这就是她对毛泽东斩不断的，割不开的爱情，以及对自己一手造成的两相分离的状况的无限悔恨。这种绵绵相思之情几十年来始终萦绕在她的心头，拂不去，吹不散。当这个情结处在潜藏的、抑制的状态，她的注意力为外界其他事物所吸引，她可能一如常人那样正常地工作，与周围的人友好相处，甚至表现出一定的观察力与思维能力。一旦由于外界的或内部的因素刺激了这个情结，使它占据了意识的主要部位，被情结所左右，那么，她就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精神恍惚，行为癫狂

的症状。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对贺子珍所发出的每一个关怀、体贴的信息，都刺激着贺子珍那无法推开的情结，使她在感情的潭水中，又深陷一步。贺子珍每一次神经症的大发作，都是在一次次小发作的积累中，由量变到质变而形成的。

在贺子珍与毛泽东庐山会晤之前，毛泽东的多次关注、馈赠，已经在她的心中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波澜了。

在这之前，毛泽东曾经特地派他的大秘书叶子龙来到南昌，给贺子珍送一千元钱，还有一些物品。毛泽东还曾经给贺子珍送去一方淡黄色的丝质男用大手绢，这个手绢的边上有几条蓝色的细线条。手绢是旧的，显然是毛泽东用过的。贺子珍捧着这方手帕，就象《红楼梦》里林黛玉接过宝玉送来的旧手绢那样，情思滚滚，心荡神驰。她更加感念毛泽东对她的关注之情，为自己未能与他白头偕老而悲伤。这一方手绢搅得她有多少天夜不安寝，食不知味，失魂落魄。她忍不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第四封信，在信里她写了自己对他的怀念，以及对他的馈赠的感谢之情。在这封信中，她再次提到王明，说，你一定要注意王明这样的人对你的迫害。在她的观念中，王明成了一切坏人的代名词。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给贺子珍写了第三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去学习，请你放心。信中还要求贺子珍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

贺子珍用情太深、太专，把爱情作为生命的支柱，这使她尝尽了痛苦之果。在她为情而精神失常时，她连生活也难以自理，十足的癫狂，其状况使人惨不忍睹。

有人设想过，假如她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象她在哈尔

滨、沈阳时期那样，用工作来填补感情的空虚，她的神经病症是否不致于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呢？王美兰在建国后曾经在上海见到过贺子珍，发现百无聊赖的她，打发时光的办法竟是对着毛泽东的肖像，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贺子珍自己承认，她有时候对着毛泽东的肖像，一坐就是半天、一天。这怎么能不使她的思想越走越窄，钻到死胡同里出不来呢。

然而，又是谁把她置于无所事事，只能在旧日的感情圈子里讨生活呢？贺子珍后半生的不幸遭遇，又该由谁来负责呢？除了江青的妒意之外，人们思想上的传统观念，认为领袖人物的婚姻必然是始终如一的，不应该有再娶之嫌，是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呢？

二十、女儿的心意

专机把李敏送到南昌

正在蜜月新婚的李敏，收到南昌的来信，知道妈妈病重的消息，万分焦急。当时她身体也不好，正在休息。她赶忙把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说贺子珍病重的消息，“啊？”了一下，似乎有些诧异，他用眼睛望着李敏，似乎在等她说下去，告诉他贺子珍发病的情形。李敏会意爸爸的要求，但她没有办法给爸爸介绍得更多，因为她所知道的，也只限于信上所说的那些。她索性把信送到毛泽东的面前。

这是一封只有一页信纸的短信，毛泽东用手拿着，竟然看了半天，也许他是重复看了几遍，力图从简短的词句中了解到更多；也许他在沉思，在庐山与贺子珍会见的情景，又活跃在眼前；也许他正在寻找处理的方案。

总之，他在沉默着，一句话也没有说。

李敏站在旁边，静静地等待着爸爸说话，但毛泽东并没有要说什么的意思。李敏有些急了，说：

“妈妈病得不轻，这可怎么办？”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当然知道

贺子珍这次得病的原因，李敏却是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勉强说了一句：

“你把信留下吧！”

李敏知道，这是她离开爸爸书房的时候了。她没有再说什么，轻轻地退了出来。

李敏相信，爸爸对妈妈的生病不会置之不理的，她等待着爸爸的安排。头天晚上，没见到爸爸有什么动静，李敏思念妈妈，惦记着妈妈，一夜都没有合上眼。第二天一整天，从早到晚，没听到爸爸拿些什么主意，说些什么话，李敏有些沉不住气了。但她仍然相信爸爸，一定会有所行动的。也许，爸爸已经去电请江西省委的负责人照料妈妈了吧。到了第三天，毛泽东仍然没有召唤娇娇到他的身旁，但中共中央办公厅却给她来了个通知，已经准备好一架专机，把她送到南昌，让她去照顾妈妈。李敏心头一喜：原来这几天爸爸作的是这样的安排。

李敏匆匆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就要起程。这时毛泽东出现了。在他的身后，一个警卫员拎来了两大筐水果。毛泽东对李敏说：

“你到南昌去，好好照顾你妈妈，一定要让她吃药看病，让她喝水吃饭。”他指着身后的两筐水果说：“这两筐水果你带去，给你妈妈吃。她不喝水，吃点水果也能解解渴。”

李敏点点头。

毛泽东又嘱咐说：“不知道你妈妈的病情怎么样，我怕你一个人去，有的事情处理不了，让一位管理员叔叔同你一起去。”

李敏要上汽车了，毛泽东又叮嘱了一句：

“好好照顾你妈妈。”

李敏不由得心头一热，爸爸把一切事情想得真周到！

飞机在南昌降落，江西省委派来的一部汽车已经等候在那里了。李敏立即奔赴妈妈的寓所。

眼前的妈妈，已经不是刚从苏联回国时那个妩媚多姿的妈妈，也不是春节时在上海见到的虽然头发花白，却谈笑风生的妈妈了。如今的妈妈，形容枯槁，两眼发直，面无表情。一头脏乱的头发，更映衬出她满面的病容。她衣服不整，看来已多日没有换洗过了。她呆呆地坐着，不言不语，象泥雕木塑一般。

李敏一看妈妈变成这个样，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她走上前去，拉住妈妈的手，一叠连声地喊妈妈，还说：爸爸让我来看您来了。

贺子珍不答应，连正眼都不瞧李敏一下，似乎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

李敏拿出带来的水果，一面削皮，一面对妈妈说：“这是爸爸特地让我带来给你吃的。”她把水果切成一条条，放到贺子珍的嘴边，想喂她吃。可是贺子珍不张嘴，劝急了，她随手扔进痰盂里了。

李敏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让妈妈恢复正常的饮食生活。

周围的工作人员详细告诉了李敏贺子珍发病的经过，并焦急地对李敏说：“你妈妈不肯见医生，也不肯吃药。她已经好多天不吃不喝了，再不喝水进食，会有生命危险的。”她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李敏身上了。

李敏心里比大家还要着急，但是她知道，光着急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好好想想办法。她知道，强迫是没有用的，妈妈不是失去知觉的人，也不是小孩子，对于任何她不愿意办的事情，都无法强迫她去办。来来回回唠唠叨叨地劝说，只会引起

她心烦和反感。她认为，妈妈不是不能吃，不能喝，而是不肯吃，不肯喝。她不肯吃、不肯喝准有她的原因，这就是她心里存有疙瘩。她心里的这个扣一天不解开，她就不会乐意地自动地吃饭和喝水。

那么，妈妈心里的疙瘩是什么呢？

贺子珍周围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她的妈妈在上庐山之前，情绪和精神状态都是正常的，回来后越来越不对头，不断地喃喃自语，说有什么人不让她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李敏一听就明白了，原来妈妈这次生病，原因还在爸爸那里，这是想念太切，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所造成的。只有把她的思想从爸爸的身上引开来，让她多想想爸爸以外的事，多想想高兴的事，她的心情开朗了，不再钻牛角尖了，精神上的毛病才有可能慢慢好起来。

在这个时候，李敏并没有读过任何心理治疗的书籍，事实上她也不可能读到过有关这方面的书籍。1957年反右以后，心理学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学说受到批判，心理学的课程也从大学的讲坛上消失。但是，李敏出自对她妈妈的爱，要医治好妈妈的心病的急切的愿望，她对妈妈病情的分析，以及治疗妈妈心病的方案，都是正确的。这说明，李敏的确长大成人了，她再不是刚从苏联回来时那个拉着妈妈衣襟，躲在妈妈背后，大惊失色地把我们的干部叫作日本兵的小女孩了。现在不再是妈妈照顾她，而是她照顾妈妈的时候了。

李敏安慰了大家几句，稳住了大家的情绪，就开始对妈妈进行心理治疗起来。

她不再勉强妈妈吃饭喝水，而是轻声细语地同妈妈讲她的婚礼，讲有什么人参加了，都说了些什么话了，婚礼怎么热闹了，等等。

贺子珍仍然脸无表情，似乎什么话都没有听见。她拿起桌上的水果刀，把李敏带来的梨子，一片片地削到地上。

李敏既不制止，也不说这样做不好，随便妈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她找来一把梳子，替妈妈梳了头；还打来了洗脸水，给妈妈洗了脸。她找出妈妈干净的衣服，替妈妈换上。贺子珍没有再反抗，任由女儿去摆布。然后，李敏扶妈妈在床上躺下，坐在她的旁边，继续说她在结婚后的生活。贺子珍没有答话，但看得出她在注意地倾听。

第二天，李敏帮妈妈梳洗后，搀扶着妈妈慢慢地走到屋外，在花园里散步。她故意指点着见到的草木，告诉妈妈这是什么花，什么草，什么树，这些花草在苏联见过没有，在东北见过没有。她竭力要引起妈妈的注意，引发她对外部世界的兴趣。

多日来不吃不喝的贺子珍，脚步是虚浮的，无力的，她几乎把身子都靠在李敏的身上了。她开始时对所见的事物神情冷淡，心不在焉。但是慢慢地表现出有兴趣，注意力逐步地集中到这些事物上面了，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当李敏扶着妈妈在花园里走了一圈，回到寓所时，贺子珍觉得累极了，也渴极了。她开口说话了，对李敏说：“替我削个水果吃。”

可是，水果已经没有了。李敏看到妈妈不肯吃，怕摆坏了，另外也想酬劳工作人员照料妈妈的辛苦，把水果分给周围的工作人员吃掉了。

从此，贺子珍肯进食了。李敏又说服妈妈接受医生的治疗，贺子珍肯吃药了。她脸部的表情逐渐恢复正常，神智也显得清醒多了。

以后几天，李敏每天都陪妈妈到外面走走，她们母女俩走

出了院子，走到大街上。她们见到迎面而来的男女老少，李敏都作了介绍：“这是老大爷”、“这是小伙子”、“这是红领巾”，以唤起贺子珍的记忆，把她的思想拉回到现实中来。

她们来到商店的橱窗。李敏指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给妈妈作介绍，哪些是国产的新产品，有什么用途。贺子珍听来很新鲜，也很有兴趣。

每天的散步，不仅让贺子珍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而且看到了社会的新事物。连李敏都没有料到，这种精神转移的治疗方法，竟然收到显著的效果。贺子珍饶有兴味地每天跟着李敏到外面转，南昌的大街小巷几乎都走遍了，她见识了不少新的东西，神情也开朗起来了。

李敏高兴地看到妈妈的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了。她想起了建国初期爸爸在给妈妈、舅舅、舅妈的一封信中写过的一句话：“要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李敏觉得爸爸的话是对的，只有多看看，多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崭新面貌，才能认识全局，开阔心胸，把个人的得失置于度外。她下了决心，以后每年都要利用假期，陪妈妈到各地走走，让妈妈多看看社会主义。

李敏在南昌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贺子珍说：“我商开永新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回去过，我很想回去看看。”她还说：“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也该回去看看小孔了。”

她的话，思路清晰，通情达理，李敏觉得，妈妈恢复正常了。她把妈妈的要求报告了江西省委。省委同意派车把贺子珍送到永新，省委还派组织部的一个同志陪她一起前往。

一部吉普车把妈妈接走了。望着逐渐远去的车子，李敏如释重负。她很高兴她完成了爸爸交给的任务，妈妈终于恢复正常了。可是，她自己却病倒了。她来的时候身体就不适，到南

昌后，连操心加上食物中毒，她已经疲惫不堪了。

她在第二天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爸爸倾诉了心曲

在车轮轰鸣的车厢里，她思绪如潮。她一会儿想念她新婚的丈夫孔令华，一会想念她的爸爸，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到他们了。但是，她更想的是她的妈妈。过去她年纪小，不懂事，对妈妈的心情、处境并不十分了解，如今她已经为人妇，知道在女人的生命中，爱情的位置有多重，她对妈妈的理解深了一层，对妈妈的遭遇深表同情，她很想帮妈妈的忙，但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

在她到达南昌以后，曾经几次给爸爸写信，报告妈妈康复的情况。妈妈目前的情况爸爸是了解的，可是爸爸不一定了解妈妈的心愿，不了解怎样来治疗妈妈的心病。李敏决定，回到北京后要同爸爸好好谈一次。

于是就有了父女俩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

李敏先介绍了妈妈身体恢复的经过。毛泽东仔细地听着，不住点头。看得出，他对李敏的南昌之行是满意的。

李敏没有谈妈妈这次发病的原因，因为爸爸没有问她。毛泽东虽然是洞悉一切，而且他肯定认为，李敏也是知道其中的一切，他们两个人是心照不宣。

谈到妈妈不断犯病，毛泽东同李敏都很发愁，李敏直接了当地谈了她在火车上就想好的意见。她说：

“我觉得妈妈一个人生活很孤苦，很寂寞，我又不能在身边照顾她。我想把妈妈接到北京来，同我一起住，也好有个照顾。”

“你妈妈到北京来，她能忍受得了江青的气吗？”毛泽东

的语调缓慢而沉重。

“我同妈妈搬出去住，不住中南海，江青管不着。”李敏跟着爸爸直叫江青的名字。她在结婚以后，仍然住在中南海，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你以为不住在一起，她就可以不受气了？”

“那我也到上海去，同我妈妈住一起。”李敏又出了一个主意。

“我不同意你到上海去，我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边。”毛泽东坦露了他对李敏的挚爱。

“那您说怎么办好？”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李讷都18岁了。”说这句话时，毛泽东的语调更低沉，脸上流露出难言的痛苦。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李敏的面前，谈到他的婚姻的苦恼。他不能忘情于贺子珍、却又不能不与江青一起生活。他对江青有一百个不满意，却不能把她从他的身边赶走，因为她有合法的身份，是他的妻子。为了维护作为党的和国家的领导人物的正面形象，江青再坏，他也不敢考虑离婚的问题，只能够用维持会的方式，维持着这没有感情可言的婚姻。毛泽东说他对贺子珍的处境无法可想，接着提到李讷已经18岁，也就是说，他同江青的婚姻已经持续了一、二十年，不可能考虑分手的问题。毛泽东非常清楚，只要他同江青一日有着夫妻的关系，他就无法给予贺子珍所需要的一切，也无法从根本上治好贺子珍的病。

毛泽东为了在大家的面前维护他的正面形象，他是深深地掩埋了他对目前婚姻的失望与痛苦的。他对江青的行为有时采取迁就的态度，是为了息事宁人，怕她吵吵闹闹，影响不好。而江青这个人从来是得寸进尺的，你让她三分，她就会爬在你

的头上作威作福，使毛泽东肝火上升，忍不住大发雷霆，对她大吼大叫。于是毛泽东同江青相处，迁就与发怒这两手，交替使用，不断循环往返。江青这个人平时很霸道、很专横，在家里称王称霸，但一旦毛泽东发起脾气来，她是害怕的，马上收敛，老实几天，不敢撒泼。

毛泽东也知道这种夫妻关系很不正常，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这些，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在这次同李敏谈话之前，他很注意在儿女们面前维护家庭和谐的气氛。他从来不在儿女们面前同江青吵架，指责她的不是。李敏虽然听说过有一次，盛怒下的毛泽东动手打了江青，但并没有亲眼看到。毛泽东同李敏在一起，怀念贺子珍，也从来没有说过江青一句坏话。

现在，毛泽东既然在女儿面前敞开了他的心扉，他觉得原来设置的防线没有必要再维持了，想倾诉内心的痛苦的愿望变得不可遏止了。他继续对李敏说：

“江青对我不好，她嫌我老了。她不爱我，嫌我年纪大，是个土包子。她同你妈妈完全不同。”

这些发自肺腑之言，震慑着李敏的心弦，她原来并不知道一向自信、坚定、开朗的爸爸，他的内心却是这样的孤独和痛楚。今天，她是更了解她的爸爸了。听完爸爸的这番话，李敏觉得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安慰她的爸爸，她只是用一双充满着深情挚爱的眼睛凝视着爸爸，同爸爸进行无声的心的交流。

李敏心里明白，爸爸说的话是真的，江青对自己的爸爸并没有真情实意。她就听到江青在人前讲过这样的话：“我同主席相差二十多岁，我们是政治夫妻。”“要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我们的岁数相差那么大，根本无法生活在一起。”江青说这番话，是想炫耀她自己，贬损毛泽东，实际上却充分暴露了她以婚姻作为阶梯，以达到个人野心的丑恶目的。

父女俩实在找不出能够帮助贺子珍改善环境的好办法。毛泽东无奈地说：

“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妈妈，大概也只有由你来代替我照顾你妈妈了。”

李敏这是第二次听到她爸爸说让她代替他的话了。第一次是针对岸青说的，这次是针对她妈妈说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李敏的器重。李敏会意地点点头。她明白爸爸说的让她代替他的含意，她当然不可能代替爸爸给予妈妈那种夫妻之爱，但是她可以用女儿火热的胸膛，去慰藉妈妈那颗凄凉的心灵。女儿之爱也会是一股甘泉，流入妈妈那干涸的心田，也会长出一片青绿来。

李敏以为父女俩这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已经结束了，她站了起来，准备走开，毛泽东叫住了她，说：

“要不要你去找一找你丢失的哥哥、姐姐，要是找到了，你妈妈也不会那么寂寞了。”

毛泽东为了让贺子珍找到新的精神寄托，竟然改变了初衷，主动建议李敏去寻找丢失的哥哥姐姐。他的用心良苦可以想见了。

在1949年，贺子珍的妹妹贺怡送李敏来北京时，曾经同毛泽东谈过要去寻找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丢失的毛泽东的儿子小毛，毛泽东没有同意，为此两个人还发生了争执，毛泽东不得不动用了军纪，才把贺怡给压住了。但是贺怡并不买毛泽东的帐，她执意要将小毛找到，为此竟然造成车祸，自己壮年就牺牲了。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建国后，从西北调到福建后，也曾多方寻找贺子珍在龙岩所生的女孩的下落。这是贺子珍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当时红四军下井冈山不久，还没有打开新的局

面，建立新的根据地，流动性很大，颠沛流离，生下的孩子不可能留在军队里，只能送给老百姓，或者是送回老家，等到以后环境好了，再接回来，贺子珍生的女儿也不能例外。她找好了一户人家，用被子把刚出生二十天的婴儿裹好，把事先准备好的十五个银元，一起送到那户人家里，托那家的大嫂代为抚养这个孩子。等到1932年，红军再次打开龙岩，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按照贺子珍的讲述，找到旧日寄养孩子的大嫂，打听孩子的下落，可是得到的答复是孩子已不在人世了。当时贺子珍信以为真了，难过一阵就把这件事丢开了。

贺敏学不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他利用在福建工作的有利条件，设法寻找这个女孩子的踪迹。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在五十年代他到北京出席一次会议，毛泽东召见他时，他对毛泽东面陈：龙岩的女孩子找到了。贺敏学回忆说，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既没有表现出很高兴，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他说：

“是吗？那就由你照顾她好了。我不便于去照顾她。”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这个被认为是毛泽东女儿的人，只认了一个贺敏学，她称他作舅舅，其他人似乎都同她没有什么血缘、亲缘的关系。因为这个女孩子的材料报到中央后，中央并没有点头承认，大家也就不好有所表示了。

李敏听了爸爸要她寻找哥哥姐姐的意见，也认为这的确是个安慰妈妈的好主意。在随后的岁月中，她按照爸爸的意见，花了不少功夫，真心实意地去找过她的哥哥和姐姐。

二十一、寻找慰藉

贺子珍重返故乡

永新在江西的西部，从南昌去永新，筑有铁路，一个白天的路程就到了。公路修筑在铁路的旁边，载着贺子珍的吉普车沿着公路向赣西驰去。

贺子珍屈指一算，她从1928年离开永新后，就没有回去过，已经有三十一年了。

她最后一次去永新是在红军第三次打开永新县城以后。那时湖南省委执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命令红军把队伍拉到比较富庶的湘南来，放弃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不同意，但是大部份是湖南宜章农民的红二十九团思乡心切，不听劝阻，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把贺子珍留在永新，帮助县委工作，自己带了一个营兵力，去把红军大队迎回来。毛泽东走时说好，等他回到井冈山，就把贺子珍接回来。可是毛泽东迎还红军大部队胜利归来已十多日了，贺子珍还不见毛泽东的来信。原来毛泽东也在奇怪，为什么不见贺子珍回来。后来才发现是永新县委的人不愿意让贺子珍离开永新，扣留了毛泽东的家书。以后毛泽东说：“你不要再到永新工作了，你到那里，他们又不放你回来了。”以后贺子珍果然没再到永新去，留在

宁冈工作了。再以后她跟随红四军去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就更没有机会回永新了。

身体刚刚复原的贺子珍，仍然感到身体虚弱，她半闭着眼睛，蜷缩着身子，坐在车子后座的左边，头靠在车角上。同行的省委组织部干事以为她疲倦了，睡着了，没有同她说话。事实上贺子珍的思想正在十分紧张地运转着。她在想些什么？她的思绪纷纭复杂，连她自己都理不出个头绪来。

她要回永新去看看的思想是突如其来的。在同毛泽东庐山会见之后，她从欢乐转为悲伤，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她自己也想过要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但她力不从心。是女儿李敏把她引回现实的生活中来，她开始感觉到在自己的痛苦的感情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和世界，她想迈入这个世界，忘掉那个令她绝望的狭窄的天地，可是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想想未来，她觉得渺渺茫茫，是她所抓不着、摸不到的；而她的过去，特别是在永新工作、生活的那一个时期，却是充实的、光辉的。回永新去看一看，对她来说，是寻梦，也是一种慰藉，让那空得发慌的心灵放上一点甜蜜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因此，她不顾身体还很羸弱，决定回永新走一趟。

开始，她并无心思观看窗外的景色，就这样半睡半醒地休息着。但是车子越接近永新，她的睡意全消了，而且情绪变得亢奋起来，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她的老家，她的出生之地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

永新县是江西省西南部一座比较大的县城，山清水秀。罗霄山脉一座座连绵的青峰，把县城环抱起来，筑成了绿色的屏障。清澈见底的禾川河象一条玉带，绕城而过。由于它地形的险要，它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它的富庶，它又是这一带有名的鱼米之乡。

贺子珍见到那纵横相连的高山了，想起了在井冈山生活的那段岁月；她见到那缓缓流淌的禾川河水，想起了童年时与女友们在这里嬉戏的情形；她望到了永新县那巍峨的城墙，她在永新暴动时，带领一支梭标队守卫永新南门时的情形，立刻呈现在她的眼前。是呀，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过她的足迹，记录了她生命的一段难忘的历程。她今天旧地重游，是为了重温旧梦来了。

永新县委早已接到江西省委组织部的通知，为她在县委招待所安排了住处。贺子珍发现，这里的陈设虽然远比不上南昌的豪华与气派，但也讲究室内要有盥洗设备，设有卫生间，有了一点现代化的味道了。

她谢绝县委要派人陪同的建议，也不要省委同来的工作人员的跟随，表示要自己上街去走走。她独自来到变得宽阔平坦的大街，寻找那些过去熟悉的建筑：大革命时期的县党部、工会，农会和妇女会的旧址还在不在？如今都派了什么用场？还有井冈山革命时期建立起的苏维埃政府，以及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召开过永新县联席会议的旧商会楼，是不是保留下来了？贺子珍发现，它们虽然更加破旧，但仍然保留着旧日的面貌。她在这些建筑面前驻足了好一会儿，竭力同过去的记忆相印证。她猛然想起，这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事情了，岁月过得好快呀。

她转入城南那条窄窄的石子路——南街，来到一座三间门面宽的两层建筑的门前。她认出来了，这就是她儿时的家，她的父母在这里开过茶馆“海天春”。这是永新县城典型的铺面建筑，一溜上的是门板。那时候，每天清晨，父母亲把店面的门板全部取下来，让店铺全部敞开在茶客的面前，招待从四面八方来喝茶的客人。她记得，南街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道，从

早到晚人流不断，他们的茶馆也是终日熙熙攘攘。可是如今，这里门板紧上，门上还挂着一把大锁。

这里的乡亲们都不认得她，他们见到一个干部打扮的妇女站在那里不走，便过来同她打招呼，问：“您要找什么人？”

“我不找什么人，”贺子珍有礼貌地回答说，“我了解，这里的店门为什么不开？现在住着什么人？”

“这是县里的豆腐房，每天清早做豆腐，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休息了。”

“哦——”贺子珍长长地答应了一声，仍然站在那里，没有离开的意思。

她看到乡亲们用一种疑惑的眼光望着她，于是解释说：“我小时候曾经在这里住过呢。”

热情的永新人听说她曾经是这个屋子的主人，而且从她浓浓的永新口音中肯定她是个同乡，就找来豆腐房的工人，把门打开，让贺子珍进去看看。

在贺子珍的记忆里，“海天春”的店面非常宽敞明亮，如今站在里面，竟觉得又窄又小，又黑又潮。往日，这里摆着十几张八仙桌，母亲杜秀提着一把铜壶，笑盈盈地为茶客们添茶续水，父亲贺焕文经管着帐目，旁边是一个宽大的灶台，终日炉火通红，上面放着许多把茶壶。

这是贺子珍的爸爸败落以后为了糊口开设的茶馆。贺子珍的祖父曾留下大片的田山和房产，是永新县有名的富户。以后她的父亲在一场官司中说了几句公道话，被牵连进去，关进了大牢。母亲为了赎出父亲，变卖了田山，家道中落了。为了生活，这才买下这三间铺面房，开了个夫妻茶馆，但是，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一些军阀、地痞白喝茶不算，有时还动手动脚调戏他们的妈妈。已经懂事的贺敏学看不过去，曾经从炉火

中抽出一根烧得通红的通条，往那个不老实的丘八屁股上戳去，烧得那个坏蛋叽哇乱叫，为此惹出了一场大祸。现在，这个店面已经面目全非，被磨豆腐的石磨、水缸等占据了。

贺子珍继续往前走，穿过了一个小天井，又是一栋同前面一模一样的三间门面宽的两层楼房，中间是客厅。两边是厢房。这就是贺子珍的家了，他们姐妹就在这个小天地长大，贺子珍就是从这里开始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在过去她的印象中，这里是非常温暖光亮的。这次回来一看，却原来同前面一样，阴暗潮湿，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了。

贺子珍听乡亲们介绍，这栋房子也历经沧桑。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们的父母随着贺怡逃出永新后，这些房子就被反动派没收了。在永新暴动，贺子珍随同农民革命武装撤上井冈山后，国民党的六个团如潮水般涌入永新，他们找不到那么多住处，贺子珍的家成了兵营，最多时住过一百多人。

贺子珍听了后，无限感慨。她不愿意再停留，转身走了出来。

她了解到，经过日月的变迁，她们贺家这个昔日显赫的望族，已经所余无几了。一些远房的亲戚接待了贺子珍，告诉她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她的一家所遭受的劫难。亲戚们对她说，国民党特别仇恨贺家的闾家革命，特别是知道贺子珍嫁了毛泽东以后，更想用抓获贺家的人来要挟永新的三贺投降。伪江西省政府以五万银元缉拿贺敏学和他的父母，见到尸体的可以得到银元两万。这个悬赏告示贴遍了永新、宁冈等城乡。

反革命的屠刀还对准了贺子珍的祖籍万年山区的黄竹岭。黄竹岭是个只有四十二户人家的小村庄，处在井冈山的深山密林中，交通很不方便，只有一条仅能并行两个人的崎岖小路通

到山外。这样一座无名的村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竟然得到国民党的青睐，先后七次派整连、整营的骑兵、步兵，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头，来到这里，一遍又一遍蹂躏这块土地，原因是这里是三贺的老家，贺敏学等人曾经在这里建立过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反动派每一次来，摧残的重点是贺家的房产。他们的老家曾经是东南特委的所在地。为了发泄他们的仇恨，这些匪徒们先后七次烧了他们的房屋，一次烧不尽的地方，下次来了继续烧。他们没收了贺家的田山，放火烧了油茶树和杉树。有一次，火势连绵不绝，上千亩树林和茶林都化为灰烬。如今，在黄竹岭贺家的宅基上，已经找不到原来的房屋了。解放后，乡亲们把这里改作稻田，种上水稻，只有那田埂上残存的两堵矮矮的土墙，让人们记起这里曾经盖有房屋，还有田垅旁边劫后余生的三棵柏树和一棵杉树，让人们回忆起当年它屹立在贺家的门前，曾经给贺家的兄妹们带来过多少的欢乐和清凉。

乡亲们还告诉贺子珍，她的叔叔贺郁文在姪子姪女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当了农民协会的秘书长；她的堂兄贺敏良，是村里的支部书记；她的堂弟贺锦良是农民协会的干部。1928年端午节，正是农忙季节，国民党的一支马队突然闯进了这座宁静的山庄。贺郁文首先发现了，他帮助乡亲们迅速转移，他自己走在最后。结果，被进庄的国民党反动派抓住了。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正要追捕贺家的人，当他们知道这是贺子珍的叔叔，就把他押回县城，在永新东门的龙潭洲公园公开问斩，借此杀一儆百。敌军在撤出黄竹岭时，一把火烧了贺郁文的家。

贺敏良分管组织工作，掌握全村共产党员的名单。有一次，国民党闯进了村庄，逮捕了贺敏良，逼他交出全村共产党员名单。贺敏良摇摇头，连口都懒得开。敌人气坏了，剥掉他

的衣服，把他吊了起来。这群野兽竟在他的脚下绑了两个水桶，桶里装满石头，用酷刑逼他开口。贺敏良紧咬嘴唇，一个字也不透露。国民党捞不到东西，在村里杀害了他。

贺锦良在敌军进庄时躲避不及，被敌军杀害了。国民党先后杀害了贺家男女老少四十七口人，他们疯狂叫嚷：“黄竹岭的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殷红的鲜血，一次次染红了这块土地。当然，国民党要杀光砍尽的企图并没有得逞，黄竹岭始终炊烟不断，坚持战斗。

贺子珍直到这个时候才了解到，她们贺家的人为革命、为人民的解放，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她想起了她的一个妹妹贺先圆、弟弟贺敏仁也先后献出了生命的情形。

贺子珍的父母在大革命失败时，逃离永新县，带走了小弟敏仁，留下了幼小的妹妹先圆，交给舅妈抚养。贺子珍和永新的干部，为了把关在永新监狱的共产党员救出来，发动了三县：宁冈、安福、莲花的农民自卫军联合攻打永新县城，需要狱中的同志里应外合，把这个消息通知监狱的同志。十一岁的先圆用给哥哥贺敏学送饭的名义，把消息传到牢房里。永新暴动后，国民党捲土重来，他们抓获了贺先圆，挖了她的双眼，残忍地将她杀害了。贺敏仁在1932年毛泽东率部打开吉安后，离开父母参加了革命，在司令部当了个司号。他机灵，帅气，也有点傲气，遭到一些人的不满意，在长征路上被自己人误杀。

如此算来贺子珍的一家连同她的父母、贺怡在内，已经有五十二个人为革命捐躯了。贺子珍为自己亲人的豪情壮志，为国捐躯，感到无比的骄傲，她觉得，虽然在他们这些人中，除了贺怡的遗容陈列在南昌烈士纪念馆以外，其他的人都是默默无闻，但是在她的心中，却树起了巍峨的丰碑，她会永远记住他们。

她又去寻访昔日同她一起搞学运的同学们，然而她失望

了。她找到了一位曾经同她并肩战斗的密友，这位女友如今也是白发皤然，一群儿女，为着生活苦苦熬着日子。她过去那种豪情壮志已经荡然无存了。她告诉贺子珍，她过去发展的那些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有人牺牲了，也有的人害怕了，退党了，不再革命了。有的远走他乡，多数人结了婚，当太太去了。她说到自己，在丈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狱中以后，也心灰意冷了，另找了个人结了婚，现在也就是混日子了。

那位老同学感念旧日之情，放下家务，陪她回到福音堂原来办女学的地方去走走。过去书声朗朗的教室如今成了生产糕点的车间，教堂里昔日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再也找不到了。

贺子珍怅然若失，说不出心头是什么滋味。她白天在县城东奔西跑，很累了，晚上躺在招待所，却无法入睡。她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任凭思绪在过去的岁月中驰骋。她听得很多，也看得很多，但是她觉得她的心仍然是空空的，她到永新来要寻找的东西，似乎并没有找到。相反，永新不仅处处留下她的足迹，也处处留下毛泽东的身影。毛泽东在永新的旧商会召开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情景、毛泽东骑马上九陇山视察工作，也来到她的家乡黄竹岭的情景，这一切，不断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弄得她心烦意乱，想丢又丢不开，要再这样沉迷在过去的怀念中，她怕自己又要神经错乱了。她决定赶快回南昌去。于是她在回到永新的第三天，就离开这里了。以后贺子珍再也没有回去过。

寻找失去的儿女

一个时间有的是，却无所事事的人，不能从过去的回忆中寻找到慰藉，她又能从什么方面找到她生活的支柱呢？在1959

年她在庐山与毛泽东会见后，大病了一场，毛泽东松了口气，让李敏去找她的哥哥姐姐，想给贺子珍找一点精神的安慰。事实上，贺子珍在解放以后就曾多方托人寻找她丢失的儿女。

她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就是在龙岩降生的那一个，生下二十天就托给一户人家抚养，从此音讯全无。第二个是小毛，是1932年出生的，1934年10月红军走上长征的路，把他寄养出去了，从此下落不明。1934年3、4月间，贺子珍在沙州坝早产了一个七个月的男婴，生下来只哭了几声，三天后就死了。过几个月她又怀了孕，在长征路上生了个女孩。由于部队要行军，女婴刚降生就送了当地一个瞎眼的老太太。1937年红军到达保安不久，贺子珍生了李敏。没几个月，她又怀了孕，这就是夭折在苏联的男婴。

贺子珍知道，那个在长征路上送掉的女孩，是无法寻找的。她连在贵州的什么地方送走的，地名、村名都说不出；那个女孩无名无姓，连可以作为日后寻找凭证的一件念物都没有。她能够寻找的，只有两个孩子，一个是龙岩的女孩子，一个是江西的小毛。

在五十年代初，贺敏学就说龙岩的女孩子找到了，但把有关的材料送到中央，组织部门没有承认，只有贺敏学一个人把她认下了。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许多革命干部都象贺子珍那样，有一个寻找在革命战争中寄养在老百姓家的子女的问题。有的父母已经牺牲，还有确认烈士子弟身份的问题。由于战争年代的动荡，记忆的错误，以及寄养人家的流动，要确认找到的是谁家的子弟，是一件相当繁难、浩大的工程。在建国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部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从事调查研究和确认的工作。即使这样，纷争仍然不断，至今还有未了的公案。

贺子珍在寻找小毛的过程中，也卷入了这样的纷争中。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1979年7月28日曾经介绍过这件事，他说：“小毛是1952年在南京找到的，那时正是全国搞三反五反的时候。贺子珍听到这个消息后，跑到南京去看是不是小毛。她主要看两点，一是看这个孩子是否油耳朵，二是看他有没有腋臭，她认为她生的孩子都遗传了毛泽东的这两个生理特点。她看过后，认为这就是她的小毛。这时，朱月倩已经认了这个孩子是自己所生的儿子霍小青，是霍步青烈士的遗孤。双方为这件事发生了争执，朱月倩说贺子珍抢她的小孩。

“1954年，我到北京开会，毛主席知道我来了，派了一辆车把我接到中南海，谈了两个多小时。毛主席问了我，在红军撤离江西后我的经历。我一一说了。最后谈到了小毛。我告诉毛主席小毛找到了，还拿出照片给他看。毛主席问了小毛是怎样找到的，孩子读书如何。最后毛主席说，这事我不好管，你来管他，照顾他，你可以找邓小平嘛。邓小平当时在中央书记处任总书记。

“小毛在1970年初在上海结婚的，是同我的女儿一起办婚事，他们结婚的事都是由我来办的。婚后他有了一个女孩。文革中小毛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病得很重，医生确诊是肝癌。我马上给他回了一封电报，让他到一家医院去找我认识的院长。但听说电报没到人已经死了。”

这是笔记本上贺敏学谈话的记录。贺子珍本人没有谈到过她认小毛这个事实。但从贺敏学的这段谈话中看到，在中组部作出了“霍小青是革命烈士霍步青的遗孤，是朱月倩所生”的结论后，贺子珍与贺敏学并没有同意中央的这个结论，继续与霍小青来往，并且张罗了霍小青的婚礼。

有的杂志介绍说，在霍小青在北京101中学读书期间，贺

子珍曾去信正在北师大读书的李敏，让她照顾这个“弟弟”（应是哥哥而不是弟弟）。李敏并没有谈过她照顾这个所谓“弟弟”的事实。李敏是在结婚以后才上大学的。如果她是在北师大读书时奉母亲之命照顾这个“弟弟”，那么，也是在毛泽东让她帮助妈妈寻找哥哥、姐姐之后的行动。

李敏为了妈妈，在听到爸爸要她寻找哥哥、姐姐之后，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上。她曾经同孔令华一起，千里迢迢来到福建，专门去看那个被舅舅认下的“姐姐”。这个“姐姐”曾经几次被卖，经历复杂，而且已经有固定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谈不上什么亲情了。李敏虽然很想认这个“姐姐”，但这并不是她个人的愿望所能决定得了的。

1979年贺子珍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来到了北京，这时她已经偏瘫了两年多，缠绵病榻。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来到301医院，自称是小毛的爱人，她诉说丈夫去世后，她的生活艰难，要求贺子珍给她买一部电视机和录音机，贺子珍很坦率地说：“我没有钱。”她的表情淡漠，当时李敏也正在医院看妈妈，她也一点没有一家人亲切的表示。这个女人以后再也没有来过。

在这之后，一封发自福建的信件，送到了贺子珍的床前。写信人自称是她的女儿，她反反复复，悲悲切切地诉说她思母之情，要求到北京来，认她这个母亲。写信人可能就是贺敏学认下的那个女子。收到这封信后，贺子珍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波动，她流下了眼泪，晚上服用了安眠药也难以入眠。看得出，她很想让这个女子来看她，或者她很想认下这个女儿。但是有人提醒她：“你只有一半认女儿的权利，其他一半权利是属于毛主席的，而毛主席已经去世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不可能认这个女儿了。

这件事对贺子珍有很大的刺激，她的糖尿病的病情原来比较平稳，此时出现了较大的反复，使301医院负责她的治疗的医生紧张不已。贺子珍对这封信没有作复。事情不了了之。

从这些情况看到，贺子珍寻找子女的行动，都没有什么结果，或者说没有什么好的结果。认了霍小青之后，烦恼多于快乐，付出的比得到的多。她也实在是因为太无聊，太空虚，为了得到一点精神的慰藉，作出了这样的事情，她在这方面的过失，给别人造成了伤害，应该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二十二、初为人母的李敏

搬出中南海

李敏结婚以后，仍然住在中南海，同爸爸住在一起。她去南昌照顾了妈妈一段生活以后，回到了北京。她对爸爸说，她希望继续读书，毛泽东同意了。在选择专业时，她挑选了理科，学化学。她觉得自己中文不好，只能够学理工；而在理工科中，化学的公式比较严谨，一目了然，不需要借助更多的、复杂的文字说明，似乎好掌握一点。毛泽东对于李敏的选择，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她尊重女儿的选择，于是李敏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化学系。

在学习期间，李敏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宁宁。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第三代，他对这个胖胖的小外孙，十分喜爱，常常抱抱他，逗他玩。

李敏分娩以后，感到“爸爸供给制”有很多不便之处。在这里，一天三顿饭都由炊事员按照计划及伙食标准做好了，吃现成的。但产妇的饮食不能仅吃三餐，中间还要加几顿。在李敏坐月子时，孔令华不得不向管理员提出给李敏加餐的要求。这样，李敏在两餐之外又加了两顿点心。可是，他们夫妻俩仍有时不得不使用电炉，单独为李敏再煮点鸡蛋之类的东西吃。

李敏在生下宁宁之后，她的零用钱从每月15元增加到30元。虽然宁宁的吃用都从毛泽东的工资中拨出专款开销，但是由于孔令华的工资很低，李敏常常感到手紧，钱不够用。有一次，带宁宁的保姆说，小孩子的褥子太小了，没法用。而当妈妈的却拿不出钱来买新棉花给儿子做一条新的。她找出点旧棉花，找人重新弹了个褥子给儿子用。

在宁宁八个月的时候，李敏把儿子送到上海贺子珍处去抚养，每月给妈妈寄上15元宁宁生活费，拿李敏的话说是“转嫁经济危机”。贺子珍把宁宁带到两岁半，李敏才把他接回北京。

生完宁宁以后，李敏胖得象个水桶，但身体一直不好。她在分娩后大出血，得了产褥热，月子里折腾得比较厉害。六十年代不提倡避孕，李敏一次再次怀孕，又一次再次地做人工流产，有段时期大出血，身体亏得厉害，她仍然坚持在大学学习。

毛泽东看到女儿的身体弄成这样，很是心疼。他劝李敏说：“你不要再做人工流产了，再生一个吧，免得伤了身体。”

“我一个都养不起，还能再生孩子？”李敏为人妇后，深深地理解了当年妈妈过密的生育的痛苦了。

毛泽东回答说：“你就再生一个吧，我来替你养。”

李敏不愿意，仍然做了人工流产。

学习耗去了她的大部分精力，加上身体欠佳，又要带孩子，李敏在婚后感到很劳累，她早出晚归，无暇他顾，连爸爸都很少见面。

此时的江青，依然过着她那优哉游哉的皇后般的生活。她对初为人母的李敏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全无一点体贴关怀之意。这也罢了，李敏本来就没有指望过要

得到她的照顾。可恨的是江青不断地找李敏的麻烦。她见到分娩以后的李敏，经济拮据，就怀疑李敏偷她的东西吃，一会儿说她放在屋里的糖块少了，一会儿说饼干箱里的饼干下去了一大截，煞有介事地一次次跑来找李敏，问是不是她拿了吃了。李敏回答说没有拿。她不相信，说：“那放在屋里的东西怎么会自动变少呢？”

“我怎么能知道你屋里的东西怎么会变少的。”李敏不愿意同她发生冲突，冷冷地、淡淡地说。

江青不讲理，说：“你以后不要进我们屋里去，我屋里放着许多中央的绝密文件，丢失了，泄露了机密，谁负责？”

“我不会上你的屋去的，过去不去，现在更不会去。”李敏的话中软中有硬。

江青碰了个软钉子，走了。

但是她要刁难李敏的心思没有变，过不了几天，她又找岔来了。

闲得无聊的江青，迷上了摄影，她大概照了一组得意之作吧，找不到了，于是风风火火地跑到李敏的房间，铁青着脸，质问李敏：

“我的一叠照片不见了，是你拿了吗？”

“我没有见过你拍的照片，也没有拿过你的照片。”李敏平静地回答说。

“没有人拿，它怎么会自己不见了？”江青一贯霸道，蛮不讲理。

“那我怎么能知道它是怎样不见了的。”李敏的口气依然平静。

江青嘟嘟囔囔地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转回来了，对李敏说：

“准是有人拿了，没有人拿它不会不见的。”

李敏觉得她已经把话说清楚了，不愿意跟她纠缠，就没有再理睬她。

从来一呼百应惯了的江青，看到李敏对她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忍受不了，她尖声地叫了起来：

“要是没有人偷，它会自己跑掉吗？”

江青已经不是询问的口气，而是肯定的语气；她对照片丢失的性质从“拿”上升为“偷”，这是李敏所无法忍受的，她觉得她的人格受到了侮辱，登时火起，义正词严地反驳道：

“我从来不拿人家的东西，更不会去偷你的东西，你找不着东西问不着我。”

一向在江青面前表现出克制、沉默的李敏，此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针锋相对地同江青抗争起来。如果说，在她初到爸爸的身边，江青大闹西瓜诗时，李敏是害怕、辩解、委曲求全的话，现在不同了，她不再害怕得罪什么人，也不想作什么辩解，更不愿意委曲求全，因为她长大了，已经是一个有独立的意志的成年人了。

看到李敏一副不畏不惧，不卑不亢的态度，江青撒起泼来了，她一句紧跟一句地吼叫：

“我丢了东西问一句都不行呀！问一句你就发脾气呀！你现在了得了，是吗？你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吗？”

“不是不能问，是你先肯定了有人偷了你的照片，你找我来是问我是不是小偷，可我不是小偷，我没有偷你的东西。”

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各不相让。李敏在气头上，拍了桌子。这是李敏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江青发生如此严重的争执。

江青占不了便宜，又输了理，又哭又嚷：“你居然敢反驳

我，同我顶嘴，你竟敢对我拍桌子，不把我放在眼里，你欺负我！”她怎样在毛泽东面前告状，李敏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李敏仍然坚持一条，绝不为家庭琐事打搅爸爸，她以后见到爸爸，关于她同江青争吵的事，没有提过一个字。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李敏不愿意再同江青一起生活了。她在这个家庭中感到压抑，特别对江青欺凌谩骂照顾她生活的工作人员，十分反感。江青把周围的服务人员看作是比她低等的下贱人，而李敏的爸爸和妈妈，从来是平等待人的，李敏对江青的霸道实在看不下去。她体谅到爸爸的苦衷，对江青的无理取闹无可奈何，但是，李敏已经长大了，她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看江青的脸色，受她的闲气呢？

李敏向爸爸吐露了她想离开的想法，可是毛泽东不愿意让李敏离开他。他显然已经从江青的告状中知道她们之间发生的争执了，而且他也明白李敏想走与这次争吵有关。他没有同李敏提起这次江青与她的冲突，也没有问个谁是谁非，他只是充满感情地说：

“何必一定要走呢，我还希望常常能见到你同小孔呢。”

李敏妥协了，她知道爸爸爱她，愿意把她留在身边。毛泽东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这就是李敏同孔令华搬出丰泽园，在中南海另外找一处房子住下。

搬出丰泽园后，李敏同孔令华单独起火，自己做饭，不到爸爸那里吃饭了。他们时时抽空回去看看毛泽东，有时见得着，有时见不着，父女的关系明显地疏远了。不过，毛泽东仍然惦记着这个女儿，有机会见到面，他一如过去那样慈爱，特别喜欢逗小外孙玩。有时李敏多日没来了，他还会过去看他们，了解他们生活的情况。

李讷曾经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高干子弟的一个弱点就是

不会生活。这是由于环境造成的。毛泽东对儿女们要求很严，要他们艰苦朴素，不要特殊，这些使儿女们日后得益匪浅。但是他们在“爸爸供给制”下长大，饭有专门的炊事员做，衣服也按规定做好，基本上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他们没有机会下厨房，不知道饭是怎样煮熟的，菜是怎样炒出来的。一般女孩子都擅长打毛衣做针线活，她们都不会，因为她们没有实习的机会。

李敏的情况也是如此。她搬离爸爸的家后，基本上是吃大食堂，有时自己做一点，但做出来的饭菜的水平，比大食堂的饭菜还不如。她曾经自嘲地说过，她最拿手的一道菜是炒鸡蛋，而外面传言她做得最好的是水煮土豆，反正水平不高就是了。在这方面，孔令华要比李敏强得多。

李敏和孔令华在中南海单独过了一个时期，他们仍然感到在中南海住着有很多不方便之处，李敏呢，还发现了自己生活能力低的弱点，觉得只有过完全独立的生活，才能锻炼提高自己。他们两个人都同意搬出中南海。

这次，他们决定不找爸爸商量了，怕爸爸还会拦阻他们，而是改为给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报告，报告是孔令华执笔，以李敏的名义写的。在这份报告里，李敏说，我已经长大成人，需要独立进行生活的锻炼，才能更快地提高。我希望离开中南海，搬到外面去居住，以便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孔令华起草了报告后，李敏看了一遍，同意了，她自己抄了一遍，送到中办去了。

李敏完全知道，中办对她这份报告的意见，也就是毛泽东的意见，中办肯定要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才会作决定的。李敏当时没有直接同爸爸提出这个要求，而是拐了一个弯子，通过中办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思，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曾经表示

过不愿意李敏离开他，他们怕毛泽东再次拦阻；二是在五、六十年代，共产党的威信非常高，人人崇尚思想改造和锻炼，年轻人为了表示自己坚定的决心和要求，不是向个人而是向组织上正式打报告，这是组织观念强的表现。

李敏要求搬出中南海的理由是充分的。一向支持儿女们进步要求的毛泽东，再舍不得女儿离开，也不可能拦阻。当年毛岸英要求去朝鲜战场锻炼，毛泽东就说过：“支援抗美援朝，我们家责无旁贷。”他没有拦阻，结果儿子牺牲在前线。如今，李敏提出要独立生活，他怎么会拦阻呢。在李敏的报告送出几天以后，毛泽东把李敏和孔令华找来，对他们说：

“你们要自立更生，锻炼提高，我不反对，支持你们的行动。李敏还在读书，我仍然负担你的生活，每月给你60元生活费。”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我也知道你们在这里的日子不好过，离开了，少受气也好。”

于是在1961年李敏结婚两年之后，他们夫妻搬出了中南海，住进了中办的宿舍。1963年，李敏因病退了学，分配到国防科工委工作，这才搬进了现在住的国防科工委的宿舍。

李敏工作以后，拿到了工资，她觉得不应该再从爸爸那里领取生活费了。她给中办打了一个报告，申明以后不再领取爸爸的补贴。从这个时候起，李敏真正开始过一种独立的、普通干部那样的简朴的生活。

对于搬出中南海的决定，李敏至今不无惆怅，她说：

“那时候我年轻，不愿受江青的气，另外，还有一股革命热情，竟怎么说就怎么干，要身体力行去锻炼自己，觉得是义不容辞的。可是我搬出中南海后，也没有锻炼好，却很难见到爸爸了。我见到爸爸的次数越来越少，开始一两个月见一次。以后一年半载都见不到一次。妈妈对于我搬出中南海一直是有意

见的，她批评我只顾自己，不照顾爸爸。在爸爸去世时，她再次提出这个意见。我觉得，妈妈的意见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我离开中南海后，江青也离开爸爸单独居住了。如果我当时不坚持要搬出去，再忍一忍，我就可以留在爸爸的身边，更好地照顾他，爸爸的晚年不至于那么孤独和寂寞了。”

陪妈妈看社会主义

李敏自从南昌归来，同爸爸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后，她就自觉地挑起代替爸爸，照顾妈妈的任务。

按照贺子珍的级别，她每年夏天可以出外避暑，李敏就利用这个机会，陪妈妈到各地去转转。有时是李敏、孔令华还有小宁宁一起，陪着贺子珍出游。有一年，李敏因静脉曲张动了手术，不能陪妈妈出去，第二年她利用病假的机会，整整陪了妈妈三个多月。

她们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天南地北，她们不仅观光了名山大川，而且参观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貌。

贺子珍在苏联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了。从延安简陋的窑洞一下子来到宽阔的柏油马路，踏进豪华的百货商店，贺子珍宛如走进一个理想的世界。那时我们的祖国战乱频仍，满目疮痍，与苏联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贺子珍从那时起，就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苏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苏联的东西都是先进的，优秀的。

在回国以后，每当她买到质量低劣的国货时，贺子珍除了要评价几句表示自己的不满意以外，往往要添上一句：“看人家苏联的。”言下之意，我们同苏联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贺子珍同李敏一起参观了我国的建设以后，她的看法改变了。她来到纺织厂，看到纺织女工织出漂亮的花布，不禁赞不绝口。她来到丝绸厂，看到色彩绚丽的织锦缎子，更是爱不释手。来到工艺美术工厂，那些神态逼真、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品，她赞叹不已。当她走进钢铁工厂，那高耸入云的巨型高炉，出铁水时的壮丽景观，都使她大开眼界，目不暇接。她深深地受到感染，“真是好！”成了她的新的口头禅。

祖国山川的壮美，也浸润着她干涸的心田。她们母女俩曾去过葡萄沟，那漫山遍野的葡萄，连院子，路边都种满了葡萄，贺子珍看的开心极了，忍不住用手去摸摸，摘上几个放在嘴里尝一尝。她们还去过一个山沟，攀上又陡又窄的山路，看到了还未采摘的宝石，一撮撮，一蓬蓬地生长着，就象蘑菇一样。她们原来以为宝石是从石头上提炼出来的，到这里来一看，才知道宝石竟然是长出来的。她们来到这里，宛如走进了一个珍奇瑰丽的童话世界。贺子珍满面笑容，情绪好极了。

她们的足迹遍及苏州、无锡、杭州、莫干山、青岛、烟台、广州，她们还去了海南岛。在海南岛，她们得到了一块硕大的珊瑚石，这块珊瑚石要两三个人才抬得起来。它的形体奇特，错落有致，表现出一种自然的美。母女俩围着珊瑚石，高兴得转了一圈又一圈，还看不够。

这时的贺子珍，眼绪中闪射出兴奋的光辉，快乐得象个孩子。她同女儿热烈地讨论，怎样才能把它带回上海去。她们设计了一个又一个方案，又一个一个地否定了。她们开始想用飞机运走，一讨论，这不行，珊瑚的体积那么大，恐怕连飞机的大门都进不去。用汽车拉，然后轮船运，水陆兼程的办法，也不行，从海南岛到上海，千里迢迢，中转工作由谁来办理呢？

最后还是李敏出了个主意，把珊瑚石周边一些次要的部位打掉，剩下核心的精华部分，这样体积缩小了，托运也比较方便了。

每一年的夏天，贺子珍同李敏一起出游，这是她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刻了。

轮到李敏严厉教子了

自从李敏把儿子宁宁送到妈妈的身边，由妈妈来抚养，李敏发现，妈妈的情绪好多了。贺子珍很大一部份注意力集中在小外孙的身上，为他的生活起居操心，手上有可以忙碌的事，心里有需要惦记的人，生活觉得充实多了。特别是小孩子一天天在长大，越来越讨人喜欢，童稚的天真和可爱，常常逗得贺子珍哈哈大笑，在这个时刻，她的烦恼没有了，显得又开朗、又温柔。李敏觉得，天伦之乐是填补妈妈心灵空虚的一剂良方。以后第二个女儿东梅降生时，她就在妈妈那里生产。在妈妈那里住了一个时期。东梅从3岁到6岁这段时间，也是在贺子珍身边度过的。

贺子珍对待女儿李敏是很严格的，可以说是严厉的，以至李敏已经结婚，做了妈妈，对贺子珍仍一定程度地怀着敬畏之情。可是贺子珍对于小外孙，却是百般地宠爱，在李敏看来有时候已经达到娇惯的程度。这是否人们常说的隔代亲的缘故？现在轮到李敏为儿子的教育操心了。

贺子珍在平时，在一般的情况下，是能够比较冷静地处理好小宁宁的正当要求和无理要求，对无理的要求加以拒绝。可是她有一个弱点，这就是听不得孩子的哭声。孩子一哭，她的方寸就乱，如果小外孙狂哭乱叫，她就会从冷静变得烦躁，放弃任何原则，迁就小外孙的无理要求，娇惯的现象就出现了。

李敏对妈妈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怕妈妈把宁宁宠坏了。有一次，她当着妈妈的面，“整”了小宁宁的“风”。小宁宁做错了一件事，不肯认错，还哭着耍赖。李敏把他一个人放在一间屋子里，对他说：“你如果不承认错误，你就待在这间屋子里尽管哭；你如果承认错了，你就不要哭，自己走出来。”开始，小宁宁在里面嚎啕大哭。此时的贺子珍，已经急得坐立不安了。她看看李敏，稳稳地坐在那里，不动声色。她不好意思破坏李敏的“整风”计划，只得心急火燎地在外屋来回地走动、渲泄她那烦躁的心情。过了不久，里屋的哭声停了，再过一会，小宁宁自己走出来了，他承认了错误。贺子珍看了看李敏，她不得不承认女儿的做法是对的，李敏的确长大了，她挑起了做母亲的责任。

小宁宁的降生，给了贺子珍很大的安慰，但是李敏并不想让孩子长久地留在妈妈的身边。从孩子的长远考虑，她认为应该让他接受集体的教育，把他送进托儿所。李敏说：“我对子女的严格要求，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

此后，不管贺子珍是否意识到，是否承认，在她与女儿之间，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们原来的关系颠倒过来了。贺子珍从教育者、保护者的身份，变成被教育者和被保护者，而李敏则相反，她从被妈妈教育和保护转变为保护和帮助妈妈。她挑起了代替爸爸照顾妈妈的责任。她对妈妈的关心是全面的，从精神上、身体上到生活上，都倾注了热情。贺子珍后来的发型是李敏帮她设计的。六十年代中期，贺子珍把留长的头发梳成两条小辫子，盘在脑后，这样不便于梳洗。李敏把妈妈的辫子打开，帮她洗了头，然后把头发剪短，从中间对分。这一来，贺子珍显得利索多了。以后贺子珍一直保持这个发型，直至去世。

二十三、在“文革”的狂飙中

李敏不知该革谁的命

在五十年代，中国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但这些都对李敏的触动都不大，这是因为那时她年纪还小，正在学校读书，她专注的是触的学业，对社会上的政治运动不大关心。

但是，1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则不同了。这是一个震撼世界、震撼全国人民的政治运动，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而且，年纪越轻，越是这场革命运动的主力，被称作革命小将。

当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时，全国人民沸腾了，李敏全身的血液也沸腾了。

陶斯亮在一篇回忆聂力、李讷、林豆豆的文章中说到李讷对她的爸爸的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以后又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桥边，面对着广场上的百万民众，席地而坐，微笑着缓缓地抽着烟。李讷也走下天安门，站在离毛泽东仅50米的地方，兴奋地对陶斯亮说：

“你看爸爸，神采奕奕多健康！多精神！我们该有多幸福！”

李敏对爸爸也有着很深的崇敬，她觉得爸爸是伟大的、睿

智的，而且也一定是正确的。她同她那一代人一样，在对这场运动还很不理解的情况下就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

她当时在国防科工委工作，不住在毛泽东的身边，因此，在文革初期，她没有李讷那样的气势，成为毛泽东的化身或代言人，但也是亦步亦趋，在国防科工委就地造反。由于她是毛泽东的女儿的特殊身份，出身好，很快就成了一个革命派的一个头头。

李敏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那时是满腔热情地去闹革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造反，可是应该去造谁的反，并不知道，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我开始是保聂（荣臻）的，后来又成了反聂的了，一场混战，自己都不知道怎样才是真革命了。”

然而，既然当了造反派，就得造反，就得有造反的目标。有一次，有人提出要揪斗国防科工委的负责人之一赵尔陆，要把他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敏看了看揪斗的材料，似乎说明不了这个问题，她觉得没有把握，就来到中南海，向父亲讨教来了。

这次她很快见到了爸爸，毛泽东拉着女儿的手，慈爱地抚摸着，问长问短，和蔼可亲。每次见到女儿，他都是满心的欢喜，总是说：你多回来看看我呀。

李敏在谈了一会儿家常后，就转入了正题，谈到要揪斗赵尔陆的事。她的话还没有说完，没想到毛泽东的脸陡然变了色。刚才还是一派清风明月，温良慈爱的毛泽东，此时却满脸的怒容。他呼吸一下变得短促，拉着李敏的手变得冰凉，而且不断地颤抖。他暴怒了，厉声地说道：

“赵尔陆是上过井冈山的人，他是革命好同志。是谁决定要批斗他的？”

看到这个情形，李敏简直吓坏了。她连忙紧紧地拉住爸爸

的手，不住声地说道：

“爸爸，您别生气，您千万别生气，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您的身体要紧。”

过了好一阵子，毛泽东的情绪才平伏下来。他对李敏讲述了赵尔陆忠于革命的故事，让她回去告诉单位的造反派，不许揪斗赵尔陆。

李敏轻轻地点头说：“我一定传达爸爸的指示，按爸爸的意见去办。”

那天，李敏在爸爸身边逗留了好久。她打来了一盆水，帮爸爸洗了脚，穿上了睡袍，照顾爸爸休息了，才离开。

这是自从1949年李敏来到爸爸的身边以来，爸爸第一次冲着她发火。当然这次发火也不是对着李敏个人而来的，而是对揪斗赵尔陆不满意。

在这之前，李敏见过爸爸发过两次脾气。一次是为了修露天舞厅。国家干部在周末跳交际舞的风气在建国初期仍然盛行。中南海里原有一个室内舞厅，那时候没有空调，夏天在室内跳舞，气温比较高。于是有关部门就在跳舞厅的外面修了个露天舞池，舞池下面有三个涵洞，流水可以从这里通过，这样，人在上面跳舞，凉快多了。毛泽东知道了，十分震怒，认为这是干部搞特殊化，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批评了搞这项工程的有关人员。

还有一次是在六十年代初，中南海建室内游泳池的事。那时，小宁宁已经出生了。修室内游泳池，毛泽东事先不知道。等他发现时，已经修得差不多了。那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人们连饭都吃不饱，却大兴土木搞室内游泳池，毛泽东十分恼火，发了脾气。他发誓说，他绝不上那里去游泳，也不许他的子女到游泳馆去游泳。

他这样批评兴建这项工程的负责人员：

“室内游泳池到了冬天，要把游泳池的水烧到一定的温度才能下去游泳。你想想，这不是一小壶开水，而是满满的一大池子水。这里的水还要不断地更换，这要烧掉多少煤呀。国家那么困难，却把钱花在这个上面，你能不痛心？”

修建游泳池的全部费用，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补上了。他的确从来未去那里游过泳，以示反对。这个室内游泳池只在夏天放水，到了冬天就不放水，为了节约煤炭。

毛泽东同李讷也生过一次气，也是为了游泳。中央住进中南海后，曾经把中海与南海挖深，放养鱼苗。为此，管理人员作出规定，不许游泳。年幼的李讷不听话，偏要下去游泳，毛泽东知道了，发了一通火。

李敏笑着说：“其实中南海里的鱼长不大，不是因为游泳，而是在挖深中海与南海时，把草拔得太干净了，鱼儿没有可吃的东西，也就长不大。”

“我是最爱吃鱼的。有一次，周末回家，炊事员对我说，我今天一定要做条活鱼给你吃。可是从中南海打捞起来的鱼太瘦小了，煎炸以后连肉都见不着了，鱼的骨头都露了出来。炊事员说，这太丢脸了，不能给你吃。我说，就是这样我也喜欢吃。炊事员说，不行不行，拿不出来，我还是给你做点肉吃吧。以后，割了草扔到海里喂鱼，鱼才长大了。”

毛泽东这次为了保赵尔陆，竟动了肝火，他对赵尔陆的态度，李敏是明确了。那么，对其他的老干部呢？有的也是上过井冈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投身革命，他们功高盖世，这些人难道也会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在这方面，李敏仍然是大惑不解。

李敏哪里知道，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所保的人，何止是

赵尔陆一个。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说，毛泽东在文革中保了很多入，很多省的省委书记如谭启龙、杨尚奎、刘俊秀，都是毛主席保下来的。宋庆龄不许斗，也是毛主席说了话。保陈毅，保贺龙，也是得到毛主席的同意的。贺龙住进周总理的西花厅，是周恩来通过汪东兴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说，就让他在那里住着嘛。还有一些人，毛主席也保进了中南海。林彪要整贺龙，要周恩来的警卫员搜查贺龙，说他把枪带进西花厅。警卫员请示汪东兴该怎么办。汪东兴说，他没有带枪进来，你就如实报告嘛。

汪东兴还谈到：“在文化革命中，毛主席对刘少奇看来是有些想法。他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红色资本家等理论，毛主席不同意。在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事先并未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要整整他的想法是有的，但是他的惨死，是瞒着毛主席的，毛泽东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如此说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初衷是要反修防修，并不是要打倒一大批的老干部。然而由于林彪以及江青等人的干扰，他的意图未能得到完全的体现，甚至是歪曲了他的本意，致使这场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浩劫和灾难。

这一些想法，当时的李敏是并没有认识到的。她只把保赵尔陆看作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与其他的老干部的被保和被打倒，没有内在的联系。她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指令，也同千百万的人民一样，为最高指示的发表，半夜从家里赶到单位，敲锣打鼓地上街游行，欢呼。

而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毛泽东，在当时，也未必看得清楚。他按照他的设想，一步步地将运动推向前去。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出了“五、七”指示，提出军队要学农、学工，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学生，要以本业为主，

兼学别样。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在这以后，五、七干校创建了，毛泽东作了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全国掀起了干部下放的高潮。

毛泽东不仅把广大干部下放了，而且把两个女儿也下放了。他对李敏和李讷说：“你们也应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两个女儿果真按照爸爸的指示去做了，李讷下放到中办的农场去劳动。汪东兴让李敏也一起上中办的农场去。李敏不同意，说：“我有自己的工作单位，我同自己单位的人一起下放。于是她来到国防科工委在河南信阳的农场劳动。由于李敏的身体本来不好，下放不久就病了，几个月后又回到北京。

江青对准了“革命”的目标

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的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捞到了政治资本。她在196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就更加不可一世了。她利用手中的权利，整治那些她认为是妨碍她、超过她以至仇恨她的人。她把她那套心毒手狠的看家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把一个个无辜的干部摧残至死，连眼都不眨一下。她把毛泽东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方针，篡改成打倒她所不喜欢老干部，打倒她所不喜欢的人，她要把她想打倒的人通通打倒。在这个过程中，她把目光也对准在家庭内惹得她不高兴的人。

她没有忘记李敏给过她的羞辱，她要发泄她的心头之恨。

在文化革命初期，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北京的高等院校是江青一伙人操纵的主要的阵地，被称为学生中四大

领袖的造反派们，在学校兴风作浪，完全是按照江青的意志行事。江青还常常到一些重点的院校去煽风点火。此时，她那原来既怕风、又怕声的多病之躯变得什么都不怕了。

不久，有一股邪风从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那里刮起来了。一时间，“孔令华是埋在毛泽东身边的定时炸弹”“李敏是保皇派”、“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孩子”等等，流传极广，危及到他们的造反地位和他们所在的造反派的地位。

正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进行革命造反的李敏和孔令华，没有想到这场革命竟然会革到他们的头上来了。他们感到生气，也感到困惑，决定回去看看爸爸，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动向。

他们在中南海的门口等候了多时，才被允许去见毛泽东。他们刚踏进家门，迎面碰上了江青。此时的江青，已经不是用打扑克来消磨时光的模样，她摆出一副极其匆忙、不可一势的架子。她还改了装，往日那些花里胡哨的装扮、服装，全收起了，改穿上布军衣，戴上布军帽。

她已经不同毛泽东住在一起，而是住到了钓鱼台，她到中南海来是找毛泽东谈什么的，正好碰上李敏夫妻也回来了。这个爱记仇的女人，当然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来表达她对李敏的不满。她用一种讥讽的口吻，大声地说：“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搞运动，回来干什么？想摸底呀！”

毛泽东已经知道李敏他们要来了，正在等着他们，听到江青的话，知道女儿、女婿到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门口，对李敏说：

“当小保皇有什么不好，保我这个老皇嘛，不是保小皇，是保老皇嘛！”

他又冲着江青说：

“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

理！”

江青无言以对，悻悻地走了。

毛泽东看到女儿来了，满心的欢喜，从李敏的身体问到小外孙的情况。在李敏的心目中，发动如此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舵手和导师，仍然是慈祥的父亲。

毛泽东也听取了李敏和孔令华对本单位运动情况的汇报，作了一些原则的指示。他们似乎真摸到了什么底，高高兴兴地走了。

此后，在北航，看不到对孔令华的攻击的标语和大字报，在国防科工委，也听不到对李敏生母是谁的议论了。这是否江青看到了毛泽东对他们的保护的态度，有所收敛的表现呢？

然而，江青要趁文革混乱之机整治李敏的心并没有死，她又想出新花招来了。

一天李敏下班回到家里，一只高音喇叭正对着她的窗口吼叫：“砸烂干部食堂！实现官兵平等！反对资产阶级小姐生活作风！反对讲吃讲喝！”这几句话来回地播放着。

李敏走到窗边一看，她家正对面的干部食堂前人头济济，一群红卫兵正往食堂的大门上贴封条，他们配戴的红袖章上有“哈军工”的字样。李敏马上就明白了，这是江青借毛远新的手搞的鬼，她要报大食堂之仇来了。什么资产阶级小姐生活作风，什么讲吃讲喝，都是江青诬蔑过她的话，现在搬到大喇叭上来嚷叫了。

李敏气愤地把窗关上，对孔令华说：“江青要报复我一个人，为此打击一大片。这喇叭吵得四邻不安，让院里所有的干部日夜没法工作休息，还让所有的干部都到战士食堂去吃饭。江青真要讲平等，她自己为什么要住招待国宾的钓鱼台，为什

么要单开小灶？这是个两面派，是个利用政治报私仇的人。”

“我们对她是要多长个心眼才行。”孔令华表示同意。

第二天，李敏给毛远新打去了电话，警告他说：你不要做得太过份了。国防科工委里不仅有资产阶级小姐，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呢。

几天以后，喇叭哑了。但是，被封的干部食堂，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起来。

江青还要报“西瓜诗”之仇。她把手伸向了贺子珍这个不幸的人。

1989年1月16日，汪东兴在谈话中介绍了如下的事实：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想把贺子珍从上海搞走，把她弄到西北去，不让她在上海居住。她自己不出面，却要陈伯达出面来办这件事，要陈伯达请示毛主席。陈伯达就来找我，说要把贺子珍从上海搞到西北去。陈伯达一讲，我就知道这准是江青的主意。我就对陈伯达说，你是要我转报，还是要我通知毛主席有人要向他报告。陈伯达不敢去主席那里报告，连忙说，由你转报最好。这样，我就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说，‘把贺子珍搞到西北去，人搞走了，思想能搞走吗？贺子珍是有思想的人嘛。每个人都是有思想的嘛。我不同意，这是谁出的主意？他们有本事他们干，我不同意。’我把毛主席的话转告陈伯达，陈伯达不敢动了，这样贺子珍在上海才没有动。”

看得很清楚，李敏、孔令华和贺子珍，都曾经是江青要“革命”的目标。她没能搬动他们，不是她不想，面是她不敢，不能。毛泽东这把红色的保护伞保护了他们。要不是毛泽东说了话，西且态度鲜明、坚决，他们的处境会是怎么样呢？

“文革”中贺子珍一家

在“文革”中，对于毛泽东曾经保护过她，贺子珍是一无所知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她本来就是一个游离于中国政治生活之外的大闲人。全民开展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她是漠然处之，她仍然沉浸在个人的不幸与哀怨之中。但是，这场运动的冲击波是如此之大，她想躲都躲不开。

最先的告急信来自她的哥哥贺敏学。当时贺敏学正任福建省副省长，造反派给他安了个走资派的罪名，把他关了起来，还抄了他的家。李立英没办法，只好给贺子珍和李敏写信求助，贺子珍是没有办法可想的，她只能托人给李敏捎话，让李敏报告毛泽东。

李敏真的去找了爸爸，告诉他舅舅被抓起来的消息。毛泽东听了后，答应了一声“哦”，就没有再说什么。

李敏着急地说：“舅舅的事，我管不了。”

“对，这事你是管不了，”毛泽东说：“你的舅舅是个好同志。”

毛泽东这一次没有出面去保贺敏学，但是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曾经突然重提1930年富田事变的事情。那时有一些革命的叛徒，打着“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制造分裂。那时曾山是江西省政府主席，陈毅是特委书记，都被抓起来了。贺敏学在东固被作为毛泽东线上的人抓了起来，要把他拉出示众，然后枪毙。贺敏学为毛泽东保存了六个文件箱，他怕毛泽东不了解情况，说服了看守，给毛泽东送去一张条子，报告了反革命的叛乱的情形。毛泽东在九大讲话时，提到了一个条子，还点了曾山的

名，说，曾山你当时也在。但毛泽东讲话中没有提到贺敏学的名字。毛泽东对李敏说，你舅舅是个好同志，说明他对贺敏学是有认识的。贺敏学送条子事他也记忆犹新。可能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他觉得自己不便多说话，对贺敏学在文化革命中被抓没有出面去保。于是，贺敏学在这场斗争中被关了八十多天，他再次为毛泽东坐了牢。待到造反派们把他放了出来，他的官也被罢了，一直处在被审查的地位。

紧接着，永新的家乡也告了急。贺子珍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贺敏萱，在父母兄弟一家人都参加革命以后，无以为生，只得躲到庙里当了斋工。以后他入了党，以斋工身份作掩护，为共产党传送情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宗教地主、假党员，被整得死去活来，夫妻俩含冤死去。

这场运动也祸及了贺家的第二代。贺怡的一个义子在1968年被活活打死，他原是上海铁路局的保卫处长。贺敏学的女婿是叶挺的儿子，由张春桥点的名，把他打成五一六分子，逼他揭发周恩来。

这些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促使着贺子珍不得不好好地想了想了。

事实上，不仅是贺子珍的一些亲属被揪、被斗，有的迫害至死，连她自己也深受其害了。毛泽东发了话，制止了江青要将贺子珍迁往大西北的计划，但江青不会就此罢手的，她要变着法子来整治贺子珍，以泄她的心头之恨。她以“防止贺子珍不良影响扩散”为名，把贺子珍与社会隔离开来。过去江青利用她在上海的影响，不许贺子珍出来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防扩散的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提出的防扩散的措施又进了一步，这就是除了亲属之外，不许她与外界往来。在贺子珍在上海湖南路住所的附近，经常有穿便衣的人在这里游动，看见

有陌生的人来敲贺子珍家的门，就上来把他们带走，加以盘问，并勒令他们马上离开，不许去见贺子珍。

开始贺子珍并不知道这种情形，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她家的门前为什么变得冷落了。直到有一次，遇到一个故人，她才明白过来。这位老乡亲告诉她，他按着门牌地址，找到她的家，正要按门铃，突然上来两个人，不问情由把他带走，带到一个派出所，严加审问。他被扣上“反革命”、“流氓”、“骗子”一大堆吓人的帽子，关押了两天，被驱逐出上海。

后来贺子珍才知道，她这个与世无争的人，她在上海的“保卫”工作，竟是徐景贤亲自过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是个被划了圈子软禁起来的人。

她很清楚，这是江青的所作所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青云直上，她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她无法了解江青是借着什么风上去的，她有多少管理国家的能力，但是她了解江青的为人，自私自利，恶毒刻薄，这同我们党的传统作风没有一点相同之处，她不敢相信，这样的人还能成为革命的旗手，还能为人民服务？

贺子珍执着地忠实于自己的爱情，她是怀着一种良好的愿望，满心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幸福、快乐。只要江青体贴、关怀毛泽东，她就感到无限的欢喜。她甚至用宽容和大度来对待江青对她的诋毁和中伤，就在贺子珍知道，由于那首西瓜诗，江青扬言要对她作组织处理时，她都没有想到要对她采取任何报复的手段。就在那年寒假期完毕，李敏要返回北京，贺子珍照样给江青和李讷各备了一份礼物，她希望江青能够善待毛泽东。

但是，当 she 从各种渠道听到江青对毛泽东不好的消息，不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还同毛泽东分居，她对江青的态度完全变了，觉得江青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是个令人憎恶的人。她忘记

了自己的哀愁，却为毛泽东的孤寂而发愁了。她常常对李敏说：“你的爸爸也是很孤苦、很寂寞的，你要多体贴他，多去看望他。”

贺子珍由于心理压抑造成的精神障碍还不时地发作，但这并不妨碍她关注着社会，关注着那些新的权贵们。

同毛泽东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她养成了仔细读报的习惯。每次看报，她都要拿一支笔，一面看一面在上面作符号，把重要的地方扛出来，圈出来。每次见到李敏，她都要提醒她要有政治头脑，要注意政治风云。对于同在上海居住的她的侄女儿贺小平、外甥女贺海峰，她的告诫就更多了，她建议她们一定要每天看报，看政治风向，看国内外大事，她还常常把自己读报的心得告诉她们，帮助她们掌握读报的重点。

贺子珍还在她的台历上，记下了文化革命中的一些重要的事件和新的口号和提法，比如，“要文斗不要武斗”，“人贵有自知之明”等，她还把江青臭名昭著的口号“文攻武卫”也写到台历上了。这个受到毛泽东严厉批判的口号，贺子珍把它记下来，与毛泽东倡导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写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把江青的罪行一笔笔地记录下来呢？

就这样，李敏与贺子珍，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狂涛中，她们同江青的恩恩怨怨，也在继续着、发展着。

二十四、晚年的毛泽东

李敏难进中南海

不管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政治的口号喊得多么震天价响，江青让全国人民只看的几个样板戏，完全排斥爱情，但人们仍然要生活，结婚，生孩子。

李敏在积极参加了一段斗私批修以后，也怀了孕。她是到上海贺子珍那里生第二个孩子的，这一胎生的是女孩，取名东梅。这时，孔令华也离开北航，调到三十八军工作。三十八军驻防在保定。这样，李敏和孔令华有一段时期不在北京。他们即使在北京，也是既忙工作，还要照顾孩子，管理家务，忙得不亦乐乎，同爸爸的关系疏远了，见到爸爸的次数更少了。

从李敏内心来说，即使再忙，她是很想多去看看爸爸的，妈妈多次嘱咐她要多照顾爸爸，无奈中南海的大门难以进去。1974年，有一次，她在中南海的大门外等了半天，没能见到爸爸。她非常气愤地对门卫说：“过去我随时都能进去看爸爸，现在搞文化革命，难道父亲和女儿都不能见面吗？”李敏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眼泪要掉下来了。

当然，李敏也知道，跟这些门卫说不上，他们不过是执行者，见还是不见，见谁不见谁，不由他们来决策。但是，在门

口空等了半天，等了一肚子气，一肚子的委屈，不管对谁，说上两句，心里也好受一些。

那么，阻挡李敏去见爸爸的，是谁呢？是毛泽东。毛泽东曾经下过一道命令，不得他的允许，任何人他都不见。有几次江青坐着小车来，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见，江青只得走了。

李敏住在外面的，要跨过中南海的红墙，去见父亲，她觉得很困难，这堵红墙对她来说，是很难逾越的。李讷就住在中南海，与毛泽东在一堵墙里，她想见见父亲，也并不容易。

有一次，天真的李讷听信江青的谗言，到毛泽东的房间东看看西看看，看有没有窃听器，不小心碰倒了一些什么东西，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生气了，要李讷马上出去，而且对她说，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到这里来。

李讷同爸爸原来就不在一起吃饭，接触的机会本来就很少了，现在再有这个规定，要见到爸爸就更困难了。她曾经感叹地说过：

“普通的人家，父母亲和子女朝夕都可以见到面，即使不住在一起，想见就能见到。而我要见爸爸，不是随便能见的，要先提出要求，作出安排，这才能见到。特别是文化革命以后，主席很忙，很辛苦，我不忍心打扰他。哪怕是几分钟的时间，都不愿意打扰他。有时候实在想看看他，就从窗缝里往里张望，偷偷地看上一看，就心满意足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是不是不愿意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的女儿呢？并不是这样的，起码在文革的初期和中期不是这样的。

李讷记得，毛泽东曾经两次派她去看李敏，了解她的近况，因为毛泽东好久没见到她了。毛泽东第一次派李讷去看李敏，是在文化革命的初期，那时，李敏在国防科工委，她作为

工作组成员进驻。以后工作组撤了，李敏可能会受到冲击，情绪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毛泽东很惦记，让李讷去看看姐姐怎样了。李讷奉爸爸的命去了，转达了爸爸的关照。

还有一次是文革中期，李敏好久没有进中南海看爸爸了，毛泽东很想念她，又叫李讷再去看看姐姐生活得怎样。李讷去了，讲的无非是关心问候之类的话。

那么文革后期呢？

文革后期，毛泽东已经到了晚年，他疾病缠身，白内障使他几乎双目失明，行动困难，这些，都使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犹如被捆住四肢的雄师，无法实施他的雄心壮志，产生英雄迟暮的慨叹。身体的衰老，大大地限制了他的行动，这已经使他十分痛苦了，尤其令他万分烦恼的是，他以惊人的胆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目的。

他曾经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过，我办事从来不后悔。事实上，他在很多事情上是后悔的。他承认过，他同江青结婚是过于草率了，江青没大过错，不好离婚，而且按照他的身份，这样做影响也不好，只得凑合着过。这是婚姻上的后悔。而他最大的后悔是看错了一批人，用错了一批人。

汪东兴曾经介绍过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情形，在1971年林彪出了事，毛泽东异常痛苦，他说：“是我瞎了眼。”他的身体明显地衰老下来。以后对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都很失望，说，我看错了一批人。在延安时，毛泽东说过，我们党内有五十个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就行了。王洪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经过毛泽东点头的，但这个人并不真懂马列主义，甚至连马列主义的皮毛都不懂，毛泽东对于自己把他选作接班人，是很后悔的。

他对于江青，毛泽东不仅是在婚姻方面后悔，他对于这个

人在文革中的行径也是很很不满意的。林彪把江青抬了出来，江青是借着林彪的力量从一个无名之辈一下子上升到政治局委员。开始，她与林彪伙在一起，毛泽东要把他们扯开都扯不开。给江青从九级，提到五级，也是林彪干的。连中办主任汪东兴都不知道。以后报告了毛泽东，他很生气，明令把多发的钱都退回去。江青和林彪，是后来才分成两派的。江青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是九大选的，那次会是两派的权力分配。

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作所为不满意，是越来越严重，不让她插手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以至提出了“上海帮”，“四人帮”的批评，为以后中央采取行动，粉碎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依据。

越到文革后期，毛泽东越不想见江青，对她的批评越严厉，这是事实。江青通过服务员张玉凤，向毛泽东提出要三万元，作为她买照相器材之用，也很伤毛泽东的心，他明白，江青知道他身体不行了，想来要遗产了，为自己找退路了。他让张玉凤把三万元给江青存到银行里。

晚年的毛泽东，内心非常的孤独和寂寞，但他不愿意接触人。他下达的这道命令：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不管什么人，都不许进来，是他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反映。

毛泽东原来就很重感情，他在军事上、政治上非常刚毅果断，表现出非凡的雄才伟略和魄力。但是表现在个人的感情上，他又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往往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毛泽东是很容易流泪的，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的感情更加脆弱，常常表现出无名的伤感和不加掩饰的孤独。他讨厌江青，不愿意见到她，但是当江青表现出无情、伸手要钱为自己留后路，他又很难过，忍不住涕泪纵横。在毛泽东的身上，刚强与脆弱，粗犷与柔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他的鲜明的个性。这可能是他既

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诗人的缘故吧。

毛泽东深居简出，不愿意见人，但是对李敏他是非常想见的，他始终惦记着、爱着这个女儿。那么，为什么李敏来见爸爸，却见不到呢？

这可能有种种的原因：一是门卫没有把李敏的身份搞得很清楚。这个衣着普通的中年妇女，又不姓毛，却自称是毛泽东的女儿，这令人产生怀疑。因此，往里面通报时，口气并不确定，二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并没有把求见者是李敏这点向毛泽东说清楚。可能当时毛泽东正在休息，可能身体正不好，也可能正为公事忙碌。服务员不便打扰，没有通报，压下来了。在毛泽东的晚年，原来照顾他生活的人，也就是熟悉李敏的人，都换过了。新到毛泽东身边搞服务工作的人，并不了解毛泽东对李敏的特殊的深厚感情，也不能理解一个老年人想见女儿的心情，把她同江青一般对待，认为毛泽东也会同样不想见她，就拒之门外了。三是按照规定，由于毛泽东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见毛泽东必须事先申报，由中办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排出计划，什么人见多长时间，才能按时按候去见。可李敏还是按照六十年代的老皇历办事，什么时候想见就去求见，计划外的会见遭到拒绝，这是可能的事情。第四是李敏自己的认为，由于江青位高权重，她虽然自己无权随意去见毛泽东，但她有权在毛泽东的周围搞了一个外包围圈，比如通过当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限制什么人与毛泽东的会见。她不愿意李敏与爸爸的接近，这个倾向是明显的。

事实上，李敏这次想见毛泽东，也是为江青而来的。1974年，正是江青借毛泽东批林批孔的指示，掀起了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新浪潮。李敏同孔令华对这场运动有看法，他们似乎从中窥到了江青的野心。这时，他们已经从盲目的紧跟到开始

用脑子思考了。他们把一个时期以来江青的言行作了分析，准备了一份书面的东西，提出了江青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江青“以主席的代表、化身的身份出现，以谁也管不了的特殊地位，到处使用特权，破坏党的原则，个人专权”的问题。这份材料，他们不敢寄出，转交，怕落入江青之手。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十足的反革命，是要人头落地的。他们想直接向毛泽东作汇报，反映这些毛泽东可能听不到的声音。但是他们见不到爸爸，只得失望而回，回到家里，李敏大哭了一场。

花费了许多时光，精心准备的这份材料最终未能上达，只好不了了之。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在毛泽东病重，双目几乎失明，毛远新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以后，什么东西送给毛泽东看，什么东西不给毛泽东看，这个权力在政治局，而且是通过毛远新来实现的。毛远新有足够的机会瞒天过海，欺上瞒下。而毛远新又是被江青所拉拢、利用的人。在晚年的时候，毛泽东处在这些人的包围下，他能听到真实的声音，看到真实的情况吗？当然是很困难的。李敏在中南海的门口，冲着门卫所说的话：“你们不让我见爸爸，我爸爸知道了也绝不会赞成你们这样做的。你们这是封锁主席，为的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些话是有道理的。可惜的是，这对年轻人光是气愤了，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封锁的突破口，他们就此罢了手，把提纲销毁了。如果当时他们想出别的办法，让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那么国家的形势有可能逆转，起码是江青这个人，有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作这么充分的表演了。

记住了李敏的年龄

有的人说，毛泽东对他的女儿们比不上对周围的工作人员

亲。意思是说，毛泽东是个亲情淡薄的人。这是对毛泽东性格的一个误解。毛泽东是说过：“我的儿女一年见不到几次面，比不上你们在我身边来得亲。”要知道，他所说的亲，是亲近的亲，内含“远亲不如近邻”的意思。由于朝夕相处，熟能生情，相互间产生了一定的信任与了解。毛泽东同他的女儿是一种血缘的关系，血浓于水，这种亲情虽然由于时空的阻隔，未能经常相见，表达于言行之中，却深藏于心灵之内，这种真挚之情，是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

这种父女之情在随后毛泽东病重的时刻，就真切地表现出来了。

从毛泽东病危到去世，李敏总共进入中南海，见到父亲三次。

第一次是在1976年的夏天，李敏正在保定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毛远新打来了长途，告诉她毛泽东病重的消息。李敏立即赶回北京见爸爸。

这时毛泽东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组负责毛泽东的医疗问题。医生中，除了有负责诊断、医治的专家外，还有负责输氧、管麻醉的医生。护士有八个，分成三班轮流值班，日夜看护着毛泽东。

李敏到达时，毛泽东刚刚被抢救过来。中央的一些负责人，还有江青都在那里。李敏想走到爸爸的面前，仔细看看爸爸，被江青拦住了，只许她远远地望着。李敏看到爸爸面色腊黄，带着输氧气的罩子，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在床上。李敏回想到去年底爸爸生日那天，她同李讷去看爸爸的情形，那时爸爸虽然行动不便了，双手发颤，但是头脑清晰，谈笑风生，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病成这个样子呢？她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这时，站在一旁的江青说话了：

“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

江青只让李敏看她的父亲一眼，就赶她走了。李敏不肯走，说：

“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守候在爸爸的身旁。”

“你待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她继续说：“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愤极了：“怎么，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正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的华国锋和汪东兴，看看两个人僵持不下，只得过来动员李敏，让她先回去了。

李敏是一直流着泪走回家的。回到家里，她又痛哭了一场。她是毛泽东的长女，在爸爸病重的时候，竟然没有权利守候在爸爸的身旁，照顾爸爸的饮食，尽一个女儿的心意，她怎么能够不伤心呢？

江青果然在使坏，李敏从此听不到爸爸的消息，她打听不到任何关于毛泽东病情的状况。她曾经到过中南海的门口，请求会见，但没有获准。

时间已经进入八月下旬了。李敏从中央的一份文件中看到毛泽东病危的通报，她不顾一切又来到中南海的门口求见。这次，她进去了，见到了爸爸，而且能够走近爸爸的床边。江青当时并没有在场。

毛泽东仰卧在床上，面容憔悴，气息低微。原来他已经不能进食了，只能用鼻饲，由医生配方，用管子插进鼻子里。由于每次鼻饲完毕，都要把管子抽出来，下次喂食时，再插进去，很费事，也很痛苦，喂一次要几个钟头。毛泽东刚刚鼻饲

完毕，显得特别的疲劳。

毛泽东的双目原来是闭着的，此时微微睁开，他看到了床边站着一个人，认出是他的女儿李敏。毛泽东眼睛原来患有老年性白内障，手术后有一只已经复明。

他颤颤地伸出自己的手，去拉李敏的手，李敏会意了，赶忙把自己的手放到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的手仍然是温暖的，柔软的，他想象过去那样把李敏的手紧紧握住，但是已经没有了力气了。

李敏看到爸爸病成这个样子，眼泪又要流下来了，她竭力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她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

“娇娇，你来看我了？”毛泽东的声音很微弱，但神智是十分清醒的，他仍然习惯叫李敏的小名娇娇。

李敏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多常来看我呢？”毛泽东望着李敏，目光中充满着怜爱和惦念。

李敏的眼泪又要涌出来了。她能告诉她的爸爸她进不了这里的门槛的委屈吗？她记得，在陈毅同志去世那年，毛泽东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过后他就生病了。李敏知道爸爸生病后，就去看望他，那次，毛泽东也是这样拉着她的手，眷念地说：

“娇娇，你为什么不多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

李敏知道，爸爸的心正象妈妈所说的，是很孤独、很寂寞的，他也象普通人一样，希望得到家人的爱，享受到天伦之乐。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接着问李敏。

“39了。”

“不，你今年38。”

毛泽东重病在身，还清楚地记得女儿出生的年份，女儿的

年龄，父女之情又一次深深地打动李敏。她的眼泪又一次涌上了眼眶。

接着，毛泽东艰难地打起了手势，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说了一句话。

毛泽东的声音很轻，李敏听不清。她用眼睛询问站在旁边的服务员：爸爸说什么？服务员摇了摇头，表示他也没有听清。

娇娇当时猜想，可能爸爸是问孔令华的情况，但又吃不准，于是没有回答。

毛泽东看到李敏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没有回答，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他拉着李敏的手也松弛下来。李敏知道爸爸累了，于是轻轻地退了出来。

这是李敏生前同爸爸的最后一次会见。她一直猜不出、想不透爸爸最后的一个手势，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在她的心中，始终是个谜。

直到多年以后，有一次，她同一个挚友谈起这个往事，这个朋友若有所思地说：

“你爸爸会不会是询问你妈妈贺子珍的情况，或是嘱咐你要照顾好你的妈妈呢？主席用手势比了个圆圈，这个圆圈是不是合上你妈妈原来的名字桂圆的圆字呢？”

李敏听了，觉得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当时，毛泽东的身体已极其虚弱，他只能用最简捷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思想。在那种场合，有别人在旁，他不便直接询问贺子珍的情况，表达他对贺子珍的最后的怀念，因此打了个手势，说了一句话。要是这个解释符合毛泽东的心愿的话，那么，李敏觉得，她又有了一桩终身遗憾的事情，她未能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没能满足他最后的愿望。否则，她就会在爸爸临终的时候，在他的

耳朵边说上这样一句话：他所魂牵梦萦的妈妈贺子珍，最近身体健康，她一定会尽女儿的责任，照顾好妈妈。

又过了几天，中办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让她去看爸爸。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中南海。她以为是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想到见到的是已经仙逝的爸爸，输氧的罩子也已经撤掉了，李敏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天是1976年的9月9日。人们告诉她，毛泽东是零时十分与世长辞的。

全国人民沉浸在失去领袖的哀痛之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人民大会堂设灵，祭奠毛泽东。

江青以夫人的身份一面把自己放在追悼活动的中心，一面加紧制造舆论，为自己上台当女皇开辟道路。她没有一点悲痛的表现，却只让李敏为毛泽东守一次灵。李敏要求多守几天灵，江青不答应，轻蔑地说：“让你守一次就够照顾了，你没有资格参加守灵。”

李敏悲愤交加，她说：

“我即使不作为主席的女儿，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给主席守灵，为什么不可以？”

于是，一连几天，她站到长长的人流中，排队进入人民大会堂，去吊唁毛泽东。当她走到毛泽东的遗容旁，就肃立在那里，不肯走了。参加守灵的行列。开始，全副武装的卫士不让她在这里停留，她作了自我介绍，诉说她为什么要参加守灵的原因。她的恳切的言词打动了战士的心，这样，她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心灵的祭奠

在这风云变幻的1976年，江青作了充分的表演，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她的面目。贺子珍的目光也变得

深邃了。

有一次，她从报纸上读到一个国家的总统去世，他的妻子继任总统的消息。她对孩子们说：

“这个总统夫人把总统害死了，自己要当总统。江青象这个总统的妻子，也是个野心家。”

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传来，贺子珍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悲痛万分。她天天都看电视，看周恩来葬仪的情况，她对家人们说：

“你看江青在总理遗体旁的神态，哪有一点悲伤的样子！还有那个张春桥，满脸的凶相，总理准是他们害死的。”接着，她忧伤地说，“他们也会害死毛主席的。”

晚辈们听到贺子珍竟敢这样大胆地议论这些新权贵，都吓坏了，赶快制止她，怕她遭迫害。可是贺子珍轻蔑地说：“我还怕张春桥，江青这些人？笑话！”

当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出以后，李敏怕妈妈承受不住，让孔令华马上赶到上海陪伴妈妈，同时把他们的三岁的小女儿东梅也带到上海去，陪伴外婆，她自己则留在北京参加毛泽东的丧礼。

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对贺子珍来说，诚然是个新的打击，她哭了好几天，情绪极其低沉。她一面哭一面说：“你们的爸爸走了，他临终时连儿女都不在身旁，送送他，好可怜啊！”她还是按照传统的家庭养老送终的模式来设想毛泽东的去世，怎能理解作为一国的领袖，他的送终不单单是儿女们的事情呢。

她又一次埋怨李敏和孔令华，不该搬出中南海，没能很好地照顾爸爸，她说：“你们只顾自己，不想想老年人多么希望见到儿女在身旁。”

她知道自己是没有权利到北京去为毛泽东奔丧，她只能在

上海，在她的心灵里，默默地祭奠毛泽东。她流着眼泪，把黑纱披在毛泽东的像上，向毛泽东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她对毛泽东的一片真情已深深地埋在心底，海枯石烂，永远永远不会改变了。直到她的生命的终结，她不会忘记那些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中既温馨又艰苦的日子。她要象毛泽东那样为着那美丽的理想奉献自己的生命，她在毛泽东的像前含着眼泪祝祷：请安息吧！

她打发了侄女儿、外甥和外甥女儿去北京奔丧，请他们代表她向毛主席的英灵致敬。

悲痛并没有使她失去理智。相反，由于周总理去世时江青等人的恶劣表演，使她有所警惕，在毛泽东去世的那些日子，她密切地注视江青那一伙人的动向。她从电视中看到江青在毛泽东灵堂里的装模作样，哀痛地说：“江青没有一点悲痛的样子，她还得意呢，毛主席果然被江青害死了。”

贺子珍表现出少有的镇静，悲痛真的化为一种力量，使她坚强起来了。

二十五、悠悠未了情

命运再次打击了贺子珍

在悲悼毛泽东去世的日子，贺子珍同李敏她们的心贴在一起，泪流在一起。她们谁都没有说，在毛泽东去世，江青权倾当朝的时刻，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她们的头上。然而，她们又那么镇定自若，似乎充满了信心。这毕竟不是过去封建专制的时代，不是“女皇”一手可以遮天的时代了。我们有成熟的共产党，有无畏的人民，历史的车轮毕竟要前进，不可逆转。

她们没有等待多久，就迎来了阴霾去尽的祖国的晴天。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江青及她的同伙，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贺子珍同她的女儿李敏都露出了笑容，她们都深切地感到，扫除了“四人帮”，她们也都得到了解放。

此时的贺子珍，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了。她的身体已经衰老，但是她那颗要为人民做一点事的壮志雄心，依然未减当年。算来，她已经闲散了二十多年了，她无所事事，虚度了几十年最好的年华。过着这样无聊的日子，并不是她的所愿，是环境的所迫，她认为是江青的唆使。现在，阻挡她工作的这块大石头已经搬去，她觉得，是到了让她恢复工作的时候了。

她完全忘了，此时她已经68岁，即使按照现在的干部制度来说，也早已过了离休的年龄，应该在家里安度晚年了。

贺子珍这种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只想实现她当年回国的愿望做点工作，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她渴望工作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致她只想到了客观的可能，而忘了主观的条件了。她曾经对李敏说过一句话：“对你爸爸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你爸爸的遗志，为人民好好工作。”这句话的确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初期贺子珍的思想。

李敏也发现了，她的妈妈把对毛泽东终生不渝的爱情，变成了一种促使自己奋起的力量，她觉得，在哀痛失去毛泽东以后的妈妈，一改过去悲观、忧郁的神态，她变得开朗了，爱说爱笑了。

在1977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兴冲冲地去了一次福建，看望了刚得到解放的哥哥贺敏学。兄妹的这次会晤，是多年来最融洽、最欢乐的一次。这一对兄妹，一起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一段时间不见，彼此都十分想念，可是他们到了一起，又很容易为一些细小的事情发生争吵，而且有时还吵得很凶，各不相让。贺子珍同哥哥的关系远不如她同妹妹贺怡来得亲密。

贺子珍从福建回到上海，正准备实现她的雄心壮志，不料新的不幸又降临到她的头上。有一天，她一觉醒来，发现她的左手抬不起来，左脚也不听使唤。她赶忙喊人，嘴巴发出的声音都变了调，呜呜哇哇，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人们赶忙把她送进了医院，医生的诊断是中风，左肢偏瘫了。她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

这个打击对贺子珍来说，是异常沉重的。她的壮志未酬，却病倒了，一切又将成为泡影。特别是，医生又检查出她患有

糖尿病，这又是一种难治之症。她今后的岁月是否只能在病床上度过？想到这里，她禁不住热泪盈眶。

命运对于这个不幸的人为什么如此残酷呢？她的亲人们赶来劝慰她、照顾她，也不禁为她一生坎坷的遭遇而叹息。

正在贺子珍重又陷进哀伤、抑郁的情绪中难以自拔时，上海市委的一个负责人到医院来看望她，报告她一个可喜的消息：她被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政协委员。这位负责人还告诉她，这次政协会议同时增补了两名委员，这就是缪云台和王光美。这位负责人说，马上要派人来为她拍照，照片要同这个消息一起刊登。

这是贺子珍在上海居住了近三十年，上海市委的负责人第一次来看望她。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不要说市委的领导从不迈过她家门坎，就是她多次去市委求见，也见不到“真佛”的面目。她自从定居上海以来，只有陈毅曾经来看望过她。那是解放初期，陈毅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在电台播出后，上海市委没有任何负责人前来慰问，只派了一个小干部来通知了一声。

贺子珍本人并不知道，全国政协决定把她增补为政协委员，需要查阅她的档案，这才发现，无论在上海还是在中央组织部，竟然没有她的档案材料。这个从1926年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战士，竟是个没有任何档案的“黑人”，正式档案没有，文书档案没有，连无头档案也没有。江青这一伙人一手遮天，企图把她从历史上、从现实中一笔勾销。当时审议、通过贺子珍为政协委员的全国政协的常委们，对这种现象都义愤填膺，为贺子珍打抱不平。大家认为，江青对贺子珍的迫害，这是最毒辣的一手。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她，把她增补为全国政协的委员，这使

贺子珍受到很大的鼓舞。她看到，生活中并不只有哀愁，仍然存在着希望，她不能在哀愁中沉沦，而应该抓住希望，让希望照亮她的生活。她又一次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正视自己的疾病，同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同命运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她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

“我还要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她在医院里，是医生、护士公认的最听话的病人，服从治疗，积极配合医生的每一项医疗措施。她听说，要使瘫痪的肢体恢复功能，除了按摩以外，还要进行针灸和理疗。这样，她每天的治疗时间就要拖得很长，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虽然她每天被折腾得很苦，但无怨无悔。

医生还告诉她，为了使瘫痪的左腿恢复功能，需要进行适当的活动，她欣然同意了。每天吃中饭、晚饭之前，她由护士们搀扶着，要在病室里走上几圈。由于左腿不听使唤，她的步履艰难，很吃力，常常全身冒汗，但她总是坚持着，一定要走完该走的路。

1979年6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和照片，第二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新闻和她的照片。照片上的贺子珍，满头银发，面颊丰腴，坐在轮椅上，正同她的外孙女儿孔东梅一起看画报，她的神态沉静安详。

这条不长的消息，一张普通的家庭照片竟然在中国的大地上引起了轰动效应。熟悉贺子珍的老战友们惊喜地说：江青倒了台，贺子珍重见天日了。并不认识贺子珍的年轻一代，一鳞半爪，道听途说，了解了贺子珍的一些过去，把她看成是传奇性的神秘的人物，他们欣喜地看到，这个人物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来来了。

于是几十封信函飞到贺子珍的身边。写信的人有的是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一位在1929年担任过毛泽东忠勤员的老同志特地发来了电报说，要不是看了报纸，以为贺子珍已不在人间了。一些年轻的素不相识的人在信中对贺子珍表示崇敬，他们对江青利用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干尽坏事，深恶痛绝。还有的信来自她的老家永新，是故人的怀旧，讲起当年她的父母在南街开设“海天春”，以及他们投身革命的情形。

还有一封信来自福建龙岩，一位自称林大姑的妇女托人代笔写来一封信，说到贺子珍1929年曾托邓子恢将女儿寄养在她家，当时说，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能见面，可是解放三十多年，我已经78岁，仍不能见面。这封信，自然又引起贺子珍感情上的一次波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上海市委，领导班子已经换过，清除了江青的亲信，他们对贺子珍关怀备至，不时派人到医院去探望贺子珍，问寒问暖，还征求过贺子珍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贺子珍把放在心底三十年的愿望吐露出来：

“我想去北京，我想瞻仰主席的遗容，我想看看天安门。”她吐字艰难，但人们听清楚了她的心愿，并将这个信息迅速传递到北京的党中央。

在北京的李敏，在清除了江青的干扰后，也感受到党中央对毛泽东后代的关怀。中办的负责人感念李敏在吊唁毛泽东时所受到的压抑和限制，不能充分表达女儿对父亲的眷念之情，特地在李敏的住所，为她设置了一个毛泽东的灵堂。墙上是深紫红色的丝绒帷幕，在帷幕前紫红木的半高立柜上，放着毛泽东的遗像和李敏一家人敬送的小型花圈，上面罩着个很大的长方型玻璃罩。这个灵堂至今仍然保留在李敏的家里。

非常敬重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也关注

着李敏。她曾经找到李敏，对她说：“你搬出中南海后，见父亲很难了，为了纪念父亲，你愿意搬回中南海去住吗？”

李敏谢绝了。她说：“爸爸希望子女们独立生活，我才搬出中南海。现在爸爸去世了，我更没有必要回中南海去住了。”

党中央的负责人听到上海市委的报告，贺子珍想到北京，立刻作出了安排。1979年的9月，一架专机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到了北京。住进了301医院的高干病房。原来在上海负责她的医疗的医生、两名护士、两名服务员，也跟随她一起来到北京。

在北京居住的一两年时间，特别是刚到北京的初期和中期，贺子珍的情绪是乐观的，高昂的，这是在她的后半生中，少有的心情舒畅的时期。在她向望了三十年后，她终于来到了北京。虽然她是被人抬下了飞机，没能用自己的双脚，踩在北京的土地上，但是她终究是生活在北京的蓝天下，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她万分的激动。

她原来的许多老战友康克清、曾志、钟月琴、彭儒，钱希钧等人，络绎不绝地来看她，她感到好快乐。这些老战友一直没有断过同她的往来，每次去上海都要去看她。但那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象在北京那样，相见得那么频繁，那么集中。同老战友一起，回忆过去战争年月中一些有趣的琐事，这使她感到快乐。

她到北京以后，一如在上海那样，积极治疗，锻炼身体。她坐在床上，常常用右手托起那不听使唤的左手，一上一下地活动着。她笑着解释说，这是她自己想出来的锻炼的办法。每天为了锻炼腿，护士要搀扶她在屋里走两圈，但并没有安排她锻炼手的活动，于是她就自己锻炼起来了。另外，她还不停地活动她的右手。每次有客人来访，她都要建议同客人掰手腕，试试她右手的力气。她说：“我只剩这只手了，我一定要

保护好它。这只手要再不管用，我想工作更没希望了。”

贺子珍直到这个时候，仍然念念不忘要恢复工作。这个信念鼓舞着她，使她把病倒以后的生活过得充实，有意义。

到北京来以后，她看不到大参考了。但她仍然坚持天天看报，听新闻广播，看电视新闻。有时候她一个手举着报纸看很累，就请护士、服务员帮助她读报。她看报集中看头版的头条新闻，她说：“最重要的消息就登在头版头条了。”不过她介绍，毛泽东读报可不是这样的，他总是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连报缝中的地方新闻他都不放过。他常常说，国民党报纸上的东西，不仅要正面文章反面看，而且要看到字面上没有的东西，才能了解到敌人的动向和真正意图。当然，贺子珍也说，对我们自己的报纸，那就不必用这种方法去看了，最重要的新闻总是登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读了它，就可以理解了党的意图。

她读报时，对于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也感兴趣。比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她很关心，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再长，她都让身边的人读给她听。她并不是听了就算了，还用脑子去想，有时还用她那含混不清的语言同别人争论，为什么她是这样看的。从这些方面看到，贺子珍并不是象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个人感情生活的目光窄小的人。她不仅关心政治，了解社会的动向，而且还有自己的看法。她经常一面看报，一面评论，有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的。

终于看到毛泽东的遗容

到北京后，她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而为了安排她的这次活动，上海的和北京的医务人员煞费苦心。从医疗的角度看，她们不希望贺子珍到毛

主席纪念堂去。根据以往的经验，她的神经经受不住过强的刺激，过份强烈的刺激会造成她精神的崩溃。建国初期骤然听到毛泽东声音的广播，1957年与毛泽东庐山的会见，都使她的神经受到严重的伤害，因而大病了一场。现在她的身体比过去更差，半身偏瘫，还患有糖尿病，如果出现上两次大发作的状况，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贺子珍这次到北京来，不正是为了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吗？不去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只能够采取缩短停留的时间，设法控制她的情绪，不使她陷于过度的悲痛之中。

在行动前的两天，她周围的医生、护士、服务员还有她的女儿，女婿，就做她的工作了。他们不断地对她说，毛泽东的灵堂是非常庄严肃穆的，不允许发出任何的声响，千万不能在那里大声恸哭，否则警卫们会认为有意破坏灵堂的秩序的。贺子珍是个最遵守纪律的人，她频频点头，记住了医生护士的话。

在去毛主席纪念堂的头天晚上，医生让她服了安眠药，让她好好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她梳洗完毕，就要出发了。她对护士说：

“我要手绢。”

她这是准备眼泪流出来时用的。护士随手递给她一条粉红色的手绢。她摇摇头，说：

“不要红的，不要红的。”

最后，她是拿了一条洁白的手绢走的。这条手绢，她一直用右手拿着，直到回到医院。

她是坐着轮椅从毛主席纪念堂的正门进入的。她一眼见到前厅毛泽东的坐像，眼泪就象泉水般地涌出来了。李敏、孔令华，还有她的外孙孔宁宁、外孙女儿孔东梅，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花圈，敬献在毛泽东的坐像前。这是一个一米五高的桃形

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敬献给毛泽东的花圈是什么形状，挽联上怎样写，李敏都征求了妈妈的意见。桃形的花圈象征着一颗心，表现出贺子珍同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对毛泽东的一颗矢志不渝的赤胆忠心。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仍然活着的人，永远会记着他。

贺子珍在挽联上写上“永远继承您的遗志”，这句话看来是非常的普通，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挽词，但是贺子珍认为，只有这句话，才能准确地表达出她此时的真情实意。她难道不知道自己已进入暮年，而且百病丛生，她加紧锻炼，希望康复，不正是想多少做一点工作，为毛泽东未竟的事业，出一把力吗？

她把自己称作毛泽东的战友，她觉得这个称谓再恰当不过了。他们曾经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曾经是两心相知的战友，这种同志之情，战友之义，贯穿在他们生命的长河中，直至永远，他们的友情将超越时空，超越生死，达到永恒。

贺子珍含着满眼的泪水，被缓缓地推进了灵堂。灵堂庄严肃穆，两排威武的年轻战士，肃立在水晶棺的两旁，葱笼的长青灌木，包围在水晶棺的四周，在那里，就长眠着中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贺子珍的泪水再次涌了出来，她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了。推着轮椅的护士连忙在她的耳边低低地说：“姨妈，这里不许哭的，千万不要哭。”

上海华东医院的护士、医生，都习惯称贺子珍为姨妈，这是跟她的外甥女儿贺海峰叫的。在贺子珍半身偏瘫住进医院后，由于李敏住在北京，无法照料妈妈，是海峰常常到姨妈的病榻前照顾老人，她每次来都是姨妈长，姨妈短的叫得亲热，于是大家都跟着叫贺子珍为姨妈了。

护士的话音刚落，医生也来打招呼了：“姨妈，你不要哭，你要坚强些。”

贺子珍记住了医生护士的话，用牙齿咬着手绢，强制着把眼泪流进肚子去，不让哭声发出来。但是，眼泪仍然模糊了她的双眼。她是含着眼泪隔着几米远的距离瞻仰水晶棺里毛泽东的遗容，看得并不真切，只觉得比1959年庐山会面时瘦削多了。她还想靠近一些多看上几眼，但是轮椅既没有往灵柩旁边靠，也没有停步，还是按照原来的速度，缓缓地推出了灵堂，结束了这次的瞻仰活动。

医生们的安排是成功的。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后的贺子珍，虽然情绪上表现出压抑，若有所失，但并没有出现精神失常的状况，更没有大发作的症状。陪同她一起参观的人，在回到医院以后，有意制造一种兴高彩烈的气氛，一会儿讲天安门怎样壮观，天安门广场怎样宽广，一会又说人民大会堂怎样雄伟，人民纪念碑如何巍峨。她们尽挑高兴的话说，把贺子珍的思想从悲痛中引开，这种精神转移法还真收到了效果。

有的人在读到有关贺子珍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报道，看到贺子珍在毛泽东的遗容前，并没有哀痛欲绝，失声恸哭，曾经评论说：贺子珍对毛泽东的感情也变淡了，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这真是委屈了贺子珍。人们并不知道，为了怕她伤感，不让她放声大哭，医务人员用了多少办法。有着五十多年党龄的贺子珍养成了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习惯，别人说，“毛主席的灵堂不许哭，”她也就拼命地压抑自己了，可冷她连毛泽东的遗容都没有看清楚就一晃而过。而且第二年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她的女儿、女婿建议让贺子珍再去一次毛主席纪念堂，医生都不同意，没有去成。这样，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只去过毛主

席纪念堂一次，也就是在去毛主席纪念堂的路上，看了一眼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以后，直到她重返上海，再也没有离开过301医院的病室。

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而且是贺子珍这种身份的行动不便的老人，她的每一个行动，都要惊动很多人，不仅要得到医务人员的批准，由医务人员随行，安排汽车，甚至报告中办，非常繁琐，而且人们的倾向是一动不如一静。它不同于普通的人家，由儿女们推着，想上哪里就去哪里。贺子珍是一个不愿意给别人找麻烦的人，她虽然很想多看看北京，但并没有开口。因此，北京的名胜，贺子珍哪一处都没有去过，仍然只能从电视中欣赏古都的景色。这对她来说，不能不是终生的遗憾。

在贺子珍逗留北京的后期，她的病情出现了反复，糖尿病的症状加重了。这与她的情绪的波动有很大的关系。

跟随她一起来京的医生、护士，都陆续返回上海了。日夜照料她生活的两位服务员，一位已经走了，与她感情最好、对她照料得特别周到的另一位服务员，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她也要走了。贺子珍很舍不得，但无法挽留，于是在服务员离去后情绪低沉，睡眠、吃饭都不好。

而更使她心情烦躁的是她到底是留京还是回上海。她的女儿、女婿希望妈妈留在北京，这样，他们可以经常来探望她，照顾她。而她的哥哥贺敏学却一力主张她回上海，说是那里有一个气功师用气功治疗偏瘫有奇效，什么人治疗后竟能行走如常。贺子珍既想留在北京能够经常看到李敏，又想早日恢复健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使她举棋不定，万分烦恼。最后她自己下了决心，回上海去，先把病治好再说。于是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后，又回到上海。

她重新回到华东医院，原来的医生、护士、服务员又回到

她的身旁，这当然使她感到高兴，但是那位治瘫的神医并未能使她重新站立起来，这又使她大失所望。而现在要见到李敏，却是很难了。在贺子珍返回上海后，李敏知道妈妈思念她心切，曾专程到上海看望过一次，但这只能是短暂的时间，因为东梅已经上学，需要有人照料，她不得不赶回北京。

这样，贺子珍又远离自己的亲人，在病榻上，继续度着寂寞的岁月。

二十六、爸爸妈妈所留下的

毛泽东的遗产

在爸爸去世之后，在这个世界上让李敏牵肠挂肚的，就是妈妈了。妈妈半身偏瘫，卧床不起，这正是需要做女儿的问寒问暖，侍奉汤药的时候，可李敏却不能在妈妈的身边，这使她内心感到很不安。

李敏无法在上海长期居住，照顾妈妈，有种种的原因。儿子上大学，女儿上小学，需要她照料，这是一个原因。孔令华身体不好，胃病时常发作，还住过院，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她自己也病了。

她先是发现自己心脏不好，胸闷难受，以后又发现淋巴结肿大，继而胳膊疼痛，抬不起来，她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的毛病，睡不好，吃不好，使本来比较富态的身躯，日渐消瘦，原来的军衣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竟挑不起来。她真有点自顾不暇了。

李敏的生活也不富裕，去看妈妈来回的路费，对她也是沉重的负担。她同孔令华都是靠薪水吃饭，两个孩子上学花销还很大。孔令华虽然在部队里也有个一官半职，但每月所得也是有限的，他们总觉得手紧。

过去，他们把孩子送到贺子珍那里，象征性地每月寄一点钱，实际上孩子由妈妈来抚养，减轻了他们经济的压力。贺子珍自从住院后，她的医疗费用虽说是公家报销，但她个人的花费大大地增加，逢年过节她还要给辛苦一年的身边的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每月所剩无几。李敏也不忍心用妈妈的钱。

毛泽东生前一再告诫儿女们要艰苦朴素，生怕在自己身边娇惯坏了，以后无法适应平民的生活，李敏自从搬离毛泽东的住处，在中南海另辟住所后，就是自己做饭吃的，她有了工作和工资，就停止领取父亲给她的津贴，靠工资过着与普通干部一样的生活。

李敏生活的省俭，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冬天的熬白菜吃了一顿、两顿、三顿还没有吃完，她舍不得倒掉，下一顿热一热，接着吃。东梅正在长身体，需要有充足的营养，怎样又省钱又让东梅吃好，这可难为了李敏。她出门买菜，常常要在菜摊转好几圈，拣便宜的买。在冬天，为了给东梅换口味，她买暖房里出来的黄瓜和西红柿，净挑那些处理的黄瓜头和青颜色的拉秧西红柿。

李敏的穿着也不讲究。屋里屋外，常年就是一套布军装。女儿不穿的运动衫，她拣来穿。有一次，一位亲戚从鞍山看她，发现三九寒天李敏身上穿的竟不是纯毛毛衣，而是晴纶织成的，袖口和衣边都已经破了。李敏解释说，“好衣服我有，平时没舍得穿，留着出门或来客时才穿。”

的确，每年的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的纪念日，是李敏穿得最好的一天。客人一走，她马上般下来，叠好，收藏起来。有几年，孔令华每年特地给李敏买一件漂亮的新衣服，让她在主席生日那天穿。她穿过以后就收藏起来，压进了箱底，再也没有穿过。这些衣服式样都变老了，她还舍不得拿出来穿。

李讷在这一点上与她的姐姐是一样的。

李讷的家，也是一样的朴实无华。半新不旧的家具和沙发，反映了主人今日的生活水平。只有墙上挂着的毛泽东的巨幅生活照片，说明了屋主人的身份。

李讷也象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为每年几十斤平价的冬贮大白菜，排上长队，然后同丈夫、儿子一起，把它拉回家。

长得高高大大的李讷，身穿一件只有五六十年代的干部才穿的深蓝色干部服，扣子从领口一直扣到下面，下面穿一条深灰色的布裤子，一双黑布鞋，就像街道居委会的老大妈，而当时李讷不过48岁。

这些，都是女儿们从她们的爸爸那里继承下来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使她们安于普通人家的清贫生活。

看到她们如此简朴的生活，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没有给她们留下遗产吗？

毛泽东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的，也可以说是富有的。

毛泽东每个月的工资是有定规的。这些工资，他用来支付全家的生活费用，包括三个孩子的学杂费用。此外，老家故人来访，他们在京的花费，回去的路费和带回去的礼品，全部要从这里开支。毛泽东的工资要精打细算，才能做到收支平衡，否则就会出现赤字。五十年代时，毛泽东每个月要查家庭的收支帐，就是避免超支。

说毛泽东富有，是因为他拥有大笔的稿费。在五十年代，他的稿费就达到一百万元。这些钱存到银行里，每年按五厘利息计算，光年利就有5万元。这笔钱存到今日，数字相当可观了。

毛泽东是怎样处理这笔钱的？他把稿费全部交到中央特别会计室，由他们保管处理。特别会计室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

个单位，负责管理党费和党的活动费用的支出。

毛泽东的稿费，都派了什么用场？

稿费的一部分，用来给毛泽东买书。毛泽东极爱书，广为收藏，特别喜欢线装书。他年岁大以后，眼睛不行了，看小号字很吃力。在一次白内障切除手术之后，他看的书都换成大字本，而且排印成线装书。象《鲁迅全集》，就专门排成大字线装本，印书的钱，从稿费中开支。

有一次，毛泽东决定印一批书，他问中办的负责人想不想要，如想要，就多印一些。这位中办的负责人说，当然想要了，是否可以发得广一些，给每个政治局委员也发一套。毛泽东同意，这样，政治局的委员都收到用毛泽东稿费印的书。以后，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这样做不合适，政治局有一笔用以购书的钱，可以从这里支出。从此，政治局再没有用毛泽东的稿费印发过书籍。

毛泽东稿费的另一项用途是搞调查研究。毛泽东不时感叹自己下去搞调查，人们只给他看好的，不给看坏的，他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他建议组织一个机动的干部队，人员从各地，各县调来，一方面担任警卫任务，另一方面回去搞调查研究，调查结果直送毛泽东。他说：“这些人的路费由我来出。”他是用稿费支付调查费用的。

毛泽东个人生活很简朴，对自己要求很严。他除每月的工资外，从不因个人生活动用公家的钱。他的伙食补助费，是由中办负责人开条，经毛泽东批准，从稿费中开支。

由于工作关系，他常要留人吃饭。对一般客人，他从不让人家请他；除外宾外，他也不动用公家的钱。总是用稿费来请客。毛泽东请客，从来是四菜一汤。他自己点一个菜，请客人点一个菜，然后配两个素菜，一碗汤，就完了。毛泽东爱吃红

烧肉，每次总点红烧肉。

毛泽东的稿费，有时作了春节的礼金。毛泽东是个重感情的人，对支持过、帮助过他的人，念念不忘。在毛泽东年轻时，曾教过他语文的王季羣老先生，还有他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曾慷慨为他解囊的章士钊先生，他一直惦记着。每年过春节，都要给他们送点钱作年礼。

毛泽东的稿费还曾用来退赔身边一些工作人员的多吃多占。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下去时，买东西不给钱，随便收礼物，多吃多拿多占。毛泽东知道后，很不高兴，一面进行整顿，一面派人下去退赔。从天津开始，然后河南、山东、上海、杭州、江西、湖北、湖南，一路退赔过去，共退了两万多元。

江青也有这个毛病，走到哪里，多吃多占到哪里。在广州，买进口照相机不付钱，照相洗印相片不付钱，做衣服穿走了也不给钱，毛泽东知道了，都一一替她还了。

毛泽东的稿费，还用来给贺子珍买过药。贺子珍在建国后，身体不大好，时时生病。毛泽东从李敏处知道后，很是着急，四处打听治病的良方，打听到后，不惜花钱买药送去。有一次，毛泽东特地派人给贺子珍送去一千元钱。

毛泽东的稿费，他自己动用的，每年不到一万元，光利息都花不完。在他的晚年生病以后，深居简出，这方面的花费更少了。

在毛泽东晚年，江青伸手要过钱。毛泽东从稿费中批了三万元给她。

在毛泽东去世后，有几年时间，没有任何人提起毛泽东的遗产问题。直到1981年，中办派人找李敏，了解她的生活和要求。李敏听到谈这个问题，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她在1961年离

开中南海时，毛泽东曾说过每月补助她生活费60元。1963年李敏有了工作，拿到工资后，自动停止领取这笔钱。这些年来她的经济一直很困难，是妈妈帮助她分担了孩子的抚养费，才支撑过来的。她对中办的同志说：“我没有什么奢求，如果可能，我只想要爸爸原来要给我的一份。”

这样，在1981年，李敏得到中办送来的8千元现金，一台20吋彩电，一台电冰箱。

这时，李讷已搬出中南海。中办给她送去一台20吋彩电，一台电冰箱。在1975年，毛泽东曾批给她八千元。毛岸青也得到同样的一份。

贺子珍已重返上海。她自己说，中办给她送去了两万元，她用这些钱买了一台20吋彩电，一部高档的录音机，放在病房里使用。

李敏知道妈妈只分到两万元，说：“妈妈应该得到的比我们多，现在她拿到的太少了。我爸爸生前曾经对我说过：“我在井冈山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东西，很多是你妈帮我抄写的，有的是根据她的意见修改的。我这个时期写的东西的稿费，其中有你妈妈的一半呢。”可是贺子珍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这是她的品德高尚之处。

李敏拿到8千元后，没有使用，也没有让家里人使用。她说：“我妈妈有病，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钱，不能老麻烦公家，这笔钱留着妈妈急需时用。”

贺子珍并没有用上这笔钱，但女儿的心意表达出来了。

全家为妈妈送行

1984年4月15日，李敏正躺在床上生病，中办突然来了个电

话，说：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要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李敏勉强爬起来，同孔令华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接他们去机场的汽车已经来了。孔令华搀扶着李敏上了汽车。

李敏本来就有心慌的毛病，听到妈妈病重的消息，心情沉重，心跳得就更快了。在飞机上，她脸色苍白，用手捂住胸口，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家里人给她服了治心脏病的药，安慰她不要过于担心。女儿东梅说：“我奶奶会好起来的。”李敏的两个孩子，都叫贺子珍为奶奶。

飞机到达上海后，一部小汽车已经等候在机场，把他们直接送到华东医院。

医生给他们介绍说，贺子珍从四月初就断续出现体温升高的现象，几天前变成高烧，而且便血，用过很多药都没能把体温降下来。

医生陪着他们来到贺子珍的病房。李敏看到，妈妈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消瘦憔悴，她难过得要落泪了。

贺子珍看到他们来了，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你们好。”

李敏俯身靠近妈妈，轻轻地说：

“妈妈，你好吗？我们来看您来了。”

贺子珍点了点头。她嘴唇动了几下，还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医生，就是为她看病的医生。她偏瘫后，说话本来就不清楚，现在在高烧中，没有力气，说话更轻，李敏听不清楚妈妈说什么，但他明白妈妈的意思，是为她介绍给自己治病的医生。

李敏又问：

“妈妈，您哪里不舒服？”

“我肚子痛。”

贺子珍的神智一直非常清楚，只是衰弱得很。

这时，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他们是听到居住在上海的女儿贺小平来电话，报告了贺子珍病重的消息，怕有什么不测，马上赶来的。贺敏学毕竟有经验，听说贺子珍高烧不退，立即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这是危重病人退烧的良药。他说：

“如果医院认为这种药太贵不能用，这个药费由我来出。”

医院表示，只要有利于抢救贺子珍，是不吝惜花钱的。于是贺子珍马上服用这种药。贺子珍服了药后，体温降下来了，并沉沉地睡着了。

李敏这才放下心来，离开病房让妈妈休息。

以后两天，他们天天去看望贺子珍。她退烧后，神智更清楚了。她高兴地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她还让护士给孙女儿东梅弄点好吃的。大家一颗心放了下来，以为病情好转了，谁知这是回光返照。18日晚上，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处在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再也不显示，她终于去了，享年75岁。

亲人们拥到她的床前，流着泪同她的遗体告别。李敏哭得气都回不过来了。

这时一辆小汽车开进了华东医院，是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听到贺子珍的噩耗，特地前来向贺子珍遗体告别，并慰问她的家属。

贺子珍的后事怎样办，骨灰安葬在哪里，这些事上海市委都定不下来，请示了中办，中办又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说：

“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

4月25日，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举行。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杨尚昆、杨得志、宋任穷、陈丕显、胡启立、乔石、郝建秀、王首道、蔡杨、康克清送了花圈。白栋材、玉芳、陈国栋、胡立教、杨堤、汪道涵、阮崇武、李坚真、曾志、陈琼英、刘英、彭儒、钱希钧、孔从洲等同志也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上海市、江西省、湖南省、福建省、浙江省、陕西省、贵州省、江西吉安地区、永新县的党和政府送的花圈，也安放在大厅内。

贺子珍的遗体放在大厅中央，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遗体前摆着她的亲属贺敏学，李立英、李敏、孔令华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汪道涵、阮崇武，以及贺子珍的亲属生前好友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在贺子珍的遗体前默哀，鞠躬，缓缓地绕遗体一周，向这位长征老干部告别。

贺子珍的遗容舒展、安详，象是静静地、深深地睡着了。

贺子珍的遗体在下午火化。以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回北京。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些未能去上海参加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的老大姐，都自动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些当年曾

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革命子弟，认识贺子珍的不认识贺子珍的都来了，他们要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最后的敬意。

安放仪式非常简朴。李敏把捧着的骨灰盒放在院子里的桌上，大家围着鞠躬，致敬，然后由李敏把它送进了一室，仪式就完了。

从贺子珍病重、去世、遗体告别仪式到骨灰安放，李敏一直处在哀伤的状态中，眼泪擦不干。她勉强支撑着她的病体，把妈妈的后事办完，在这之后她自己的身体更弱，病也更重了。

从妈妈那里继承的

令李敏最伤感的是妈妈没有留下遗言。她悔恨地说：“我看见妈妈烧退了，情绪也好了，以为妈妈度过危险期了，没有抓紧时间问妈妈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想到病情突然发生变化，妈妈处在昏迷状态，有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好后悔啊！”

李敏对自己的要求是过于苛刻了，这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当自己的亲人病危的时候，守候在她身旁的家属总是希望病人能转危为安。临终留言的提出，往往会使病人感觉到自己不行了，给病人带来刺激，这又是家属所不愿意的。这样，延误了时机，又使家属们留下了悔恨。

其实，贺子珍生前对李敏的嘱咐，是很多很多的，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贺子珍的留言。贺子珍留给李敏的精神财富，远远超过物质的财富。

按照贺子珍这样级别的干部，她给李敏留下的遗产是很菲薄的。她的遗物中，最值钱的东西是用毛泽东的遗产买的大彩电和手提式录音机。这两样东西，李敏都捐赠给医院了。贺子珍的全部遗物就装在三个箱子里，有一个箱子还是她从苏联

带回来的。在三个箱子里，有一半是衣物。一套呢料子制服，这是最好的衣服了。新添置的都是她瘫痪后做的内衣内裤，肥肥大，白布或绒布做成的，就象医院里的病号服。另一半是杂物，单位发的政治读本，来往书信，照片，还有就是她瘫痪后，市委老干部处用她的工资代她购买的生活用品的发货票。她给李敏留下的现金只有三千元。而这三千元钱，李敏仍然没有用。她说，爸爸和妈妈生前，都非常希望我寻找到哥哥姐姐。如果寻找到了，我就将这些钱分给他们用。

李敏的一片痴心，令人感动。在她的父母相继去世以后，即使寻找到哥哥姐姐，已经不能安慰母亲的寂寞了。更何况，她果真找到了哥哥姐姐，得到中央的承认，这个哥哥姐姐也会分到同样的一份遗产，并不需要从李敏的一份中分出一部份来。

李敏把从爸爸那里分到的钱想留给妈妈用，以后把从妈妈那里继承到的钱想留给杳无踪影的哥哥姐姐用，表现她顾及他人，很少想到自己的高尚的思想。

贺子珍留给李敏的最有意义的纪念物是毛泽东赠给贺子珍的真丝手绢，和那条贺子珍一直带在身边的红毛毯。红毛毯已经很旧了，而且烧坏过，织补过，它不过记录了人生一段美好的回忆而已。毛泽东给贺子珍的全部书信，还有贺子珍给毛泽东去信的手抄底稿，全部没有放在箱子里。

李敏还记得，她曾经在妈妈的箱子里，看到有一卷妈妈在白桦树皮上用毛笔写的诗稿。李敏闹不清这是妈妈自己的诗作，还是她抄录的诗句。在妈妈的遗物中，这卷白桦树皮没有了。

然而，贺子珍留给女儿的精神遗产却是丰富的。李敏承认，她的待人处事，深受妈妈的影响。

她从妈妈那里学到的最突出的一点是公私分明的思想。妈

妈的口头常常带着公家的字样：“公家的东西”、“公家的要求”、“为了公家”。她开口闭口就是“组织上”，组织上的决定，她都是无条件服从的。在妈妈那里，住的是公家房，用的是公家物，做的是公家事，连她自己都是公家的人。因此，在她的观念里，没有多少是属于自己的东西，连公家发给她的工资，她都慷慨大度，只要别人有需要，她都可以无偿地将她的所得奉送给别人。妈妈的这些思想，对李敏也深有影响。她从小就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公家的，连自己也属于公家，她在学校读书时，对那些无父无母的烈士子弟关怀备至，常常拿自己的另用钱给她们买一些食品和日用品。她觉得，这些钱是爸爸给的，也是公家的，应该同大家一起用。即使是家里的东西，她也认为是家里人公有的，不属于一个人。爸爸妈妈给自己的东西，她也不认为是个人的，别人也可以拿去玩，拿去用。

贺子珍待人热情真挚，她也学到了。有一个时期，孔令华得了急性痢疾，住到医院里，病情比较重。他在部队任职，按照当时的级别待遇，一个年轻的警卫战士住到他们家，协助李敏照顾孔令华。这位小战士才十五、六岁。热心地帮他们做些家务。李敏感到不安了，她不认为让战士做家务是理所当然的，她象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关心他，照顾他，吃饭给他夹菜，闲时教他学文化。后来，这位小战士回部队了，每次来京，总爱抽空来看看她。

贺子珍正直忠厚，实事求是，不搞个人恩怨，这一点，她也学到了，她听从妈妈的教导，对江青这个后妈一直是采取团结、尊重、忍让的态度。江青嘴碎、唠叨，计较小事，不一碗水端平，经常挑起一些小矛盾。李敏为了不让爸爸为这些事烦心，都容忍下来了。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只让李敏守一次

灵，同她讲话都是连讥笑带挖苦，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写了个揭发江青的材料，请她提意见。这份材料上，把江青养猴也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状写上了。李敏不同意，说：

“江青的问题不在这里，养只猴子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她养的猴，也并不是什么金丝猴，而是普通的猴子。我住在中南海时，我们还一起养过兔，养过鸡，爸爸还同我们一起照料它们。有一回，已经长到八斤重的一只大公鸡，跑到爸爸的床下打鸣。把爸爸吵醒了，惹得爸爸生了气，这才把它杀了。”

她还说：

“不能因为江青对党对人民犯了罪行，就连养猴也成了罪状。其实，爱养个小动物，并没有什么错，各有所好嘛。江青养了一段时间，把猴尾巴剁了，觉得没意思，就把它送到动物园去了。”

李敏自己认为，妈妈身上有一些好品质，她并没有学到，这就是妈妈对政治的关心和政治上的敏锐性。

贺子珍曾经要求过李敏，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把《毛泽东选集》四卷都读一遍。她说：“《毛泽东选集》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总结，里面包含了很多革命的原则，马列主义的思想。学习它，你就会在政治上提高一步了。”

然而李敏一直没把这四本雄文读完。她觉得，这些书不同于小说，了解个大概内容就可以了。而是要一篇一篇地读，一句一句地读，还要联系到当时革命的背景和进程来读，这对于中文水平很差、历史知识贫乏的李敏来说，真是太困难了。在以后的生涯中，她进一步体会到妈妈对自己的这个要求的正确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参加了一派，她所在的那一派有人受

了伤，跑到她的家里，她把他收留下来，没有报告。结果，江青倒台后，她被作为江青线上的人受到审查，她自己感到万分的委屈。后来，邓小平把她从国防科工委调到总政，这桩公案才算不了了之。她自己检查说，这是因为我政治上幼稚造成的，如果我听妈妈的话，学习政治，提高政治水平，具有政治头脑，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

如今，在李敏家的客厅里，在东端的柜子上，放着贺子珍的一张巨大的遗像。相片里的贺子珍，白发苍苍，神情开朗，笑容可掬，面容丰润，这可能是在文革的动乱结束后拍摄的。只有在消除掉江青的政治压力后，贺子珍才可能笑得那么舒畅。这幅遗像，是贺子珍逝世后，李敏从上海带回来的。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它就挂在灵堂上。

在房间的西墙，挂着一幅毛泽东在延安时的大照片。照片上的毛泽东，戴着解放帽，衣领敞开，也是满脸笑容，既潇洒，又健康。这两位老人，生前未能实现白头偕老的愿望，在他们相继逝世以后，在女儿李敏的家里，他们的相片日夜厮守，相视而笑。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李敏 · 贺子珍与毛泽东

作者 =

页数 = 3 0 3

S S 号 = 1 0 1 7 6 2 1 6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一、母女相逢在莫斯科

飞往莫斯科

旅居苏联的贺子珍

二、一个临时的不象家的家

她娇宠自己的女儿

贺子珍对岸英岸青倾注热情

谁都不提起的一个人：毛泽东

三、贺子珍的错误选择

贺子珍的难言之隐

与毛泽东婚变的原因

又走错一步

四、战争，改变了母女的生活

饥饿，困扰着她们

娇娇挨打

五、厄运降临

严厉的爱

是妈妈救了娇娇

愤怒的贺子珍

娇娇成了孤儿

六、贺子珍关进疯人院之谜

迫害并非来自王明

她怀疑是因为得罪了人

疯人院里的贺子珍

七、终于踏上自己的国土

母女再次重逢了

她坚定地说：回祖国去！

在归途中

八、为工作、为女儿费尽心机

艰难适应新工作

娇娇的教育蓝图

九、娇娇眼中的妈妈

旧情难忘的妈妈

倾囊相赠的妈妈

娇娇的后悔

十、贺怡姨妈

女中豪杰

？萌生写信的念头

不让姨妈道歉

十一、爸爸的召唤

她见到了爸爸

一个人的爸爸

贺怡的使命

- 十二、第二个妈妈
娇娇不肯叫江青妈妈
岸青被迫搬出中南海
学会“外交手段”
- 十三、全新的生活
爸爸供给制
四个人的爸爸
江青撕去伪装
- 十四、一年一度见妈妈
都向李敏打听消息
一封医治心病的信
- 十五、西瓜诗的风波
是西瓜画引出西瓜诗
江青承认：毛、贺感情未破裂
毛泽东说：我们家有三派
- 十六、父女情深
要女儿读破万卷书
劝女儿打扮的毛泽东
同爸爸一次最严肃的谈话
- 十七、毛泽东的感情世界
不能忘情于贺子珍
对江青复杂的态度
- 十八、庐山的会见
李敏不当探春
一次精心的策划
毛、贺相会在美庐
- 十九、贺子珍的疯狂
李敏结婚
再次发病的贺子珍
贺子珍的病症
- 二十、女儿的心意
专机把李敏送到南昌
爸爸倾诉了心曲
- 二十一、寻找慰藉
贺子珍重返故乡
寻找失去的儿女
- 二十二、初为人母的李敏
搬出中南海
陪妈妈看社会主义
轮到李敏严厉教子了
- 二十三、在“文革”的狂飙中
李敏不知该革谁的命
江青对准了“革命”的目标
“文革”中贺子珍一家
- 二十四、晚年的毛泽东
李敏难进中南海

	记住了李敏的年龄
	心灵的祭奠
二十五、	悠悠未了情
	命运再次打击了贺子珍
	终于看到毛泽东的遗容
二十六、	爸爸妈妈所留下的
	毛泽东的遗产
	全家为妈妈送行
	从妈妈那里继承的
附录页	